

列宁主义

列宁主义研究导论

〔苏〕格·季诺维也夫著

東方出版社



列 宁 主 义

列宁主义研究导论

〔苏〕格·季诺维也夫 著

郑异凡 郑 桥 译

東 方 出 版 社

ЛЕНИНИЗМ

— Введение в Изучение Ленинизма

Г. Зиновьев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а Ленинград 1926

根据苏联列宁格勒国家出版社1926年版本翻译

列 宁 主 义

LIENING ZHUYI

列宁主义研究导论

著者/〔苏〕格·季诺维也夫

译者/郑异凡 郑 桥

封面设计/马少展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北京新华印刷厂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0.25 字数/261,000

版次/1989年3月第1版 1989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2,200

 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ISBN 7-5060-0065-2/D·47

定价 5.40 元

译者说明

列宁逝世后苏联曾出版了一批论述列宁主义的专著，这既是普及列宁主义理论的需要，也是深入研究列宁主义学说的需要。季诺维也夫所著《列宁主义》一书是其中较有份量、较为重要的一本。可惜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斯大林的《论列宁主义基础》和《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成了解释列宁主义的范本，而所有其他论述列宁主义的著作都成了禁书，季诺维也夫的这本书也因而难以见到。

《列宁主义》一书原是作者在共产主义科学院和红色教授学院的讲稿，经整理后出版。这是一本具有特色的著作。

作者同列宁过往较深，在老布尔什维克当中比较了解列宁。季诺维也夫在1903年第一次会见列宁，在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发生分裂时拥护列宁的主张，属布尔什维克派。后在彼得堡多年从事党的秘密工作。1907年在党的第五次（伦敦）代表大会上同列宁一起当选中央委员，同时也是布尔什维克中央的成员。1908年夏应中央之召出国，从这以后季诺维也夫就长期同列宁密切共事。他们一起出席重要会议，如1912年1月党的第六次（布拉格）代表会议，1915年8月齐美尔瓦尔德会议（两人均被选入齐美尔瓦尔德左派常务局），1917年党的四月代表会议。他们一起编辑党的报刊《无产者报》、《社会民主党人报》和《启蒙》杂志等等。二月革命后两人一同取道德国回国，七月事变后为躲避临时政府的迫害，两人又一起避难于拉兹里夫的窝棚。布尔什维克党的一些重要文件如《几点纲要》（1915年）和《1917年3月4日（17日）的提纲草稿》，是两人合作起草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季诺维也夫还同列宁共同写作出版了《反潮流》文集。有这种合作共事的经历，季诺维也夫就

2F94/25
有可能不仅根据列宁的著作，并且还根据自己同列宁的接触和合作的体会来阐述列宁的思想，使本书的某些内容具有回忆录的性质，更加真实。

其次，本书写成之后曾经送给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看过，提过意见。此外，季诺维也夫长期担任共产国际主席，其任务之一就是向共产国际所属各党传播列宁主义和俄国革命的经验，他在这方面做过大量的工作，共产国际1925年通过的关于各国党的布尔什维克化的提纲就基本上采纳了季诺维也夫对列宁主义所下的定义。

第三、本书的写作方法也颇具特色。同斯大林论述列宁主义时所采用的逻辑归纳的写法不同，季诺维也夫是从历史和理论的结合上来阐述列宁主义的形成、发展以及基本内容的。作者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列宁各个时期的言论为依据，大体上循着民主革命、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世界大战、十月革命、无产阶级专政、新经济政策、一国社会主义问题这样一条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线索来阐述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再旁及一些有关的专门问题，如不断革命问题、革命的动力问题、民族问题，等等。有一些适于综合述评的独立问题，如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关系、党的作用、辩证法等问题，则独立设章，单独阐述。这种写法使读者能够随着历史的足迹在较为广阔的范围看到列宁主义是怎样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是什么，列宁主义在哪些方面、哪些问题上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对所有论点和提法，作者都不是简单地提出结论，而是旁征博引，用大量材料，包括列宁的论述和历史背景材料，来论证这些结论。他所引证的某些历史资料本身就很有价值，例如帕尔乌斯为托洛茨基《1月9日之前》一文所写的序言，被认为是最早提出“不断革命论”的文献，现在已很难找到，在《列宁主义》中却有大量的引文。

本书的第四个特色是力求用列宁的思想去回答苏联当时面临的迫切问题。正因为如此，作者用两章的篇幅专谈新经济政策，分

析新经济政策的经济内容和政治内容，在这里作者既同托洛茨基观点，也同斯大林和布哈林的观点展开争论。但是，作者在评价新经济政策的作用时没有充分估计到它对促进生产力发展所起的积极作用，明显地夸大了所谓富农危险，过份强调了城乡阶级斗争的严重性。书中涉及的另一个迫切问题是苏联的发展前途问题，即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问题。在这里季诺维也夫实际上是同斯大林展开论战。从书中对马克思和列宁观点的阐述可以看出，季诺维也夫所坚持的是传统的社会主义观点。按照传统观点，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不仅消灭剥削阶级，而且也消灭工人和农民这两阶级之间的差别，基于这种理解作者得出了单独一国不可能建成没有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取得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的结论。正是这一观念使他转而同原先的对手托洛茨基结成联盟。本书为我们了解和判断当时的争论提供了有代表性的第一手资料，这对我们研究列宁主义发展史很有参考价值。

本书写于1924—1925年，当时列宁的许多著作还不易找到，《列宁全集》第一版正在出版中。在这种情况下书中大量引用列宁的著作是必要的，并且也是全面阐述列宁思想所必需的。由于引用的版本不同，有些引语同以后出版的各版《列宁全集》文字不尽相同，为保持本书原貌，不同处均照本书文字译出。出处也照原书译出，译者所加部分用方括号标出。对《列宁全集》中文版的某些译文我们作了个别改动。在上述两种情况下出处的注释中均注明“参看”字样。

列宁逝世半个多世纪以来，对列宁主义的解释众说纷纭，看看列宁同时代人，特别是他身旁的战友、助手的解释，无论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对我们都会有所启发。我们希望此书的出版能为我国读者研究列宁主义提供一份有价值的资料。

作者的话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需要，其中包括苏联无产阶级所面临的问题，要求系统地论述列宁主义实质的著作，要求写出一些小册子，首先尝试说明列宁本人对一系列紧迫问题的真正观点，因为国际工人运动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些紧迫问题的正确解决。尽力之所及帮助解决这一任务，这就是笔者写作本书的目的。

正因为这个缘故，当涉及目前正在进行争论的那些特别重要的问题时，我们认为有必要大量地引用列宁的原文。在这种情况下，对我们这些列宁的学生来说，最首要的是完整地准确地弄清楚列宁对这些争论问题是怎样想的和写了些什么。显然，事情还不仅限于此。但是，了解列宁的观点，这是我们大家首先需要做到的。

越是反复阅读列宁的著作，就越感到我们还多么不善于利用列宁主义宝库。由于工作关系，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从1907年到1917年这十年中的全部重要的手稿都曾经经过我的手，我曾读过好多次（校样等等），还事先讨论过等等——但是甚至这些著作现在读起来仍然常有崭新之感。

列宁的著作是如此深刻、全面，其内容是如此丰富，每读一次都会有新的发现。

反复地阅读，反复地研究列宁原著吧！了解列宁就是了解通向世界革命胜利的道路。

本书所涉及的远非全部问题，而只是列宁主义的一些基本问题。书中几乎完全没有涉及诸如民族问题、帝国主义理论和工会等问题。也许以后我们能够把这些问题补充进去。本书目前这种

样子仅仅是**列宁主义研究导论**的习作，然而，作者希望能够对那些全面地独立研究列宁主义的人有所裨益。

* * *

谨向娜·康·克鲁普斯卡娅表示热烈的谢意。她在阅读此书的手稿和清样时，给我提出了一系列极其宝贵的建议。

格·季·

1925年9月17日于列宁格勒

本书的基础是1924年底作者在莫斯科共产主义科学院和红色教授学院讲课的讲稿。P.皮凯利同志给了作者很大的帮助。

目 录

译者说明	1
作者的话	1
第一章 导言——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	1
论列宁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联系。 列宁主义的根源和组成部分。 列宁主义和农民问题。 列宁主义的世界历史意义。	
第二章 小资产阶级“从左面”对列宁主义的批评 (二十世纪初)	16
关于想比列宁“更左”的人。 民粹派“从左面”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批评。 论“从左面”批评布尔什维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性。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立场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从左面”对他们立场的批评。	
第三章 无产阶级和农民民主专政	32
为什么俄国成为列宁学说的故乡。 布尔什维主义在1917年是否重新武装过。 列宁论无产阶级同路人的有条件的革命性。 列宁论俄国革命的性质。 论俄国和西方的相互作用。	
第四章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	46
论列宁主义发展的有机性。	
第五章 列宁所理解的民族革命	55
论革命人民专政和苏维埃的意义。 托洛茨基不理解民族革命的意义。	
第六章 运动的规模和列宁的分析(1914—1917年)	72
布尔什维主义和帝国主义战争的开始。 从1917年2	

月到4月代表会议时期的列宁主义。1917年的4月代表会议。十月的日子。列宁主义的一般理论路线的彻底性。

第七章 马克思和“不断”革命 103

马克思赋予“不断革命”概念以什么内容

第八章 帕尔乌斯和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 109

布尔什维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之间的分水岭何在。

帕尔乌斯和托洛茨基对动力的估计。帕尔乌斯-托洛茨基的“理论”和革命的教训。不断革命“理论”的基本错误。

第九章 从国际经验谈谈革命的动力问题 131

论波兰社会民主党的几个错误。论罗莎·卢森堡的错误。德国革命的经验。

第十章 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 151

巴黎公社和苏维埃。列宁在进一步制订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中的作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两个时期。无产阶级专政、革命法制和苏维埃民主制。论乌斯特里亚洛夫对苏维埃制度正常化所作的错误解释。论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有关的两种危险。

第十一章 列宁主义和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和国家资本主义 179

论布尔什维主义在总的进攻路线下的暂时退却。新经济政策的世界历史意义。新经济政策和工农联盟。农民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

第十二章 列宁主义和新经济政策。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 209

论苏维埃国家中的阶级斗争。论领导农民。党的纲领和新经济政策。列宁的政治遗嘱。我国继续发展的前景。

第十三章 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 229

马克思和列宁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所下的定义。

论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所需的时间。 论国家的“消亡”或“自行停止”。 论社会主义在一国的胜利。

第十四章 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在一国胜利问题…………… 237

论社会主义革命在俄国最终胜利的两个条件。 论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规律。 为什么由俄国“开始”。 社会主义是否可能在一国取得最终胜利。 论争取社会主义斗争的速度和时间。 论我国革命同国际革命的联系。 工农联盟和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 托洛茨基不懂得农民在无产阶级胜利后的作用。 列宁论合作制。 论目前我国经济的高涨。 论幻想的危险性。 论民族狭隘性。 取得胜利和巩固胜利。

第十五章 列宁关于党的作用的学说…………… 279

阶级和政党。 全体参加的组织和先锋队的作用。 工人党还是“工农”党。 党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作用。 党和苏维埃。 论党的领导作用。 党和列宁主义的组织原则。

第十六章 列宁主义和辩证法…………… 302

列宁和辩证法。 列宁论马克思的辩证法。 论“转变”。 列宁对生气勃勃的社会力量的发展的估计。 在列宁对“目前”局势的分析中未来形势的轮廓。

第一章

导言——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

什么时候以及为什么在国际工人运动中说起列宁主义来的呢？

最早使用这个词的是列宁的反对者，大约是在1903年，在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开始出现分歧之时。那时这个词是用于论战目的的，反对者企图把列宁的观点同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对立起来**（经常使用的是“布尔什维主义”，但是在特别想要“刺激”布尔什维克的时候就用“列宁主义”），企图把列宁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雅各宾主义混为一谈。

列宁当然是最坚决地反对这种做法的。他认为自己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实际上他也确实是这样的人。

列宁逝世之后，布尔什维克不仅在俄国，而且在全世界谈论作为一种学说的**列宁主义**。

毫无疑问，即使现在列宁本人也会反对这种用语的。其原因是凡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为人略有所知，从而了解他的谦虚品质的人都知道的。

但是我们作为列宁的同时代人和他的学生，现在有**责任**来谈列宁主义，就象马克思事业的继承人当时应该谈**马克思主义**，或者达尔文观点的拥护者谈**达尔文主义**那样。这不是简单地出于对伟大导师的尊敬和爱戴，而是革命运动的最根本利益的要求。

要谈“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这个题目，最好是以列宁的著名文章《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作为出发点。这是一篇不长但极端重要的文章，是1913年3月列宁流亡克拉科夫

时写的。我清楚地记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怎样写这篇文章的。

在这篇文章里，列宁在恩格斯^①之后指出，马克思主义是19世纪三个主要思想流派的继续和完成，即1. 德国的古典哲学，2. 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3. 法国的社会主义。

“马克思的学说所以万能，就是因为它正确。它十分完备而严谨，它给予人们一个决不同任何迷信、任何反动势力、任何为资产阶级压迫所作的辩护相妥协的完整世界观。马克思的学说是人类在19世纪所创造出来的优秀成果——德国的哲学、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社会主义的当然的继承者。”^②

科学社会主义象任何一种新的理论一样，在它产生的时候应当利用它以前就已存在的知识。马克思主义的上述三个来源就是这种知识。

在《卡尔·马克思》一文中列宁指出了马克思世界观的组成部分：哲学唯物主义、辩证法、唯物史观、经济学说，科学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策略——这里当然也包括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马克思主义的考察对象既包括自然界的生命问题，也包括社会发展问题。但是马克思主义不仅仅是“解释”世界，它还指出改造世界的途径。马克思主义要求我们掌握并阐明历史发展的前进运动中所产生的具体的、新的东西。只有在理论和实践统一的条件下，马克思主义才能在社会历史发展中认识特殊的和新的东西。

列宁在谈到“正确的革命理论”的必要性时，在《“左派”幼稚病》中正确指出，“理论并不是教条，它只有同真正群众性的和真正革命的运动的实践密切地联系起来，才能最终形成”！^③

① 恩格斯的《从空想到科学》及《反杜林论》。

② 《列宁选集》第2卷第441—442页。——译者注

③ 《列宁选集》第4卷第182页，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39卷第5页。——译者注

列宁主义首先就是对社会历史发展中的新的过程和世界工人运动(和整个革命运动)中丰富的新的经验的认识 and 对此作出的马克思主义解释,这些过程和经验是在马克思以后产生的,并且常常为第二国际的官方理论家所歪曲。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也就是在垄断基础上的垂死的、“腐朽的”资本主义)和已经开始的社会主义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列宁分析了帝国主义时代的全部矛盾,同时也描绘了无产阶级革命发展的整个图景,指出了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动力。列宁制定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 and 策略。他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在解释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新时代所提出的根本问题方面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新观点。

当然,决不能把列宁主义同马克思主义对立起来。列宁是马克思的最杰出的学生。离开马克思主义就没有列宁主义。但是,列宁主义首先以三次俄国革命的经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同时也从20世纪初直至目前阶段的其他许多革命运动的经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首先在下列问题的研究上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整个学说:

- 1)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
- 2)关于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和机制,关于无产阶级在帝国主义战争和世界革命时代的策略;
- 3)关于无产阶级革命以前、无产阶级革命中间和无产阶级革命以后无产阶级和农民的相互关系;
- 4)关于民族问题的意义,特别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运动对世界革命的意义;
- 5)关于党的作用;
- 6)关于过渡时期无产阶级国家的作用;
- 7)关于作为这一时期无产阶级国家的具体形式的苏维埃制度。

马克思和恩格斯首先总结了法国、英国和德国社会运动的经

验。在马克思的学说和西方经验中发展起来的列宁主义，首先同歪曲马克思主义的西欧社会民主党人展开了斗争（列宁同机会主义，特别是同考茨基主义进行了斗争）。与此同时，列宁主义还运用马克思的方法，总结了近东和远东——首先是俄国，其次是中国和印度等国家伟大的革命运动的经验。

在一定意义上可以划分下面三个阶段：

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个阶段**：从开始写作《共产党宣言》到马克思逝世（1847—1883年）。

第二个阶段——“马克思主义”的不肖徒弟的阶段：从第二国际建立到帝国主义大战开始（1889—1914年）。这个阶段，尤其是它的前半期有好的一面：建立了无产阶级的群众性组织，在工人阶级内部进行了大量的文化教育工作，等等。但总的来说，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这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歪曲马克思主义**的阶段。大约从1907年开始，在第二国际内部工人运动中的**革命派**（列宁、罗莎·卢森堡）开始在国际范围内在某种程度上结集在一起了。

第三个阶段——列宁阶段。列宁主义大约发端于第一次俄国革命的前夕（1903—1904年），而于1917年获得了第一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胜利。

没有马克思也就没有列宁。但是在第二国际领袖们对马克思主义干了那些勾当之后，在考茨基之流在**马克思的旗帜下**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修正”之后（尤其是在这些马克思主义的叛徒们进行反对俄国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的时候），不能不说在**目前形势下**，**离开列宁主义就不可能有革命的马克思主义**。

无产阶级专政在俄国的胜利，几乎遍及世界各地的无产阶级和农民运动的发展，殖民地、半殖民地日益增长的革命解放运动——所有这一切的总和构成了世界革命的开端。

列宁主义就是垄断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是帝国主义战争、民族解放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

主义。

* * *

列宁主义在农村人口占多数的国家(俄国)第一次取得了直接胜利。“我们应当记住,我们是在农民构成居民的大多数的国家里实现社会主义革命任务的。”(列宁。)这段话以及许多类似的说法说明了列宁主义的许多特点。正像俄国革命本身是在国际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一样,列宁主义也是整个国际无产阶级运动的产物。列宁恢复了马克思对十九世纪伟大的无产阶级运动(宪章运动、巴黎公社)的正确评价,清除了马克思主义的“信徒”对它们所作的机会主义歪曲;并补充了对欧洲、美洲及世界其他地区的发展着的新的群众性无产阶级运动的经验所作的马克思主义评价;总结了从20世纪初起以强有力的面貌出现的农民运动和民族革命运动的伟大意义,这样,列宁也就把马克思的学说提到了空前的高度。

列宁主义是在无产阶级专政开始取代资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的彻底发展。

认为马克思主义只是理论,而列宁主义只是实践的观点是不正确的。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时代,帝国主义战争和以俄国无产阶级专政为开端的世界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

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新时代的条件下的具体化和发展。

如上所述,马克思主义的谱系始于上述三个来源:1. 德国古典哲学,2.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3. 法国社会主义。但是,马克思不是把它们机械地综合在自己的学说里,而是把每一个来源“熔化”,然后铸成一个完整的世界观。

列宁所面临的已经不是这种任务。列宁的双脚站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学说的基础之上。无论是在理论研究中,还是在实践活动中,列宁都是完全以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和经济学说为出发点的。列宁在制订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战略和策略时全盘接收和运用了马克思主义。

但是，和马克思相比，列宁砸断了更多的“锁链”。列宁对新的世界历史时期的最重要的大事件作出了评价，从而给马克思理论本身加进了新的成分。因此，列宁主义在辩证法的运用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使我们对帝国主义时代的根本矛盾及基本规律有了清晰完整的理解，解决了整个新时代的特点所提出的一系列有首要意义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在我们的时代要成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就无论如何必须成为列宁主义者的缘故。

要弄清列宁主义的根本，哪些现代史中的事件是首先必需考虑到的呢？

第一，应当考虑到垄断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战争——特别是1914—1919年战争——的经验；这里还包括被这场战争波及的一些西欧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开端。

第二，俄国革命，或更准确地说俄国的三次革命，以及无产阶级和农民在这些革命中的作用。

第三，这里还应当加上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民族解放运动的经验和整个民族问题的意义。

这就是列宁主义本身的三个主要“组成部分”。

当列宁在1913年给马克思主义的“组成部分”下定义时，显然，他指的不只是书本、学派、理论和体系。他指的是阶级斗争的整个过程，世界历史的进程。

列宁主义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去阐明那些新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的产物，这些事件比英国革命、法国大革命、1871年巴黎公社具有更大的意义。

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下定义后的十年里（从1913年到列宁逝世的1924年）所发生的那些事件，是够填满整整一个世纪。而结果却是：这些事件集中出现在一段时间里，并且在短短十年期间就完成了全过程。这就是当代马克思主义，也就是列宁主义的新的“组成部分”得以如此“迅速”地产生并得到发展的原因。

“只有德国小市民才能想像，在这种伟大的发展中，二十年比

一天长，虽然以后可能又会有一天等于二十年的时期。”^①——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

列宁是一个天才人物。他是时代的代表，而这个时代真是狂飚与突进的时代。在数十年和数百年期间潜在地积聚起来的東西，在1905—1917年^②这段时间里就像火山的岩浆一样喷发了出来。量转变为质。列宁成了这个伟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运动的公认领袖。

1924年发表了列宁的有关制订第一个党纲的那些文件（见《列宁文集》第2卷）。由于这些材料的公布，才清楚地看到在1902年列宁已经作为理论家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而这时在俄国马克思主义者阵营里理论上的领导权是归普列汉诺夫掌握的。列宁在20世纪初不仅凭直觉，也不仅在策略上，而且在理论上也已经天才地预见到并描绘了人类生活中日益迫近的伟大革命的时代。

每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都必须明白：列宁1913年提出的公式（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组成部分”）现在已不完整，因为没有把列宁本人包括进去。按照列宁1913年的定义，老马克思主义总结的主要是德、英、法三国的经验；现代马克思主义，列宁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应当总结和正在总结的则还有其他许多国家的最伟大的世界历史经验，首先是俄国、美国、日本、中国和印度的经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繁荣和最初几次阶级大搏斗时期的欧洲经验作出了总结，列宁又补充了腐朽的资本主义和业已开始的为世界革命展开决定性搏斗的世界经验。

马克思和恩格斯当然清楚地知道，这些国家将有伟大的未来，我们在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也能找到某些甚至是直接有关这些国家日后发展的预言。但是不言而喻，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不可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48页。——译者注

^② 例如，在1904—1905年列宁已经是彻底的“失败主义者”（日俄战争），在1911—1912年，在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前夕发生的巴尔干战争中，他是更为彻底的“失败主义者”。

能全面地预见到这些国家所起的那种巨大的世界历史作用。

在《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一文中列宁写道：“现在东方（日本、印度、中国）的新兴阶级……日益觉醒奋起斗争的事实……愈来愈证明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①（着重号是我加的。——格·季·）

毫无疑问，事情确实如此。但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要想用世界现代历史的事件来加以证明、解释和发展，在马克思逝世以后就需要有列宁这样的人物。

现在没有列宁就“不可能”有真正的马克思。可以做一个“学院派”的马克思主义者，可以在讲台上马马虎虎地讲马克思主义，譬如说只讲到1900年，在讲课中不涉及列宁主义。但是，如果不是列宁主义的拥护者，要做一个真正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要做一个无产阶级的战士、世界无产阶级运动的自觉的参加者，那已经是不可能的了。

也许有人会向我们指出，我们所说的仅仅是老生常谈而已。可惜，事情并非如此。

关于第二国际的领袖们我们就不说了。弗里德里希·阿德勒不久前还企图指责布尔什维克，似乎他们“否认”马克思主义而“代之”以列宁主义。他说，布尔什维克越来越多地谈论列宁主义，而不提马克思主义，这决不是无缘无故的。

谁也不能否认，潘涅库克是欧洲范围内的大马克思主义者。也不能否认哥尔特过去也曾是个大马克思主义者。然而他们都不是列宁主义者。他们都想继续做旧的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拒绝按第二国际的精神去歪曲马克思主义，但他们也拒绝列宁主义。结果怎样呢？这使得他们起初成为“院士”，而后来例如哥尔特已经站到街垒的另一边去了。一个意大利的“左翼”共产党人（无疑，是一个真诚的革命者）前不久给我们写信说：“我不是布尔什维克，但我是共产党人。”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29页。——译者注

就是在我们自己的国家里也存在着这样一些人，他们认为一个人虽不是列宁主义者，却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前不久我们莫斯科的社会主义科学院改名为共产主义科学院，为此在学院院士的会议上发生了一场小争论。梁赞诺夫同志的发言很有意思。他确实这么说过：“记得我在1919年初就提出过更改名称的建议。但我当时是出于另外一些考虑，我现在就把这些考虑再重复一遍。我不是布尔什维克，我不是孟什维克，我也不是列宁主义者。我只不过是马克思主义者，而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我也是共产主义者。”^①

这是准确无误的速记记录。当然，这里有一半要归梁赞诺夫个人负责：大家都知道，梁赞诺夫同志“为了俏皮话，连亲生父亲都舍得”；但整整一半不能算在他个人的账上。我们还有一批同志也持有这种看法，他们很熟悉马克思，从本质上说都是真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也许不像梁赞诺夫同志那样坦率地说出这一点（坦率是梁赞诺夫同志身上的一个优秀的个人品质），但他们也是这么想的。

在列宁那里没有或者说几乎没有一点东西是不能从马克思主义“引伸”出来的。在这种意义上列宁数十次地把自己叫做马克思的学生。没有马克思就没有列宁。确实如此。不过与此同时我们现在也已不能离开列宁来谈马克思主义了。马克思更多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原先的“组成部分”，列宁则最鲜明地体现了作了增补的新的“组成部分”。现在没有列宁就没有马克思主义，就象没有马克思本人也就没有马克思主义一样。没有列宁，马克思现在已经不是完整的马克思了。马克思加上列宁，这才是现在的全部马克思主义。

列宁主义是**完全**符合当代阶级斗争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路线，甚至对诸如罗莎·卢森堡、潘涅库克这类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

^① 《共产主义科学院通报》第3卷第392页。

的著作，都不能完全给予这种评价，而诸如考茨基那种“马克思主义者”的“发展路线”则完全偏离了当代的阶级斗争。

再说一遍，整个列宁主义都是从马克思主义中生长出来的。正因为如此，现在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有权谈论马克思主义向列宁时代马克思主义的“转变”。马克思和恩格斯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先驱，列宁则是这一革命的领袖和领导者。这就是说，无产阶级革命在列宁时代已经从预见和长期准备的领域进入实行的阶段。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行时代本身带来了非常多的新内容，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全部天才也无法预计到的。只要指出这样“三条鲸鱼”就够了：1)党的作用，2)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同盟军——农民的意义，3)民族解放运动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意义。谁也没法否认，在这三个方面列宁主义提出了真正有决定性意义的论断，它们补充了马克思主义，以致没有这些论断在目前时代马克思主义就不成其为马克思主义了。由于生活和活动在另一个历史时代，完全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基础之上的列宁主义也在更大范围内的“地理”上行动了。它的活动范围延伸到俄国、美国、日本、印度、中国这样一些国家。

* * *

理解列宁主义在**农民**问题上提出的新观点尤为重要。

列宁主义关于农民是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可能同盟军的作用的观点是列宁主义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列宁“发现了”农民是工人阶级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同盟军。

这无疑只是列宁主义的一部分，但在目前阶段是相当重要的、有时是决定性的一部分。

我们已经说过，在整个列宁主义中几乎没有不能从马克思主义中引伸出来的东西。但仅仅是引伸——因为在马克思那里常常仅仅是萌芽状态的东西，列宁则把它发展成完整的思想体系。农民问题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可以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找到分散在不同地方的许多意见，说明远在列宁和俄国革命以

前他们已预见到农民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作用。列宁本人在卡·马克思传记的序言中援引了马克思 1856 年 4 月 16 日写给恩格斯的信中的一段引文，内容如下：

“德国的全部问题将取决于是否有可能由某种再版的农民战争来支持无产阶级革命。如果那样就太好了。”^①

仅仅几个字，但它包含了多少丰富的内容！工人运动加上再版的农民战争——马克思在 1856 年就是这么说的。

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一版中我们看到这样精彩的句子（在以后各版中被删掉了）：

“法国农民一旦对拿破仑帝制复辟感到失望时，就会把对手自己小块土地的信念抛弃；那时奠立在这种小块土地上面的全部国家建筑物，都将会倒塌下来，于是无产阶级革命就会得到一种合唱，若没有这种合唱，它在一切农民国度中的独唱是不免要变成天鹅之歌的”。^②

仍然说得简短扼要，但这里内容却相当丰富。没有农民的合唱，无产阶级的独唱在农民国家里就会变成天鹅之歌。换句话说，在农民国家里无产阶级革命没有农民的支持，就会失败。

90年代恩格斯在《法德农民问题》中写道，“社会党夺取政权已成为最近将来的事情，为了夺取政权，这个政党应当首先从城市跑到农村，应当成为农村中的力量。”“被我们挽救而没有真正转变为无产者，还在农民地位时就被我们吸收到自己方面来的农民人数愈多，社会变革的实现也就会愈迅速和愈容易。”“当我们掌握了国家权力的时候，——恩格斯代表本人和马克思写道，——我们绝不会用暴力去剥夺小农（不论有无报偿，都是一样），象我们将不得不如此对待大土地占有者那样。我们对于小农的任务，首先是把他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而不是采用暴力~~，而是通过示范和为此提供社会帮助。”^③ 恩格斯曾不止一次地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334 页。——译者注

②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699 页。——译者注

接近胜利了的无产阶级对待中农和小农的“布尔什维主义”策略。

还可以举出许多类似的段落。但是已经提到的这些足以说明这样一个思想，即在列宁提出许多宝贵的新思想的农民问题上，列宁主义完全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的“肩膀”上的。列宁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善于根据马克思或恩格斯无意中说出的天才意见，依据新的事件建立起一个完整的体系。而主要的是，接着把这些观点运用到最大的一个国家的革命中去，运用到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革命中去。

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地指出，正是因为有了列宁，布尔什维主义才能在农民问题上实现**国际化**。列宁的伟大不仅在于他能够在农民国家（即俄国）制订无产阶级政策时运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列宁的伟大还在于他能够在农民问题上，并且是在**国际**范围内提供这么多新的内容。共产国际现在在这个问题上所持的观点完全是列宁所规定的。可惜我们对共产国际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有关土地问题的著名决议宣传介绍得很不够，这个决议从头至尾都是由列宁起草的，并且由列宁对它作了逐句的说明。在这一纲领性文件中列宁主义在农民问题上的观点得到了最鲜明的表现。恰恰是在这个纲领性文件中，列宁主义在农民问题上**国际化**了。共产国际的全部斗争在今后许多年里都将在真正实现这一纲领的旗帜下进行。而且，近来谈得很多的布尔什维克化，在很大程度上也应该以实现这一纲领性文件所规定的任务为基础。

让我们简短地看一看在这个依我们看来是列宁主义的一个**最重要文献**的思路。“只有共产党所领导的城市工业无产阶级，才能使农村劳动群众摆脱资本和大地主土地占有制的压迫，摆脱破产，摆脱在资本主义制度存在时必然会一再发生的帝国主义战争。”但是，“另一方面，如果产业工人局限于狭隘的行会利益和狭隘的职业利益，只满足于为改善自己有时还过得去的小市民的生活状况

③ 恩格斯《法德农民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92、312、310页。——译者注

际范围内提出了许多新的东西。

可以相对地把布尔什维主义的历史划分为如下阶段：1、初期的布尔什维主义（俄国革命的性质）^①和2、发展了的布尔什维主义（关于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当然，这只是相对的。因为早在1917年以前，列宁就不仅把俄国革命的最终胜利和欧洲无产阶级的斗争联系在一起，而且还把它和东方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解放斗争联系在一起。

“无产阶级的国际革命运动在各个国家里并不是而且也不可能以同一的形式均衡地发展。只有在各个国家的工人所进行的总的阶级斗争中，才能充分地 and 全面地利用一切活动场所中的一切机会。每一个国家都把自己的有价值的独创的特点带进总的潮流里来，但是，在每个国家里，运动都有某种片面性的毛病，都有各个社会主义政党所具有的某些理论上或实践上的缺点。总的说来，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已经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无产阶级百万大军已经在同敌人的一系列的的具体冲突中团结起来，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决定性斗争已经愈来愈近。拿工人阶级方面来说，这次斗争将比巴黎公社即无产者最近一次伟大起义的时期要准备得更好，要好许多倍。

“除了亚洲的革命民主斗争的尖锐化以外，整个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这一进步也使俄国革命处于特殊的和特殊困难的条件。俄国革命在欧洲和在亚洲都有伟大的国际同盟军，但是，也正是由于这一点，它不仅在国内的敌人，不仅有俄国的敌人，而且有国际的敌人”^②（着重号是我加的。——格·季·）。

“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革命”。——在1905年革命时期狭义上的布尔什维主义可以归结为这一公式。“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革命”，这是一个新的伟大的公式，但还不是成熟的公式。“无产

① 然而，就在那时，即在它存在的最初年代里，布尔什维主义已经明确地把俄国革命的问题看作是国际革命问题的一部分。

② 《列宁全集》第15卷第161—162页。《世界政治中的引火物》，——译者注

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是它的代用语。1917年这个公式“发展成“工农革命”，或“无产阶级-农民革命”，或“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或“率领农民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等等。在这里，**无产阶级领导权**是所有这些公式中的主要内容。在这里在表述上有很多细微的差别，但思想是相同的。所有这些定义都能说明列宁主义政策的实质。

如果要给成熟的列宁主义，即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列宁主义下个定义的话，那就应当这样说：

如果说列宁在1913年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总结了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社会主义的学说，那末，我们就应当把列宁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看作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已勾画出基本轮廓而为列宁所发展的学说；除了上述三个组成部分以外，列宁又总结了三个新的组成部分：**第一**，垄断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战争和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开端的经验；**第二**，俄国历次革命以及无产阶级和农民在其中的作用；**第三**，被压迫民族的运动。

在目前革命时代的条件下，列宁主义中可以称之为关于革命动力的学说的那一部分具有特殊意义。在这种意义上可以有条件地把列宁主义看作起先是关于俄国革命动力的学说，然后是关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动力的学说。还可以简短地说，列宁主义是已经开始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 and 实践，其主要动力是：1) 无产阶级，2) 全世界农村居民中的三个最重要阶层，3) 被压迫民族。这里同时应当看到，被压迫民族及其解放运动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农民问题。

第二章

小资产阶级“从左面”对 列宁主义的批评

(二十世纪初)

在转入正题之前，先略为“清扫”一下道路，谈谈那些想比列宁“更左”的人，是很有益的。至少要谈谈他们中间的几个人。

布尔什维主义不仅是在反对右倾的斗争中，而且也是在反对无政府主义、“召回主义”、工团主义、最高纲领主义、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以及诸如此类的自认为并且表面上看起来比布尔什维主义“更左”的政治思想流派的斗争中形成和锻炼出来的。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时代马克思主义也曾走过同样的发展道路。

长期以来流传着一种看法，似乎“不断”革命论是从左面批评布尔什维主义的。在某些地方现在还存在着这种看法。这种错误看法是一部分不成熟的革命者还在继续对托洛茨基主义（帕尔乌斯主义，因为“不断革命”的基本思想是属于帕尔乌斯的）表示某种同情的原因。这些人对自己说，不管怎么解释，事实上帕尔乌斯主义-托洛茨基主义指出了俄国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而当时的布尔什维主义，尽管是在列宁领导之下，却还认为革命将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就是说，帕尔乌斯主义-托洛茨基主义从左面批评了布尔什维主义，也就是说，帕尔乌斯主义者-托洛茨基主义者看得更远，更是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更清楚地看到了无产阶级的历史比重有多大！……

必须详细谈谈这种“说法”。在《1905年》这本书中列·托洛茨

基写道：“布尔什维克则从‘民主专政，而不是社会主义专政’……空洞抽象的概念出发，得出……无产阶级接受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自我限制的思想。”^①请记住“自我限制”这个词。在同一本书的另一个地方，托洛茨基同志是这样说的：“现在有人建议用合作的庄稼汉给无产阶级政治上的自我限制加上一个客观的反社会主义的‘保证’。”^②在此书的另一些地方，托洛茨基谈到列宁的阶级“禁欲主义”，^③说列宁向工人阶级鼓吹禁欲主义、自我限制，号召他们不要越过既定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目标。在各种各样的“动人的”公式中，用不同的说法来表达这一点，但在所有的地方意见都是清楚的：你（列宁）想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自我限制”去束缚基本的革命阶级——无产阶级！你鼓吹“斋戒的革命”！你鼓吹“阶级禁欲主义”！你没有下决心充分地提出无产阶级革命问题。

这就是“从左面”的批评，它听起来是多么高傲自负，对那些不了解其真正含意的人来说又是多么诱人！

不错，布尔什维主义和孟什维主义在若干年间（大约从1903到1906年）曾经争论过俄国革命的性质。争论的问题是：我们俄国的革命是不是资产阶级革命，它在哪种意义上是资产阶级革命，或者它将是独特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革命，它在多大的程度上是这样的革命；无产阶级在俄国革命中将起什么样的作用，农民将起什么样的作用；革命的社会内容是什么。

但是，从1907年到1917年——整整的十年！——布尔什维主义和孟什维主义争论的已经不是革命的性质问题，而是总的说来第二次革命会不会发生的问题。从1907到1917年，孟什维克的立场是不仅反对革命中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而且反对任何第二次革命。孟什维克说，在1905—1906年间已经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结果有了一部宪法；革命是“从上面”进行的；现在的问

① 托洛茨基：《1905年》国家出版社版第285页。

② 同上书，第284页。

③ 同上书，第284页。

题已经仅仅在于沿着改良的道路——“普鲁士”道路前进。这些年里孟什维主义的实质在于**根本反对新的革命**。

在这关键的十年里，帕尔乌斯派和托洛茨基派在哪里呢？**恰恰是同孟什维主义站在同一个阵营里！**在这段时间里同托洛茨基在革命性质上的争论只是偶尔在文字争论的形式下闪现一下。但是，实际上争论的是：**总的来说革命会不会发生**。争论的是对孟什维主义的态度问题，孟什维主义已从日程上取消了**任何第二次革命**。这一事实本身就象蓝色焰火的光芒一样照亮了列宁主义同托洛茨基主义之间的全部历史争论。

帕尔乌斯主义-托洛茨基主义是从**左面**批评布尔什维主义的吗？我们的第一个回答是：帕尔乌斯和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口号清楚地反映了他们对俄国革命和国际革命动力无知的机会主义，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下面专门一章里详谈。我们的第二个回答是：在决定性的十年里托洛茨基主义和把**第二次革命从日程上根本取消的阵营同流合污了**。

在当时的全部政治斗争中都是在以布尔什维克为一方，以孟什维克和托洛茨基分子为另一方进行交锋的。整个反布尔什维主义阵营（包括托洛茨基分子在内）的看法是：**根本不会发生新的革命**，所以需要向合法地位扎根，象“欧洲”社会民主党那样，准备经过相应的几十年时间达到“最终目的”（按照某种伯恩施坦主义的理解），达到那个幸福的，但相当遥远的社会主义王国到来的时刻。整个反布尔什维主义阵营都（完全是“欧洲式地”）把“最终目的”看作是**需要向之顶礼膜拜的某种“圣像”**，但它终究只是个圣像而已。

所以，谁想了解帕尔乌斯主义-托洛茨基主义是否从**左面**批评布尔什维主义，他就应该看到：1903—1906年争论的实际上是革命的**性质问题**，而从1907到1917年，争论的则是关于**总的革命问题**，即会不会发生反对沙皇制度的第二次俄国革命，要不要为之进行工作的问题。

再重复一遍，应当牢记的事实是：**在同孟什维主义争论的不是**

革命的性质问题，而是关于革命本身的问题的那个决定性的十年里，托洛茨基主义乃是孟什维主义的组成部分。

* * *

为了更好地理解问题，我们可以回顾一下：

——是否有过一段时间，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流派，譬如说民粹派，社会革命党人曾明显地试图“从左面”批评布尔什维主义呢？有过这样的时刻吗？

问题就在于有过这样的时刻。

有一个时候，社会革命党机关报《革命俄国报》正是按照这条路线同以列宁为灵魂的旧《火星报》进行了激烈的斗争。以切尔诺夫为首的社会革命党人“从左面”批评了当时的列宁主义。他们正是在俄国革命的性质问题上反对《火星报》。任何一个熟悉这一时期文献的人都知道，无论是《革命俄国报》，还是当时由右翼社会革命党人鲁萨诺夫主编的《俄国革命通报》，在1902年到1905年期间制订自己反对‘火星派’和列宁的政纲时在很大程度上似乎是“从左面”对列宁主义进行批评的^①。我们引用这些纲领性文章中的一篇《一个读者的日记摘录》（《革命俄国报》1905年第70期第

^① 有些同志可能对这个问题感兴趣，并且打算专门研究这一题目，这是极其有益的，我们可以向这些同志推荐下列文献资料：1902—1905年间的《革命俄国报》和《俄国革命通报》杂志上刊载了一系列文章（几乎全都没有署名），反映了社会革命党人关于未来革命甚至在其变革的第一阶段就必然是社会主义性质的观点。这一思想经常出现于社会革命党人的土地理论中，在“土地社会化”观点的掩盖下阐述这个问题。下列文章就是按照这种思想写出的：1)《农民运动》（1902年第8期第3页）；2)《周年纪念》（1902年第14期第3页）；3)《社会民主党人和社会革命党人》（1903年第16期第5页）；4)《俄国革命纲领的基本问题》（1903年第32期第5页，第33期第7页）；5)《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1903年第38期第2页，1904年第40期第9页）；6)《未来的任务》（1904年第40期第2页）；7)《战斗的时刻》（1905年第59期第4页），还就这一问题写了下列文章：《论农民问题》（《俄国革命通报》1903年第3期第214页），《一个读者的日记摘录》（《革命俄国报》1905年第70期第10页，无署名）和《新事件和旧问题》（《革命俄国报》1905年第74期第1页，无署名）。

最后两篇文章尤为意味深长。

10页)；此文极端重要。这是一篇写于1905年1月9日以后的文章，当时革命已经在敲门了。文章没有署名，但显然是切尔诺夫写的。他分析了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不同派别之后，写道：

“俄国面临的变革将纯粹是资产阶级变革，这种观点已经成为各种色彩、各种流派的社会民主党人的教条了。他们的差别仅仅在细节上。有一批人追随列宁先生，把他们在逻辑上和政治上的大无畏精神发展到**准备用自己的双手为未来的统治者资产阶级建造宫殿**的地步(着重号是我加的。——格·季·)。他们准备参加未来的临时政府，但并不是为了迫使他们在政权中的伙伴给帮助资产阶级的起义工人以丰厚的报酬，不，他们参加临时政府只是为了巩固政治变革，防止反革命或被未来的无产阶级新革命吓坏了的资产阶级本身的反动意图，仅此而已。这种**自我限制**(着重号是我加的。——格·季·)是那些炫耀自己每时每刻都忠实于社会主义的人们特点。

“以马尔丁诺夫先生^①和《火星报》^②为首的另外一批社会民主党人，更忠实于拒绝同‘不纯人物’混在一起的学究式原则：他们把参加旨在消除加在工人身上的桎梏的临时政府看作是参加旨在继续统治工人的资产阶级政府内阁。因此，他们并不停留在局部限制临时政府的活动范围，而是得出根本不参加临时政府的思想。正如你们看到的那样，这是最大限度的自我阉割。”

切尔诺夫认为，“这两种人的错误根源完全相同”。其证明如下：

“不进行应有的批判性考察，就相信未来的变革是纯粹资产阶级变革这一原理，并且按照‘我们能用感情去征服理性认为必然的东西’这条规则行事，这样他们自然就立足于对社会主义政党来说是极端错误的原理上了：实现了尼·康米哈伊洛夫斯基曾经预言过的东西而米哈伊洛夫斯基为此被马克思主义者指责为‘造谣中

① 马尔丁诺夫同志现在是俄共党员，当时是著名的孟什维克领袖。

② 这时《火星报》已经成为孟什维克的报纸。

伤’。这位去世的社会学家曾向他们预言，他们如果要彻底，就应当成为资产阶级的不自觉的奴仆——当然，这不是为了资产阶级，而是为了资产阶级的‘积极历史使命’——但事实终究是事实。实际上现在提出一个在本质上和一些资产阶级纲领相符合、并且没有任何一点是从根本上破坏资产阶级社会地位的政治纲领，还有什么能比这更多地为资产阶级效劳的呢？结果那些在口头上自认为是当代主人的人和那些自认为是这些主人的不可调和的反对者之间，出现了极为迷人的接近。为了摆脱这种模棱两可的状态，社会民主党人倾吐积愆，对资产阶级自由派进行表面的、装样子的报复——时而对他们肆意谩骂，时而进行革命的煽动，而最后则两者兼施。”

列宁主义的红色教授式共产主义科学院院士（当然不包括那些认为自己“既不是孟什维克，也不是布尔什维克，而只不过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人”）的很好的博士论文题目就是：研究并说明社会革命党人怎样并且为什么“从左面”批评布尔什维克，社会革命党怎样借切尔诺夫之口证明“列宁先生”想对无产阶级实行“自我限制”并“为资产阶级建造宫殿”！

“自我限制”这个词是帕尔乌斯-托洛茨基主义者“投向”列宁主义者的主要非难，正象我们所看到的，切尔诺夫一字不差地重复了这个词。

谁要理解列宁主义和帕尔乌斯主义-托洛茨基主义之间的争论，首先他就不应当放过下面这一基本事实：最典型的小资产阶级政党，或者资产阶级民主派政党——如我们所熟知的社会革命党也企图“从左面”批评布尔什维主义。在1925年，我们已经很清楚社会革命党人是什么样的人。社会革命党是小资产阶级政党，它要举行反对沙皇的政治变革，而当无产阶级继续前进反对资产阶级时，则激烈地反对无产阶级。我们清楚地知道，社会革命党在决定性时刻不仅反对无产阶级，而且还拉渴望土地的农民的后腿：先等一等立宪会议，“暂且”让我们把土地委员会全体委员关入监狱，

把那些不愿按照英国帝国主义分子命令行动的士兵枪毙。社会革命党是典型的小资产阶级政党。

不仅如此，我们现在还知道“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是什么样的人。我们知道，在政治意识形态中往往要象观看中国的皮影戏那样：这样或那样的政治流派关于自己所说的一切往往并非它们的真实面目，而是它们所想显示的形象。“左派”社会革命党也是这样。我们现在就把他们揭穿了，我们揭去了“美丽”的魔鬼和这个曾是政治陌生人的面纱。别看那些“革命”词藻，“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事实上只是小资产阶级的激进变种，是一群疯狂的小资产者。而在沙皇专制制度垮台以前，在1905年及以后的年代，当一切都被压上沙皇专制制度的墓石时，当政治分界线还不那么明显的时候，当阶级差异分化得还不很清楚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一个奇怪的历史化妆舞会：小资产阶级的政党即社会革命党所指责的无产阶级革命党即布尔什维克党的过错，恰恰是它自己的过错。

请看，社会革命党人指责布尔什维克和“列宁先生”，说他在需要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的时候却想要无产阶级实行“自我限制”。社会革命党人有一个时候（在1905年以前）反对任何最低纲领。在社会革命党人中间产生了“最高纲领”派——事实上也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流派。当革命到来之时，当皮影戏不能再继续下去的时候，当需要革命炮火考验的时候，我们看到的社会革命党人并不是在某个时候他们所想表现的那个样子，而是他们的实际面目。这时候大家都看清了，这是一个带有某种富农的政治思想意识的小资产阶级政党，是一个已经不仅打算“限制”无产阶级，而且还打算“限制”农民的党：这个党事实上只是为资产阶级“民主”而争取政治自由，同时却竭尽全力去阻止群众进行“社会实验”，——这是它对革命的称呼。

谁不理解这个事实的意义，他也就不可能懂得目前争论的实质。

再深入一步，再远一点，可以说以普列汉诺夫为首的“劳动解

放社”和民粹派的争论有时也是按这条路线进行的。普列汉诺夫和“劳动解放社”认为自己存在的意义就在于去证明：俄国工人阶级正在诞生，我们——工人阶级的政党——应经历政治斗争等等。而他们的反对者，直到吉霍米洛夫为止的民粹派的首领们攻击普列汉诺夫，他们说，瞧，普列汉诺夫主张政治斗争，他不愿意为社会主义而斗争；我们是社会主义者，我们是左派，而他是右派。

普列汉诺夫当时是一个彻底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他正确地与民粹派进行了斗争。当问题在于证明那些起码真理，证明俄国正经历着资本主义，工人阶级正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社会舞台的时候，普列汉诺夫是强有力的。在需要证明反对民粹派的这一起码常识以前（那时这不是起码的常识，而是通向整个阵地的钥匙），普列汉诺夫是伟大的，是列宁的先驱。而当二十年以后问题已成为实践问题，当“起码的常识”已经不够用，当革命无产阶级进行战斗的时刻已经到来的时候，普列汉诺夫“缴械了”，他转向孟什维克了。

如果我们想从当前的争论中弄懂一点东西，如果我们想明了帕尔乌斯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是否真的比布尔什维主义更左，那我们就应当记住，曾经有过一段时间托洛茨基和帕尔乌斯对无产阶级“自我限制”的提法，同民粹派反对“劳动解放社”的斗争（八十年代）中的立场是相同的，同社会革命党人反对列宁的社会民主党的斗争（1903—1905年）中的立场也是相同的。

* * *

但是，有人会问我们：为什么所有的民粹派都需要披上这件外衣？这奇怪的历史化妆舞会是什么玩意儿？为甚么小资产阶级恰恰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掀起第一个巨浪前夕穿上了鲜艳的社会主义服装？

最好是用列宁的话来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指的是他的著作《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革命中的土地纲领》。在这部杰出的著作中，列宁试图对民粹派和孟什维主义作出诊断。他

写道：

“一切民粹主义者的错误在于他们只看到小业主的小天地，看不见农民在摆脱农奴制束缚以后建立起来的社会关系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关系。他们把小资产阶级农业的‘劳动原则’和‘平均制’这一消灭农奴制大地产的口号，变成一种绝对的、独特的、意味着某种特殊的、非资产阶级制度的东西。

“某些马克思主义者的错误，在于他们批评民粹主义者的理论，而忽略了这种理论在反对农奴制的斗争中所包含的历史上现实的和历史上合理的内容。他们批判了而且正确地批判了‘劳动原则’和‘平均制’这种落后的、反动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但是他们忘记了这种理论反映着先进的、革命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着重号是我加的。——格·季·），忘记了这种理论是同农奴制旧俄国作最坚决斗争的旗帜。”^①

这就是理解民粹派整个立场的钥匙。列宁说，民粹派先生们，你们是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者”。所以，比起革命的社会主义，比起马克思主义，比起布尔什维主义，你们是反动的。你们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当作社会主义，你们把农民对土地的渴望叫作平均主义、社会化、劳动的基础等等。

而谈到孟什维克阵营时，列宁说，不错，民粹派的平均主义和社会化是大有问题的。不错，在我们面前的是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但是，你们孟什维克们只是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者”，你们只看见民粹派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②而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即他们反映了大批农民的愿望，反映了农民要收拾地主的愿望，反映了农民世代梦想得到土地的愿望。

再说一遍，这就是理解1917年革命前列宁对民粹派的全部观点的钥匙。

① 《列宁全集》第13卷第216—217页。——译者注

② 提醒一点，这时在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之间还没有建立紧密的联盟，而孟什维克还打算用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去批判社会革命党人。

拿列宁和社会革命党人多次争论的土地社会化的口号来说吧！列宁完全正确地证明了，社会革命党人的土地社会化不是社会主义。1917年10月，他从社会革命党人那里（准确点说，从信任社会革命党人的农民那里）借取了土地纲领，以便更好地实现工人阶级同农民的结合，他预先估计到，生活会对它作相应的修改的。我们现在拥有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在工人阶级政权下实行土地国有化的经验。但这毕竟还不是社会主义。但是让我们设想一下，照社会革命党人的那一套行事。那时我们就会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专政，那时在最好的情况下我们就会有资产阶级共和政府。在这种情况下的土地“社会化”会是什么样的呢？就接近社会主义而言，它所提供的东西只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国有化的百分之一，因为那时候富农将占很大的比重，实际上成了新地主。这一点布尔什维主义看得很清楚。但是与此同时它也看到，小资产阶级民粹派（在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反映了农民对土地的渴望，反映了当时具有深刻革命意义的反对大地主的斗争。

从以上所引例子我们清楚地看到，在第一次革命前形成了各种集团，那时有的人还不清楚“哪边是左，哪边是右”，孟什维克也好，社会革命党人也好，帕尔乌斯分子-托洛茨基分子也好，都不懂得这一点。

帕尔乌斯分子-托洛茨基分子完全不懂得农民的意义。正因为这样，他们不懂得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在1905年必然会披上“极左”派的外衣来反对我们。这是由当时错综复杂的政治关系造成的。这是人之常情。那时“革命派”反对我们，他们自认为是了不得的“左派”社会主义者，而实际上往往不过是“带炸弹的自由派”。就在这些“极端”革命派的小资产阶级性还处于萌芽状态时，列宁象透过放大镜似的已经看得清清楚楚了……

这样，我们用列宁的话回答了下列问题：为什么小资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前夕要披上社会主义者的外衣，把自己描绘得比列宁还要“左一些”。需要记住这一点才能理解那时候的基本争

论,其中包括理解1905年前后及以后加于列宁的某些政治性外号。“列宁先生”一语现在甚至第二国际的领袖们也叫不出口了。现在非常清楚,列宁这个名字标志着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政党,这是获得解放的无产阶级的象征。而那时候我们的对手决定把列宁叫做“先生”、“不自觉的资产阶级奴仆”,指责他执行“无产阶级自我限制”的政策以及许许多多的其他滔天大罪。

* * *

我们再试试这样来提问题:好,在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前夕我们看到,典型的小资产阶级革命家是怎样“从左面”批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那末,过去在革命历史中,在国际运动的历史中,有过与此类似的情况吗?是否有过什么时候,马克思主义者处于被小资产阶级似乎“从左面”批评的地位呢?

有过!

恰恰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遇到过这种情况。

我首先说明一下,这里情况并不完全相同。这仅仅是用来举例说明事情的类似现象。

1847—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准备《共产党宣言》,也就是著名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宣言的时候,曾对自己说过:然而,德国的情况是,我们暂时只能充当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家的极左翼。马克思和恩格斯甚至参加了这样的组织,同时继续写作《共产党宣言》和创建共产主义者同盟。共产主义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历的这段时间,是非常短暂的昙花一现的历史插曲。

为什么这同列宁在1903—1905年的情况不尽相同呢?这是因为环境太不相同了。1903—1905年列宁在俄国依靠的已经是强大的俄国无产阶级,他拥有巴黎公社和第一国际的经验,知道马克思的《资本论》,看到帝国主义时代的开始。显然,1847—1848年间有许多不同之处。德国的工人阶级当时还很软弱,社会关系还没有分化,国际工人运动还仅仅处于萌芽状态。这是另一种形势。但是也有某些相似之处。这就是1847—1848年摆在马克思和恩格斯

面前的任务同二十世纪初摆在列宁面前的任务在许多方面是相同的，当然，规模没有这么巨大。马克思和恩格斯是这样解决任务的：我们作为极左翼在短暂的时间里参加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组织，与此同时我们将筹建无产阶级政党的第一批支部，写出无产阶级革命的纲领。所有这些过程时间是很短的。在1850年我们已经看到另一种局势。马克思的著名的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即他在其中谈到“不断”革命的那个著名的宣言^①就是这个时候写的。但是，有过短暂的时刻，如后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所做的那样，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不仅需要支持，而且还需要作为极左翼直接参加民主主义资产阶级组织。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二十世纪初说过，需要“推动”（当然不是孟什维主义的含义，而是利用自由派运动反对沙皇制度的意思）俄国自由派资产阶级向左转。彼特龙凯维奇、罗迪切夫及其他自由派贵族的代表人物想反对沙皇，但他们“很穷”，没有地方印刷秘密传单，而我们工人党却很富，我们接受并秘密印刷他们的传单，我们帮助他们，因为这是工人事业所需要的。列宁就是这么办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另一种环境下也是按这样的方针行事的。他们不能够答应替德国的“彼特龙凯维奇和罗迪切夫们”印刷传单，因为那时德国还没有工人党。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加入了民主主义资产阶级组织，参加了它的战斗队（例如恩格斯）。在“誓死捍卫共

① “民主主义的小资产者至多也不过是希望实行了上述要求便赶快结束革命，而我们的利益和我们的任务却是要不间断地进行革命（着重号是我加的。——格·季·），直到把一切大大小小的有产阶级的统治都消灭掉，直到无产阶级夺得国家政权，直到无产者的联合不仅在一个国家内而且在世界一切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内都发展到使这些国家的无产者间的竞争停止，至少是直到那些有决定意义的生产力集中到了无产者手里的时候为止。对我们说来，问题不在于改变私有制，而在于消灭私有制，不在于掩盖阶级矛盾，而在于消灭阶级，不在于改良现存社会，而在于建立新社会。”（《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1850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历史著作》国家出版社俄文版第501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85页〕。

和国”的口号下恩格斯当过普通士兵，威廉·李卜克内西当过普通的志愿兵。与此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构思了《共产党宣言》，酝酿了成立国际无产阶级组织的思想。

在这个例子里是否在**某些地方**同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在1905年及以后的立场有相似之处呢？

有的。

我们重复一下，只是在**某些地方**。不会全都一样的。但是这个例子里的**某些地方**能使我们易于理解第一次俄国革命前夕列宁提出的原理，同时弄清楚为什么象切尔诺夫这样叫嚷列宁“要无产阶级自我限制”的带假面具的人要缠着列宁不放。

看一看《共产党宣言》，读一下马克思和恩格斯谈到小资产阶级小市民社会主义的地方。请回想一下，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是怎样“从左面”“批评”象马克思和恩格斯这样的巨人的，他们要别人相信，似乎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是货真价实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者。

马克思把法国当作农民占人口多数的典型国家，他写道：

“在农民阶级远远超过人口半数的国家，例如在法国，那些站在无产阶级方面反对资产阶级的著作家，自然是用小资产阶级和小农的尺度去批判资产阶级制度的，是从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出发替工人说话的。^①这样就形成了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西斯蒙第就是这个学派的首领，对法国来说是这样，对英国来说也是这样……”

“德国的社会主义者给自己的那几条干瘪的‘永恒真理’披上一件用思辨的蛛丝织成的、绣满华丽辞藻的花朵和浸透甜情蜜意的甘露的外衣，这件光彩夺目的外衣只是使他们的货物在这些顾客中间增加销路罢了（这段评述多么淋漓尽致地描绘了“我们”的切尔诺夫！——格·季·）……”

① 对革命前的俄国这样的国家来说，这更是“自然”不过的了。——格·季·

“它(德国社会主义。——格·季·)贯彻到底，直接反对共产主义的‘野蛮破坏的’倾向，并且宣布自己是不偏不倚地超乎任何阶级斗争之上的。”①

这样，再说一遍，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写作《共产党宣言》这一国际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基本文献的同时，认为可以作为极左翼参加革命民主主义资产阶级组织。与此同时他们用文字鞭笞了德国的切尔诺夫，小资产阶级的和“真正的”社会主义者，这些人似乎“从左面”对马克思和恩格斯进行了批评。

然而，1848年到来了。一闻到革命的气息，马克思就同恩格斯动身前往德国并掌握了《新莱茵报》。在这时候，恩格斯象马克思那样，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鲜明地显示出他不仅是一个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家，而且还善于使理论同革命实践结合起来。1849年5月，《新莱茵报》被查封。就在这5月份，在爱北斐特、杜塞尔多夫、佐林根等采矿工业区开始了起义的尝试。恩格斯急忙赶往行动地点，但他到达的时候反动派已取得了胜利，爱北斐特公安委员会中的胆小怕事的市民们立即把他撵走，他们要人相信，恩格斯的到来使资产阶级极为不安：他们说它怕恩格斯宣布成立红色共和国。不久在巴登和普法尔茨在“帝国宪法”旗帜下爆发了起义。恩格斯作为《新莱茵报》的革命战士赶往那儿，作为副官参加了维利希的志愿部队。他在这里一直留到起义结束，在起义被击败后，他是越境进入瑞士的最后一批人中的一个。②

1849年6月25日，恩格斯在致马克思夫人的信中写道：

“当普鲁士人到来时，我就情不自禁地参加了战斗。维利希是唯一有些才干的军官，于是我就到他那里，做了他的参谋。我参加了四次战斗，其中有两次，特别是拉施塔特会战，是相当重要的……而《新莱茵报》方面有一个人参加了战斗毕竟是件好事，因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6、279页。——译者注

② 关于此事详见我的文章《马克思和恩格斯》，收在文集《卡·马克思逝世二十五周年》1908年版。

为所有的民主派无赖都在巴登和普法尔茨，而目前他们正在吹嘘他们所没有完成的英雄业绩。否则，又会有人叫嚷什么《新莱茵报》的先生们胆子太小，不敢参加战斗。可是，在所有的民主派先生们当中，除了我和金克尔，没有一个人打过仗。”^①

这样，众所周知，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本没有要“无产阶级自我限制”，而在1849年，宣言的作者之一恩格斯在帝国宪法的口号下，在“誓死捍卫共和国”——但不是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口号下，在民主共和国取得胜利的期望极为渺茫的情况下，同被他称为废物的可怜的“民主派”一起战斗。他这样做是因为他认为这是无产阶级事业的利益所要求的。

这就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活的现实中所常碰到的，这时候摆在他们面前的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革命同无产阶级革命的相互关系问题，是为资产阶级自由而斗争（这是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第一个阶段）的问题；这就是当问题不仅仅在书本上，而且在生活中出现，当推翻封建制度从而为社会主义扫清道路的任务被提上了日程的时候常常出现的情况。凡是熟悉马克思主义文献的人都记得，马克思曾不得不一再地反击“来自左面”的小资产阶级批评家，他曾同蒲鲁东进行过激烈的斗争，他曾不得不反击枯燥乏味的格律恩之流，等等。

现在事过75年，作为事后“聪明人”当然不难看到真正的发展道路，——现在，当我们除了马克思还有列宁，他用巨大的火炬给无产阶级照亮了全部已经走过的和面临的历史道路，现在，当我们拥有过去的三次俄国革命和国际革命的开端，当我们看到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在腐朽没落（虽然事情不会没有局部的复发），——现在不难对这一切作出分析。但在75年以前这一任务是非常困难的，需要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天才洞察力才能克服这种

^① 此信俄译文载于我的小册子《共产主义的奠基人和领袖》，第65页[应是1849年7月25日致燕妮·马克思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525—526页]。

困难。

如果我们想明白列宁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争论的意义，我们就不应忘记过去的这些例子。现在每一个人都清楚，切尔诺夫“从左面”批评列宁意味着什么。现在每一个人都清楚，指责列宁要“无产阶级自我限制”这种“从左面”的批评值多少钱。

是的，布尔什维克直至1917年以前都认为俄国的革命将是独特的、规模巨大的人民民主革命，它只有在有利的条件下才能迅速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是的，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以前提出了“无产阶级和农民民主专政”的口号，并断定只有在有利的环境下，这一专政才会迅速“转变”为无产阶级专政。是的，事情正是这样。布尔什维克是正确的。列宁在1916年写道：“俄国1905年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由人民中一切具有不满情绪的阶级、团体和分子的一系列的战斗构成的。”^①列宁是对的。但是在1905年和1917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布尔什维主义执行的是无产阶级路线：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到底，以保证它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因此列宁的策略是唯一的无产阶级策略。而所有似乎“来自左面”的批评尽管表面上“革命”，实际上是献给小资产阶级小市民“社会主义”的丰盛的礼物。其中就有“不断”革命拥护者的假“左”立场。

① 《列宁全集》第22卷第350页。——译者注

第三章

无产阶级和农民民主专政

一个口号的历史

1903—1917年代的俄国布尔什维主义的历史，如果谈的是纯粹策略方面的问题，那末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结为一个口号的历史：**无产阶级和农民民主专政。**

我们且着手研究这一口号的历史。

正是俄国成了列宁学说的故乡，这一情况自然决非偶然。正是俄国工人运动在这个时代理应处于前列——正如在这以前先是法国无产阶级，然后是德国无产阶级曾处于前列一样。不言而喻，列宁本人也不止一次说过，国际革命越广泛、越充分地向前发展，俄国也就势必越快地成为“落后的苏维埃国家之一”。早在《怎么办？》一书中列宁就曾这样说明促使俄国成为世界革命先锋队的历史环境：

“历史现在向我们提出的当前任务，——这是在1902年写的，——是比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的一切当前任务都更革命的任务（着重号是列宁加的。——格·季·）。实现这个任务，即摧毁这个不仅是欧洲的同时也是（我们现在可以这样说）亚洲的反动势力的最强大的堡垒，就会使俄国无产阶级成为国际革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①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6卷第26—27页。——译者注

考茨基也很懂得这一点，当他还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时候，他在旧《火星报》上写了自己的著名文章《斯拉夫人和革命》，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曾多次引用这篇文章，考茨基在文中指出，正是我国注定要在一定时间内处于世界舞台的前台。

“现时(与1848年不同——尼·列宁)可以认为，不仅斯拉夫人加入了革命民族的行列，而且革命思想和革命活动的重心愈来愈移向斯拉夫人那里。革命中心正从西向东移。19世纪上半叶，革命中心在法国，有时候在英国。到了1848年，德国也加入了革命民族的行列……揭开新世纪序幕的一些事变使人感到，我们正在迎接革命中心的进一步转移，即向俄国转移……从西欧接受了这么多的革命首创精神的俄国，也许现在它本身已有可能成为西欧革命动力的源泉了。轰轰烈烈的俄国革命运动，也许会成为一种最强有力的手段，是以铲除在我们队伍中开始蔓延的萎靡不振的庸俗习气和鼠目寸光的政客作风，促使斗争的渴望和对我们伟大理想的赤诚重新燃起熊熊的火焰。俄国对于西欧来说早已不再是反动势力和专制制度的堡垒了。现在的情况也许恰恰相反。西欧正变成支持俄国反动势力和专制制度的堡垒……俄国的革命者如果不是同时必须跟沙皇的同盟者——欧洲资本作战，也许早就把沙皇打倒了。我们希望，这一次他们能够把这两个敌人一起打倒，希望新的‘神圣同盟’比它的前驱垮得更快一些。但是不管俄国目前斗争的结局如何，那些在斗争中牺牲的烈士(不幸的是，牺牲的人会很多很多)所流的鲜血和所受的苦难，决不会是白费的。他们将在整个文明世界中培育出社会革命的幼苗，使它们长得更茂盛、更迅速。1848年时，斯拉夫人还是一股凛冽的寒流，摧残了人民春天的花朵。也许现在他们注定要成为一场风暴，摧毁反动势力的坚冰，以不可阻挡之势给各国人民带来新的幸福的春天。”(考茨基的文章《斯拉夫人和革命》，载于1902年3月10日《火星报》第18号)。^①

^① 引自《列宁全集》第XVII卷第116页[《列宁全集》第2版第39卷第3页]。

马克思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向列宁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过渡是同国际性质的事件联系着的。但是这并不妨碍俄国，如列宁和考茨基（这时他还是个马克思主义者）所指出的，因形势的客观革命性而成为最先完成这种过渡的第一个国家。这就是俄国产生按列宁主义解释的“无产阶级和农民民主专政”口号的原因。

* * *

1925年托洛茨基企图把事情说成这样，似乎列宁主义（或布尔什维主义）之所以取胜，是因为1917年进行了“思想上的重新武装”，即抛弃了某种错误的东西，抛弃了无产阶级和农民革命民主专政的旧的、似乎是“错误的”口号，转向了崭新“新”的无产阶级专政口号，似乎同“历史上的布尔什维主义”，即从1903年到1917年形成的布尔什维主义格格不入的口号。

列宁是这么做的吗？列宁写的一系列基本文献和重要文章完全驳斥和推翻了此类论断。

试想一下布尔什维主义在1905年是怎么提这个问题的。这里必须引用对所谈问题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两种策略》中的引文，此书是1905年革命时代布尔什维主义的主要著作。

列宁写道：“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同世界上一切事物一样，有它的过去和未来。它的过去就是专制制度、农奴制度、君主制度、特权制度。在和这种过去作斗争时，在和反革命作斗争时，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意志的统一’是可能的，因为这里有利益上的一致。

它的未来就是反对私有制的斗争，雇佣工人反对业主的斗争，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在这里意志的统一是不可能的。那时，我们面前的道路就不是从专制制度进到共和制度，而是从小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制度进到社会主义。

当然，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过去和将来的成分交织在一起，前后两条道路互相交错。雇佣劳动及其反对私有制的斗争在专制制度下也有，甚至在农奴制时代就已经萌芽了。但是这丝毫不妨

得我们从逻辑上和历史上把发展过程的几大阶段分开。我们大家都认为资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是截然不同的东西，我们大家都无条件地坚决主张必须把这两种革命极严格地区分开，但是，难道可以否认前后两种革命的个别枝节成分在历史上互相交错的事实吗？（着重号是我加的。——格·季·）难道在欧洲民主革命的时代没有许多社会主义运动和争取社会主义的尝试吗？难道欧洲不是还有许许多多民主主义性质的事情要由将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去最终完成吗？”①

在我们看来，这是《两种策略》中的最深刻的思想，它不是在取得两次俄国革命的**经验**之后，而是在第一次俄国革命的**前夕**提出的，所以尤其显得可贵和出色。这里基本上已经包含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全部列宁主义理论。在列宁的这些基本原理同他在生前最后几年里对四年无产阶级专政总结所作的评价（在庆祝苏维埃政权四周年的文章里）之间有着极其清楚的联系。②

这是一个不间断的链条。充满了思想上的继承性。不需要进行任何“重新武装”。

大家知道，正是在这时候，在1905年，孟什维主义进行了反对列宁主义的激烈斗争，这时列宁主义依据对俄国革命动力的分析，提出了“**无产阶级和农民民主专政**”的口号。孟什维主义按照下述路线攻击我们：它证明说，列宁主义似乎使无产阶级的基本阶级利益服从于短暂的资产阶级民主变革的利益，用雅各宾主义的民主主义立场偷换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两种策略》受到孟什维克的疯狂攻击，为了这本书列宁被叫做（用当时托洛茨基给起的外号来说）“**马克西米利亚·列宁**”——罗伯斯比尔，独裁者、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领袖的候补人。

孟什维克说，俄国面临的是资产阶级革命，**就是说，靠边站吧，**

① 《列宁选集》第1卷第575—576页。——译者注

② 关于这问题详见第四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

给资产阶级让开路，无产阶级应是自由资产阶级的尾巴。

而列宁回答说：

“我们的新火星派^①正好就是这样一些以近视自夸的聪明人。正是在必须善于区别共和革命派资产阶级的民主和君主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民主的时候和地方，他们仅仅局限于谈论革命的资产阶级性（着重号是我加的。——格·季·），至于区别不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彻底的无产阶级民主主义，就更说不上。”……

“有各种各样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着重号是我加的。——格·季·）。拥护上院、‘请求’施行普选制、同时在暗地里偷偷摸摸地就残缺不全的宪法和沙皇政府妥协分赃的君主派地方自治人士，是资产阶级民主派。拿着武器反对地主和官吏、带着‘幼稚的共和主义情绪’提议‘驱逐沙皇’的农民，也是资产阶级民主派”……

“农民中有大批的半无产者，同时还有小资产阶级分子。这使得它也不稳定，因而迫使无产阶级团结成为一个阶级性十分严格的党。但是农民的不稳定和资产阶级的不稳定根本不同，因为农民现在所关心的与其说是无条件地保存私有制，不如说是夺取私有制主要形式之一的地主土地。（着重号是我加的。——格·季·）农民虽然不会因此而成为社会主义者，不会因此而终止其为小资产阶级，但是它能够成为全心全意地和最彻底地拥护民主革命的力量……”

“革命对沙皇制度的彻底胜利’，就是实现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

“这样的胜利还丝毫不会把我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变为社会主义革命；民主革命不会直接越出资产阶级社会经济关系的范围；但是这样一种胜利，对俄国和全世界的将来的发展，都有极其重大的意义。除了已经在俄国开始的革命的这种彻底胜利以外，再没有什么东西能把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毅力提高到这种程度，再没

① 孟什维克。

个单独的阶级，虽然它同无产阶级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和处在过渡阶段，但毕竟是一个单独的阶级。

“必须首先把自己同一切人划清界限，即仅仅把无产阶级一个阶级专门单独地划出来，然后再说无产阶级解放一切人，号召一切人，邀请一切人。”^①

而孟什维克指责这些话的作者（请勿忘记，这是在1902年写的）缺乏坚定的阶级观点，说他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家，而只不过是“小市民（或农民）革命家！！真是诿过于人……”

孟什维主义这时候可以明显地分为两翼，或至少分为两种思想色彩，两种情绪，两种心理状态。一些人从纯“阶级的”立场出发，而另一些人则从“全民族的反对派”立场出发，实际上这是同一个阵营。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实际上是要使无产阶级只充当自由派的尾巴，但是前者力求成为和被视为“阶级论者”（Классовик-и）——起初也不无成就。当时，在1905年，把往往是些不坏的工人拉向孟什维克的是孟什维主义中的这样一种流派，它企图主要从似乎无产阶级“不调和的”、“纯阶级”立场的观点去批评列宁和布尔什维主义。当时对孟什维主义的本质远不如20年后的现在看得那么清楚。斗争刚刚激烈起来，刚刚从文字领域转入直接的阶级斗争领域。孟什维克中间自然有一些人多少自觉地为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利益而利用这种“阶级的”心理；但也有一些人是出于真诚的信念，相信他们站在布尔什维克的左边，似乎是在捍卫无产阶级的真正阶级利益。附带说一下，一部分孟什维克——孟什维克中的优秀人物——从1905年到1925年，即在20年间正是随着逐渐看清了孟什维主义的这种伪阶级立场而转到我们这边来的。

《两种策略》一书的基本意义就在于，它是理解布尔什维克在1905年革命时代的立场的钥匙。在《两种策略》中我们已经可以找到关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问题的所有主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6卷第238页。——译者注

要论点。

《两种策略》证明，列宁不仅善于根据刚刚结束的事变的新痕迹，不延迟也不落后，立即抓住这些事变中的最主要的东西，并且还善于早在事变开始以前预见到事变，事先清楚地说明其阶级内容。早在1905年，列宁就极其明确地指出，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有其过去和将来，非常清楚和完整地说明，这过去和将来到底是什么样的。因此布尔什维主义的批评家们从似乎“左的”，不断革命论观点反对列宁，说“无产阶级和农民民主专政”的公式不够革命，甚至会倒过来反对取得胜利的无产阶级的利益，反对社会主义^①——这一切岂不可笑！

从“无产阶级和农民民主专政口号”向“无产阶级专政”（预定在工人阶级领导下时工人阶级和农民联盟下的专政）口号的过渡并不是突然发生的，这不是跳向未知数。再回想一下，列宁关于布尔什维克老口号的“过去和未来”说了些什么。不理解列宁主义的一个基本思想——关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就无法理解从一个口号向另一个口号的过渡、“转变”。

为了理解发生这种“转变”的历史环境，首先需要理解处于俄国第一次革命和第二次革命之间的时代——这个时代的特点是帝国主义及其矛盾急剧发展，从而导致第一次世界帝国主义战争，而这又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

1905年和1917年两次革命的主要动力是一样的。这就是无产阶级和农民。但是，第一、这两个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第二、反

① 托洛茨基在《我们的意见分歧》一文中写道（见《1905年》一书，1922年再版）：“孟什维克从‘我们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这种抽象概念出发，得出使无产阶级的全部策略迁就自由资产阶级的行动，直到自由资产阶级夺得国家政权为止的思想，布尔什维克则从‘民主专政，而不是社会主义专政’这种同样空洞抽象的概念出发，得出使执掌国家政权的无产阶级接受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自我限制的思想。不错，两者之间在这一问题上的差别是非常大的，孟什维主义的反革命一面现在已经暴露无遗，而布尔什维主义的反革命特性，只有在革命胜利时才会具有极大的危险性。”（托洛茨基《1905年》第285页）。

革命阵营内部的力量对比和第三、国际环境在上述两个时代远不是一样的。因此布尔什维克的口号是有区别的，而这是同一种思想在两个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的具体化。

* * *

再详细点看看列宁对俄国革命性质问题的观点。列宁的基本著作之一，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1907年写就，1917年出版的《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革命中的土地纲领》一书阐明了这一问题。此书对1905年革命作了最完整的总结。

请注意列宁的下述中心论点：

“在全部社会经济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条件下，任何反对中世纪制度的农民革命都是资产阶级革命。但是并不是一切资产阶级革命都是农民革命。”^①（着重号是我加的——格·季·）

请记住这个地方。这是理解列宁主义的许多定理的钥匙。任何反对中世纪制度的农民革命，在全部社会经济制度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条件下，都是资产阶级革命，但是并不是一切资产阶级革命都是农民革命！列宁主义的对手完全不理解这一思想，因而不能理解俄国革命的全部特点。我们已经指出过，普列汉诺夫这位“劳动解放社”的最卓越的领袖曾经不无成就地向旧民粹派证明过（这时争论还处于最初阶段），俄国将经历资本主义阶段，无产阶级将成为俄国革命的基本力量，成为革命的领导者。但是在需要用实际内容去充实关于俄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的一般公式和关于无产阶级在俄国革命中的领导权的一般公式时，普列汉诺夫却搞错了。正是列宁给了这些一般公式以生命。

列宁的上述论点再次证明，甚至孟什维克中的优秀人物——那些从“阶级”观点出发的人物的反驳是多么幼稚，他们作多余的卖弄，企图向列宁证明，农民革命还不是社会主义革命。列宁比谁都了解，什么是农民革命。但是与此同时他也不知道，在我国极端尖

^① 《列宁全集》第13卷第328页。——译者注

锐地提上日程的首先是土地问题，也就是说农民革命即将来临，所以在 1. 我国农民人数众多，2. 无产阶级的比重和 3. 国际工人阶级斗争的环境的情况下，我们的第一次革命应当成为（并且已经成为）虽非典型的社会主义革命，但亦非通常意义上的资产阶级革命。列宁比谁都更具体地设想了俄国革命的真正进程。因此我所引的列宁的公式充满着深刻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在此书的“土地纲领问题方面的政治上和策略上的考虑”一章中，列宁写道：

“结果是，资产阶级变革这一没有周密思考的抽象概念，使人（孟什维克。——格·季·）看不到农民革命是资产阶级变革的一种形式！所有这一切都是‘骚乱’，只有‘常轨’才是现实的。对于在我国资产阶级革命中斗争是为了什么这一问题的庸俗观点和无知，在这里表现得再清楚不过了。”^①

换句话说：你们孟什维克“一般地”为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还是社会主义性质问题争辩，但是你们没有看到“小事情”：在我们这里农民革命固然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一种，但这种革命同我们所知道的所有其他资产阶级革命是极其不同的。

列宁解释说：

“如果在一个农业已经完全按资本主义方式组织起来的国家里，农业资本家在雇佣工人的帮助下实现了土地革命，譬如说消灭了土地私有制，这就是资产阶级革命，但并不是农民革命。如果在一个土地制度已经同一般资本主义经济密切结合起来、不消灭资本主义就不能消灭这种土地制度的国家里发生了革命，譬如说工业资产阶级代替专制官僚掌握了政权，这就是资产阶级革命，但并不是农民革命。换句话说，可能有一种没有农民人口的资产阶级国家，也可能有在这种国家里发生的没有农民参加的资产阶级革命。但是在农民人口很多的国家中也可能发生不是农民革命的资

^① 《列宁全集》第 13 卷第 326 页。——译者注

产阶级革命，就是说它并不把只同农民有关的土地关系革命化，并不把农民列为比较积极的、创造革命的社会力量……

普列汉诺夫及其追随者孟什维克在俄国革命第一个时期（即1905—1907年）所采取的全部策略路线，其错误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完全没有了解一般资产阶级革命和农民资产阶级革命之间的这种相互关系。”^①

农民无论如何都不是**彻底的**革命阶级，这是对的。过去和现在只有无产阶级才是**彻底的**革命阶级。但是，在我国1917年以前那种错综复杂的阶级关系下，农民在很长的时间内曾是个革命的阶级，或者说得谨慎点，或多或少曾是个革命的阶级，在有利的条件下，在工人阶级领导下能够成为（并且已经成为）非常巨大的革命力量。而全部任务在于，把农民的“有条件的”革命力量，潜在的革命力量变成跟着工人阶级走的**现实的**革命力量——这是当时无论普列汉诺夫，无论帕尔乌斯，无论托洛茨基，无论马尔托夫都不懂得的。

列宁写道：“社会革命党人也同所有比较彻底的民粹主义者一样，不懂得农民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而把自己全部的冒牌社会主义同这个革命连在一起。在民粹主义者看来，农民革命有利的结局会意味着民粹派社会主义在俄国的胜利。其实这样的结局将意味着民粹派（农民）社会主义最迅速、最彻底的破产。”^②

“从左面”批评列宁的民粹派（见第二章《小资产阶级“从左面”对列宁主义的批评》）设想，农民革命的胜利将是民粹派的，即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繁荣的时代。

而列宁早在1907年就告诉他们：错了，先生们，事情恰恰相反，农民革命的胜利越大，你们民粹派的“社会主义”的破产就越快。

结果如何？结果正如列宁所预言的。

^① 《列宁全集》第13卷第328页。——译者注

^② 《列宁全集》第13卷第323页。——译者注

真正的土地革命、跟着无产阶级走的真正农民运动的规模越强大有力，民粹派“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或小市民“社会主义”的美妙时光也就越快成为过去。有人“反驳”列宁说：您怎么不懂得，农民革命还不是社会主义，您怎么不想一想，我们代表无产阶级，代表工人政党，我们的最终目标是社会主义，因此，我们不应让无产阶级搞“自我限制”，等等，等等，这对列宁来说真是把他自己的全部东西奉献给他自己，因为他在1907年就发表了这种预言，并且作为真正辩证法大师已看清了小资产阶级民粹派的两面性（革命的一面和反动的一面）。

天才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的真正领袖，他领导本阶级在已成为世界革命焦点的国家取得胜利，而现在却想向他证明，正确的不是他的学说，而是这样一种“学说”，它在1905年没看到农民的革命作用这种“小事”；不懂得“一点东西”：在旧俄这样的国家里无产阶级是唯一彻底的革命阶级，但不是唯一革命的阶级，在土地问题按照列宁的说法是“民族”问题的国家里，也不可能不是这样。

布尔什维主义根据对提到日程上来的农民革命的分析作出全部结论。布尔什维主义知道并且懂得，只有无产阶级成为革命的领导者，农民革命处于工人阶级的领导之下，俄国革命才能取得胜利。布尔什维主义作为无产阶级政党懂得，正是革命的根本利益要求工人阶级领导农民。布尔什维主义从理论上和实践上解决了这一任务。

早在论“临时政府”的著名文章中（1905年）列宁就说过必须“力求使俄国革命成为多年的运动，而不是几个月的运动”，使这个革命“彻底推翻”“执政当局”，彻底清除专制制度这奥吉亚斯马厩。“如果能做到这一点，那时候……那时候革命的火焰将延烧欧洲；在资产阶级反动势力下备受折磨的欧洲工人也将发动起来，并向我们表明‘该怎么办’；那时候欧洲的革命高潮就会反过来影响俄国，使几年的革命时代变成几十年的革命时代。”^①

^① 《列宁全集》第8卷第257页。《社会民主党和临时政府》。——译者注

“我们将立刻由民主革命开始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并且恰恰是按照我们的力量，按照有觉悟有组织的无产阶级的力量，开始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我们主张不断革命。我们决不半途而废。”①

“在资产阶级革命中，无产阶级以鄙视态度摒弃市侩改良主义办法；我们注意的只是进行斗争的自由，而不是享受市侩幸福的自由。”②

“结果正同我们所说的一样”，列宁后来在《叛徒考茨基》中③这样写道。

* * *

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曾经设想，西方社会主义革命的迅速胜利将使俄国能够缩短其资本主义发展阶段。

在《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序言中，在恩格斯致特卡乔夫的信中，在不久前发表的马克思答维·伊·查苏利奇信的草稿④中，共产主义的创始人表示了这样一种思想：俄国迅速推翻专制制度和西方同时发生工人革命能够使俄国的土地公社成为社会主义发展的支柱。（马克思在答维拉·查苏利奇的草稿中甚至走得还要远。）

历史的辩证法要复杂得多，“狡猾得多”。结果不仅专制制度，而且资本主义都恰恰在最薄弱的“环节”——在俄国第一次遭到决定性的失败。结果是，迟到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落后的俄国所取得的决定性胜利，迅速转变成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而它，在落后俄国的胜利，又威严地牵动第二个“环节”，开始加强较为成熟的资本主义国家中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展，开始加速西方和东方革命结局的到来。

俄国在影响西方（自然，也影响东方）。同时西方也影响俄国。

① 《列宁选集》第1卷第634页。《社会民主党对农民运动的态度》。——译者注

② 《列宁全集》第13卷第339页。《社会民主党在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译者注

③ 《列宁选集》第3卷第684页。——译者注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库》，梁赞诺夫编，第1卷第270—286页。

世界革命的发展和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各国（和各大洲）的相互影响，是个复杂的问题。这一辩证发展的一般轮廓，列宁主义已经相当清楚地勾划出来了。列宁主义早在1905年已经清楚地看到，俄国胜利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同西方社会主义革命更迅速成熟之间的联系和相互影响。即使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防止复辟的保障，列宁认为也在于西方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在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列宁给彼得堡工人的关于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的报告等等）。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迅速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列宁向来不仅把它同俄国内部革命力量的成长联系在一起，而且把它同西方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展，同“与欧洲无产阶级的联盟”联系在一起。

第四章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

列宁注意到我们俄国革命的全部特殊性，具体地研究了其错综复杂的阶级状况，同时说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这个过程是如何进行的。列宁并没有用万里长城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农民革命同社会主义革命隔开。列宁仔细考察了一种革命向另一种革命转变的过程，研究了这一转变的规律，这样，他就在这—领域完成并扩大了马克思所开始的工作。

让我们从1905—1907年的著作直接转到1917—1918年，转到《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正是在这里我们极其清楚地看到《两种策略》和列宁在十月革命时代的基本著作之间的“结合”。

列宁这样写道：

“无产阶级应该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列宁说这话的时候已当了一年左右的人民委员会主席。——格·季·），不让自己受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束缚’。布尔什维克当时对资产阶级革命中的阶级力量对比是这样表述的：无产阶级联合农民，中立自由资产阶级，彻底摧毁君主制、中世纪制度和地主土地占有制。

无产阶级联合一般农民，也就表现了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因为一般农民就是以商品生产为基础的小生产者。接着，布尔什维克当时就补充说，无产阶级联合全体半无产阶级（一切被剥削劳动者），中立中农，推翻资产阶级，这就是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同的

社会主义革命。”①

列宁在1907年说，任何农民革命②都是资产阶级革命；而在1918年他使这个公式更准确了，他说：正是无产阶级同**一般农民的联盟**（列宁给“一般”这个词加了着重号，他指的是全体农民）显示了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因为“一般”农民就是小生产者。正是强大的农民作为整体参加我们的革命（没有这种支持就不可能取得胜利）暂时给革命打上一定的印记，一般说来，使革命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为什么会这样，列宁也作了解释。因为农民，在运动的这一阶段中我们的基本盟友，是立足于商品生产的。

列宁继续写道：“革命进程证实了我们的论断是正确的。起初同‘全体’农民一起，反对君主制，反对地主，反对中世纪制度（因此，革命还是资产阶级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然后同贫苦农民一起，同半无产阶级一起，同一切被剥削者一起，**反对资本主义**，包括反对农村的财主、富农、投机者，因此革命变成了社会主义革命。

企图在这两个革命中间筑起一道人为的万里长城，企图不用无产阶级的准备程度、无产阶级同贫苦农民联合的程度而用其他什么东西来分开这两个革命，就是极大地歪曲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用自由主义代替马克思主义。”③（着重号是我加的。——格·季·）

“俄国无产阶级同全体农民一起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就最终地过渡到了社会主义革命，这时它分裂了农村，把农村无产者和半无产者吸引到自己方面来，使他们联合起来反对富农和资产阶级，其中包括农民资产阶级。”④

同一般农民一起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同贫农，无产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35卷第296—297页。——译者注

② 列宁本人作了一些限制（见上一章）。

③ 《列宁全集》第2版第35卷第302页。——译者注

④ 同上，第306页。——译者注

者和半无产者农民一起向社会主义革命前进！

这就是列宁主义政策。而这是唯一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政策。

“正是布尔什维克严格地估计到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他们把前者进行到底，就为过渡到后者打开了大门。这是唯一革命的 and 唯一马克思主义的策略。”①（着重号是我加的。——格·季·）

“正是布尔什维克，只有布尔什维克，完全是依靠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才帮助农民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真正进行到底了。只是这样，布尔什维克才为促进和加速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过渡做了最大限度的努力。”②

但仍然有人同意托洛茨基的下述观点：布尔什维主义确实需要“重新武装”，“放弃”无产阶级和农民革命民主专政，才能成为现在这个样子。然而，不是别人，正是列宁——我要着重指出，不是学生们，而是老师，——在苏维埃政权存在一年之后肯定了布尔什维克早在1905年对革命动力所作的分析是正确的，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问题的阐述也是正确的。我们在列宁那里看到对历史过程所作的准确论述：他向我们清楚地指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到底是怎样转变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

列宁的上述引文还没把下一阶段——新经济政策估计在内。因为这是在新经济政策以前写的。不管怎么说，这个新阶段在基本方面更加证实了列宁所说的话。无论如何，新经济政策证明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是一件比我们所设想的更为缓慢、更为困难的事业。

我们现在研究的基本问题——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口号同社会主义革命口号的相互关系问题（区分托洛茨基主义和列宁主义的最重要问题之一③）——在列宁的上述论断中讲得完整而又彻底。这里没有什么可补充的，连一个字也加不进去。这里一切都是按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35卷第313页。——译者注

② 同上，第316页。——译者注

照伊里奇式的清楚扼要，简短明了地写就的，写得就象文选读本所要求的那样。

现在谈谈列宁的另一篇纲领性文章《十月革命四周年》，这是理解列宁主义的最重要文章之一。列宁在这里说了些什么呢？

“俄国革命直接的迫切的任务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的任务：打倒中世纪制度的残余，彻底肃清这些残余，扫除俄国的这种野蛮现象、这种耻辱、这种严重妨碍我国一切文化发展和进步的障碍。

我们有权引以自豪的是，从对人民群众的深远影响来看，我们所做的这种清除工作比 125 年多以前的法国大革命要坚决、迅速、大胆、有效、广泛和深刻得多。

不论无政府主义者还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即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他们是国际上这一社会阶层的俄国代表）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即无产阶级革命）的关系问题上，过去和现在都讲了不知多少糊涂话。四年来的事实已经完全证实，我们在这一点上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对以往革命经验的估计是正确的。我们比谁都更彻底地进行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我们完全是自觉地、坚定地和一往直前地向着社会主义革命迈进，我们知道社会主义革命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之间并没有隔着一道万里长城，我们知道只有斗争才能决定我们（最终）能够前进多远，能够完成无限崇高的任务中的哪一部分，巩固我们胜利中的那一部分。”④

这样，苏维埃政权已经存在四年了。建立了共产国际。列宁已经领导着全体工人阶级，得到大部分农民的支持。国内战争已大体上结束。岸已清楚在望，并且已经清楚地看到，我国工人阶级已经取得了重大的胜利。然而，列宁决不喜欢用臆造的模式去套

③ 提一下列宁在 1909 年所写的：“托洛茨基同志的根本错误，就在于他忽视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对于从这种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没有明确的看法。”〔《列宁全集》第 15 卷第 344 页。《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斗争目标》。〕

④ 《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42 卷第 169—170 页。——译者注

现实，他在回顾走过的道路时说，俄国革命的首要任务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他说，我们感到自豪的是，我们好好地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清除了旧制度的奥吉亚斯马厩，开始向社会主义革命前进。他清楚浅显地向我们指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到底是怎样开始**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苏维埃制度就是由一种革命发展为另一种革命的明证或表现之一。”^①

读了这些以后，还能说布尔什维主义的“思想上重新武装”，还能说把它的旧理论送进档案馆么？列宁和布尔什维主义不需要思想上的“重新武装”。该“重新武装”的难道不正是这样的人，此人不仅在1905年，第一次革命的前夕，不仅在1913年，第一次革命之后，不仅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头一年和第四个年头，而且在苏维埃政权的第八个年头还按照孟什维克的腔调重复众所周知的事实：“一般”农民不是无产阶级，在农民身上有许多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东西，等等……

为了结束这个题目，还必须注意列宁论我国革命的最后几篇文章中的一篇。这就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生前最后几星期的内容极其深刻的日记摘录。提醒一下，这些文章写于实行新经济政策之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逝世前不久。这是针对苏汉诺夫而写的。

“他们（即苏汉诺夫之流。——格·季·）甚至没有想到，例如，俄国是个介于文明国家和初次被这次战争最终卷入文明之列的整个东方各国即欧洲以外各国之间的国家，所以俄国能够表现出而且势必表现出某些特殊性，这些特殊性当然符合世界发展的总的路线，但却使俄国革命有别于以前西欧各国的革命，而且这些特殊性到了东方国家又会产生某些局部的东西。

例如，他们在西欧社会民主党发展时期背得烂熟的一条证据，已成为他们万古不变的金科玉律。这条证据就是：我们还没有成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42卷第172页。——译者注

长到实行社会主义的地步，或象他们中间各种‘博学的’先生们所说的那样，我们还没有实行社会主义的客观经济前提。可是他们谁也没有想到问一问自己：面对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所造成的那种革命形势的人民，在毫无出路的处境逼迫下，难道他们就不能奋起斗争，以求至少获得某种机会去为自己争得进一步发展文明的并不十分寻常的条件吗？

‘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可以实行社会主义的高度。’第二国际的一切英雄们，当然也包括苏汉诺夫在内，把这个论点真是当做口头禅了。他们把这个无可争辩的论点，用千百种腔调一再重复，他们觉得这是对评价我国革命有决定意义的论点。”^①

列宁对苏汉诺夫说，您到现在还不懂得俄国革命的特点。作为一个最平庸的孟什维克，您继续认为，无产阶级变革在顺序上一定得在工业最发达的国家进行，在缺乏普遍识字和足够文明的国家是不能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苏汉诺夫公民，您忘记了，工业的发展，文明的程度等等是革命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唯一的因素。

列宁写道：“你们说，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就需要文明。好极了。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在我国为这种文明创造前提，如驱逐地主，驱逐俄国资本家，然后开始走向社会主义呢？你们在哪些书本上读到过，通常的历史顺序是不容许或不可能有这类改变的呢？”

记得拿破仑这样写过：‘On s’engage et puis on voit’，意译出来就是：‘首先要投入真正的战斗，然后便见分晓。’我们也是首先在1917年10月投入了真正的战斗，然后就看到了象布列斯特和约或新经济政策等等这样的发展中的细节（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来看，这无疑是细节）。现在已经毫无疑问，我们基本上是胜利了。”^②

不错，社会主义首先要求有象文明这样的前提。我们还没有这种前提。但是1917年在我国形成了有利的局势，我们可以说：

① 尼·列宁《全集》第XVIII卷第2册，第118—119页《论我国革命》[《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368—369页]。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370页。——译者注

为了有效地开始提高我国人民文化水平的严肃工作，让我们先把沙皇、地主和资本家赶走。结果我们真的驱逐了沙皇，赶走了地主和俄国的资本家，而现在作为工农政权，我们正在着手创建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提高文化水平的基本前提。

这不好吗？

不，这很好。

我们的批评者至今不懂得一个基本的东西：十月之所以取得胜利，是因为我们有1. 土地革命加2. 帝国主义战争的危机这在任何国家都没有的非同寻常的结合。换句话说，我们拥有“和平”口号加“土地”口号，这是其他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政党都没有的。

这就是我们胜利的原因。

如果说在1905年这些口号已足以震撼专制制度，那末，在1917年的局势中，当千百万农民在军队中服务，“土地”口号再加上“和平”口号，——这就决定了一切。

提前说一下，正是由于缺乏这种结合，使得德国革命难以取得胜利。“打倒战争”的口号声震所有参战国，即几乎全欧洲；“要面包”的口号在1916—1918年间也传遍所有参战国；而象1917年俄国革命这种规模的“土地”的口号，只在我们这里出现。这是唤起最广大革命阶层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全民性口号。两个（甚或三个：和平、面包、土地）口号的结合当然完全正确地反映了当时俄国的具体现实，给了我们胜利的可能，帮助我们在短短的八、九个月期间走过从二月到十月的道路。在二月，革命还是资产阶级革命，而在十月已开始社会主义革命了。二月革命孕育着十月革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孕育着无产阶级革命。甚至出现这样的情况：这孕育期延续了几乎整整九个月。

这就是托洛茨基同志至今还不懂得的俄国革命中的出色之处。托洛茨基在《1917年》一书序言中写道：

“但这决不是说，俄国革命只能走它从1917年2月到10月所

走的那条道路。这条道路的产生，不只是(!!)由于阶级关系，而且也是由于战争所造成的那些临时条件。由于战争，农民才组织起来并武装起来，成为数以百万计的军队。当无产阶级在自己的旗帜下组织起来以领导农民群众之前，小资产阶级革命者就已在被战争激怒起来的农民军队中找到了自然的支柱。小资产阶级革命者就利用这支数以千百万计的军队的力量来压迫无产阶级，并在初期把它领导起来，因为这股力量曾经是支配一切的。在同样的(?)阶级基础上，革命也可以(!!)有另外一种进程。战前所发生的一些事件，最好地证明了这一点。”①

这些话全然不懂我们革命之所以胜利正是由于两种危机——战争危机和土地危机结合的结果(自然，是在存在广泛的革命工人运动作为基础的情况下)；我们之所以胜利是由于“打倒战争”加“土地”这两个口号结合的结果。换句话说，这也是全然不懂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一定的条件下怎样开始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②

对农民所作的正确的标准评价，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同无产阶级革命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依赖的正确的标准评价；对我们自己国家阶级力量所作的准确清楚并得到证实的估计；对俄国革命和国际革命的联系极其清楚的理解——这就是列宁主义的基本财产，铁的宝库。全世界的共产党人将长期从布尔什维主义这一纲领性宝库中汲取营养。

布尔什维主义的所有这些思想的萌芽几乎都是属于马克思思的。但是，列宁在1905年第一次革命前夕以标准的明确性发展了这些思想，对它们进行了检验，并在1917年两次革命之后再次作了肯定。它们的基本价值就在于此。

列宁主义就是这样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形成起来的。介绍一下

① 列·托洛茨基《全集》第III卷《1917年》第1册，《十月的教训》，第XIX页。

② 关于托洛茨基的这一错误详见我的小册子《布尔什维主义还是托洛茨基主义?》。

列宁主义的几个重要阶段：1. 第一次革命前夕；2. 1905年之后；3. 然后在1917年的两次革命中；4. 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之后；5. 然后，革命的四年之后，1921—1922年。宣布新经济政策之后；6. 列宁逝世前夕，1923年。充满着思想的继承性。在1905年、1917年和1922年间不存在任何“思想上的重新武装”。布尔什维主义不需要这样做。1905年的《两种策略》同1918年的《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有机地融为一体。1905年，列宁还只是个著作家，一些孟什维克还嘲笑他，称之为“马克西米利安·列宁”。1918年，列宁已是公认的国际革命领袖和苏维埃俄国的首脑。这时候列宁的著作立即成为国际共产主义的基本文献。列宁主义在有机地发展，而没有“重新武装”。从1904年起到1922年止的列宁著作充满着从俄国三次革命时代和世界革命运动中汲取来的内容。列宁的每一行话都可以用阶级斗争和国内战争的鲜明例子来说明，这些例子大大超过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1848年和1871年革命中阶级斗争的事变提供的最光辉的历史例证。这些著作向我们显示了整个列宁主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这就是这些著作的主要内容。

第五章

列宁所理解的民族革命

“不断”革命的理论家们的错误首先就在于不懂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实质。与此相联系的是他们在另一问题——关于民族革命的实质和关于民族革命转变为国际革命问题上的混乱。

我们这里有这么一些可怜的国际主义者，他们几乎把“民族革命”这个说法看作骂人话。什么！我们革命家要到什么民族革命中去瞎折腾！这同我们（大写的！）是不相称的。让我们“马上”去搞国际革命吧！

什么是列宁所理解的民族革命呢？

民族革命不是（或者说，无论如何不一定是）民族主义的、沙文主义的、小市民的，满足于自己的局限性和狭隘性的革命。照列宁看来，民族革命是包括全体或几乎全体人民、整个民族的革命。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不止一次地谈到，无产阶级革命是民族革命。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写道：

“一般说来，工业无产阶级的发展是受工业资产阶级的发展所制约的。只有在工业资产阶级统治下，它才能获得广大的全民族规模的存在地位，这种存在地位能够把它的革命提高为民族革命。”^①

① 马克思和恩格斯《历史著作》第36页[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02页]。

在列宁那里可以找到关于这方面的出色论述。

请看《立宪民主党人的胜利和工人政党的任务》一文，特别是此文确定列宁到底怎么理解“民族革命”一词的地方。列宁举斯皮里多诺娃同阿夫拉莫夫的事做例子（哥萨克大尉阿夫拉莫夫拷打斯皮里多诺娃，因而引起公愤，结果招致对阿夫拉莫夫实行私刑）。列宁说，阿夫拉莫夫拷打斯皮里多诺娃，这是一种专政，但当人民惩办阿夫拉莫夫，把他就地处死时，这也是一种专政。前者是少数人的专政，后者是人民的专政。孟什维克马上见怪了：什么，“人民”的专政？你们的马克思主义何在？“阶级”何在？这就显出了这个孟什维克的驴耳朵，他象我们已经说过的，重弹“阶级的”老调，而实际上只是自由派的应声虫。

列宁解释说：

“我们从上述例子看到的，正是人民的专政；人民，无组织的、‘偶然’聚集在一个地方的居民群众，亲自登上舞台，亲自执行审判，使用政权，创造新的革命的法律（着重号是我加的。——格·季·）。最后，这正是革命人民的专政。为什么它仅仅是革命人民的专政，而不是全体人民的专政呢？因为全体人民经常由于阿夫拉莫夫之流建立功勋而遭到极残酷的折磨，他们中间有的人肉体上受了摧残，被吓坏了，有的人精神上受了毒害，例如受了不用暴力对抗邪恶的理论的毒害，或者不是受理论毒害而只是受偏见、习惯、常规的毒害，有的人对一切都漠不关心，那就是所谓庸人、小市民，他们最善于逃避剧烈的斗争，对它不闻不问，或者甚至躲藏起来（千万别卷到这场械斗里去！）。所以实现专政的不是全体人民，而只是革命的人民；可是革命的人民决不害怕全体人民，他们把自己活动的原因和详细情形告诉全体人民，非常愿意吸收全体人民来参加活动，不仅参加国家‘管理’，而且参加政权，参加国家机构本身。”①（着重号是我加的。——

① 《列宁全集》第10卷第216—217页。——译者注

格·季·)

我们都记得列宁在1917年说过的名言：每一个厨娘都应学会管理国家。读者看到，实质上他在1905年向孟什维克解释什么是人民专政时就说过同样的话。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列宁不止一次地把民族革命看作是包括全体人民，首先包括广大农民阶层的革命。

顺便说说，列宁在1905年十二月起义之后对打扫院子的人在红色普列斯尼亚起什么作用感到兴趣，不是无缘无故的。他把一部分扫院子的人参加起义看作是时代的最伟大的象征。1917年，他把厨娘看作是最受压迫、最落后、最受苛待的人民阶层的象征。1905年，他对扫院子的人感到兴趣！什么！扫院子的人参加修筑街垒，而你们对此不置一词——要知道，这是判断群众运动的非常非常重要的因素。你们说了，这时候提出些什么样的提纲，在提纲中争论这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或者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是你们忘了告诉我更重要的事情——打扫院子的和一般小人物是否参加了街垒的修筑。如果参加了，那末对我来说，这就再次证实了这是真正深刻的民族革命。

如果“皮拉和司索伊卡”还这样那样地没有参加革命，那末大概这还不是真正的、完全群众性的人民革命。①不错，这些人是落后的、不文明的；他们会把自己的落后性、不文明、狭隘的眼界带进革命。我们无产阶级的代表，我们先锋队将纠正这一切。但

① 列宁就二月革命(1917年)写道，“一切真正的革命，其科学的和实际政治的主要标志之一，就是积极、自动和有效地参加政治生活，参加国家制度建设的‘普通人’非常迅速地、急剧地增加起来。

俄国就是这样。俄国正在沸腾。在政治上沉睡了10年、因受沙皇制度残酷压迫和替地主工厂主做苦工而在政治上受压抑的千百万群众，现在已经觉醒过来并渴望干预政治了。这是些什么人呢？大部分是小业主、小资产者，即处在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那些人。在欧洲各国中，俄国是最富有小资产阶级性的国家。”[《列宁全集》第2版第29卷第154页。《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任务。》]

是，如果“皮拉和司索伊卡”根本没有参加运动，如果农民、士兵，如果厨娘、扫院子的、小人物没有参加运动，那么这还不是真正人民的、民族的革命。

在这里，量转化成质：卷入阶级斗争（议会选举、罢工、总罢工、起义、国内战争）的群众越多，斗争的规模越广大有力，阶级斗争所处的阶段就越高级。为了胜利地向建成社会主义迈进，需要把所有的劳动者都直接组织起来。

而列宁就是从这种观点看待苏维埃问题的。从1905—1906年起列宁就开始创建关于苏维埃的学说。^①某些教授在我们这里讲授苏维埃法。研究现在的苏维埃法，这当然很好。但是，如果与此同时我们的教授能够讲讲列宁在1905年是如何评价苏维埃的，那就更好了。

早在《立宪民主党人的胜利》一文中列宁写道：

“你是工人吗？你愿意为了使俄国摆脱一小撮警察暴徒而奋斗吗？那你就是我们的同志。请你马上选出自己的代表；你认为怎样方便就怎样选举好了，我们很乐意很高兴接受他做我们的工人代表苏维埃、农民委员会、士兵代表苏维埃等等的享有平等权利的一员。这个政权对大家都是公开的。”^②（着重号是我加的。——格·季·）

是的，列宁在1917年写出了关于苏维埃的意义的真正的不朽杰作。而上面所引的话是1906年初，在1905年革命的第一个高潮之后说的。那时候列宁就已清楚，苏维埃不仅是“起义的机关”，甚至不仅是“政权机关”，而且是新的国家形式。苏维埃是最好的组织，在这里实现了工农的真正结合，在这里先进工人同最落后的“下层”代表聚到一起来了。这就是关键所在。这里，苏维埃是

① 然而，列宁从来没有把苏维埃偶像化，不论在1905年底，在1917年3月和1917年七月事变之后，还是在十月之前和十月之后，他都善于对苏维埃作冷静的阶级分析。

② 《列宁全集》第10卷第215页。——译者注

极欲奔向战斗、走上街头、投身革命的这所有一切的集中点。

1917年后列宁又回到这个问题上，他在同考茨基争论时写道：

“苏维埃所以是民主制的最高形式和最高类型，正因为它把工农群众联合起来，吸引他们参与政治，它是最接近‘人民’（指马克思在1871年谈到真正的人民革命时所说的‘人民’）、**最灵敏地反映群众在政治上阶级上的成熟发展到什么程度的晴雨表**（着重号是我加的。——格·季·）。苏维埃宪法不是按照什么‘计划’写出的，不是在书斋里制定的，也不是资产阶级的法学家强加给劳动群众的东西。不，这个宪法是在阶级斗争发展进程中随着阶级矛盾的成熟而成长起来的……（着重号是我加的。——格·季·）

起初苏维埃联合了全体农民。正是由于贫苦农民不开展、落后、无知，领导权才落到了富农、财主、资本家、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手里……”（着重号是我加的。——格·季·）

“布尔什维主义革命的胜利意味着动摇的终结，意味着君主制和地主土地占有制的完全破坏（这种土地占有制在十月革命以前还没有破坏）（着重号是我加的。——格·季·）。资产阶级革命由我们（着重号是我加的。——格·季·）进行到底了。农民整个说来是跟着我们走的。他们同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对抗，一时还不会显现出来（着重号是我加的。——格·季·）。苏维埃联合了全体农民。**农民内部的阶级分化还没有成熟，还没有显露出来**（着重号是我加的。——格·季·）。

这个过程在1918年夏秋两季得到了发展。**捷克斯洛伐克军的反革命暴动**（着重号是我加的。——格·季·）唤醒了富农。富农暴动的浪潮遍及全俄国。贫苦农民不是从书本上，不是从报纸上，而是从实际生活中知道他们的利益同富农、财主、农村资产阶级的利益是**不能调和的**”（着重号是我加的。——格·季·）。①

列宁在这里补充说，如果布尔什维主义试图过早地“命令”在

农村进行内战或实施社会主义，而不同全体农民结成暂时的同盟（联盟），不向中农作一系列让步等等，那就是用布朗基主义歪曲马克思主义，那就是少数人企图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多数人，那就是在理论上荒谬绝伦，不懂得全体农民的革命还是资产阶级革命，不懂得在落后的国家里不经过许多过渡，不经过许多过渡阶段，就不能把资产阶级革命变成社会主义革命。”^②（着重号是我加的。——格·季·）

上面已经说过，列宁是怎样把对农民的观点国际化的。现在我们也提一下，他怎样把自己关于苏维埃的学说国际化的。

他就此写道：

“苏维埃运动已不仅是无产阶级政权的俄国形式。它已成了国际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阵地，成了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发展进程中的第二步（在巴黎公社之后。——格·季·）。”^③

在另一个地方说：

“1917年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使苏维埃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了全面的发展，后来又使它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中获得了胜利。不到两年功夫就显示出：苏维埃具有国际性质，这种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已经扩展到全世界工人运动，苏维埃的历史使命是充当资产阶级议会制以及整个资产阶级民主制的掘墓人、后继人和接替人。”^④

与此同时列宁教导说，不仅在无产阶级占优势，能够进行典型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国家，而且在农民占绝大多数的国家，例如东方各国，苏维埃也能起决定性的作用。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35卷第302—304页。《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
——译者注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35卷第306页。——译者注

③ 尼·列宁：《全集》第XVI卷，《论工会》，第15页[《列宁全集》第2版第35卷第429页]。

④ 《列宁全集》第2版第39卷第69—70页。《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译者注

1920年，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说：
“苏维埃的作用和意义在东方各国也普遍地为人们所了解了。”

在整个东方，在整个亚洲，在一切殖民地人民当中，苏维埃运动都已经打下了基础。

被剥削者必须奋起推翻剥削者，建立自己的苏维埃，这并不是十分复杂的道理。在有了我国的经验之后，在俄国建立苏维埃共和国两年来之后，在第三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后，全世界亿万被剥削被压迫的群众都懂得了这个道理。”^①

苏维埃的口号对东方具有巨大的意义。

在这里这一口号指出了把农民——被压迫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农民集合到一起的组织。这是说明列宁如何把民族革命同“苏维埃”口号“结合起来”的具体例子。我们知道，列宁盼望（我们也盼望）印度、中国及其他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发生的首先正是列宁所理解的民族革命。列宁还为这些革命提出了“苏维埃”的口号。在苏维埃里聚集着被压迫的农民，苏维埃成了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中民族革命的机关，这种民族革命照列宁的说法乃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组成部分。

这就是对列宁所理解的民族革命、人民专政的简略介绍。这里产生一个问题：列宁所理解的民族革命同马尔托夫所理解的“全民族的反对派”有什么区别呢？

自然，在列宁所理解的“民族革命”同孟什维克关于“全民族的反对派”的“学说”之间横着整整一条鸿沟。

在第一次革命时代孟什维克把全民族的反对派看作是从工人起直到“自由派”地主—十月党人为止的全体革命的和反对派的人民阶层反沙皇的联合。

列宁不反对甚至利用自由派地主去反对沙皇制度。在自由派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39卷第222页。《关于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基本任务的报告》。——译者注

尚未因革命“危险”的增长(1905年)而最终倒向反革命阵营以前,列宁并不拒绝“推动”自由派去反对沙皇。但与此同时,列宁历来懂得,注册的反对派想利用工人,想迫使无产阶级为资产阶级火中取栗。列宁看到,在自由主义登上舞台不久(特别是在1905年工人们显示了自己的阶级力量之后),资产阶级反对派就开始准备同沙皇制度勾结起来反对工人和农民。列宁不反对暂时利用自由派阵线作为反对沙皇制度斗争中的砝码,但他片刻也没有忘记,我们需要革命联盟: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

孟什维克所说的“全民族的反对派”意味着工人充当自由派的尾巴,不敢去“吓跑”自由资产阶级,把自己的要求降低到“全民族反对派”的纲领的水平,向自由派看齐。

当然,青年土耳其派的变革也可以说是“民族”革命,因为它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几乎全民族的利益。列宁所说的民族革命不是这种意思。列宁所理解的民族革命是深刻的人民革命,它推动农民以“平民方式”去惩治地主。而孟什维克的“全民族反对派”公式指的是同立宪民主党人和十月党人的联盟,是向自由派地主和“反对派”商人看齐的联盟。

* * *

1905年以后,列宁继续注视着俄国的民族革命。例如,他在1909年给斯克沃尔佐夫同志的信中(载于《无产阶级革命》1924年第5期)解释布尔什维主义对问题的“标准”提法时写道:

“所以这个土地问题现在在俄国就是以资产阶级发展道路为内容的民族问题。所以为了不致把相当正确的和在各方面都极有价值的德国范例错误地(机械地)搬到我们俄国来,就必须明了:在资产阶级发展道路已完全确定的德国情况下,民族问题曾是统一等等问题,而不是土地问题;而在资产阶级发展道路还有待最后确定的俄国情况下,民族问题现在正是土地问题(甚至更狭窄些,是农民问题)。

“这就是把马克思主义运用到1848—1866年(大致)的德国与

1905—19??年的俄国两者有所区别的纯理论的基础。”

或者请看下一段：

“如果我们能够一致认为，俄国的现代历史即1905—1909年的历史已经证明了土地问题在确定俄国一定形式的资产阶级演进上具有根本的、头等重要的、民族的（从重要意义上讲）意义，那末我们就能够继续讨论。否则就不能继续讨论了。”

不懂得这一点使得孟什维克和半孟什维克在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问题上得出反革命的结论。

列宁关于孟什维克写道：“由此便产生出他们那种极为荒诞、愚蠢和叛变的思想（《社会运动》一书也充满了这种思想），说农民运动是反动的，说立宪民主党人比劳动团分子进步，说‘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即标准提法）与‘经济发展的总进程’相矛盾（见孟什维克的《社会运动》一书第661页）。“与经济发展的总进程相矛盾”——这不是反动吗？”①

列宁在另一篇文章中写道：“如果出发点是群众利益，那末俄国革命的关键就是土地问题。判断革命的成败不应当根据政府的暴力和‘反动派’（它引吸了许多立宪民主党式的社会民主党人的全部注意力）的表现，而应当根据对群众在争取土地斗争中的地位**的估计**。”（着重号是我加的。——格·季·）②

而这场争取土地的斗争基本上是由下列情况决定的：“1000万户农民拥有7300万俄亩土地。28000个高贵而又低贱的地主却拥有6200万俄亩土地。这就是农民展开土地斗争的基础。”③

列宁在《幼稚病》中写道：“没有全民族的（既触动被剥削者又触动剥削者的）危机，进行革命是不可能的。”④

① 《列宁全集》第16卷第116—117页。——译者注

② 《列宁全集》第11卷第350页。《无产阶级及其在俄国革命中的同盟者》。——译者注

③ 《列宁全集》第13卷第205—206页。《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译者注

与此同时列宁当时还解释说，俄国的土地革命问题不仅具有民族意义，而且还具有国际意义。列宁主义不仅从来也没有忘记，整个俄国革命是国际革命的一部分；列宁主义连较为细小的问题也没忘记；甚至仅仅一个俄国土地问题也不单是俄国的问题，而且也是国际的问题。

列宁（在《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革命中的土地纲领》中）写道：

“……毫无疑问，地主经济不但同官僚而且同资产阶级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没收土地将会损害大资产阶级的许多利益，而农民革命——正如考茨基正确指出的那样——将使国家趋于破产，也就是说，不但损害俄国一国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且损害整个国际资产阶级的利益……由于商品生产不是使农民更加一致、更加集中，而是使他们分化和拆散，农民革命在资产阶级国家里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下才能实现，——这一情况使全世界的十分强大的资产阶级更加要起来反对这样的革命了。”^④

而另一篇文章写道：

“专制制度的崩溃将对西欧的经济生活发生可怕的影响，将给投资数十亿于巩固俄国专制制度的法国和德国资本主义以沉重打击……它将使各民族感到神往……它将大大唤起全世界的无产阶级。”^⑤

列宁不止一次地发挥这样一种思想：当无产阶级开始在土地革命中实现其领导作用时，也就是当爆发世界上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土地革命时，国际资产阶级自然是决不会袖手旁观的。原因很简单，俄国地主同俄国资产者联系着，而俄国资产者又同国际资本家联系着。

列宁所理解的民族革命的规模和胜利在另一端上依靠的是国

④ 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39卷第64页。——译者注

⑤ 《列宁全集》第13卷第322—323页。——译者注

⑥ 尼·列宁《全集》第VI卷第206页。《俄国革命的国际意义》。

际关系，即国际革命问题。

俄国革命，那怕只是作为土地革命，也充满国际意义，是同国际革命发展的命运紧密相联的。1917年的十月革命具有更巨大的国际意义。这一点无论如何是无需教训列宁主义的；正是列宁主义在这一问题上不是提出抽象的公式，而是进行天才的分析，说明事物的实际情况——不是在想像的、幻想的，而是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之中。列宁的学说之所以有力量，正是因为只有它指出了俄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在其进程中的实际相互关系。

而托洛茨基同志是怎么看民族革命的呢？

对托洛茨基同志来说，“民族”革命几乎等于骂人之语。他把民族革命看作民族局限性。我不去引用托洛茨基同志在1905年革命以前所写的东西，我现在引用他在1914—1918年帝国主义战争最紧张的时候所写的东西，这时候托洛茨基虽然慢慢地，但却已开始脱离孟什维主义。托洛茨基有一篇纲领性文章，叫做《军事溃败和政治前途》，写于1915年9月。^①他在文中给自己提出了前途问题。“民族主义方针还是国际主义方针”——他就是这样提问题的。

而托洛茨基说：

“在这十年中我们的社会关系的全部发展是沿着继续降低小资产阶级和农民(!?)^②可能起的革命作用，继续增加工业无产阶级的人权和生产作用的道路进行的。如果说1905年未能完成‘民族’革命，那末历史甚至不可能提出第二次民族革命，即联合‘整个民族’去反对旧制度的革命。（着重号是我加的。——格·季·）

“社会民主党在自己的斗争中自然会顾及并利用其他社会力量的反对派运动。但是基本的大问题是：我们是否认为在对外政策上终于暴露了自己的帝国主义反动本质的俄国资产阶级能够在

^① 此文托洛茨基现在也认为是正确的。他把它归入可不作任何改动而重印的文章之列。

^② 着重号是我加的。——格·季·

对内政策上起革命作用？我们是否使俄国革命的发展，也就是俄国无产阶级的实际运动，取决于俄国知识分子、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运动（着重号是我加的。——格·季·）？或者我们使俄国无产阶级的运动服从于全欧洲无产阶级运动的任务和目的？”^①

这是托洛茨基的**反列宁主义**文章的样板。

1915年底，托洛茨基同志还继续把1. 俄国的知识分子，2. 城市小资产阶级，3. 农民这三者等量齐观！

结果，这三种成份多少是一样的；这三个集团似乎都一样地脱离革命，失去起革命作用的能力。而托洛茨基热情奋发地询问列宁：怎么办，您是持指靠越来越不成其为革命因素的俄国知识分子、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的方针呢，**还是**持指靠国际无产阶级的方针？

这样提问题本身就是托洛茨基主义致命的弱点。这种“还是”“还是”显然是不正确的。因为马克思主义不能这样来提问题：持指靠本国的某些农民阶层的方针呢，**还是**指靠国际无产阶级。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说：正因为我持指靠国际无产阶级的方针，正因为如此我不会忘记，为了使我的事业取得胜利，我必须保证自己在本国有无产阶级的基本盟友，而我首先在某些农民阶层中找到这种盟友。在我们国家里这已经非常清楚了。革命的年代已把事情说清楚。而我们看到，在国际范围内农民问题也是按照列宁的观点用同样的办法解决的。

我们看到的是1905年帕尔乌斯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狭隘性的例子，之后在1915年在帝国主义战争中又重复这种狭隘性，这时候当前的所有主要问题都已足够清楚了。

能不能有这样的人，他持1915年托洛茨基的观点，却能解释什么是1917年的二月革命？当然没有！这种人失去了阐明1917年二月革命的钥匙。

^① 列·托洛茨基《战争和革命》第1卷第255—256页。

我们已经知道，按照列宁的看法二月革命是什么——这就是“民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孕育着无产阶级革命。按照列宁的看法二月革命是可以解释清楚的。而按照托洛茨基的看法呢？……按照“不断”革命的观点能不能解释清二月革命呢？臆造多少僵死的图式都可以，但要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去解释什么是二月革命，“不断论者”是办不到的。因为按照列宁的理解，二月革命是“民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在托洛茨基看来，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是一回事。在托洛茨基看来，俄国革命的发展不能“取决”于他们（即也不能取决于农民）……

托洛茨基本应懂得，在我们这样的国家里农民是无产阶级的基本盟友。他应设法弄清，象列宁对我们阐述的，特别是在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之后，农民在国际范围内分成三个集团，它们构成农业居民的大多数（反复看看1920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列宁起草的土地问题决议），在我们看来，应成为并正在成为无产阶级的盟友。1915年9月托洛茨基同志所写的文章《军事溃败和政治前途》再次表明，他缺乏理解真正的、人民的、民族的革命“转变”为国际革命的钥匙。

列宁在《论革命的两条路线》（1915年11月）一文中反驳了托洛茨基在这方面的观点。

列宁在分析普列汉诺夫关于当前俄国革命的性质问题的观点时，对1905年革命中的两条路线提出如下评价：

“俄国1905年革命及以后反革命时期的经验告诉我们，就无产阶级和自由资产阶级两个阶级争取对群众的影响来说，在我国有两条革命路线。”

“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第一条路线（是从事实而不是从‘战略的’空谈得出来的），就是无产阶级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农民没有坚决地跟着无产阶级走。这两个阶级都反对君主制和地主。由于力量不足和决心不够，这两个阶级遭到失败（虽然他们把专制制度打开了一个缺口）。”

“自由资产阶级的行为就是第二条路线……俄国革命中‘自由派的’路线就在于‘平息’和分裂群众斗争，使资产阶级同君主制调和起来。俄国革命的国际环境和俄国无产阶级的力量都使得自由派的行为必然如此。

布尔什维克自觉地帮助无产阶级走第一条路线，奋不顾身地进行斗争并领导农民前进。孟什维克则经常滚到第二条路线上去，他们使无产阶级运动适应于自由派，——从号召参加布里根杜马（1905年8月）起，到1906年的立宪民主党内阁和1907年同立宪民主党人结成联盟反对民主派为止——以此来败坏无产阶级。”^①

所以，按照列宁的看法，1905年革命有两条阶级路线：一条是我们的，无产阶级的（布尔什维克的）路线，而另一条是孟什维克的，实际上是自由资产阶级的路线。

当时托洛茨基同志持什么立场呢？列宁在同一篇文章中是这样说明他的立场的：

“这个任务托洛茨基在《我们的言论报》上解决得不正确，他只是重复他那1905年的‘独创的’理论，而不肯想一想，究竟由于哪些原因整整十年的实际生活都没有理睬他那个卓越的理论。

托洛茨基的独创的理论是从布尔什维克方面摄取了号召无产阶级进行坚决革命斗争和夺取政权的口号，而从孟什维克方面摄取了‘否定’农民作用的思想。据他说，农民已经分化了，他们已经变质了，他们可能起的革命作用愈来愈小了；在俄国不可能进行‘民族’革命，因为‘我们是生活在帝国主义时代’，而‘帝国主义不是把资产阶级民族同旧制度对立起来，而是把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民族对立起来’。

这真是一个‘玩弄字眼’（帝国主义这个字眼）的可笑例子！如果说在俄国无产阶级已经同‘资产阶级民族’对立起来，那就是说

^① 《列宁全集》第21卷第395—396页。——译者注

俄国现在正直接面临着社会主义革命!! 那就是说‘没收地主的土地’(托洛茨基继 1912 年一月代表会议之后在 1915 年所重复的)这个口号是不正确的,那就是说不应该讲‘革命工人’政府,而应该讲‘工人社会主义’政府!! 托洛茨基说:无产阶级用自己的坚决精神也能把‘非无产阶级的(!)人民群众’带动起来(第 217 号),从这句话中可以看出,托洛茨基竟糊涂到了何等程度!! 托洛茨基也不想一想,如果无产阶级能够带动农村非无产阶级群众去没收地主土地,推翻君主制度,那也就是俄国‘民族资产阶级革命’的完成,也就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

1905—1915 年这整整十年,这伟大的十年,证明了在俄国革命中有两条而且只有两条阶级路线……托洛茨基事实上是在帮俄国自由主义工人政治家们的忙,这班政治家们所以‘否定’农民的作用,就是因为不愿意发动农民去革命!”^①

与此同时列宁自然片刻也没有忘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同应当“联合欧洲各国的无产者”来完成的社会主义革命之间并没有隔着万里长城。就在那时候列宁写道:

“无产阶级现在为夺取政权、为建立共和国、为没收土地而斗争,也就是说,为争取农民、为尽量发挥农民的革命力量、为吸收‘非无产阶级的人民群众’参加使资产阶级俄国摆脱军事封建‘帝国主义’(=沙皇制度)的解放运动而斗争,将来还要如此英勇忘我地进行斗争。对于这种使资产阶级俄国从沙皇制度下、从地主的土地政权下获得解放的运动,无产阶级将立即加以利用,无产阶级不是用来帮助富裕的农民去反对农业工人,而是用来联合欧洲各国的无产者,完成社会主义革命。”^②

列宁关于“民族的”、“人民的”革命问题的提法比他的任何最“左”的反对者都具有更多的国际主义的内容。列宁把自己的有力的分析的全部力量用来估计俄国国内阶级力量的相互关系,而俄

① 《列宁全集》第 21 卷第 398—399 页。——译者注

② 参看《列宁全集》第 21 卷第 399 页。——译者注

国是直接面临革命的国家。与此同时，列宁总是从国际力量对比的角度去观察俄国的“民族”革命的。

“要保持住胜利的果实，要防止复辟，俄国革命必须有非俄国的后备军，必须有外来的帮助。世界上有这样的后备军吗？有的，就是西方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

谁要是在谈复辟的时候忘记了这一点，就表明他对俄国革命的看法是极端狭隘的。他忘记了18世纪末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的法国被许多十分落后的半封建的国家包围着，这些国家正是复辟的后备军，而二十世纪初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的俄国是被许多十分先进的国家包围着，在这些先进的国家里有一支能够成为革命后备军的社会力量。”^①

1906年列宁就是这样说的。他在谈论俄国革命的性质和前途问题的著作中曾多次发挥了这一思想。他对俄国“民族”革命问题的提法从来没有“狭隘观点”。

1917年列宁在其主要著作《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1917年9月底）中写道：

“我们的革命……是不可战胜的，因为支持我们的有无比广大的、更加成熟的和更加有组织的世界无产阶级的力量，这种力量暂时受到了战争的压制，但并没有被消灭，相反地，战争使它更加强大了。”^②（着重号是我加的。——格·季·）

这同1906年的观点是密切“结合”的。（见关于在世界局势中完成的法国大革命和在世界局势中完成的我们俄国革命之间的差异的论述。）

列宁关于俄国“民族”革命的观点充满了国际主义精神。他一人彻底了解从伟大的“民族的”“人民的”革命通向国际革命的具体

① 尼·列宁《全集》第IX卷第429页《斯德哥尔摩统一代表大会上的土地问题》〔《列宁全集》第10卷第302页〕。请比较第IX卷第415页在1906年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上的《总结发言》。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32卷第321页。——译者注

道路。他一人彻底理解两者的联系和相互依赖。他一人彻底理解1917年的二月,因而为此清楚地看到1917年通向十月的具体道路并通过它通向世界的十月的具体道路。

第六章

运动的规模和列宁的分析

(1914—1917年)

不言而喻，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任务不在于不断重复某些“永恒真理”，而是善于把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运用于具体的现实条件，赋予它们以生命。无论我们选取列宁主义的哪一个时期，我们到处都可以看到列宁的辩证法和立足于三次革命经验的列宁的实际目测力的卓越典范。属于列宁主义重要实践问题的首先是极其微妙、极其复杂、在一定时刻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关于民主革命转变为无产阶级革命的速度问题。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将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这一点列宁主义早就清楚了。全部问题在于：什么时候开始转变，它按什么样的速度进行，为了不致于放过对我们的策略作必要的修改的时机，要做什么，当转变开始临近时，如何相机动作。

为了避免在这方面犯错误，需要有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那样的对生活的辨别力和他那样的技巧。

让我们看一看，列宁是怎样在布尔什维主义的主要观象台上观察这一“转变”过程的（这里确实要能听得出“草是怎样在往上长的”）。让我们按时间顺序看一看这方面的某些有决定性意义的文献。

1914年帝国主义战争的爆发应看作是这方面的分界线。从这时起革命开始以快速的步伐发展。从这时起，列宁主义明显地成

为世界性的现象。

布尔什维主义对世界大战作出反应的第一个文件是1914年10月底列宁在伯尔尼起草的中央委员会宣言(《战争和俄国社会民主党》)。这一宣言提出些什么口号呢?

“俄国由于最落后,由于还没有完成资产阶级革命,因此,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仍然是实现彻底民主改革的三个基本条件:建立民主共和国(各民族享有完全平等和自决),没收地主的土地,实行八小时工作制。但是在一切先进国家中,战争已把社会主义革命的口号提到日程上来。无产阶级的战争负担愈重,在现代‘爱国主义’可怕的野蛮行为过去以后,在拥有大资本主义的巨大技术成就的条件下重建欧洲时,无产阶级的作用愈积极,社会主义革命的口号就愈迫切。”①

在这一宣言中提出了著名的口号“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对那个时期来说,这是崭新的口号。布尔什维主义的政治口号仍然是过去的口号——“三条鲸鱼”:1.民主共和国,2.没收地主土地,3.八小时工作制。

过了一年,从1915年下半年起事情变得越来越清楚,俄国在临近革命。从此时起需要特别仔细地考察列宁主义的一些最重要的政治文献。

* * *

先谈谈1915年10月的几点纲要,这是我们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编辑部当时由列宁和季诺维也夫组成)发表在该报第47号上的。它曾被转载于《反潮流》文集,自然,其中所有重要论点都出自列宁。写这个纲要时我们已丝毫不怀疑俄国处于第二次革命前夕了。这时利沃夫已沦陷,工人已开始军事工业委员会里同孟什维克展开斗争,象赫沃斯托夫这样的著名黑帮分子(我们在纲要中引用了他的话)已承认革命不可避免了。

① 《列宁选集》第2卷第573页。——译者注

关于正在临近的第二次革命的直接口号问题在纲要中是怎样提的呢？在这一纲要中讲的不是“一般”革命的性质，而是适用于我们面临的局势的具体口号。列宁是这样提问题的：

“‘立宪会议’的口号，作为一个独立口号提出，是不正确的，因为现时的全部问题在于由谁来召集这个会议。”（这不是完全放弃立宪会议的口号，而是放弃把它作为一个独立口号。——格·季·）列宁接着说，“自由派还在1905年就接受了这个口号，因为他们可以把这个口号解释为由沙皇召集并与沙皇协商的会议。最正确的口号应该是‘三条鲸鱼’（建立民主共和国，没收地主土地，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口号，加上号召工人在争取社会主义、争取用革命手段推翻各交战国政府和反对战争的斗争中实行国际团结……”

“俄国无产阶级的任务就是要把俄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到底，以掀起欧洲的社会主义革命（着重号是我加的。——格·季·）这第二个任务现在已非常接近第一个任务；但它毕竟是一个特殊的任务，是第二个任务，因为这里牵涉到同俄国无产阶级实行合作的两个不同阶级：在实现第一个任务时，它的合作者是俄国小资产阶级农民，在实现第二个任务时，却是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①

在理论上布尔什维主义过去从1905年起就已知道，无产阶级和农民专政有“自己的过去和自己的将来”。战前这一点在理论上已经清楚。但是不言而喻，帝国主义战争（纲要写于1915年10月）对整个欧洲，特别是对我国来说，已成为某种历史分界线，我国是在业已成熟的土地危机尚未解决的情况下被卷入这场战争的。正是因为战争，摆在布尔什维主义面前的已不是俄国一国革命“一般地”转变为另一种革命的问题（这一问题在理论上已经解决），而是这种革命转变的时间和速度问题。在这一意义上，1915年布尔什

① 《列宁全集》第21卷第380—381页。——译者注

维主义面临的是崭新的形势。它的回答是什么？布尔什维主义借列宁之口说：第一，无产阶级的任务是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到底，第二，在欧洲燃起社会主义革命的烈火。在第一种情况下，同盟军是小资产阶级农民。在第二种情况下，同盟军是世界无产阶级。不是“或者—或者”^①，而是“既是一又是”。不能把两者分割开来，不能说，这一盆端出这一任务，另一盆端出另一个任务。在时间上第二项任务同第一项任务是很接近的。为什么？因为爆发了帝国主义战争，它使整个欧洲，尤其是使孕育着资产阶级革命的那个国家处于新的状态。^②

1915年10月，布尔什维主义就是这样提问题的。

在1917年二月革命后的第二天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怎样看待这一纲要的呢？二月革命后他是否立即宣布，这种提法已不能成立？没有！二月革命之后，在回国以前，他在给加涅茨基同志的信中写道：

“不管怎样，我要求在彼得堡再版这里的《社会民主党人报》、列宁和季诺维也夫论战争与社会主义的小册子、《共产党人》杂志和《社会民主党人文集》，即使用《近年沙皇制度纪事》这样的名称

① 托洛茨基的二者择一。见第5章第77页。

② 我们还要指出纲要中关于社会民主党人可以参加临时革命政府这一非常重要的论点。

“我们和从前一样仍然认为，社会民主党人同民主主义小资产阶级一道参加临时革命政府是可以的，但只是不能同沙文主义革命者一道参加这种政府。”[见《列宁全集》第21卷第381页。]

这里的用词以至整个问题提法都很有意思。列宁说：我们和从前一样同意同小资产阶级一道参加临时政府，但只是不能同沙文主义革命者一道参加。也许会问，到底同另一种什么样的小资产阶级一道——要知道，小资产阶级几乎全体都是沙文主义的。1915年布尔什维主义没有给予明确回答。但到1917年十月革命之后，它回答了：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在一段时间里曾是非沙文主义的革命者，或者不全是沙文主义者，至少在布列斯特和约之前是如此。1915年，当列宁写纲要时，他们还不存在，但列宁预见到会产生小资产阶级这一翼的，他们在某种局势下虽有动摇，但能出来反对沙文主义。

也好。首先应当重新发表登载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第 47 号（1915 年 10 月 13 日）上的纲要。这篇纲要在目前非常重要。（着重号是我加的。——格·季·）

“这篇纲要直接、明显而又确切地指出了在俄国革命时期我们应当怎么办，并且是在革命前一年半指出的”（着重号是我加的。——格·季·）！

“这篇纲要被革命绝妙地、一字不差地证实了。”^①（着重号是我加的。——格·季·）

这样，在二月革命之后列宁认为，1915 年的纲要提出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到底，以便在西方燃起社会主义革命的烈火，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非常重要的，已为革命所完全证实。

让我们接下去分析以后几年布尔什维主义的重要声明。我们进入了这样一个时期，在这一时期最好是尽可能逐日地考察列宁主义的重要文献，因为这时候就是一天也是个不短的时间；事变以一日千里的速度飞速发展，革命使我们每一分钟都面临新的时势。

我们所知道的下一个文献是 1917 年 3 月 17 日的提纲草稿，它在报刊上被叫做《列宁和季诺维也夫的提纲草稿》。当然，这里所有重要的东西也都是属于列宁的。1917 年 3 月 17 日在苏黎世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家里，经过一再考虑和多次协商，依据来自俄国的一批消息，列宁这样说明了布尔什维克面临的任务：

“因此，革命无产阶级不能不把 3 月 1 日（14 日）的革命看作是它在自己的伟大道路上取得的初步的但还远不是完全的胜利，不能不给自己提出继续为争取民主共和国和社会主义而斗争的任务。”^②（着重号是我加的。——格·季·）

这样，3 月 17 日列宁把当前任务表述为争取民主共和国和社会主义而斗争。“民主共和国”，也就是民主议会，立宪会议！对

① 《列宁全集》第 35 卷第 305 页。——译者注

② 《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29 卷第 5—6 页。——译者注

我们现代的年轻革命家来说，这种思想也许是不能容忍的。但事情就是这样，这是在1917年3月17日写的。这是列宁写的。

下一个文献是1917年3月列宁在瑞士写的《远方来信》。列宁写道：

“我国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因此工人应该支持资产阶级——取消派阵营中最坏的政客们说。

“我国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说道，——因此工人应该使人民看清资产阶级政客的骗局，教导人民不要相信空话，只能依靠本身的力量，本身的组织，本身的团结，本身的武装。”^①

这样，我国的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列宁主义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无产阶级更要争取在这一革命中的领导作用，不把这一领导作用交给资产阶级。而列宁一方面提出建立工人民兵、武装工人等等要求，同时作为开端还提出了表面上温和的立即改选市杜马的建议。（很多人觉得奇怪，为什么恰恰是“市杜马”，其实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显然是从巴黎公社那里获得的联想）。总之，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应当把它“进行到底”。应当从夺取苏维埃和市政机关中的据点着手。

下一个当时非常重要的文献是《给瑞士工人的告别信》。在离开的时候，列宁给瑞士同志写了一封信，这封信显然是为整个国际而写的。瑞士工人在这里成为收信人是偶然的。瑞士的运动本身规模并不大。但列宁在那里生活过，在那里组织了工人小组，所以他想通过他们向整个国际发表自己的告别词。在这一具有头等意义的文献中列宁说：

“俄国是一个农民国家，是欧洲最落后的国家之一。在这个国家里，社会主义不可能立刻直接取得胜利。但是，在贵族地主的大量土地没有触动的情况下，在有1905年经验的基础上，^②俄国这个

^① 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29卷第19页。——译者注

国家的农民性质能够使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具有巨大的规模，并使我国革命变成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序幕，变成进到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级阶梯。”①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喜欢重复“阶梯”这个形象的词。

“俄国无产阶级单靠自己的力量是不能胜利地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但它能使俄国革命具有浩大的声势，从而为社会主义革命创造极好的条件，这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意味着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这样，俄国无产阶级就会使自己主要的、最可靠的战友——欧洲和美洲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易于进入决战。”②

这一文献已不单是对俄国，而且也是对国际无产阶级而发的。而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向国际无产阶级讲话时，他总是认为这里特别需要斟酌每一个用词。不应当提出无法实现的希望，而应当冷静、准确等等。在动身返俄前，列宁向这些听众说：俄国是个落后国家。直接开始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之后，我们只能把俄国革命变成进行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一级阶梯”。我们自己不能最终完成我们的革命。我们第一个开始了革命，但我们自己不能胜利地完成它。后来列宁曾多次声明，俄国易于开始，而欧洲无产阶级易于继续和完成。③

由于俄国无产阶级所占的比重，由于一系列有利情势的凑合，我们能使我们民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达到如此的规模，使之成为国际革命的序幕和通向国际革命的“一级阶梯”。不多不少。这就是列宁回俄前所作的估计。让我们记住这一点。

下一个文献是列宁在苏黎世所作的一度被认为丢失了的报告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29卷第90页。——译者注

② 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29卷第91页。——译者注

③ “每一个认真考虑过欧洲社会主义革命的经济前提的人都不会不了解，在欧洲开始革命要困难得多，而在我国开始要容易得多，但是要继续下去，却比在欧洲困难。这个客观情况使得我们不得不经历异常艰难、异常急剧的历史转折”。〔《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47页。《关于战争与和平的报告》〕。

摘要。① 其中列宁说：

“由于各种条件的非常奇特的凑合，各种各样的社会力量能够在1917年联合起来去共同打击沙皇制度。

第一：统治和掠夺全世界的英法金融资本。它在1905年曾反对革命，帮助沙皇政府扼杀了革命（1906年的亿万贷款！）。现在它最积极地直接插手革命，策动古契柯夫、米留可夫和高级军界人士废黜尼古拉二世。

“从世界政治和国际金融资本的角度来看，古契柯夫-米留可夫政府不过是‘英法’银号的伙计，不过是继续进行帝国主义大屠杀的工具。

第二：沙皇君主政府军事上的失败淘汰了旧军事指挥人员而代之以新的、年轻的、主要是资产阶级的指挥人员。

第三：在1905—1914年间，尤其是在1914—1917年间加紧组织起来的俄国整个资产阶级，同贵族勾结起来反对腐败的沙皇制度，想靠掠夺亚美尼亚、君士坦丁堡、加里西亚等地发财。

最后，**第四**，也是最主要的，除了这些帝国主义性质的势力以外，还有要求**和平、面包和自由**的强大而深厚的具有革命性质的无产阶级运动。工人阶级同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毫无共同之处，他们还率领由工农组成的军队的大多数。”②

这也是极有意思的声明。早在1915年底，托洛茨基教训说：不要指望城市知识分子，不要指望城市小资产阶级，也不要指望农民。而列宁在1917年3月，在二月革命已经完成之后说：结果是，不仅农民，不仅城市小资产阶级，也不仅知识分子，而且甚至古契柯夫和米留可夫实际上都曾协助推翻沙皇制度，并且不仅古契柯

① 普拉廷同志根据1917年3月18—31日刊登在瑞士党的左翼机关报《民权报》上的报告《列宁论俄国革命》，找到了这个报告摘要。

② 弗里兹·普拉廷《列宁自国外返俄。1917年3月》，“莫斯科工人”出版社1925年版第76页。所引文字显然是列宁的原文，而不是从译文转译的。〔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29卷第64—65页。〕

夫和米留可夫，甚至英法金融资本也出来反对沙皇制度——当然，各有各的打算。结果是，不仅农民奋起，不仅士兵行动起来反对沙皇，不仅城市小资产阶级“动摇”到革命一边，并且连大资产阶级，甚至完全是帝国主义的英法金融资本都一时离开了沙皇制度，企图寻找其他出路。这也就是按列宁主义理解的民族革命。换句话说，列宁在这一报告摘要中把俄国革命看作是民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争取了最广大的群众，使沙皇制度完全陷于孤立；完全特殊类型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打开了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它自己辩证地①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继续说：

“无产阶级应当采取什么样的策略呢？我们正处在一个过渡时刻，即从革命的第一阶段向革命的第二阶段过渡，从反对沙皇制度的起义向反对资产阶级、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起义过渡，——向实现国民公会过渡，而只要政府肯履行它所许下的召开立宪会议的‘诺言’，立宪会议就能够发展成国民公会（着重点是我加的。——格·季·）。

“当前的特别重要的任务，就是建立无产阶级的组织。但这不是各国社会主义叛徒——社会爱国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所满足的老一套的组织，而应当是革命组织。这种组织首先必须是普遍的，其次必须是把军事职能和国家职能结合起来的。

“马克思根据1871年巴黎公社的经验教导我们说：‘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②无产阶级应当打碎这个机器（军队、警察、官僚）。这就是机会主义者加以反对或掩盖的真理。这是巴黎公社和俄国1905年革命的最重要的实际教训。”③

① 见本书第十六章《列宁主义和辩证法》。

② 卡·马克思《1870—1871年法兰西内战》，列宁编辑的译本，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出版社莫斯科1919年版第41页。

③ 弗里兹·普拉廷《列宁自国外返俄》第79—80页。[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29卷第68页。]

这最后一句话特别重要，因为它显示出列宁这时是怎样具体设想革命的。他以巴黎公社和法国大革命作类比。列宁从巴黎公社的类比中得出苏维埃的思想，他在1905—1906年间已开始发挥这一思想了。根据对法国大革命及其优点的推论，他赞同国民公会，期望我们从立宪会议产生国民公会。列宁清楚地看到正在形成的伟大运动的不断变动的界限。早在二月革命之初，列宁就不仅在理论公式上设想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而且使这种转变在革命的国家机构之中得到体现：从立宪会议产生的国民公会，将是建立新型的苏维埃工人国家的一个阶段。^①

按时间顺序下一个文献是列宁1917年4月4日的著名提纲，这是列宁回到彼得格勒后的第二天发表的。我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景。事情的经过如何？我们从国外回来，正好碰上因第一次全俄苏维埃代表会议而召开的布尔什维克会议闭幕。同志们等待列宁的到来，召集了布尔什维克会议尚未散去的那一部分人员。这里还有这样一些人物，如沃伊廷斯基、阿维洛夫、巴扎罗夫及其他一些一只脚已站到孟什维克阵营的人物。他们自认为是布尔什维

^① 问题的这种提法顺便把我们引到不久前因《十月的教训》而发生的关于立宪会议的争论。托洛茨基同志企图利用我的关于“苏维埃和立宪会议的配合形式”的说法，证明这种配合形式的思想本身就是“希法亭主义”，说这是“孟什维主义”等等。然而列宁在1917年3月就这样设想过。这同孟什维主义毫无共同之处，这仅仅是布尔什维主义策略的具体化。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托洛茨基认为“希法亭思想”的那些思想写道，“唯有在苏维埃掌握政权的条件下，才能保证立宪会议会召开，才能保证它的成功，难道这还难以理解吗？这一点，布尔什维克已经说过几千遍。从来没有人试图驳倒它。这种‘配合形式’是大家都承认的。”[《列宁全集》第2版第32卷第395页。]在1917年8至10月期间我们的布尔什维克报纸《工人之路报》对这一问题（立宪会议和苏维埃）很为注意，并且提法也同列宁的上述指示相同。

现在，在我们有了十月革命的经验之后自然不难看清，在业已形成的力量对比下，立宪会议只能起反动作用，不可能把它同苏维埃联合在一起。但在革命初期，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还仅仅开始的时候，列宁认为这种“配合形式”是可以允许的。并且托洛茨基到1918年初以前也没有否认立宪会议起革命作用的可能性。

克，参加了我们的会议。正是在这个不寻常的会议上列宁第一次讲述了自己的提纲。这时候在塔夫利达宫的大厅里正在举行所谓社会民主党“所有派别”的统一代表会议。那里在等布尔什维克发言表态，并且阿维洛夫、沃伊廷斯基之流主张我们从小会议室移到大厅去，并干脆融化到社会民主党“所有派别”的整体之中，即要我们成为“统一狂”的牺牲品。

列宁在布尔什维克的小型会议上宣读了自己的提纲。会议中有一部分人因来得突然而大吃一惊：“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改变党的名称，这都使某些同志觉得“过火”了。报告后在布尔什维克小范围内提出一个具体问题：对塔夫利达宫的会议怎么办？列宁说，最好暂时不去，需要等一等，需要在我党中央商量一下宣读过的提纲。但在当时要花几天（即使几小时）在中央进行事先讨论是不可能的；革命甚至连几分钟的时间都不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只好到大厅去并发表讲话。如果说这一提纲曾出乎部分布尔什维克之意外，那末甚至很难想象得出，提纲在这由策烈铁里任主席的有大量形形色色人物参加的大会上造成什么样的印象。列宁的提纲就象一颗炸弹爆炸了。普列汉诺夫在《统一报》上说，列宁的提纲是“幻想加闹剧”，列宁是从另一个星球掉下来的，等等。

不过且让我们看一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这一提纲到底讲了些什么。列宁在提纲中说：

“不要议会制共和国（从工人代表苏维埃回到议会制共和国是倒退了一步），而要从下到上遍及全国的工人、雇农和农民代表苏维埃的共和国。

废除警察、军队和官吏。

一切官吏应由选举产生，并且可以随时撤换，他们的薪金不得超过熟练工人的平均工资。

在土地纲领上，应把重点移到雇农代表苏维埃。

没收地主的全部土地。

把国内一切土地收归国有，由当地雇农和农民代表苏维埃支

配。单独组织贫苦农民代表苏维埃。把各个大田庄(其面积约100俄亩至300俄亩,根据当地条件和其他条件由地方机关决定)建成示范农场,由雇农代表进行监督,由公家出资经营。

立刻把全国所有银行合并成一个全国性银行,由工人代表苏维埃进行监督。

我们的**直接任务**并不是‘实施’社会主义,而只是立刻过渡到由工人代表苏维埃**监督**社会的产品生产和分配。”^①

这就是被普列汉诺夫称之为幻想加闹剧、受到孟什维克最猛烈攻击的那份文件中的实质性部分。

在这一提纲中列宁已比先前几次的说法前进了。“不要议会制共和国,而要苏维埃共和国”——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声明说。要知道,革命也在前进。但是在这一文献中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还坚决宣布,我们面临的**任务不是直接实施社会主义**,而只是立刻过渡到由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监督**经济、生产和银行。列宁强调指出,在战时甚至某些资产阶级国家也不得不采取和实行监督,这是战争造成的,等等。

当然,列宁清楚地知道,实行这些口号是不能靠和平手段的;他出于“教育”的考虑以这种形式提出“温和的”说法,以便**开始**,以便**打开门户**,以便**迫使苏维埃“接受邀请”**——以便工人群众能**开始**动起来并集合在布尔什维主义旗帜之下。

宣读了列宁的提纲之后,以列宁为一方,加米涅夫为另一方,开始了争论,这一争论的意义现在被歪曲了。这不是共产党人同社会民主党人的争论。这是布尔什维克队伍内部的争论。加米涅夫自然是很错误的,正确的是列宁。但这是得到列宁的完全赞同,得到整个中央委员会赞同而公开进行的布尔什维主义范围内的争论,是关于**民主革命如何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问题的争论。这就是争论的问题。分歧是严重的、深刻的。在气氛极其紧张的大革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29卷第115—116页。《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译者注

命时刻，这场争论当然具有巨大的政治意义，但决不是象现在所说的，似乎那时我们有一个完整的党内的“右”翼等等。

在《无产阶级政党的行动纲领草案》（《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任务》，1917年4月10日）中，列宁写道：

“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的阶级根源和它的阶级意义在于：1917年3月的俄国革命不仅推翻了整个沙皇君主制度，不仅把全部政权交给了资产阶级，而且已经到达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彼得格勒和其他地方的工兵代表苏维埃是这样的专政（即不是依靠法律而是依靠武装的居民群众的直接力量的政权），就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

“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只是反映了革命发展中的一个过渡时刻，这时革命已超出了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围，但是还没有到达‘纯粹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①

那里还写着：

“对资本家即对和平与社会主义的死敌抱着不觉悟的轻信态度，这就是俄国群众的政治现状的特点，这就是在欧洲一个最富有小资产阶级性的国家的社会经济基础上以革命速度产生出来的现象……”

俄国无产阶级的人数较少，觉悟和组织程度不够，这是造成这种情况的另一个原因。”^②

在正面阐述纲领时，列宁在这里写道：

“在一个小农国家里，只要绝大多数居民还没有觉悟到必须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无产阶级政党就决不能提出‘实施’社会主义的目的。”

“但是，只有躲在‘准马克思主义’词句下的资产阶级诡辩家，才会以这个真理为借口，替那种不执行实际上业已成熟的迫切革命措施的拖延政策进行辩护，而这类措施在战时已有许多资产阶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29卷第153—154页。——译者注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29卷第155页。——译者注

级国家实行了，因为这是同日益逼近的经济的彻底崩溃和饥荒作斗争所绝对必要的。

实行土地国有化、把一切银行和资本家的辛迪加收归国有或至少由工人代表苏维埃立刻加以监督等等措施，决不是‘实施’社会主义。应当绝对坚持实现这些措施，并尽量用革命方法来实现。”^①

下一个文献是列宁的《论策略书》（这已经是在列宁格勒写成的），特别是其中列宁一方面解释加米涅夫的错误，另一方面又立即反对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的那些地方。

列宁对加米涅夫说：

“我的朋友，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是常青的。”

“谁按旧方式提出资产阶级革命的‘完成’问题，谁就是为死教条而牺牲活的马克思主义。

按照旧方式，结论是：继资产阶级的统治之后，才可能和应当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统治，他们的专政。

但是生动的实际生活中已经产生了另外一种情况，产生了一种非常奇特的、崭新的、从未有过的两种统治互相交错的情况。现在同时并存的一方面是资产阶级的统治（即李沃夫和古契柯夫政府），另一方面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后者自愿把政权让给资产阶级，自愿做资产阶级的附属品。”^②

这就是列宁对问题的提法：加米涅夫同志，你去求助于旧布尔什维主义，这是不对的；布尔什维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的旧口号是正确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是正确的，而现在争论的不是理论，而是在目前形势下已经出现的转变的速度和特点。结果出现这样的情况，既存在资产阶级专政（李沃夫—古契柯夫），也存在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这后一种专政已经实现，但它实行自我“限制”，自己使自己一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29卷第166—167页。——译者注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29卷第139页。——译者注

时成为大资产阶级的附属品。为什么？这是因为，我们的农民和部分工人是“真诚的护国派”，他们真诚地认为，他们只是在保卫自己的国家。结果出现了错综复杂的情况，应当善于把它搞清楚。在资产阶级政府旁边出现了民主专政，这种专政应当转变成，也正在转变成社会主义专政。但应当顾及局势的特点；需要过一些时间，以便使现在政治上还是盲目的，充满了幻想的“真诚的护国派”——农民觉醒过来，并且在政治上成熟到能越过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所以，任务在于要使“真诚的护国派易于消除他们的幻想。要做到这一点只有靠布尔什维克对问题的不可调和的提法和耐心的宣传，而不能靠鼓吹对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实行“监督”。你不懂得这一特点——列宁对加米涅夫说。

与此同时列宁也反对了托洛茨基的半孟什维主义的“不断革命”论：

“我们会不会有陷入主观主义的危险，会不会有想‘跳过’尚未完成的（农民运动尚未失去作用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进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危险呢？”

如果我说‘不要沙皇，而要工人政府’，那就有这种危险。但是我说的不是这个，而是别的。我是说，在俄国，除了工人、雇农、士兵和农民代表苏维埃外，不能有别的政府（资产阶级政府除开不算）。我是说，目前俄国的政权只能从古契柯夫和李沃夫的手里转到这些苏维埃的手里，而在这些苏维埃中，占大多数的恰巧是农民和士兵，如果不用生活上的、习俗上的、职业上的说法，而用阶级的说法，用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用语来说，那末占大多数的恰巧是小资产阶级。（着重号是我加的。——格·季·）

在我的提纲中，绝对保险一点也没有跳过尚未失去作用的农民运动或整个小资产阶级运动，一点也没有由工人政府‘夺取政权’的儿戏，一点也没有布朗基主义的冒险行动，因为我直接提到了巴黎公社的经验。”^①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29卷第142页。《论策略书》。——译者注

这是非常出色的地方。列宁把问题提得非常具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向加米涅夫解释他在把米留可夫和古契柯夫当作保姆的“真诚的护国主义”的独特性上所犯的~~错误~~，然后非常准确地阐述了他的口号同“不断”革命口号有什么不同。我没有跳过农民，我绝对保证这一点。我的口号是“全部政权归苏维埃”，而不是“打倒沙皇，而要工人政府”。而在苏维埃里的是什么人呢？在苏维埃（特别是在军队尚未复员情况下的当时的苏维埃）里农民代表占四分之三。谁不记得当时的彼得格勒苏维埃，在那里我们布尔什维克在革命初期几乎没有开口说话的余地？那里坐着大量的士兵——“真诚的护国派”，他们在开始时关于真正的国际主义连听都不想听。列宁知道，苏维埃（当时的苏维埃）是小资产阶级的苏维埃，不能跳过这一事实。但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也知道，苏维埃很快会反对战争的，它会跟无产阶级先锋队走的。

列宁在1905年就已知道，什么是苏维埃。1906年（在《立宪民主党人的胜利》一文中）列宁就已号召最落后的工人和农民说：请到苏维埃来！苏维埃是使农民尽快抛弃无用的包袱，跟着先进工人走的组织。1917年，列宁提出苏维埃问题，使之适用于战争造成的条件，特别是适用于“真诚的护国主义”。

托洛茨基同志不愿理解这一切，他在《1917年》一书的序言中说：如果没有战争，那末一切就会是另一个样，就不会有一千万武装的农民，就会有真正无产阶级的苏维埃等等。

我们要问托洛茨基同志：那末工人们，他们从1917年2月大约到5、6月间的情绪怎么样呢？好吧，就算战争是“偶然的”，一千万武装的农民士兵也是“偶然的”。那末工人呢？甚至最先进的彼得堡工人，他们在1917年2月到6月间的情绪怎样呢？俄国工人的先锋队——当时决定全局的首都无产阶级的情绪怎样呢？难道他们——至少是很大的一部分，而在开始时还是大多数，不是怀着护国主义情绪吗？难道在这一阶段俄国工人阶级没有自我“限制”，没有自愿地服从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政权？难道这也是“偶

然的”？

不仅仅是农民，而且大部分工人当时都是典型的“真诚的护国派”。列宁在党的四月代表会议上对此种情绪作了出色的说明：

“我谈到过‘真诚的’革命护国派群众，那不是就道德范畴来说的，而是就阶级的含义来说的。工兵代表苏维埃所代表的那些阶级并不从掠夺战争中得到好处。欧洲的情况则不同。在那里，人民备受压迫，连极端机会主义的和平主义者所受的迫害也往往比我们真理派所受的厉害得多。在我国，工兵代表苏维埃不是靠暴力，而是靠群众的信任来贯彻自己的革命护国主义立场。欧洲则完全是个军事监狱。资本在那里残酷地统治着。在整个欧洲，应当推翻资产阶级，而不应当规劝资产阶级。在俄国，士兵是武装起来了，但他们甘愿受人欺骗，同意所谓只是为了‘防御’威廉的进攻。在欧洲，没有‘真诚的’革命护国派，这跟俄国不同。在俄国，人民由于愚昧无知、因循守旧，由于习惯于忍受棍棒，由于传统，把政权让给了资产阶级。斯切克洛夫、齐赫泽在表面上是领袖，但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尾巴；尽管他们有种种美德，有马克思主义的知识等等，但他们在政治上已经僵死了。在我们这里，政权掌握在带有护国主义情绪的士兵手中。资本家的客观阶级地位是一回事。他们是在为自己而打仗。士兵，也就是无产阶级和农民，则是另一回事。夺取君士坦丁堡他们有兴趣吗？没有，他们的阶级利益同战争势不两立！因此，他们是可以教育和说服的。目前政治形势的关键，就是要善于向群众说明真理。当我们还没有向士兵或不觉悟的群众讲清‘打倒战争’的口号的意义时，我们还不能认为革命群众等等是我们的‘支柱’。”^①

我们看到那时期的一种典型实例，看到俄国农村怎样常常以自己的情绪感染我们的工人，因为许多工人，特别是莫斯科工人，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29卷第238—239页。《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格勒市代表会议》。——译者注

特别是战时进入彼得堡的工人，他们自身就是半个农民。这一时期极其清楚地表明，在我们这样的国家里，来自农村的护国主义浪潮——小资产阶级幻想和“和平主义”的浪潮，农民的、半托尔斯泰主义的、卡拉塔也夫主义的浪潮——通过彼得堡和莫斯科的卫戍部队，通过士兵，即通过农村的青年人席卷了城市，同时甚至席卷了彼得堡的无产阶级先锋队。不要说农民，就是无产阶级自己当时也至少需要几个月的“学习”和训练。不错，在革命最激烈的地方无产阶级成熟得很快，象七月事变这样的事变也迅速地推动它前进。我们布尔什维克到7月，在七月事变之初，才在彼得格勒苏维埃工人部获得多数，这不是偶然的，但就是在那时候也只是很微弱的多数。并且仅仅是在工人部。大多数士兵仍然是反对我们的。

这就是那几个月工人的情绪。

这些工人甚至在掀起沙皇制度的铅皮屋顶之后仍然怀这种情绪，除了列宁执行的政策以外，对这样的工人能执行别的政策吗？当然不能。在革命的这一阶段我们看到了列宁主义在无产阶级和农民这一根本问题上正确无误的、鲜明而形象的历史例证。

* * *

布尔什维主义策略发展中极其重要的关头是1917年4月，我党的四月代表会议，顺便说一下，对会议的意义托洛茨基同志也是全然不懂的。

这次代表会议起了沙皇制度崩溃后的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作用，会上第一次聚集了从流放地、苦役地和国外回来的几乎是党的整个司令部。召开四月代表会议时，同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一起组成的第一届联合政府已在筹组中，彼得堡的街头在举行反对米留可夫的第一批游行示威，护国主义开始在群众中消失，而代之以半布尔什维主义情绪。顺便说说，在这次代表会议上，列宁顺便坚决地反对了“不断”革命理论。列宁再次坚决重申：

“如果我们说，‘不要沙皇，而要无产阶级专政’，那就会跃过小

资产阶级。但我们说的是要通过工兵代表苏维埃帮助革命。决不能陷入改良主义。我们进行斗争，不是要使自己失败，而是要成为胜利者，至少要取得部分的成功。即使我们失败了，我们也一定会取得部分的成功。那就是实行改良。改良是阶级斗争的辅助手段。”①

托洛茨基把四月代表会议描绘成毅然决然地采取同“历史上的”布尔什维主义决裂的方针，会上两种政纲——一个是争取民主革命的，另一种是争取社会主义革命的——进行着莫名其妙的激烈斗争，“右”翼同“左”翼进行着激烈的斗争，左翼在列宁领导下只是经过拼死的斗争才占了上风，贯彻了一条反对右翼的坚定的路线。这一切被无限夸大了。托洛茨基同志没有参加这次代表会议，因为当时他还不是我党党员。有许多事他不会知道。既然如此，那就应当了解事实。四月代表会议的政策同托洛茨基强加于它的速射炮式的“左的”政策毫无共同之处。相反地，在代表会议上列宁致力于用探测、叩诊和听诊的办法极其小心谨慎地探查局势，按照现时的尺度，极其“温和”地提出了党在这革命开始时期的全部纲领。列宁竭尽全力设法做到，在采取当然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坚决路线时，在速度上不操之过急。在这次代表会议上，部分“左派”（当时彼得堡委员会的一批同志和部分莫斯科“左派”）正是指责列宁动作缓慢。他们对列宁说：国内进行着伟大的革命，而您却建议向真诚的护国派一次又一次地阐明局势，难道我们是个宣传员协会？

而列宁回答“左派”和“右派”说：现在正是需要阐明和一再阐明的時候。不能跳过它。我们确实不是宣传员协会，而是革命的政党。但是革命现在已进到这样的界线，在这里在继续前进之前，需要向先锋队阐明战争的性质、苏维埃的意义，解释两个政权并存局面、俄国的路易勃朗主义（即策烈铁里主义）等等。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29卷第361页。——译者注

彼得堡当时象开了锅一样。在所有的街道上都是不断的人数众多的群众大会，完全象个蜂箱。到处都提到列宁的名字。记得有一次我们同列宁来到一家住所，准备呆几小时以避开在《真理报》社前举行的宣传民族仇恨的示威游行，而这家的一个女工一边给列宁脱大衣，一边情绪激昂地说：哎，只要这个列宁落到我手里，我就会咬断他的咽喉。记得这件事不仅使列宁大笑了一阵，并且还使他想到，群众还多么不理解布尔什维克。

列宁告诫全党：镇静！耐心！沉着！让我们到这种熔炉中去熬炼吧！要善于耐心地向现在还打算咬断我们咽喉的女工和农妇们解释什么是布尔什维主义。让她们尝一尝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菜吧。让她们通过实践看清，什么是孟什维克政府，什么是两个政权并存，让她们看到，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将如何继续战争，——那时她们就会迅速懂得，布尔什维克要的是什么。

四月代表会议并非象托洛茨基同志所说的那样，是从六层楼上往下跳。只要仔细地读一读四月代表会议根据列宁的提议通过的主要决议^①就清楚了。

四月代表会议的主要决议中说：“俄国无产阶级是在欧洲最落后国家中的一个国家内，在大量小农居民中间进行活动的，因此它不能抱定立即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目的。（着重号是我加的。——格·季·）

“但是，如果由此得出结论说，工人阶级必须支持资产阶级，或者必须把自己的活动局限在小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范围内，或者在向人民解释必须立即采取若干实际上已经成熟的向社会主义迈进的步骤方面放弃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那就是极大的错误，在实际上甚至是完全转到资产阶级方面去了。

“这样的步骤，首先就是实行土地国有化。这种措施并没有直

^① 这个代表会议的速记记录现在已出版。我们向读者大力推荐这一记录。顺便说一下，主要决议几乎是一致通过的。其中“右派”——加米涅夫、李可夫、诺根也投了赞成票。

接超出资产阶级制度的范围，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却是一个强有力的打击，因而会加强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对农村半无产者的影响。

其次，这样的步骤就是对所有的银行实行国家监督，把它们联合成一个统一的中央银行，同时对保险机关和资本家的最大的辛迪加（如糖厂主的辛迪加、煤业公司、五金公司等等）也实行国家监督，逐步实行更合理的累进所得税和累进财产税。这样的办法在经济上已经完全成熟，在技术上完全可以立即实行，在政治上能够获得绝大多数农民的拥护，因为这些改革在各方面都是对他们有利的。”^①

四月代表会议的纲领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纲领。列宁就土地国有化这样重要的纲领性要求说道：“在这种情况下，土地纲领中规定的土地国有化就必然会有另一种提法。这就是：土地国有化不仅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最后一言，而且也是迈向社会主义的一步’。”

所以，四月代表会议的纲领在土地问题上土地国有化（这是布尔什维主义早在1905年就已捍卫过的），在财政和工业领域是把众多的银行合并为一个银行，由工人代表苏维埃实行监督，是对制糖厂主辛迪加实行监督，等等。对制糖厂主辛迪加实行监督！逐步向较为公平的所得税过渡！——难道这是“左的”纲领？

从表面上看这是极为温和的纲领。

为什么？

因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提出的仅仅是实践上业已成熟的措施，这种措施能够得到多数工人和农民的支持。列宁竭力把纲领写得不仅能为工人所接受，而且能为由农民组成的强大的步兵所接受，在目前阶段他们还怀有护国主义情绪，并且为克伦斯基所操纵。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29卷第442—443页。——译者注

如果绝大多数人民都参加革命，那末新的革命定能胜利，这一点列宁是坚信不疑的。这就是为什么他在四月代表会议上提出这样的任务，即写出能使最广大的工人和农民群众行动起来的经济纲领。当群众不能继续照旧生活下去的时候，他们就会投身革命。1917年4月能不能向群众提出直接进行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口号呢？不行，还不能提（虽然在一般鼓动中我们当然要高呼：“社会主义革命万岁！”）。这就是为什么1917年4月党不提“剥夺资本家”，而把“对生产实行监督”，“向较为公平的、温和的所得税过渡”，“土地国有化”同“和平、面包、自由”的口号并提，这些口号是最广大的群众所能接受的，可以围绕着这些口号动员群众，把他们联合起来，推动他们投入战斗。

孟什维克在这时候准备起草不管什么样的“左的”决议。请回想一下当时的劳动部长孟什维克斯柯别列夫，最初他要求资本家交出不下于百分之一的利润，换句话说，以剥夺工厂主相威吓。而列宁是怎样回答这一点的呢？

——你们要求百分之一的利润？我们党的要求要小得多。它在自己的决议中要求得很少，这就是“仅仅”建立对银行的监督和“逐渐”（请听，请听，布尔什维克主张“渐进性”——这是列宁说的！——格·季·）过渡到较为公平的累进所得税和财产税。

我们党看起来好象比孟什维克斯柯别列夫还“温和”。斯柯别列夫提出了无度的、甚至极端的诺言。但是，他也因此“只”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只是”不接受唯一能迫使资产阶级靠边站并给工人和农民让路的那些条件。

布尔什维克不提出响亮的左的词句，不发出可怕的威胁，却提出这样一些在实际上把革命推向前进，即导向社会主义的“温和的”要求。不仅需要通过书本和报纸向群众进行坚持不懈的解释工作，并且要把解释工作做得能够用最密切的经济问题把越来越广泛的劳动者阶层吸引到自己这边来。这一思想象一条红线贯穿于列宁在这一时期的所有文章和讲话之中。

一般说来，如果仔细看看，在整个二月革命期间布尔什维克党是怎样提出要求，怎样提出口号的，那末我们就会看到尽可能的谨慎小心和真正的“合理的渐进性”。不言而喻，列宁完全估计到革命的快速速度，但是列宁不仅是勇敢的革命家，而且也是极端谨慎的群众组织者和教育者。

四月代表会议是否象托洛茨基同志企图描绘的那种会议呢？一点也不象！你们感觉得到极其小心谨慎的态度，你们看到极端细心的深思熟虑的探测，你们看到列宁和全党在四月代表会议上是怎样制订布尔什维主义的策略，既反对右倾，又反对“不断革命”的理论家们的“左”的词句的。列宁的随机应变、小心谨慎、“教育学”是由下列情况决定的：列宁不仅记住必需吸引整个先进阶级——无产阶级跟党走，并且还记住从无产阶级到农民，到小资产阶级的中间环节。必须懂得这一点。这样就不致于写出关于四月代表会议的阿拉伯神话了。参加这次代表会议的大部分同志还活着。他们记得事情的经过；有会议记录，还有会议的决议。代表会议象列宁所说的，而根本不象托洛茨基所说的那个样子。它通过了谨慎的，探测性的纲领——从以下各个方面去探测工人群众和一般农民：当他们抛弃孟什维克的玫瑰色眼镜，当他们摆脱“真诚的护国主义”幻想而同先进工人并肩前进，同那些不是逐日而是逐时从护国病中康复，成为布尔什维克的工人们并肩前进的时候，他们将怎样看待明天。

四月代表会议是革命之初布尔什维克全部工作的起点。然而问题不仅在代表会议。问题在于会议的所有决议都是同列宁早就说过的关于革命的动力，关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等等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这是同列宁在1914年和1915年所说过的话联系在一起的。1914年中央委员会的宣言，《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的提纲，1917年二月革命的开始，列宁和季诺维也夫的决议初稿，致加涅茨基的信，致瑞士同志们的信，《远方来信》，4月4日提纲，论策略书和四月代表会议——这是一条一环扣一

环的连续不断的历史链条。

这就是在这一决定性关头布尔什维克党的真正发展史。

* * *

从1917年9月起我们进入了每一天都具有巨大意义的阶段。这时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怎样监视运动的速度，是怎样把握运动的脉搏的，理解这一点至为重要。我们每一个人都记得这一时期列宁的号召性的、有决定性意义的、彻底的、“十月的”言论。但也不应忘记他的文章《论妥协》，此文写于1917年9月，我们在彼得格勒苏维埃取得对于孟什维克的胜利，把齐赫泽和克伦斯基从主席台赶下去之后。列宁对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写道：

“只是作为一种例外，只是由于情况特殊（显然，这种情况只能持续极短的时间），我们才能向这些政党建议妥协，而且我认为这是我们应该做到的。

从我们方面来说，妥协就是回到7月前的要求：全部政权归苏维埃，成立一个对苏维埃负责的由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组成的政府。

现在，只是在现在，也许只有在几天或一两个星期的时间内，这样的政府可以完全和平地成立并得到巩固。它可以保证（这种可能性极大）俄国整个革命和平地向前推进，保证全世界争取和平和争取社会主义胜利的运动有极大的可能性大踏步前进。

我认为，只是为了革命的这种和平发展（这种可能性在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是非常可贵的，是极其罕见的），只是为了这种可能性，主张世界革命、主张采取革命方法的布尔什维克，才可以而且应当谋求这种妥协。

妥协的内容就是：布尔什维克不要求参加政府（不真正实现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专政的条件，国际主义者参加政府是不可能的），不立刻要求政权转归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不采取革命方法来实现这个要求。条件是不言而喻的，对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来说也并不新奇，那就是要有鼓动的充分自由，不再推迟召开立

宪会议的日期，甚至要在更短的时期内召开立宪会议。”^①

这样，列宁提出政权归苏维埃（“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组成的政府”），归我们还会处于少数的苏维埃，条件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召开立宪会议，给我们以鼓动的自由，而我们则在苏维埃内部进行斗争。《论妥协》一文不是什么突然出现的東西，它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其中自然有纯属对付敌人的随机应变成分，但在整体上这是同一条发展的链条。在这以前列宁不止一次地发挥过这样一种思想：如果政权能和平地转归苏维埃（在科尔尼洛夫发动之前我们在这里是明显的少数），那末我们党就能和平地在苏维埃内部进行争取多数的斗争，在这种情况下，小资产阶级的幻想也就能和平地消除。文章试图令人注意地、具体地向仍然信任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那一部分人民解释：这就是我们建议的道路；只要你们站在这条道路上，也许可以避免国内战争。那时候我们还要为争取苏维埃中稳定的多数而斗争，我们自然也要为自己夺取政权。列宁在《论妥协》一文中以党的名义宣布不参加同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联合的“苏维埃政府”。但是如果说现在我们对于没有一个共产党的领导就不可能有巩固的无产阶级专政这一点已毫无疑问，那末那个时候无论如何对于达到这一点的道路还远不是这样清楚的。我个人的错误在于，《论妥协》一文的路线仅仅适用于特定的具体时刻，而我却超过可能多贯彻了几天时间。事变以令人眩晕的高速发展。我却处于地下状态，没能跟上，犯了巨大的错误。^②但是现在说的不是某一个布尔什维克的错误，而是整个布尔什维主义的发展。《论妥协》一文完全是从上述布尔什维主义的一般路线引伸出来的。

然后，这方面的最后一篇文章——列宁论最低纲领的文章，写于1917年10月初。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写道：“我们不知道几时胜利，是明天还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32卷第131—132页。——译者注

^② 关于此事详见我的小册子《列宁主义还是托洛茨基主义？》第1章。

是再晚一些时候。(我写这篇东西是在1917年10月6日,我个人的想法倾向于明天,我们也可能耽误一些时候才能夺到政权,但明天终究是明天,决不是今天。)我们不知道,我们胜利后西欧的革命是不是很快就来到。我们不知道,我们胜利后是不是还会出现暂时的反动时期、暂时的反革命胜利时期,这不是没有可能的,所以我们胜利后一定要挖上‘三道战壕’来防止这种可能性。

“这一切我们都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任何人也不可能知道。因此现在抛弃最低纲领是可笑的,只要我们还生活在资产阶级制度的框子里,只要我们还**没有**砸烂这个框子,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根本措施还没有实现,敌人(资产阶级)还没有打垮,就算是打垮了,也还没有消灭,最低纲领就是**不可缺少**的。以上这一切都会办到,也许要比许多人想象的快得多(我个人认为明天就应该开始),但**毕竟还没有办到**……

“‘上战场别吹牛,下战场再夸口。’……

这样就是瞎吹,因为首先应当夺取政权,而我们还没有夺到。首先应当真正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措施,把我国革命进行到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到以后‘下战场’的时候才能够而且应当抛弃这个**再也无用的最低纲领**。”①

这就是说,在十月革命前几天列宁还主张保留最低纲领。不仅如此,十月革命后,1918年3月在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在决定布列斯特和约问题的代表大会上,列宁还继续认为,如果我们被迫倒退回去的话,可以利用资产阶级议会制。列宁没有弃绝这种可能性。②

所有这一切并没有妨碍他在十月直截了当地提出起义的问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32卷第364—366页。《论修改党纲》。——译者注

② “以为我们不会被迫倒退回去,那是空想……我们说,在任何被迫倒退的情况下,我们不拒绝利用资产阶级议会制,——如果敌对阶级的力量把我们赶上这条老路的话,但是我们的目标仍是争取经验所得到的东西,即苏维埃政权。”
[《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50页。]

题,给予在这一时刻动摇的人以“猛烈的”、绝对应得的反击。《危机成熟了》一文和《给同志们的信》当然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这一时期的最重要著作,他在这里无情地批判了我们所犯的,当时**极端危险**的错误。

这就是1917年2月到10月这段时期的列宁主义。列宁主义的理论基础仍然如故。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宝库所作的科学贡献是确定无疑的。但是列宁主义的另一部分的重要性也不在其下,这一部分的界限是变动的,说的是事变的速度,在这里需要靠尖锐的眼光和灵敏的听觉以掌握飞速发展的事变。在我们这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可以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这一点布尔什维克早就知道了。但是1917年的二月革命以多快的速度转变成社会主义革命,在1917年3月、7月、9月对事态作什么样的估计,这些问题在一定的期间是有**决定性意义**的问题。在这样的时候“赶不上速度”,这是巨大的不幸。

我们上面所引的文献构成了列宁在这段期间的活动的基础,是布尔什维主义的最重要的篇章,其中没有一个文献是用托洛茨基同志提出的“历史哲学”观点所能解释的。托洛茨基断定,似乎列宁“从思想上重新武装了”布尔什维主义,并且列宁自己也在10月以前“重新武装了”。如果这样,那末列宁在1904—1906年所写的著作应置于何地呢?已清楚地提出整个“转变”理论的《两种策略》等等著作应置于何地呢?

从1905年到1923年列宁主义的理论路线基本上是相同的。它的发展是完全有机的、合乎逻辑的、严整的。而列宁主义的“实用”^①部分(期限、速度、对“时局”的估计),其界限自然是变动的。1917年2月至10月时期的“实用的”列宁主义,在这风暴时期对“时局”所作的正确无误的、精辟的估计是对列宁的全部理论的最好检验——实践的检验。谁赶不上速度,错过一个阶段,谁就容易往下

① 我们称之为实用部分,自然是相对的。

滑——如果不立即改正自己的错误的話。但在這種情況下過錯就不在列寧主義，而在該列寧主義者本人……

總而言之，可以把布爾什維主義發展的特點概括為：布爾什維主義就是同社會民主黨爭奪工人的鬥爭，同資產階級（包括社會革命黨人）爭奪農民的鬥爭。

* * *

我們試圖用各種各樣的表述來說明布爾什維主義的實質，以求全面說明問題。

爭奪工人階級，我們的階級，基本的階級，這當然是整個布爾什維主義的基礎。因為布爾什維克黨是工人的政黨。這無需詳加說明。但是爭奪農民的鬥爭是怎么回事呢？

同資產階級（包括社會革命黨人）爭奪農民的鬥爭。布爾什維主義從2月到10月的歷史很適用於這一公式。

難道古契柯夫、米留可夫和李沃夫親王不是帝國主義資產階級的代表？而克倫斯基不是他們的幫凶？他們執掌政權，想繼續進行戰爭；而當時農民是跟着他們走的。

記得我在第一次前線戰士代表大會上講演的情景。古契柯夫發言，然後我發言。古契柯夫比我更受歡迎，然而我受到的歡送卻比他好。我通俗地向他們解釋，為什麼不應當作戰。40歲的“和平主義者”說：我們40歲了，我們希望回農村，而不去打仗。帝國主義分子必定會利用這種倦於戰爭的情緒。而我們向先進的前線戰士——首先是通過工人——闡述世界革命的前景。這是什麼？這也就是同資產階級爭奪農民的鬥爭。

現在，布爾什維主義按照列寧的遺訓在國際範圍內進行這種鬥爭，而從1903年起，特別是從1917年2月到10月他已在民族範圍內進行這種鬥爭。我們同資產階級和社會革命黨人進行了爭奪農民的鬥爭，同時又同社會民主黨爭奪跟孟什維克走的那部分工人。“同資產階級爭奪農民的鬥爭”這一公式對帕爾烏斯分子和托洛茨基分子來說自然是百思不得其解的東西。那些從1905年起

就没有站在布尔什维主义立场上的人不理解也不能理解这一点。

在萨法罗夫同志的《列宁主义基础》一书中有一章叫《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争夺农民和被压迫民族的斗争》。光是这一标题就能证明萨法罗夫是布尔什维克。而那种鼓吹“重新武装的”布尔什维主义的人是不会这样提问的。同资产阶级，同帝国主义争夺农民的斗争——列宁早在帝国主义战争之前就教导这么做了；布尔什维主义在帝国主义战争之后非常清楚地懂得了这一点，而在2月和10月之间更为清楚地懂得了这一点。十月革命之所以容易取胜是因为帝国主义战争危机同土地危机结合在一起的缘故，这是其他国家所没有的。帝国主义战争也好，土地危机也好，各自单独存在，这是具有巨大爆破力的甘油炸药；其中任何一种都能单独地炸毁旧的沙皇制度。而我们拥有的不是一颗，而是两颗甘油炸弹，并且两颗都具有巨大的爆破力；而被炸的沙皇制度同欧洲各资产阶级国家比起来却是软弱的、士气沮丧的、威信扫地的制度。因此我们比其他国家更快地立即由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迈进。

列宁的伟大不仅在于他发展和丰富了马克思的学说，而且还在于他是一个阶级斗争的天才大师，非常清楚地看到正在发生的一种革命向另一种革命的转变，他观察革命的所有极端复杂的曲线和转变，掌握它的发展速度，从而能及时地发出实践指示和口号，并且**适应革命的上升路线使之发展、扩大和加深。**

列宁主义的一般理论路线，从《人民之友》起到《宁可少些，但要好些》止，是一条路线。这是同一条不间断的、笔直的和坚定的路线。自然曾有过个别的实践上的错误，有过一时歧出列宁主义发展的直路的“回转线”。例如1906年曾对“局势”作过高的估计（列宁曾期待大田工作结束后的农民起义）。另一方面对1902—1904年的农民运动（要求“割地”）又曾有过某种估计不足。但列宁很快就对“速度”作了修正。“回转线”被消除了，整个路线合乎逻辑地继续发展，继续前进。

关于“割地”的例子值得详细一谈。

1903年列宁在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曾为归还割地辩护。^①他是以当时的农民运动为出发点的，而在1903年农民运动还是比较弱的。当农民运动开始发展和扩大的时候，当农民群众，甚至农村富裕的上层也被卷入农民运动，地主的大地产成了富裕上层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的时候，当农民运动卷起巨澜的时候，当海军和陆军中也掀起运动（而海军和陆军就成份而言乃是农民）的时候，列宁立即看到，归还割地的要求过于狭窄，因而变成错误的了。他想用以吸引全体农民的“门”过于狭窄了。这就是说，需要较为广泛的纲领。所以1905年在坦默福斯代表会议上（略早一些，1905年5月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本人坚持修改旧的土地纲领，纠正自己的错误。^②农民运动发展了，“割地”被送

① 列宁是这样说明什么是割地的：“地主的土地和农民的土地是连在一起的。在解放农民的时候，从农民那里割去了农民所必不可少的土地，割去了牧场和草地，割去了森林，割去了饮马场……不管愿意不愿意，都只得跑到地主那里去，求他准许饮牲畜或者放牧，等等。而地主并不经营自己的田庄，也许一点钱也没有，而专靠盘剥农民过日子。农民借用了割地不得不无偿地替地主干活，用自己的马给地主耕地，替他收庄稼割青草，替他打谷，甚至有些地方的农民用自己的农家肥来上老爷的地，给老爷家里送麻布、鸡蛋、以及各种家禽。这同在农奴制度下完全一样！”[《列宁全集》第2版第7卷第160—161页。]

土地纲领要求的就是把这些割地归还农民，从而消除妨碍资产阶级关系在农村发展的任何农奴制残余。

② 列宁后来就自己的错误写道：“这一错误的根源在于，我们当时虽然正确地认清了发展的方向，但是没有正确地认清发展的时期。我们以为资本主义农业成分在俄国已经完全形成了，不仅在地主经济中（盘剥性的‘割地’除外，由此提出了归还割地的要求），而且在农民经济中也完全形成了，以为农民经济已经分化出了强健的农民资产阶级，因此农民不可能进行‘农民土地革命’。这一错误纲领的产生，并不是由于我们‘害怕’农民土地革命，而是由于我们对俄国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程度估计过高。当时我们认为农奴制残余不过是很小的局部现象，认为份地和地主土地上的资本主义经济已经十分成熟和巩固了。”[《列宁全集》第13卷第268页。《社会民主党在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

对俄国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程度估计过高意味着对其中的农奴制成分估计不足，意味着对农民的革命民主主义运动的可能性估计不足。

进档案馆了。现在我们这一伙里又添了生力军，农民觉醒了，让我们为之提供更为广泛的纲领。前进……

列宁永远是这个样子。从《人民之友》到《宁肯少些，但要好些》，在这 25 至 30 年间总的理论路线基本上是同一条路线。而布尔什维主义的“随机应变能力”则随着运动的发展而发展。护国主义衰落了。工人的觉悟提高了。工人越来越多地跟我们走了。请注意，不要脱离后卫。引导群众逐步，但坚定地前进。

从 1915 年 10 月到 1917 年 10 月总共两年。在这两年期间布尔什维主义提出的一系列要求得到多么飞速的发展——飞速，然而又是小心谨慎、逐步、巧妙的发展。

我们在报刊上已经指出：关于列宁可以说的基本的东西就是，1905 年 1 月 10 日的他“已非”1 月 8 日的他。因为中间隔着一个 1 月 9 日。二月革命后过了一天，他已非二月革命前一天的他；1917 年 10 月 26 日，他“已非”10 月 24 日那个样子了。与此同时，在天才的敏感上，在气魄上，在坚定的信念上列宁始终是列宁，正是他和他的党率领本阶级前进。在他的钢铁巨手的掌握下，领导的机器在从容不迫地、稳定地运行。是他领导工人阶级为我们铺平在农民占多数的国家里通向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道路。是他大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他率领工人阶级进行了三次革命。是他确定了我国新经济政策时期各阶级相互关系的基础。是他给全世界提供了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策略。

第七章

马克思和“不断”革命

众所周知，“不断”革命这个名词帕尔乌斯和托洛茨基是从马克思那儿借用来的。在马克思的一些著作中（《法兰西内战》、1850年的《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我们不止一次地看到这个名词。

在帕尔乌斯分子身上，我们在下面将会看到同一个词而被赋予截然不同的内容的典型例子。

马克思赋予“不断革命”这个概念以什么含意呢？为了理解这一点，首先必须深入到马克思写作含有这一名词的著作那个时代的环境中去。这些著作主要是为总结法国大革命和1848年一系列革命的经验而作的。如果考虑到马克思——部分地还有恩格斯——写作的时代，那就会非常清楚，他们赋予这一名词下列内容：第一，他们想借助于这一公式描述在这些著作以及其他著作中同革命的“下降”路线不同的，被他们不止一次地称之为革命的“上升”路线的东西；第二，非常清楚，马克思和恩格斯使用的“不断革命”这个概念很接近于后来在列宁那里获得明确表述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公式。

只要仔细思索一下马克思主义史上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文献——1850年的《马克思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这一点就完全清楚了。在这一文献中，也可以说，包含着浓缩状态的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策略，从而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也包含着列宁主义的策略部分。这一文献试图在1848—1849年一系列运动之后，直接根据尚未冷却的事件的新鲜的痕迹，考察革命无产阶级同小资产阶级

的相互关系，并确定前者对后者的策略。如果说在1847—1848年在和1849年初马克思和恩格斯一手建立了国际无产阶级组织，撰写了《共产党宣言》，而另一手编辑了《新莱茵报》，如果说在这个时候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认为可以直接参加革命资产阶级民主派组织，参加其战斗队等等，那末在1850年，当社会发展的某种周期结束的时候，马克思对业已终结的时期作了总结并从中得出教训，从而规定了略有不同的对待小资产阶级的策略，小资产阶级这时已日益脱离登上历史舞台的年轻阶级——无产阶级。

早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中，马克思在总结1848—1850年的革命运动经验时写道：

“无产阶级就愈益团结在革命的社会主义周围，团结在被资产阶级用布朗基来命名的共产主义周围。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着重号是我加的。——格·季·），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①

在这里马克思把“不断革命”这个名词当作几乎同**一般社会主义**概念或为社会主义进行革命斗争的概念相等的公式。

但是让我们看看《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1850年）。在这里我们已经看到更为接近我们在上面说到的东西，不断革命在这里等于：1. 革命的整个上升路线，2.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②这一文献中的下列论述证实了上述思想：

① 引自梁赞诺夫：《马克思主义史概论》第479—480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79—480页。]

② 列宁在1905年写道：“在1850年，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把民主主义专政和社会主义专政区分开来，或者更确切些说，根本没有谈到民主主义专政，因为那时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已经衰老，社会主义已经临近……1850年，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社会主义已经临近了，因此对民主胜利成果估计不足，那时他们觉

“民主主义的小资产者至多也不过是希望实行了上述要求便赶快结束革命，而我们的利益和我们的任务却是要不间断地进行革命，直到把一切大大小小的有产阶级的统治都消灭掉，直到无产阶级夺得国家政权，直到无产者的联合不仅在一个国家内而且在世界一切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内都发展到使这些国家的无产者间的竞争停止，至少是直到那些有决定意义的生产力集中到了无产者手里的时候为止。对我们说来，问题不在于改变私有制，而在于消灭私有制，不在于掩盖阶级矛盾，而在于消灭阶级，不在于改良现存社会，而在于建立新社会。”^③

因此，必须使革命成为不断革命，直至大大小小的有产阶级一个接一个地统统被消灭，起先是封建贵族，然后是大资产阶级，最后还有小资产阶级。并且不仅仅是在一个国家，而是在所有国家。我们看到，在马克思笔下另一种表述的“不断革命”，其意义是跟沿着上升路线发展的革命相同的，这种革命开始时力量较弱，然后获得越来越大的力量，向越来越新的阶段发展，先是消除资产阶级，然后消除小资产阶级国家。

在这一文献中马克思较为准确地说明了年轻的无产阶级对小资产阶级应实行的策略。他以下述极端清楚明确的形式做到了这

得由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必然胜利，这些胜利成果是牢靠的……如果马克思和恩格斯了解到民主制度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占统治地位是不可避免的……他是会赋予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以更大的意义的。”（《论临时革命政府》〔《列宁全集》第8卷第438—439页〕）

“当二月革命爆发时，我们大家关于革命运动的条件和进程的观念，都受过去历史经验，特别是法国经验的影响。须知正是法国在1789年以来的全部欧洲历史中起了主要的作用……历史表明，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1895年恩格斯在为马克思的历史著作所写的《导言》中就是这样写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历史著作》第9、14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94、595、597页〕）

③ 马克思和恩格斯：《历史著作》第501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85页〕。

一点：

“他们(即共产主义者。格·季·)应当极力引伸那些当然不会采取革命手段而只会采取改良主义手段的民主派所提出的主张；他们应当把这些要求变成对私有制度的直接攻击。例如，假若小资产者主张赎买铁路和工厂，工人就应该要求把这些铁路和工厂作为反动派财产干脆由国家加以没收，不予任何补偿。假若民主派主张施行比例税，工人就应该要求施行累进税；假若民主派自己主张施行温和的累进税，工人就应该坚持施行累进率极大而使大资本必遭覆灭的累进税；假若民主派要求调整国债，工人就应该要求宣布国家破产。这就是说，工人的要求到处都必须针对着民主派的让步和措施来决定。”^①

在这里，马克思关于“不断革命”这一思想是从策略方面表述的：如果革命将沿着上升路线发展，也就是说，如果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将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那末以共产主义者为首的工人的策略就应是马克思在上述论断中所说明的策略。马克思简短地表述这一思想如下：

“革命的工人政党对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态度是这样的：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一起去反对工人政党所要推翻的派别；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想要巩固本身地位来谋私利的时候，就要加以反对。”^②

再说一次，马克思根据1848—1850年事件的新鲜痕迹得出的这些简略意见包含着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策略的萌芽，因而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也包含着列宁主义策略部分的萌芽。

把现在所讲的同恩格斯1883年8月27日给伯恩施坦的信中的思路作一对比是很有意思的，这封信不久前发表在达·梁赞诺

① 马克思和恩格斯：《历史著作》第507页[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91页]。

② 马克思和恩格斯：《历史著作》第500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84页]。

夫主编的《马克思恩格斯文库》中。

在谈到德国时恩格斯写道：“在我们这里，革命的第一个直接结果，按其形式来说，同样只能是而且一定是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但是，它在这里将只是一个短暂的过渡阶段，因为我们很幸运，没有一个纯粹共和主义的资产阶级政党。这个也许是以进步党为首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我们可以首先用它来为革命的社会主义争取广大的工人群众。这件事将在一两年内完成，并将引起除我们以外还可能存在的一切中间党派彻底衰退和自行瓦解。只有到那个时候，我们才能胜利地取得政权。

德国人的重大错误就在于把革命想象成一夜之间就能完成的事情。事实上，它是群众在加速情况下的多年发展过程。任何一个一夜之间就完成的革命，或者只不过是推翻一个早已毫无希望的反动政权（1830年），或者直接导致预定目的的反面（1848年的法国）。”^①

一方面恩格斯说，德国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只能支持一两年，在这段时间工人们将能积聚起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力量。这是过去的估计的回音，结果证明是不正确的：众所周知，马克思和恩格斯正是在期限问题上犯了错误。但是，另一方面，在结尾中我们看到已经完全成熟的问题的提法：任何一次深刻的革命都是持续多年的过程，并且是群众自身在运动加速情况下的发展过程。这后一种公式很接近于列宁在十月革命后不止一次提出的一系列公式，列宁曾指出，“掌握革命经验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乃是革命本身”，群众在革命中的脱胎换骨过程要好多年的时间。

这些论述足以证实我们在本章开头所提出的两个论点。

第一：马克思的“不断革命”公式主要是对法国大革命和1848年革命经验的总结；对马克思来说，这一公式常常同他在谈到革命按上升路线发展时所指的含义相同。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库》，达·梁赞诺夫编，第1卷，莫斯科国家出版社1924年版第349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40页〕。

第二：马克思的这一公式不是接近于帕尔乌斯—托洛茨基，而恰恰接近于列宁对马克思主义所作的解释，接近于列宁不断阐述的思想——关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思想。对工人阶级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分离过程的描绘和分析基本上就是(后来列宁发展的)关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

为了研究帕尔乌斯和托洛茨基给不断革命“理论”添加些什么概念这一问题，这些题外话是必要的。

第八章

帕尔乌斯和托洛茨基的 “不断革命”

帕尔乌斯和托洛茨基从马克思的正确的历史-哲学总结出发，在具体估计俄国革命动力方面作出了完全错误的结论。

由于有关俄国革命的动力问题过去(和现在)同国际革命的动力问题有紧密联系，所以非常清楚，在这方面帕尔乌斯和托洛茨基必不可免地也犯了如此重大的错误。

应当牢牢记住，争论的不单单是历史。在同志们中间往往流行这样一种看法，一切都证明1917年以前托洛茨基是错了，然而1917年以后托洛茨基在政治上已完全再生了。为什么要回到旧的、已成为历史遗产的时期去呢？

实际上并非如此。争论的不单单是历史。不言而喻，1917年的革命给每一个参加者，其中包括托洛茨基同志以巨大的影响。但恰恰是在这一点上托洛茨基同志至今仍然认为，他反对列宁是正确的。远的不说，在《新方针》(1924年)中他清楚地宣布了这种看法。就在那时候，在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我们曾反对这种说法说，据我们看来，“托洛茨基的这一著作没有丝毫的布尔什维主义”。有人企图把我们的发言说成是争论中的夸大其辞。现在，经过最近关于《十月的教训》的争论，想来所有的人都会理解，这里并无夸大之处。

托洛茨基同志在《新方针》中写道：

“至于谈到‘不断革命’论，我认为没有任何理由放弃我在1904、1905、1906年以及后来对这个问题的论述。我现在仍然认为，我当时所发挥的基本思路，比那时许多布尔什维克所写的东西更接近列宁主义的真正实质……”

“不断革命的思想与布尔什维主义的基本战略路线是完全一致的。18年或15年以前可能看不到这一点。但是在现在，在一般公式已为染满鲜血的历史内容所充实的时候，就不能不理解和承认它了……① 不断革命的理论直接导向列宁主义，特别是导向1917年的四月提纲。”②

这样，直到1923年，在涉及党的世界观的当前的紧要问题的激烈争论中，托洛茨基同志完全公开地向全世界声明，他没有任何理由放弃他在1904—1905年关于不断革命问题所说的一切。

不久前报刊上刊载了托洛茨基同志的声明，说他在评价过去的布尔什维克派和孟什维克派问题上可能不正确，但与此同时，在革命动力问题上反对布尔什维克却是正确的。

在托洛茨基同志1921年12月6日给奥里明斯基同志的著名的信中特别强调了这一思想：

“我认为我对革命动力（着重号是我加的。——格·季·）的估计是绝对正确的，而我根据这个估计所做的对两派的结论则是绝对不正确的。”③

但是，在革命动力问题上正确地反对布尔什维克，同时却能站在布尔什维主义立场上，这事实上是否可能？

在对待两派斗争上不正确，而在革命的动力问题上却仍然正

① 这个论断同1925年1月15日托洛茨基同志致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会的信难以一致，信中说，“如果在十月革命之后我因某种原因一般地重新提过‘不断革命’的公式，那仅仅是谈党史（着重号是我加的。——格·季·），即回顾过去，而不是要说明现在的政治任务”。

② 列·托洛茨基：《新方针》，莫斯科1924年版第50—52页。

③ 《列宁论托洛茨基〔俄共（布）党史片断〕》，国家出版社1925年版第4页。

确，这是否可能？据我们看来，不可能！

托洛茨基同志在此信中接着断定，“只是由于布尔什维主义建立了这种革命的、紧密团结的组织，才可能那么迅速地从革命民主主义的立场转变为革命社会主义的立场。”^①

两种说法不相一致。并且这同“组织”有什么相干？因为布尔什维克得以建立良好的组织，所以……他们很容易从错误立场转向正确立场！！我们自然是很好地紧密团结的组织的拥护者。然而，如果在革命动力问题上持原则错误的观点，那末任何组织都无济于事。因为首先要求“组织”自己的脑子。

最后还有一个声明：

“现在我可以毫不费力地把我同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进行论战的文章分做两大类：一类是关于分析革命的内部力量和关于革命的前途（见罗莎·卢森堡主编的波兰理论性机关刊物，《新时代》杂志）的文章，另一类是关于对俄国社会民主党各派的估计、关于各派别的斗争等等的文章。第一类文章，就是现在我也可以一字不改地拿出去（着重号是我加的。——格·季·）因为这些文章从(!!!) 1917年起就完完(!)全全(!!)符合我们党的立场。”^②

总之，是否可以设想这样一种状态：在布尔什维克同孟什维克两派斗争问题上可以是错误的，而与此同时在主要的、基本的问题上——在关于革命动力的估计问题上却是正确的？从以上所述可以得出结论，这种立场是不可能的，因为其中有无法解决的矛盾。

在前几章我们试图清楚地指出，关于革命动力的学说恰恰是布尔什维主义的中心问题之一。布尔什维主义和孟什维主义之间主要就是为这个问题展开争论的。如果有人宣称，我完全同意达尔文，除了……物种起源理论，那末关于此人我们能说些什么呢？

^① 《列宁论托洛茨基“俄共(布)党史片断”》，国家出版社1925年版，第4页。

^② 《列宁论托洛茨基》，国家出版社1925年版第4页。

如果有人说，也许我在评价拉萨尔派和爱森纳赫派^①之间的派别斗争上犯了点什么错误，然而马克思却在阶级斗争理论上……犯了错误，那末关于此人我们能说些什么呢？

这两个例子都包含着和托洛茨基同志的下述声明相同的不可容许的矛盾：他对待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态度是错误的，但在俄国革命的动力问题上他却是正确的。

关于革命的动力学说对列宁主义来说，就象物种起源理论对达尔文主义或阶级斗争理论对马克思主义一样。

可以有一定的根据这么说：布尔什维主义基本上是列宁关于俄国，然后是世界革命动力的学说——并且是**已经得到证实的学说**。孟什维主义基本上是阿克雪里罗得和马尔托夫关于俄国革命动力的学说，——**只是没有得到证实的、不正确的、错误的、完全滑向资产阶级民主派观点的学说**。最后，“托洛茨基主义”（或“帕尔乌斯主义”）基本上是帕尔乌斯和托洛茨基关于革命动力的学说——**没有得到证实的、在布尔什维主义和孟什维主义之间进退维谷的学说**，形式上“左得出奇”（列宁语），实质上半孟什维主义的学说。

第二种学说同第三种学说（阿克雪里罗得—马尔托夫的学说同托洛茨基和帕尔乌斯理论）的不同点在于，孟什维主义尽管不正确，但当时毕竟曾把相当数量的工人阶层吸引到自己这一边来，然而同样是不正确的托洛茨基主义却从来也没有把多少广泛的工人阶层吸引到自己这一边来。

革命的动力问题是**头等重要的**基本问题，而不是第十等的问题，不是次要的问题。这里乃是布尔什维主义、孟什维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的分水岭。

^① 拉萨尔派和爱森纳赫派（因在爱森纳赫城召开代表大会得名）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中过去的两个派别。一派为首的是拉萨尔和施韦泽。另一派为首的是威廉·李卜克内西和奥古斯特·倍倍尔。后者接近马克思主义。前者有孟什维主义类型的倾向——倾向于同君主制“调和”，等等。

* * *

现在来谈托洛茨基同志的“不断革命论”本身。

关于“不断革命论”哪里阐述得最准确？最重要的文献资料有：帕尔乌斯为托洛茨基的小册子《1月9日以前》所写的序言（1905年）、《开端报》上的一系列文章（1905年）、收在不久前再版的托洛茨基文集《我们的革命》、《1905年》中的某些文章，然后还有帕尔乌斯本人著作^①中的有关部分，在那里他企图既总结俄国革命的经验，又同时总结业已开始的德国革命的复兴。

至于《开端报》，它作为形式上极端尖锐有力和“左得出奇”的报纸，在理论领域很少有自己的东西。谁也没有认真地看待它，而孟什维克甚至拿它取笑，用俏皮话挖苦它：“看，《开端报》飞跑了！”倒是研究一下较为“象样”的理论著作要有用一些。其中最重要的是1905年帕尔乌斯为托洛茨基同志的小册子所写的序言。在这里，帕尔乌斯把问题提得比帕尔乌斯本人和托洛茨基后来的著作要含蓄得多。但是所有“不断革命”论者的基本错误在帕尔乌斯的这篇文章中已经都有了。这错误就是不正确地估计俄国革命的动力，不正确地阐述俄国各阶级的相互关系，对俄国工人阶级的历史谱系作出显然错误的结论。——帕尔乌斯写道（这一文献不常见，在俄国合法出版物上大概没刊载过，因此我们摘引得长一些）：

“众所周知，西欧的政治激进主义主要依靠的是小资产阶级。这是些手工业者和整个说来所有被工业发展所卷入，但同时又被资本家阶级所排挤的那一部分资产阶级。不应忘记，西欧的手工业者曾创建城市，城市在他们的政治统治下曾相当繁荣，工匠们给好几个世纪的欧洲文化留下了自己的印记。不错，到实行议会制度时，工匠的强大力量早已消失，然而存在无数城市这一事实本身和只有发展中的无产阶级能与之抗争的中等阶层在数量上的统治地位仍具有政治意义。随着这些社会力量消溶于资本主义的阶级

^① 《俄国和革命》、《社会主义和社会革命》、《社会民主党和议会主义》、《工会和社会民主党在社会革命中的作用》等等。

矛盾之中，在民主政党面前提出了这样的任务：或者跟着工人走，成为社会主义政党，或者跟着资本主义资产阶级走，成为反动政党。在俄国，在资本主义以前时期，城市更多的是按中国方式，而不是按欧洲方式发展的。这是具有纯粹官僚性质的行政中心，没有一点政治意义，而在经济方面则是为其周围的地主和农民服务的商业集市。在它们还很不发展的时候，资本主义过程就中止了它们的发展，而开始按自己的样子，即工厂城市和世界商业中心，创建大城市。结果是俄国有资本主义资产阶级，但没有中间资产阶级，而西欧的政治民主是从中间资产阶级那儿复兴起来的，也是靠他们维持的（着重号是我加的。——格·季·）。俄国现代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中间阶层，同全欧洲一样，是由所谓自由职业者：医生、律师、作家等等，由处于生产关系之外的社会阶层，由资本主义工商业和附属于它们的如保险公司、银行等工业部门的技术人员和商业人员组成的。这些形形色色的分子不可能有自己的阶级纲领，因此他们政治上的好恶不断地摇摆于无产阶级的革命性和资本主义的保守主义之间。在俄国属于此类人物的还应加上平民知识分子，这是资本主义发展过程还来不及吞没的俄国改革前阶级和阶层的废物。”

“俄国的政治激进主义只好建立在这种城市居民之上，他们没有经历过西欧中世纪的历史学校，没有经济联系，没有过去的传统，也没有未来的理想。毫不奇怪，它还要寻求其他基础。”^①

这也就是帕尔乌斯所作的社会学的中心总结，后来托洛茨基不止一次地重复并予以发展。读过托洛茨基奠定不断革命理论的社会学论述的任何人都会确信，托洛茨基基本上只是重复帕尔乌斯的议论。

托洛茨基不止一次地把帕尔乌斯当作自己的老师表示感谢。下面是1915年托洛茨基发表在《我们的言论报》上的文章的引文：

^① H·托洛茨基，《1月9日之前》。日内瓦1905年版。帕尔乌斯序第V—VI页。

“我们同帕尔乌斯一起在《开端报》上坚持这样一种思想：俄国革命是欧洲发展中社会革命时代的序幕；无产阶级无论同自由资产阶级合作，还是同革命农民结成联盟，都不能把俄国革命‘进行到底’；它只有作为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组成部分才能取得胜利。而现在我比过去任何时候更看不到有什么根据要放弃极大部分属于帕尔乌斯的这一论断，这一预言。‘主观的’中学生会嘲笑**不断革命**的概念，他们对不断革命的含义是如此无知，就象对他们摆出独立的架式而又在其中挣扎的目前这场大灾难的含义不明白一样。”

“我们同帕尔乌斯一起在俄国的土地上创办了第一家工人报纸——彼得堡的《俄罗斯日报》，我们向他学习了用朴实的语言表达朴实的思想这一困难的艺术。在革命最消沉的时代我们在帕尔乌斯的直接协助下去维也纳创办了工人报纸《真理报》。我们同帕尔乌斯一起拒绝把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两派看作社会主义理论或实践的不可调和的流派，我们和他一起拒绝使自己追随布尔什维主义或孟什维主义。而现在，在取得党的全部思想和政治经验之后，我比过去任何时候更看不到有什么根据要放弃这十多年的传统。”^①

因此毫无疑问，按照托洛茨基本人的声明，不断革命理论的创立“极大部分”是属于帕尔乌斯的。

在着手分析帕尔乌斯的上述论断本身以前，必须再提一下我们上面说到的马克思的“不断革命”。马克思总结了西方一系列革命的经验，从几十年几十年的观点指出无产阶级革命的总的上升路线。在马克思那里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的萌芽，这个理论后来被列宁发展了。在帕尔乌斯以及我们在下面将要看到的在托洛茨基那里则是另一回事：对俄国革命动力的估计，并且是完全不正确的估计。帕尔乌斯和托洛茨基不是在准确分析的基础上来具体估计一个国家的阶级力量，而是向

^① 《我们的言论报》1915年2月14日第15号。

们提供了对俄国的动力所作的不正确的分析，并且用具有一般历史哲学意义的马克思的公式来掩饰自己的不正确的半孟什维主义的分析。

现在让我们看看帕尔乌斯作出的，托洛茨基随之重复并予以“发展”的对俄国革命动力的具体分析到底有多少正确的成份。照帕尔乌斯的说法，俄国的城市居民没有经历过西欧中世纪的历史，它没有过去的传统，没有未来的理想。俄国尽管有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却似乎没有中间资产阶级，因而政治激进主义只好另找基础。

不错，手工业在俄国没有它在西欧所拥有的那段历史，这完全正确。我们缺乏中世纪发展的许多典型特征，而这不能不影响到我国的阶级关系，这完全正确。列宁在《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其他著作中以另一种观点对此作了很好的解释。

我国的手工业者缺乏西欧手工业者所拥有的那么长期的历史，从所指出的这一多少正确的事实中能得出什么结论呢？只能得出一个结论：从家谱来说我国的工人远比西欧工人接近农民。恰恰因为我们的手工业没有得到象我们所看到的在西方中世纪那样长期的发展，正因为如此，我们的工人阶级比较接近农民。把我们俄国工人同农民分开的世代和阶段要少一些。因此其社会谱系同西欧不同之处就在于俄国工人同农民和半农民群众有紧密联系。

这就是由此得出的结论。

布尔什维主义的策略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恰恰是建立在这上面的。然而托洛茨基主义竟然能巧妙地作出直接相反的结论。

帕尔乌斯和托洛茨基在俄国工人阶级的家谱中寻找特点。他们说得对，这个家谱是独特的，是同西欧工人阶级的家谱不同的。但在什么地方不同？就在于俄国工人是较直接地“出身于”农民的，我国90年代有整整一个人数众多的工人-农民阶层，俄国工人同农民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联系大大超过其他任何国家的

工人。这一切恰恰是因为我们的发展同西欧不同。

从我国和西欧无产阶级家谱不同这一事实得出**不正确的结论**乃是不断革命全部“理论”的基础。毫不奇怪，这个基础是不坚固的，它是建立在沙滩上的。这就是为什么只要一着手确定未来革命的前途和农民在其中的作用，托洛茨基主义的全部“理论”大厦就会崩溃。

我们的工人同农民相近，这一点我们的“不断论者”是不懂得的。因此，他们也不能正确地估计农民在我国革命中的作用。

帕尔乌斯在这篇序言中写道：“俄国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早在君主专制下已经清楚地明确化了。那妨碍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发展的东西，即不发达的手工业生产形式，倒有利于俄国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无产阶级立即在工厂中集中起来，立即出现在它面前的经济统治乃是不事生产的资本家的最完善的形式，而国家政权是完全靠军事力量维持的最集中的专制制度形式。”^①

这里同样多少正确地指出了我国手工业的独特发展，指出了为什么在我们这里工人立即集中在大工厂之中。但是帕尔乌斯放过了最重要的第二个方面：虽然工人们迅速集中在大工厂，但远远没有失去自己同农民的血肉联系。在我们中央俄罗斯，在我们莫斯科，25—30年前创建了巨大的工厂，大量昨天的农民迅速地进入了这些工厂。他们落到集中化大工业的环境之后，开始养成无产阶级心理。但是工人并没失去同农村的有机联系。俄国工人的全部特点正是在于，他们同农民有密切联系，而与往往出身于手工业工人的西欧工人不同。农民，其祖辈和父辈梦想土地并仇视地主，现在被置于工厂机床之旁。从他们中间也锻炼出集城市无产者的坚忍刚毅精神与渴望土地的农民的自发性和内在反抗性于一身的革命家。

帕尔乌斯多少正确地指出了这一事实，但在这里竟然也作出

^① H·托洛茨基：《1月9日之前》，帕尔乌斯的序言，第IV页。

了无论如何都同事实不一致的结论。俄国有资本主义资产阶级，但没有中间资产阶级！这对不对呢？这样说，意味着不懂得整个农民的作用，特别是不懂得其富裕阶层的作用，这样说，实质上意味着贬低农民。对“不断论者”来说，在革命中实际上并不存在农民。而如果说他们有幸被列入“不断革命”的死板图式，那也只不过是带来了“政治上的愚昧无知”、优柔寡断和“政治上的无政府状态”的成份。

帕尔乌斯在序言中写道：“工人身上保留着民主主义成份。但我们早先已经说过，这种成份在俄国是很微弱的。越来越多的农民将被卷入运动。但他们只会增加国内政治上的无政府状态并以此削弱政府，他们不能组成密集的革命大军。”①

托洛茨基同志跟着帕尔乌斯，大体上也是这么提问题的。

“虽然农民和知识分子当中没有形成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傳統和反无产阶级的成见，这有助于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在另一方面也必须注意，他们没有这种成见并不是由于他们的政治觉悟，而是由于他们在政治上愚昧无知，缺乏固定的社会形态，原始幼稚和优柔寡断。所有这些本性和特点，完全不能为无产阶级的彻底有效的政策创造可靠基础！……因此，执政的无产阶级的政策愈明确愈坚决，它的立足基础也就愈狭窄和愈不稳（着重号是我加的。——格·季·）这一切都极有可能，甚至是不可避免的……”②

因此，照托洛茨基的看法，结果便是：特别在夺取政权之后无产阶级将是孤单单的。结果是，在最好的情况下农民只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偶然的和不可靠的同路人。

这样，如果说农民在革命运动中起某种作用，那么是什么样的作用呢？在最好的情况下这就是增加国内“政治上的无政府状态”。在这种搭配下的“无政府状态”一词本身是非常典型的半孟什维主义语汇。请看，农民在革命中只会增加无政府成份！帕尔

① H·托洛茨基：《1月9日之前》，帕尔乌斯的序言，第X页。

② H·托洛茨基：《我们的革命》第254—255页。

乌斯没有想到，在我们这里工人自身常常就是工人—农民，正如列宁早在1894年在《人民之友》一文中所指出过的。

列宁在《社会民主党和临时革命政府》(1905年3月)一文中无情地批判了马尔丁诺夫的小册子《两种专政》，也顺便谈到了帕尔乌斯和托洛茨基的这一根本错误。

请读者不要为大段引文而抱怨我们：这段引文极其清楚地提出了农民在未来革命中的作用和无产阶级对他们的态度问题。

“帕尔乌斯下面的说法也是不正确的：‘俄国临时革命政府将是工人民主派的政府’，‘如果社会民主党领导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那末这个政府将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政府’，这个社会民主主义的临时政府‘将是社会民主党人占多数的完整的政府’。如果不是讲偶然的、很短促的事件，而是讲比较长期的、多少能在历史上留下痕迹的革命的专政，那末他所说的那种情形是不可能有的。所以不可能，是因为只有依靠大多数人民的革命专政才可能是稍微巩固的(自然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专政。目前俄国无产阶级在俄国人口中还是少数。它只有和半无产者、半小业主群众，即和小资产阶级城乡贫民群众联合起来，才能成为绝对多数。我们所希望的和可能的这种革命民主专政的社会基础的成分，自然要反映到革命政府的成分上，必然使革命民主派中形形色色的代表参加这个政府，或者甚至在这个政府中占优势。在这个问题上存在任何幻想都是十分有害的。

如果托洛茨基现在说(可惜是和帕尔乌斯在一起)‘加邦牧师只能出现一次’，‘第二个加邦没有存在之余地’，那仅仅是醉心于空谈。如果俄国没有第二个加邦存在之余地，那末我们这里也就不会有真正‘伟大的’、进行到底的民主主义革命存在之余地了。革命要成为伟大的，象1789—1793年的革命那样，而不是象1848—1850年的革命那样，并且要超过它们，就必须使广大的群众摆脱可怕的黑暗、空前的闭塞、难以设想的野蛮和暗无天日的愚昧状态，发动他们参加积极的生活，英勇奋斗和进行‘彻底的历史创造’。

革命已经开始发动群众，它一定会把他们发动起来，——沙皇政府的拼命反抗会促进这件工作，但是，这里自然还谈不到这些群众和他们的人数众多的‘独特的’人民的、甚至农民的领导者已经有了深刻的政治觉悟，有了社会民主主义的觉悟。他们还没有经过多次革命锻炼，所以现在还不能成为社会民主党人，这不仅因为他们没有知识（再说一遍，革命会非常迅速地教育他们），而且因为他们的阶级地位不是无产阶级的，因为历史发展的客观逻辑现在向我们提出的任务根本不是社会主义变革，而是民主主义变革。

但是，革命的无产阶级将以全力参加这个变革，抛弃一些人的可怜的尾巴主义和另一些人的革命词句，使急转直下的事变具有阶级的明确性和觉悟性，不屈不挠地勇敢前进，不害怕革命的民主专政，而是热烈地盼望这种专政，为共和国和完全的共和自由而奋斗，为坚决的经济改革而奋斗，以便给自己创造一个真正广阔的、无愧于20世纪的、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舞台。”^①

因此，列宁不是把积极吸引广大小资产阶级群众（特别是农民）参加将来的革命看作是“缩小”革命的“基地”（托洛茨基语）、“政治上的无政府状态”（帕尔乌斯语），而是看作“历史发展的客观逻辑”，看作无产阶级和农民革命民主专政当时（1905年）具体提出的一项任务。

而帕尔乌斯本人是怎么看他同列宁的分歧的实质的呢？

帕尔乌斯在《俄国和革命》一书中是这么说的：

“我们同列宁的分歧何在呢？分歧在于对他来说革命是可能错过的瞬息间的事业（请看，对列宁来说革命是可能错过的瞬息间的事业！！——格·季·），而对我来说这是不可避免的历史过程。他（列宁。——格·季·）认为，革命起义造成革命，而我认为，革命使起义获得胜利。他到局外去为革命起义寻找同盟者，因为他不相信无产阶级的革命能量，而我则引导工人投身政治斗争并使

^① 参看《列宁全集》第8卷第260—262页。——译者注

他们同其他政党发生政治关系，以显示他们的革命能量。”①

而在另一处写道：

“现在政府赋予合法根据的国家杜马，这就是没有间断的革命（беспереогвная революция）。”②

这两段引文是很说明问题的。至于后一段引文，那不过是文字游戏。第一段引文证明，作者用革命的词句来掩盖自己的半孟什维主义。作者显然不懂得列宁身上最主要的东西。“列宁到局外去（！）为革命起义寻找同盟者”——对帕尔乌斯来说，列宁主义策略的全部含义就在于此。列宁确实为基本阶级，为无产阶级寻找同盟者，并且找到了它，但不是在自己背心的侧兜里，而是在对我国阶级关系所作的深刻而正确的分析之中找到的。

这就是帕尔乌斯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的“理论”基础。这一“理论”基础后来就改铸出例如“不要沙皇，而要工人政府”这样的政治口号。现在，在我们同农民结成联盟历十五年而争得苏维埃政权之后，这个口号听起来是非常合情合理的。不要沙皇！——很好。要工人政府——更好。但是如果记得这口号是在1905年提出的，那么所有的布尔什维克都会承认，那时这一口号完全“跳过”了农民。

12年以后，1917年，在爆发震动全世界的帝国主义战争之后，在二月革命之后，布尔什维克提出了工农政府的口号。在1925年，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第八个年头，我们重申列宁的这一口号。而“不断论者”在1905年想把“打倒沙皇，而要工人政府”的口号硬塞给我们。但农民在什么地方呢？全然不懂并且贬低农民在俄国这样的国家里的作用，这一点在这里不是很触目的吗？这不是“跳过”农民又是什么呢？要知道，这个口号是合乎逻辑地从帕尔乌斯和托洛茨基的全部“理论”中得出的。如果说我国没有小资产阶级是正确的，如果说我国没有“政治激进主义”的基础是正确的，如果

① 帕尔乌斯《俄国和革命》第166页。

② 同上，第223页。

在农民问题上正确的是帕尔乌斯，那末由此确实要得出抛弃布尔什维主义策略的结论。但是问题也就在于这一前提是不正确的。

这样，在醉心于抽象的一般公式的情况下，从对俄国具体的阶级关系所作的全然错误的估计出发，“不断论者”必然得出贬低农民这个无产阶级在革命斗争中的同盟者的作用的“理论”……

* * *

从1917年二月革命的教训可以看出这种理论提法是多么可怕的错误和图式化的臆造。

难怪列宁在1915年再次猛烈抨击托洛茨基的“独创”理论，指出“托洛茨基也不想一想，如果无产阶级能够带动农村非无产阶级群众去没收地主土地，推翻君主制度，那也就是俄国‘民族资产阶级革命’的完成，也就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①

托洛茨基把自己对俄国农民作用的根本不正确的观点同关于俄国革命和国际革命的相互关系及一般国际革命动力问题的同样不正确的提法逻辑地“结合”在一起了。

托洛茨基同志在自己最“左”的著作《我们的革命》一书中是这样提问的：

“但是在俄国的经济条件下，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政策能走多远呢？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种政策在遇到国家技术落后的阻碍之前很久，就会碰到政治上的障碍。没有欧洲无产阶级直接的国家援助，俄国工人阶级就不能保持政权，就不能把自己暂时的统治变为长期的社会主义专政（着重号是托洛茨基加的）。这是一分钟也不能怀疑的。”^②

托洛茨基同志的错误并不在于他认为俄国革命是国际革命的一部分，不在于他把我国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同国际革命的胜利联系在一起。这是起码的常识。托洛茨基的错误在于他过去不懂

① 《列宁全集》第21卷第398页。《论革命的两条路线》。——译者注

② H·托洛茨基：《我们的革命》1906年版第277—278页。关于这段引文在争论期间我在小册子《布尔什维主义还是托洛茨基主义？》中曾作了详细分析。

得(现在仍不懂得)俄国革命和国际革命取胜的**道路**。托洛茨基的不幸在于,采取他的“策略”我们就会断送俄国革命,并从而延缓国际革命本身。

什么是“欧洲无产阶级的国家援助”?要有可能给予俄国革命以“国家援助”,欧洲无产阶级先得……**在欧洲夺取政权**。但是要知道在1905年,并且整个说来在1914—1918年战争以前这自然还谈不上。而托洛茨基鼓吹“不断”革命恰恰是在1905年。

由此得出什么结论呢?结论是或者托洛茨基本人在1905年并不认真相信什么不断革命,他说这些东西只是舞文弄墨,或者他在1905年鼓吹“不断”革命是有“条件”的,即欧洲无产阶级给我们以“国家援助”,也就是说,托洛茨基把俄国工人革命“推迟”到欧洲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之后。在后一种场合托洛茨基充当了最腐朽的社会民主主义观点的代表:先让“他们”进行革命,然后“我们”就“立即”进行工人革命。这时期托洛茨基同孟什维克的实际上的联盟恰恰证实了这第二种选择。

托洛茨基在那些年代写了大量的东西,说俄国革命只有作为胜利的国际革命的一部分才可能取得胜利,因为西欧资本正以借款等等支持沙皇制度。这里有一点真理,因为托洛茨基只是重复了布尔什维克所说的话。但是托洛茨基过于抽象地理解俄国革命同国际革命的这种联系了,使这种联系过于公式化了,也过于机械地提问题了。正是这种情况促使他推行一种处于真空之中的,事实上同孟什维克的支持结合在一起的,口头上“左”但完全抽象的路线。

欧洲无产阶级的“国家援助”在1905年是谈不上的。这种国家援助可惜在1924年我们也还没有得到。在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第八个年头,例如我们从英国得到的不是英国无产阶级的“国家援助”,而是……鲍尔温和张伯伦的照会。托洛茨基同志口头上“左的”理论之所以如此轻易地在15年期间容忍极端露骨的孟什维主义在实践上所给予的支持,正是因为这种理论只是口头上“左的”

的理论。问题是极为简单的。

托洛茨基同志不懂得我国革命的具体道路。他现在也还不懂得农民在我国革命中的真正作用。

帕尔乌斯和托洛茨基认为，如果说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之前还能在某种程度上利用农民，那末在夺取政权后的第二天农民就将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首要的和基本的难题，成为革命继续发展的最大障碍。

托洛茨基在1922年写道：“无产阶级先锋队正是为了保证自己的胜利，还在它统治的初期，就不仅要最深刻地侵犯封建所有制，而且要最深刻地侵犯资产阶级所有制。在这种情形下，它不仅会和那些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初期支持过它的一切资产阶级集团发生敌对的冲突，而且会和那些协助它取得政权的广大农民群众（着重号是我加的。——格·季·）发生敌对冲突。”^①

关于夺取政权前农民曾起什么样作用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它现在对苏联来说只具有历史意义，但对整个共产国际来说却具有非常迫切的现实意义。而关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农民应起和将起什么样作用的问题，这一问题现在对苏联来说恰恰是具有迫切现实意义的（因为我们已夺得政权），而暂时对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却不那么迫切。

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土地问题提纲中列宁指出，把农民看作“反动的一帮”的观点“是因为有根深蒂固的偏见（这种偏见是同一切资产阶级民主偏见和议会制偏见有关的），是因为不了解已经被马克思主义理论充分证明而且又被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经验完全证实了的真理，这就是：除了现在已经站在革命一边的农业工人之外，上述三类空前愚昧、十分分散、备受压抑的、在一切最先进的国家中必然过着半野蛮生活的农村居民（指农业无产阶级，以小块土地为基础，部分在自己的土地上劳动，部分打短

① 列·托洛茨基《1905年》，第1版序言，第4页。

工的农民和不使用雇佣劳动的小土地所有者。——格·季·)，虽然在经济上、社会上和文化上会从社会主义胜利中得到好处，但是只有在革命的无产阶级夺得政权以后，只有在革命的无产阶级坚决镇压大土地占有者和资本家以后，只有在这些备受压迫的农业无产阶级阶层在实践中看到他们有了这种组织起来的十分强大坚定的领导力量和保护力量来帮助和领导他们，给他们指出正确道路以后，才能坚决地支持革命的无产阶级。”^①

这里有一点是不言而喻的，农民并非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起同样的作用的。马克思主义者对列宁关于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的一般学说的运用必须善于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

因此，列宁关于农民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作用问题的学说的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就是这样一个论断：只有在无产阶级夺得政权以后，只有在农民看到他们已经有坚强果断的保护者之后，只有在坚决镇压地主等等之后，这些备受折磨和压制的农民才能坚决地支持无产阶级革命。

这里，托洛茨基主义同列宁主义一次又一次地出现根本分歧。阐述这一问题远不是“党史”的问题；它完全是迫切的现实问题。正是现在全党碰到了工人阶级对待农民的态度问题。而对这一问题的前景的描绘是极不一样的。照列宁看来，夺取政权之后，镇压地主之后，我们就有了最大的可能去把最广大的农民群众拉到自己这一边来。在帕尔乌斯和托洛茨基看来，恰好相反。夺取政权前对农民作用的错误估计使得帕尔乌斯和托洛茨基在夺得政权后如何对待农民问题上同样采取错误的立场。

这就是“托洛茨基和帕尔乌斯式的”不断革命理论。他们拿了马克思正确的一般公式，放进对具体国家(俄国)革命动力的不正确估计，对夺取政权前农民作用作出政治上错误的结论，然后把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农民作用的极其错误的结论推荐给我们。

^①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第610页。[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39卷第170页]。

有意思的是，在1924年奥里明斯基同志公布的托洛茨基给他的信中企图证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为考茨基《革命的动力》所写的序言中表示同意考茨基的小册子，这样似乎他就走向了不断革命论，换句话说，走向了帕尔乌斯和托洛茨基。

托洛茨基同志是这样写的：

“当时我认为两派（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格·季·）之间的意见分歧不是这么深，因而希望……革命进程本身能把两派引导到不断革命和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立场上，而这在1905年已经部分地实现了（列宁同志为考茨基的论俄国革命动力一文写的序言和《开端报》的整个路线）。”^①

这样，托洛茨基同志就把列宁描写成似乎是一个“羞怯的”或“不自觉的”不断论者。这里是否有一点点真理呢？没有，这完完全是歪曲。在《俄国革命的动力和前途》这一小册子里，是**考茨基走向列宁**，而不是相反。列宁在为考茨基的小册子所写的序言中所强调的恰恰是这一点。

列宁写道：“只有**无产阶级和农民**（着重号是我加的。——格·季·）才能不顾资产阶级的动摇来完成资产阶级革命，布尔什维克策略的这个根本论点完全被考茨基证实了。”^②

这哪儿有不断革命？

大家知道，考茨基的小册子是回答普列汉诺夫关于下列问题的征询意见的：“俄国革命的一般性质：它是资产阶级革命还是社会民主主义革命？”列宁是怎样评价考茨基的答复的呢？

列宁说：“其实，考茨基回答普列汉诺夫的问题时，**抛弃了普列汉诺夫对问题的提法！……考茨基说，这是老一套的说法。不能这样提问题，这是非马克思主义的。俄国革命不是资产阶级革命，因为资产阶级不是俄国目前革命运动的动力。俄国革命也不是社会主义革命，因为它决不能使无产阶级实行唯一的统治或者专**

^① 《列宁论托洛茨基》。米·奥里明斯基序，第4页。

^② 《列宁全集》第11卷第396页。——译者注

政……但是目前革命的胜利不可能只是没有其他阶级帮助的无产阶级的胜利。那末，在目前革命的客观条件下，究竟哪个阶级是无产阶级的同盟者呢？是农民，因为‘在革命斗争的整个时期，只有无产阶级和农民才有牢固的共同利益。’^①

再说一遍，哪里有这样的不断革命论：它“跳过”农民，看不见无产阶级和农民“有牢固的共同利益”，相反地却指出胜利的无产阶级“还在它统治的初期，就不仅要最深刻地侵犯封建所有制，而且要最深刻地侵犯资产阶级所有制。在这种情形下，它不仅会和……一切资产阶级集团发生敌对的冲突，而且会和那些协助过它取得政权的广大农民群众发生敌对的冲突。”^②

考茨基的小册子同帕尔乌斯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毫无共同之处，这一点从考茨基在小册子中所阐述的下列思想可以看出：

“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力量和它取胜的可能性是建立在工业无产阶级同农民利益一致性的基础之上的，但是它也为利用这一胜利规定了限度……”（着重号是我加的。——格·季·）。

换句话说，考茨基是容许领导农民革命的无产阶级作“自我限制”的。而不断革命理论正是最坚决地反对这一点，拿自己表面上的最——最——最革命性同导致“自我限制”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相比较。

考茨基发挥自己的思想说：“作为胜利的党，它（社会民主党）在实行自己的纲领时不能超出支持无产阶级的那个阶级所容许的利益范围。”^③

列宁就此写道：“这意味着不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专政，而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换言之，考茨基表述了同机会主义者和“醉心者”不同的革命社会民主党的全部策略的最早的基本

① 《列宁全集》第11卷第395—396页。——译者注

② H·托洛茨基《1905年》。序言，第4页。

③ 卡·考茨基《答格·瓦·普列汉诺夫》，圣彼得堡1907年版第30—31页。

前提。所谓“醉心者”，列宁显然是指帕尔乌斯分子。

根据以上所述，托洛茨基同志在其著名的致奥里明斯基同志的信中的说法的“优良品性”就清清楚楚了。

在谈了不断革命“理论”之后，还应谈谈由此理论得出的**实践**。这一理论的奠基人帕尔乌斯本人的结局很糟糕：留在德国社会民主党行列之中，堕落为最坏的社会爱国主义——虽然他也有过光荣的时日，反对过伯恩斯坦，为旧《火星报》撰过稿，等等。但这只是在他的名望处于极盛之时的遥远的过去的事。看来，帕尔乌斯恰恰是这样一种类型的革命家，他无法经受失败，那怕是我们1905年所遭受的那种失败，而这是比另一些胜利更为重要的失败。从1906年起帕尔乌斯换毛了：他回到德国社会民主党右翼的怀抱，而在俄国则支持孟什维主义。

列宁的下述论断清楚地说明了托洛茨基主义的实践：

“他(托洛茨基。——格·季·)在1903年是孟什维克；1904年脱离孟什维主义，1905年返回孟什维克那里，只是用超革命的词句大出风头；1906年再次脱离；1906年年底拥护同立宪民主党人达成选举协议(也就是实际上再次同孟什维克站在一起)，而1907年春天在伦敦代表大会上说，他同罗莎·卢森堡的差别，‘与其说是政治倾向上的差异，不如说是个性色彩上的细微差别’。托洛茨基今天从这一派的思想武库中偷一点，明天又从那一派的思想武库中偷一点，因此就宣布自己是凌驾两派之上的人物(土申诺的倒戈分子。——格·季·)。

托洛茨基在理论上一点也不赞同取消派和召回派，而在**实践上却在一切方面都赞同呼声派和前进派**”^①(即用自由主义影响工人阶级的分子)。

* * *

在结尾的时候我们用提纲的形式来说明不断革命“理论”的基

^① 参看《列宁全集》第16卷第391页。《俄国党内斗争的历史意义》。——译者注。

本错误。

1. “不断革命”理论的作者借用马克思的术语，不成功地企图把它用于自己对俄国这个具体国家革命动力的错误估计上，同时把全然不同的内容加到马克思的这个词上，因为他们不懂我国的阶级关系。

2. 不断革命理论的作者正确地指出了俄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同西欧不尽相同（其中包括手工业者问题），但作出了不正确的结论，他们没有看到俄国工人阶级在家谱上同农民有特别紧密的联系。

3. “不断论者”不懂得在象俄国这样国家里农民的作用和土地革命的意义，在最好的情况下其“理论”也是注定毫无结果的，而在坏的情况下则不可避免地成为孟什维主义效劳。

4. 因此“不断论者”根本不懂俄国革命的真正动力。

5. 在什么是列宁的民族（人民）革命问题上，他们暴露了完全错误的观点。由此产生形而上学的对立：“不是”指望俄国的民族革命，“而是”指望国际革命。

6. 由此产生对我国二月革命性质的不理解和对2月到10月的动力的估计上的一系列错误：不懂得农民的作用和这一时期复杂的全部社会情况，因而也就找不到解释二月革命的原因和性质的钥匙。

7. 托洛茨基主义不懂得俄国农民的作用，“跳过”农民国家中的农民，因而也就不能理解国际革命中农民的作用（这对列宁主义是极端重要的）。

8. 由于这缘故我们看到托洛茨基对被压迫民族问题缺乏应有的注意，在他1917年以前的所有著作中几乎完全不提这一问题。因此不理解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争取农民和被压迫民族的斗争。被压迫民族问题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也就是农民问题，因为这些民族多数是由农民组成的。

9. 在理论上这意味着不理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

命的转变。

10. 与此类似的还有不惜任何代价地同孟什维克统一的错误思想，这一思想在托洛茨基主义学说中起了不小的作用(所谓调和主义)。理论上是“不断革命”，实践上是不断鼓吹同社会民主党的反革命派统一。

11. 这在实践上使帕尔乌斯和托洛茨基“派”在革命和进行关于革命性质争论的年代里(1904—1906年)接近“从左面”“批评”布尔什维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批评家”的队伍，而在为争取第二次革命而斗争的决定性10年里(1907—1917年)，托洛茨基已经直接支持(在组织上，在政治上)孟什维克取消派。

12. 在帝国主义战争时代执行同样的路线(为了想和平地夺取社会民主党的“机构”而反对同该党决裂)。

13. 归根到底，托洛茨基主义过去(在相当程度上现在依然)仅仅是带“左的”色彩的同布尔什维主义根本敌对的“欧洲式的”(即机会主义的)假马克思主义。

14. 因此现在不断革命论妨碍共产国际各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其中也包括俄共，因为我们党也需要布尔什维克化。

问题就是这样摆着的：或者是不断革命论，或者是各党的布尔什维克化。通过“不断”革命理论实现各党的布尔什维克化这种问题的提法是列宁主义完全不能接受的，是不可思议的。德国、法国或任何一国的共产党都不可能实现布尔什维克化，如果不向它解释清楚不断革命论的根本错误，如果不促使它好好考虑资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相互关系，如果不阐明在夺取政权之前和取得政权之后农民的作用的话。

结论：帕尔乌斯和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自命为什么都行，只是不能妄想与列宁主义等同(或近似)。

第九章

从国际经验谈谈革命的动力问题

只有不仅用俄国事变的经验，而且也用德国和波兰的经验去检验不断革命“理论”，我们对它的评价才会是全面的。

该理论的作者试图把它用之于所有这三个国家。俄国、波兰、德国在这一点上就象个三角形。需要哪怕是粗线条地看一看，不断革命理论在这三国的每一国中是怎样折射的。罗莎·卢森堡既在波兰、也在德国，还部分地在俄国活动过；她也同托洛茨基一起犯了某些错误；帕尔乌斯既在俄国，也在德国活动过，他同托洛茨基犯完全相同的错误，甚至是这些错误的鼓舞者；托洛茨基同波兰社会民主党共过事，在一段时间里推行一条几乎在一切方面都同它一致的路线。

农民问题是意见分歧的中心，在俄国革命中，在波兰运动中，部分地甚至在德国革命中都是如此——当然尖锐程度并不一样。看一看体现这些非布尔什维主义色彩的优秀人物——其中也有罗莎·卢森堡，那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在农民问题上离开布尔什维主义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

先从波兰说起。这里的根本问题是，波兰马克思主义者在1925年在策略上似乎不得不退回到20年前，大约1903—1905年去，这恰好发生在三个问题上，在这些问题上他们在俄国第一次革命前同列宁有过分歧。

由罗莎·卢森堡和梯什卡领导的波兰社会民主党人退出了党

的第二次代表大会(1903年),第一次同列宁发生了激烈的分歧。分歧主要是在民族问题上。列宁当时就坚持了自己在民族问题上的观点(作为分立权、成立独立国家的权利的自决;与此同时在无产阶级队伍内坚持最严格的国际主义)。^①而罗莎·卢森堡及其在波兰社会民主党中的拥护者认为,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提法是小资产阶级的,是无法与之调和的,甚至因此而退出代表大会。在民族问题上的这第一个根本分歧当然在根本上是同农民问题联系在一起的。在党的伦敦代表大会上(1907年),波兰社会民主党回到了我们党内(俄国社会民主工党)。^②在伦敦,罗莎·卢森堡已经在俄国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性、同立宪民主党人结盟等等问题上同列宁并肩反对孟什维克。沿着这条斗争路线,她同列宁并肩反对普列汉诺夫。但农民问题上的分歧依然存在。由于问题在于从孟什维克手里夺取党,所以布尔什维克、波兰和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人是齐心协力地干的。但正因为这只能由不同集团的联盟来做,所以伦敦代表大会决议在理论上的明确性受到了影响。我们要在伦敦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中找到完备的布尔什维主义的说法,那是徒劳的。这些决议仅仅“在总的方面”是布尔什维主义的。

从1908年起开始形成取消主义。孟什维主义完全脱离了革命,蜕化为“自由派的工人政策”——取消主义。1908年12月在巴黎召开了极其重要的党的全俄代表会议——最后一次同孟什维克一起开的代表会议。在反对取消主义的斗争中,波兰社会民主党是我们的盟友,是布尔什维主义联盟的组成部分。

在这次代表会议上再次提出问题:俄国向何处继续发展,我们

① 列宁后来多次回到民族问题上来。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在帝国主义战争期间的著作:《论对马克思主义的讽刺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批评彼·基也夫斯基—尤·列·皮达可夫的文章)、《关于自决问题的争论总结》、《论尤尼乌斯的小册子》(罗·卢森堡)。(见尼·列宁《全集》第XIII卷。)

② 回来是在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上先决定了的(1906年),但到1907年才全部实现。

作为政党向何处去？孟什维克的回答既简单又清楚：革命已经结束，立宪君主制胜利了，我们要取消秘密的党；斯托雷平道路取得了胜利，从上面完成了革命，此后开始了和平的局部改良时期。这就是当时孟什维主义的核心，那些住在俄国的孟什维克取消派是直截了当地说出来的，而呆在国外的马尔托夫一伙则是转弯抹角地暗示的。

布尔什维克在自己的行列中还有“召回派”，列宁称之为“倒过来的孟什维克”。而布尔什维主义虽然在自己的行列中还有召回派，还没有同他们决裂，但在最艰难的反革命时期必须向党指出道路。

十二月代表会议（1908年）通过了列宁起草的极端重要的决议——关于斯托雷平政制第一阶段的估计和俄国第二次革命的不可避免性。

“旧的农奴专制制度正在解体，它正在进一步转变为以假的立宪形式来掩饰专制制度的资产阶级君主制。由于六三政变和第三届杜马的成立，沙皇制度同黑帮地主和上层工商业资产阶级的同盟公开地固定下来了，得到承认了。专制制度迫不得已终于走上了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而同时它又力图把那条能够保留农奴制地主的政权和收入的道路保持下来，所以在这个阶级和资本的代表人物之间看风使舵。沙皇政府利用这两个阶级的细小争执来维持专制制度，而且同它们一起进行疯狂的反革命斗争，来对付在不久前的群众斗争中显示出自己力量的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和民主农民……”。

整个说来，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客观任务无疑还是没有解决。延续的经济危机、失业和饥荒表明，专制政府最近的政策不能保证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条件。这种政策必然会加深各个阶级之间的政治斗争。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中曾经引起了1905年革命的那些基本因素仍然在起作用。在这样的经济和政治的状况下，新的革命危机必然会成熟起来。”^①

代表会议上辩论的中心是未来革命的性质问题。孟什维克已完全不相信任何革命了，但是竭力就这个问题在布尔什维克和波兰人之间进行“挑拨离间”，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我们之间不完全一致，列宁和罗莎·卢森堡在民族问题和农民问题上有分歧。从而使我们布尔什维克处于困难的境地。我们依靠波兰社会民主党的票（没有他们我们就不能成为多数），为此我们一定要找到能达成协议的共同公式。列宁的旧公式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波兰社会民主党声明：我们不接受这一公式；这种提法是不正确的；象现在所说的，这是“农民倾向”，是小资产阶级性，等等。经过长时间的争论，我们得出一致的公式，这是波兰社会民主党想出来的：**“依靠农民的无产阶级专政”**。布尔什维克只好投票赞同这一公式，以便联合波兰人取得那怕是微弱的多数去反对孟什维克。这一公式被通过了。

这以后，马尔托夫立即发表文章《为什么而斗争？》，一方面企图再次挑拨列宁同罗莎·卢森堡争论，另一方面使托洛茨基卷入争论，为自己争得托洛茨基这个盟友。为什么而斗争？——马尔托夫问道。早先布尔什维克说得很清楚：争取无产阶级和农民专政。而现在布尔什维克却同波兰社会民主党一起说，要为“依靠”农民的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哪儿是真正的布尔什维主义？这是什么意思？请给我们解释解释，等等。

马尔托夫引用了决议中的说法：“目的仍然是推翻沙皇制度，由无产阶级依靠农民中的革命阶层来夺取政权和完成资产阶级民主变革”，使他“感到愤慨”的是，当时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二号的社论（列宁起草）中把这一段错误地解释为“无产阶级和革命农民夺取政权”。

马尔托夫写道：“托洛茨基同志早就非常清楚地指出了两种公式之间的根本差别（例如参看他的著作《我们的革命》第253页）”。

① 《苏共决议汇编》第1分册第247—248页。——译者注

“从……以上所述很清楚，我们是怎么看待‘无产阶级和农民专政’的思想的。问题不在于我们认为它在原则上可以还是不可以，我们‘愿意’还是‘不愿意’这种政治合作的形式。而是我们认为它是无法实现的——至少在直接和间接意义上是如此。实际上，此类联合的前提是：或者某一现存资产阶级政党掌握农民，或者农民建立强大的独立政党。正如我们竭力指出的，这两者都是不可能的。”他接着说（第250页）：“全部问题在于，谁规定政府政策的内容，谁用这一政策团结单一的多数？”民主派居民代表参加工人占多数的工人政府，这是一回事，而无产阶级的代表作为多少尊贵的人质参加某一资产阶级民主政府则是另一回事。

“无产阶级依靠农民运动掌握政权所需要的政治前提，跟无产阶级同农民一起掌握政权的政治前提全然不同。托洛茨基说得对（同上，第253页）：‘哪怕它（农民）这样做（‘拥护工人民主制度’）的时候，并不象往常拥护资产阶级制度那样自觉！’。为使农民同无产阶级一起在同全体资产阶级斗争中夺取政权，它必须具有很高的觉悟，必须提高到同整个资产阶级自觉对抗的水平。”

马尔托夫得出结论：“放弃‘无产阶级和农民专政’的公式是使俄国社会民主主义思想从民粹主义束缚中解放出来的道路上的重要一步。我们为批判这一公式化了不少力气，现在真可以认为，我们从代表会议那里得到了要把它从党的生活中清除掉的某种诺言。我们希望属于党内所有各派思潮的同志们能充分尊重理论真理，从而摒弃任何把思想斗争归结为字眼的争论的企图，摒弃任何用吹毛求疵地解释公式的办法来掩盖世界观的进化的企图。”^①

列宁当时发表文章作了如下解释。他说，“依靠农民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公式确实是不恰当的。依靠可以是弱者依靠强者。按照俄文这听起来似乎是跛子依靠拐杖。显然，根据波兰社会民主党的坚决要求通过的公式和术语是不正确的，政治上不完全对的。我

^① 《社会民主党人报》第3号，1909年3月9/22日。

们布尔什维克的公式实质上依然是过去的公式(无产阶级和农民专政),但是我们同在许多方面跟我们接近的波兰社会民主党人共处于一个党内活动。我们在措词上向他们作了让步,以便和他们一起取得多数去反对那些根本不要任何专政——不论“依靠的”专政,还是别的什么专政的人。

在答复引证托洛茨基的论据来说明自己不同意“无产阶级和农民专政”公式的马尔托夫时列宁指出,托洛茨基的根本错误在于忽视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对这一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缺乏明确的观点。从这一根本错误中产生了一些局部性错误,马尔托夫以同情和赞许的态度摘引了两段话,又重复了这些局部性错误。

列宁分析了托洛茨基关于无产阶级和农民在革命运动中不可能建立“联盟”和关于允许社会民主党人参加某一革命政府的条件的错误,特别强调指出被马尔托夫看作“正确的”托洛茨基的论点是错误的,这论点就是他所说的“哪怕它(农民)这样做(‘拥护工人民主制度’)的时候,并不象往常拥护资产阶级制度时那样自觉。”“无产阶级既不能把希望寄托在农民的不觉悟和成见上面(而资产阶级制度下的统治者却正是指望和依靠这些东西的),也不认为在革命时期农民的哪怕是寻常的不觉悟和消极的状况会保存下来。”

列宁写道:“认为社会民主党提出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专政,就是做民粹派的俘虏,这只能付之一笑。这样发表议论的冒牌马克思主义者,首先应当责备考茨基(请注意,考茨基那时还是马克思主义者。——格·季·)、马克思和恩格斯做了民粹派的俘虏。在一切资产阶级大革命中,无产阶级(比较成熟的)只是同农民结成联盟才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俄国资产阶级革命胜利的条件也是如此。1905—1907年的经验和每次巨大事变都实际证实了这个真理,因为一切决定性的发动,不论是‘战斗’发动或者议会发动,实际上都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共同行动’”。

“我们党坚持这种看法,即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

作用是领袖的作用，为了把革命进行到底无产阶级必须和农民共同行动，革命阶级不夺取政权就不可能取得胜利。”①

这一争论值得一谈：不言而喻，向波兰社会民主党人所作的让步不仅仅是措词上的，可惜，我们还向优秀的波兰革命者和当时还是糟糕的布尔什维克头脑中的模糊思想作了让步。现在在我们党内也有许多在1917年转向我们的原先的波兰共产党人，他们至今无法理解，怎么能认为他们过去不是列宁主义者：要知道他们曾经是象布尔什维克那样坚定，那样卓越的革命者，他们服过苦役等等；他们当时难道还不是列宁主义者？是的，他们曾是卓越的革命者，但他们那时还不是列宁主义者。在1908年代表会议上向他们作让步的恰恰是农民问题。当时他们的思想还是非常模糊的。“依靠农民”——这一点他们还能容许，但“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联盟”——绝对不行！难道这不是混乱？……

仔细观察事情是怎样闹下去的，这是极端重要的；这将使我们有可能顺便更好地理解不断革命“理论”中的某些东西。

当时托洛茨基同志是波兰社会民主党理论性机关刊物《社会民主党评论》杂志的经常撰稿人；他是它的经常撰稿人——虽然这时候波兰社会民主党比较倾向于同布尔什维克结成联盟，而托洛茨基则倾向于孟什维克。下面是托洛茨基同志1909年3月28日在德国写给当时波兰报纸编辑梯什卡同志的信。②托洛茨基同志写道：

“我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第4号或第5号上批评了你们的（波兰的）代表大会就党的代表会议（1908年12月）的决议通过的决议。对波兰同志们加到党的财产中的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新词必须予以彻底清算。你们对布尔什维克的公式所作的修

① 《列宁全集》第15卷第347、351—352页。《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斗争目标》。——译者注

② 波兰共产党的同志为本书提供了丰富的档案材料。我们现在利用其中一些非常说明问题的从来没有发表过的托洛茨基同志的政治信件。

正只有**纯粹措词**的性质——在这一点上列宁是绝对正确的。但是**我决不赞同把马克思主义这样廉价地出让给列宁。**”

那时已经开始弄清各人的位置。波兰人想站在列宁和托洛茨基之间。马尔托夫看清了这一点，从托洛茨基这个“环节”着手。托洛茨基则使劲拉波兰人这“环节”，以便让它把我们布尔什维克的链条拉过去。托洛茨基嘲笑波兰人说，你们向列宁做了过多的让步，但我（托洛茨基）不同意把马克思主义这样廉价地出让给列宁。

下面是1909年5月28日托洛茨基同志给波兰社会民主党人的另一封信。托洛茨基写道：

“读了《无产者报》上的列宁文章的俄译文（准确点说，是原文）。Immer dasselbe（总是老一套）：他（即列宁）正确地掌握了基本的政治思想（这是非常重要的），但是1. **为它安排了极端粗制滥造的论据，这种论据中所反映出来的马克思主义有如图拉茶炊上的阿芙洛迪特^①（!!!）；**2. 他把他那正确的政治思想当作指令去同今天的政治现实相对抗，而不是通过这一政治现实的发展得出这种思想。他的‘**无产阶级和农民联合专政**’的公式是同我绝对格格不入的。”

在1909年6月29日给波兰社会民主党人的第三封信中托洛茨基写道：

“你们信中提及的无产阶级和农民联合问题，我这里不谈了，免得同一件事让你们接连读两次——一次在信中，另一次在文章中。但关于党的政策问题我想在这里讲几句。你们同布尔什维克的关系具有太多的‘意识形态的’，或者——如果允许的话——太多的‘行政的’性质。你们是从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的角度看待他们的。^②从这一角度去看他们不过是激进的决议和激进的口号的总和而已。然而，要知道这还不是**政策**，而只是它的纸尾巴。布尔

① 阿芙洛迪特是希腊神话中爱与美的女神。——译者注

什维克过去现在都是党内的保守分子。他们总是力求保存党的落后性，由于害怕机会主义的‘动摇’起而反对党的发展。你们在任何问题上都可以看到这种情况：工会运动、代表苏维埃、杜马……现在，当处于革命退潮的时期，当党在其知识分子上层发生分裂瓦解的时候，布尔什维克在保存党的落后性的同时，也在保存作为党的党。而这是应记在他们名下的他们的无可置疑的历史功绩。他们在反动的混乱时期的这种积极作用是同他们的消极作用紧密联系的：思想上的形式主义、对历史发展所持的检察官式的吹毛求疵态度和警官式的不信任态度、小集团的利己主义和保守主义。”^①

你们看到，这里有“对历史发展所持的警官式的不信任态度”，有“小集团的利己主义”，有“保守主义”，有“检察官式的吹毛求疵态度”，等等，等等。所有这些都写在致波兰“盟友”的四封密信上。一句话，如果不是“少女的羞怯”不准许说出别的词来，那末托洛茨基同志对列宁主义还不是这样的骂法。

这就是托洛茨基同志1908—1909年间对待布尔什维主义的态度。而他竟能这样给波兰人写信，这一事实证明那时候他至少部分地是同他们一致的。

那时候甚至象罗莎·卢森堡这样杰出的革命家也沾染上了“欧洲式的”假马克思主义，使得列宁在极其重要的问题上向他们作出“措词上的”让步，而实际上却不仅仅是措词上的让步。在农民问题上，潘涅库克、哥尔特、罗兰-霍尔斯特以及当时的拉狄克都站在波兰社会民主党人的立场上。从这个例子可以清楚地看到，不仅关于俄国，而且关于整个国际，列宁看得多么远。这一例子还表明，只要向不断革命“理论”做微小的让步，就会使甚至非常杰出的革命家失去以应有的观点看待象农民和民族这样一些根本问题的能力。由于这两个“小”错误（在民族问题和农民问题上），波兰马克思主义者在整个一个时期内削弱了自己在波兰农民（并且还有

^① 所引用的这些信件的原件保存在波兰共产党人的档案里。

工人)中间的影响而有利于波兰社会党右派(波兰右翼社会革命民族主义者)。波兰的社会结构是这样的:无产阶级在贫苦农民的援助下能在那里成为多数,能够实现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的专政,特别是在1917年革命的关头。如果说这一点没有实现,这部分地是由于波兰社会民主党人及以后的波兰共产党不懂得列宁对待农民和民族问题的态度,认为“无产阶级和农民专政”的口号是无产阶级的堕落、“自我限制”等等。

如果我们在农民问题上不是持列宁的观点,而是持罗莎·卢森堡的观点,难道我们在俄国能够战胜社会革命党人吗?

在波兰民族问题上某些波兰共产党人至今不敢完全彻底地说该说的话,因为他们觉得这偏离了国际主义,背叛了无产阶级观点。然而正确解决民族问题是列宁主义的有机组成部分。波兰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及时地按列宁主义提出民族和土地问题,而这在某种程度上使得波兰无产阶级白白遭受十年的资本主义压制。这是毫无疑问的事实,波兰共产党人中间的优秀分子自己也承认这一点。他们现在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从头”开始斗争。他们现在只好依据列宁对农民和民族问题的估计重新深入群众。而所有这一切只是因为他们没有及时看出托洛茨基主义的根本错误,在一段时间内还曾为之辩护。

* * *

为了说完罗莎·卢森堡在农民问题上的根本错误,我们再引用她的一些言论。1918年她在坐牢的时候写了一本论俄国革命的小书。在这本书里她在农民问题上继续发表极其错误的观点。众所周知,罗莎出狱后自己拒绝出版这本书,相信列宁——至今就俄国而论——是正确的。罗莎逝世后,此书于1922年由保尔·列维出版,此人有一个时候曾是她的亲密朋友,于1921年成了叛徒。

保尔·列维卑鄙之处在于,他滥用了罗莎的信任,利用她本人并不想出版的手稿去反对共产党人,这时候他离开了这些共产党人,而罗莎本人已不能大声呼喊了。但是就问题的实质看看罗莎

的错误毕竟还是有益的。她在这本书中写道：

“列宁的土地改革为社会主义造成了新的强大的敌对的人民阶层，他们的反抗要比贵族—地主的反抗危险得多和顽强得多。”①

甚至象罗莎·卢森堡这样清晰的思想家，对无产阶级革命彻底忠诚的人物，也会在1918年，我国十月革命一年之后写出这样的东西！她没有出版这个东西，她相信有四分之三是自己错了，有四分之一在动摇。但错误毕竟是错误。

德国革命急风暴雨的几个月过去了。斯巴达克一月（1919年）起义短暂但重要的政治经验看来促使罗莎重新考虑了农民问题。

斯巴达克起义被镇压之后，罗莎写了《秩序控制着柏林》（«Die Ordnung herrscht in Berlin»）一文，这是她的最后一篇文章，成了她的绝笔。罗莎试图弄清楚，为什么斯巴达克运动失败了，为什么德国工人阶级遭到了失败。根据工人起义的新足迹她写了一篇极其有力而又热情奔放的文章，此文今天读来仍令人激动。罗莎在文中写道：

“革命斗争在这关头的弱点是士兵群众政治上的不成熟，他们让军官们不正当地利用自己以达到反人民的反革命目的，仅仅这一点就表明在这次搏斗中革命要取得长期胜利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士兵的这种不成熟本身只是德国革命普遍不成熟的征兆而已。大部分士兵是从农村来的，而农村象过去一样，革命才刚刚触及。”②

请好好想一想罗莎·卢森堡在惨死前几小时所写的这几行字

① Rosa Luxemburg. «Die russische Revolution» Herausgegeben und eingeleitet von Paul Levi. 1922. S. 87. [罗莎·卢森堡《俄国革命》，保尔·列维出版并作序，1922年版第87页]。

② Clara Zetkin und Rosa Luxemburg. «Stellung der russischen Revolution», S. 115—116.

[克拉拉·蔡特金和罗莎·卢森堡《俄国革命的形势》第115—116页。]

吧！1918年，在狱中的时候，她在农民问题上还处于旧“欧洲式”社会民主党观点的魔力之下。在监狱的围墙之内她还非常尊重这旧观点。她感觉到，俄国在进行某种伟大的事件，她崇敬伟大的俄国革命，对列宁本人和我们党充满了友好感情，但她还是说：你们那里在农民问题上的所作所为是极大的错误，造成了新的强大的敌人阶层，他们的反抗要比地主阶级的反抗危险得多，顽强得多。但是只要她走出监狱来到街头，只要她呼吸到真正革命的新鲜空气，只要她不是通过提纲的稜镜，不是通过“欧洲式”假马克思主义的眼镜，而是通过对具有全部长处和弱点的生动的德国无产阶级运动进行观察，她的估计就开始变了。她已经看到，斯巴达克运动之所以失败在相当程度上是因为士兵来自农村，大部分军队来自农民，而革命才刚刚触及农村。而这说的是德国农村，就革命的可能性而言，它自然比俄国或波兰小得多。德国农村不象我国农村。但是罗莎·卢森堡显然开始在那里看到这种可能性，寻找这种可能性，考虑如何使得德国农村不再是“革命才刚刚触及”的农村。

这样，我们看到，甚至欧洲马克思主义的优秀人物——而罗莎是这些优秀人物中的一个——有时也在列宁主义所由以开始的那个基本问题前面止步不前。顺便说说，这一情况也妨碍了他们正确看待第三国际的历史使命。甚至到1919年，罗莎·卢森堡和梯什卡还不想立即建立第三国际。理论错误往往导致根本性的政治实践错误。而要知道，这还是欧洲工人阶级的优秀人物！他们听马克思说过，农民怀有小资产阶级的偏见，但他们忘了，农民虽然怀有偏见，但也具有理性，而这是列宁从来没有忘记的。“欧洲式”马克思主义者在农民身上只看到偏见，而没有看到在什么地方，在什么条件下农民能够成为无产阶级的同盟者——特别是在帝国主义战争之后，这场战争强烈震动了最深厚的农民阶层，把许多东西改造成另一种样子。

在世界各地建立共产党的时候，要真正掌握列宁主义并具体运用它，就不能不吸取一些最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犯错误的教训，

他们试图把马克思主义运用到新时代的环境之中，但并不总是能做到这一点。

结果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对共产国际的许多党来说，不克服包括卢森堡主义在内的错误就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化，由于历史条件使然，卢森堡主义错误在这些国家的运动中起着相当大的作用。目前具有现实意义的罗莎·卢森堡的主要错误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

1. 对待农民问题上的错误。在1919年1月斯巴达克起义被镇压之后所写的最后一篇文章中，罗莎·卢森堡开始纠正这些错误了。

2. 罗莎·卢森堡在民族问题上犯了同样严重的错误。以在帝国主义条件下“不可能”解决民族问题为理由否定民族自决（成立独立国家的权利）口号，这实际上导致民族问题上的虚无主义，大大加重了许多国家共产党人工作中的困难。

3. 在“自发性”和“觉悟性”、“组织”和“群众”问题上的非布尔什维主义提法。当时在罗莎·卢森堡面前有往往直接影响群众革命斗争规模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经验，卢森堡所做的不正确估计使她不能正确理解党在革命中的一般作用。

4. 波兰党，包括罗莎·卢森堡在内多年来坚持的关于工会的党性的宣传是个巨大的错误，使得先锋队难以正确对待整个阶级。

5. 在准备起义中对技术因素估计不足妨碍了，在某些地方现在还在在一定程度上妨碍着正确提出“组织革命”的问题。

我们给予共产国际创始人之一罗莎·卢森堡的伟大工作以应有的评价，相信如果现在能帮助共产国际各党从这位伟大的革命家的错误中吸取教训，共产国际就能按照罗莎·卢森堡本人的精神进行活动。

不克服卢森堡主义中的错误成分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化。只有列宁主义能够成为全世界共产党的指路明星。一切偏离列宁主义的行为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离。

毫无疑问，不懂得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乃是整个非列宁主义阵营（更不用说反列宁主义阵营了）的基本特征之一。

如果从全体机会主义分子来看，从最极端的到所谓一般的、平凡的机会主义分子止，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不懂得列宁所阐述的农民的革命作用。问题并非是社会民主党人根本不愿思考农民问题。这样说是不对的。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分子提出过农民问题。拿德国改良主义分子来说，赫兹、大卫和福尔马尔都提出过农民问题。现在德国和奥地利（鲍威尔）社会民主党人也提出农民问题，只不过是从小市民的角度，从小资产阶级的角度提出的。简而言之，他们不是把农民的某些阶层提高到革命无产阶级的同盟者水平，而是竭力把无产阶级降低到农民中的半富农分子的政治水平。对他们来说，农民只不过是能在选举中投票的选民。至于农民能成为**革命**的重要因素，这对他们来说是百思不得其解的事。

这也就是把列宁主义阵营同所有非列宁主义阵营区分开来的极其重要的不同特点之一。在非列宁主义和反列宁主义阵营内部有其各种各样的差异。当然，大卫和潘涅库克全然不同，而赫兹也不同于托洛茨基。这里当然是有区别的。但使他们联合起来反对列宁主义的共同点，就是在农民这个中心问题上不懂得列宁。他们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自认为是“欧洲马克思主义者”，却不懂得现在不存在没有列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从波兰马克思主义的例子清楚地看到，农民问题上的理论错误可以把革命推迟十来年。这是为波兰工人运动的优秀人物现在所证实和承认的。波兰的例子之所以珍贵是因为它离我们很近。波兰的社会集团在许多地方是同我们一样的。而在那里活动的活动家是些最优秀的人物：罗莎·卢森堡和梯什卡。但是既然他们试图对不断革命理论作让步，他们在这方面也就遭到了失败。

* * *

现在谈谈**德国**革命。在评价不断革命论时，它的经验同样能

教给许多东西。请回想一下托洛茨基和帕尔乌斯对列宁提出的基本指责：你们列宁的策略导致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自我限制”；你们要无产阶级这一现代的唯一革命阶级，在革命中应起决定性作用的阶级，在胜利之后自己限制自己，也就是不超出资产阶级民主制的范围。这是永远不会出现的，这是不正确的，这是反革命。^①托洛茨基同志说，在革命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无产阶级不会半途而废的，它不会搞自我限制的，它将实现自己的整个纲领，社会主义纲领。

让我们用1918—1919年德国革命的经验来检验一下这些说法。1918—1919年那里出现了什么事？难道德国工人阶级没有取得政权？难道我们没有看到1919年德国工人阶级的政权？难道德国没有遍布苏维埃网？难道由六名“人民委员”组成的第一个革命政府不是完全由两个工人政党——独立社会民主党和社会民主党的代表组成的？难道他们没有尝试过宣布自己的共和国为“社会主义”共和国？

而德国工人阶级利用取得的政权做了些什么呢？结果它无力完成作为“自为”阶级的历史使命。它没有准备好把自己组织成为统治阶级，勇敢地改造资产阶级社会而斗争的阶级。德国工人阶级作了“自我限制”，实行了资产阶级民主制纲领，解散了自己的苏维埃，召开了立宪会议！

可以反驳这一点说，这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出卖了工人阶级。完全正确！我们对此不会有异议。当然，德国社会民主党出卖了革命，当然，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是值得工人革命有朝一日对他们论功行赏的！但是，从工人群众中生长出来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怎么能够实现这一背叛的呢？要知道，在德国还有共产党人，有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他们提出了并且英勇地捍卫了另一个纲领——不是资产阶级民主纲领，而是无产阶级纲领。他们被

^① 请回想一下托洛茨基关于布尔什维主义的反革命特性的言论（见本书第39页）。

残杀了。跟着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走的共产主义先锋队多半被肉体消灭了。如果广大德国工人完全支持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难道德国社会民主党能够在那里实现他们业已实现的叛卖的事业？难道他们能够使苏维埃代表大会本身作出自我解散的决定！要知道，在那里正是全德苏维埃代表大会决定解散苏维埃并把权力转交给魏玛的立宪会议。

那末问题在哪里呢？怎么理解德国的经验呢？

这还是得向列宁的学说求教。

列宁教导区分无产阶级中的各种不同阶层——尤其是在帝国主义时代。列宁教导说，正是在垄断资本主义时代，获得超额利润的资产阶级很容易收买和分化出上层工人贵族，造成从帝国主义那儿“得到好处”，同情其罪行的工人阶层。列宁提供了理解下列现象的钥匙：（1）工人贵族加（2）工人官僚加（3）小资产阶级同路人是怎样给机会主义造成群众支柱的。只有列宁对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内部所发生的内部分子运动过程所作的估计，加上列宁对党在革命中的作用的观点（在这里是缺乏有力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和存在群众性的机会主义的“工人”政党）给我们提供了解释1918—1919年德国革命的钥匙。

在德国有过“工人”革命（即由工人进行的革命），在德国工人阶级本来已接近掌权。而结果却是，这一工人阶级由于一系列情况的凑合而作了自我“限制”，仅仅实行了资产阶级革命纲领——而且还是大大缩小了的。如果全体工人不想这样做，那末国内是找不到能够违背工人阶级的意志硬要这样做的力量的。这就是应当懂得的东西。

罗莎·卢森堡在德国革命刚刚开始的时候就竭力设法回答这些问题。她写道，就实质而言，德国所发生的一切，“帝国主义的崩溃多于新原则的胜利”，即旧制度的崩溃多于新制度的胜利。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但是这加上某些不同的说法可以用于每一次革命——在其始初阶段。这还不能说明全部问题。当然，

1918—1919年德国出现了帝国主义崩溃。1917年俄国也出现了帝国主义崩溃。全部问题在于，从帝国主义崩溃中长出了什么；它的崩溃是否能成为另一种制度胜利的开端。拥有50年发展历史的德国社会民主党起了非常巨大的、决定性的、然而却是反革命的作用。为什么？显然是因为常常有这样的形势，那时人数上强大有力的无产阶级自己实行“自我限制”。

德国革命的经验对于列宁主义同不断革命理论的争论能提供什么教训呢？原来有这样的情况，工人阶级已接近取得政权，但是工人阶级自身的内部状况及其对周围形势的认识使得此工人阶级尽管具有其数量上的力量，却实行“自我限制”，实行资产阶级革命纲领。

不言而喻，这完全不是说，如果我们俄国按照托洛茨基的公式完成革命（也就是，假如工人阶级没有农民就取得胜利），那末它就象德国工人阶级在1919年那样行事。这只是意味着，如果运动的代表者是工人阶级，那末这一事实尽管本身自然极端重要，但还没有解决关于革命的社会内容的全部问题。看来有这样一种情况，那时工人阶级无力实行工人革命的纲领，虽然似乎有着足够的可能性做到这一点。

事实是：德国无产阶级在1918—1919年革命中曾起决定性作用，但它根本没有实行社会主义变革。而到底是谁妨碍了它，是农民吗？农民大军中某些阶层的反动性当然起了自己的作用。但仅此一端还不能决定全局。按照“不断革命”理论，农民必定妨碍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而在德国结果却是，导致革命失败的首先是，更多的是工人阶级本身的内部软弱及其上层的精神堕落。

在俄国是另一种情况，在这里农民没有成为缚在脚上的秤砣，它帮助工人阶级向苏维埃政权过渡。俄国之所以这样，当然是因为我们这里是另一种社会局势，土地问题具有另一种意义，等等。自然也因为我党的策略是正确的。无产阶级领导阶层的策略在革命中具有巨大的意义。我们的策略是正确的，而罗莎·卢森堡和

德国左派的策略在某些地方是不正确的。

再说一次，我们是有意选取象罗莎·卢森堡及其朋友这样优秀的人物作例子的。初看起来是小小的错误不仅导致理论上的大错误，而且直接妨碍取得胜利。

德国革命的进程也清楚地说明了党的作用问题，这同样是构成列宁主义的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的问题。德国无产阶级在决定性关头没有一个有力的群众性的布尔什维主义的党。但它“却”有一个群众性的有力的反布尔什维主义的、反革命的党：社会民主党。这个党利用它的全部影响、它的整个机构、50年来积累的全部政治经验、它同工人们的广泛联系来反对革命。结果看到了党（社会民主党）的作用——不过是否定的作用的极为鲜明的实例。

这就是德国革命经验给我们提供的教训。

德国的另一些社会主义者认为，民主共和国的口号在那里是不适用的，那里的道路是从威廉直接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不可能是另一种样子的！而结果却是，在工人清除社会民主主义幻想之前，我们在德国要经历整整一个漫长的时代。这是整整一个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多少时间，不清楚。这是同国际局势联系着的。从理论上说，在德国所发生的就是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再过10至15年回头看看德国所走过的道路，那时谁都会看得很清楚，1919—？年间那里出现的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带有若干间歇和诸如兴登堡的胜利之类的反革命痉挛）。现在那里正在进行这种“转变”，并且是在流血受难，坐牢枪毙的情况下进行这种“转变”的。工人阶级从自己的失败中学习真正的列宁主义，即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 and 实践。

当“不断论者”说，工人阶级不会作“自我限制”，我们回答说：同志们，请你们研究一下欧洲工人阶级的历史吧！要知道，德国工人阶级并不是最差的。而它却搞“自我限制”。这不是简单的偶然性。这不是德国工人阶级的过错，而是它的不幸。这是由这个国家的全部局势造成的。

大家知道，列宁主义的反对者试图用德国最近的事件（1923年10月）作冒险的对比。例如，托洛茨基同志说，1923年10月在德国出现了跟我们1917年10月相同的形势，但是共产国际中的拙劣的领导人“胆小怕事”，“错过了”革命的时机。这是不理解1923年德国所发生的事态的典型。真正的布尔什维克首先应当向自己和工人阶级解释清楚1919年的1月，这样就会较易于理解1923年的10月了。有人向我们说，1923年10月曾出现典型的革命形势，但是白白地把它“错过了”。

为什么我们俄国差不多九个月就完成了这种转变，而在德国，这种转变已进行到第六年，也许还需要许多年。我们是九个月（从1917年2月至1917年10月），而他们，譬如说，是九年！爱开玩笑的历史开了这么一个玩笑！爱搞对比的人忘记了一些“小事”。需知并不单单是共产党人从俄国的十月中吸取教训。资产阶级也在学习“十月的教训”。当政权转入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之手时，他们曾扬言说：我们要把战争继续进行“到底”！事实上，他们是把战争继续进行“到底”了——进行到**自己的**政治末日。

而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干了些什么呢？他们取得了并且学习了“十月的教训”，他们立即缔结和约，向协约国作了全部让步，以避免无产阶级专政。为什么？因为德国资产阶级和德国社会民主党都从我国十月的教训中领会了一些东西。资产阶级也在研究我们俄国革命的经验，单单因为这原因，纯粹的克伦斯基主义大概在任何地方都已不能重现了。这就是德国所没有的“**第一件小事**”：新政府立即停止了对协约国的战争。

第二件“小事”是：1917年在我们俄国是帝国主义战争加土地危机，即我们手上有两个口号：“**打倒战争**”加“**土地归农民**”。而德国不存在土地危机，缺乏第二种炸弹。

第三件“小事”是：我们这里全部军队站在我们这一边，而在德国迅速复员了军队，到1923年10月常备军只掌握在资产阶级手里——法西斯的白色军官团掌握在塞克特将军^①手里。

第四件“小事”：我们有苏维埃，而德国在 1923 年没有苏维埃。

这就是德国的十月的真正教训，这就是德国局势同我们的不同之处。应当懂得这一点，应当向全体工人阶级把这一点解释清楚。

这就是为了懂得“不断”革命的理论上和实践上的错误而应当研究的波兰和德国的经验。考察了围绕俄国三次革命、围绕波兰和德国事件的斗争，任何一个布尔什维克都会说，不可能有两种看法，或者是布尔什维主义，或者是托洛茨基主义。或者是列宁主义，或者是为了不断革命“理论”而放弃列宁主义。或者是向前走向列宁主义，或者后退到使许多国家工人阶级付出重大代价的错误上去。

① 塞克特(Seeckt, Hans, 1866—1936), 1920—1926 年任德国国防军司令, 1923 年镇压了革命运动, 1934—1935 年在蒋介石围剿苏区时任德军事顾问团首席顾问。——译者注

第十章

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

列宁主义把“拉丁语”的无产阶级专政一词“翻译”成最广大的群众的语言——并且是在全世界范围之内。列宁主义在地球陆地1/6 这块大银幕上向人民群众具体展示了什么叫无产阶级专政。

恩格斯写道：“近来，社会民主党的庸人又是一听到无产阶级专政就吓得大喊救命。先生们，你们想知道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样子吗？请看看巴黎公社吧。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恩格斯为《法兰西内战》第3版所写的导言）。

列宁主义可以这么说：你们想知道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样子吗？请看看苏维埃国家吧，尽管整个资产阶级世界疯狂地敌视它，它已经存在8年了。

自然，俄国的无产阶级专政有自己的特点。它的“主要的特点”是“小资产阶级居民阶层在数量上占优势。”^①但是巴黎公社也有自己的特点。列宁就此写道：“但是要知到专政与专政是不同的！也许这（巴黎公社——格·季·）就其成员的纯社会民主主义成份（这是在1905年写的，那时我们还全都叫做社会民主党人——格·季·）及其实际任务的性质而言，是真正的、纯粹的无产阶级专政？绝对不是！觉悟的无产阶级（并且只是多少有点觉悟的）即国际

^① 《俄共纲领》国家出版社版第109页。

(第一国际。——格·季·)会员是少数；政府的多数是由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代表人物组成的。……恩格斯把巴黎公社叫做无产阶级专政只是指无产阶级的代表，并且只是在思想领导方面参加了革命巴黎的政府。”^①

俄国革命是大范围内的事业。苏联的苏维埃政权已经具有绝对无可争辩的权利称自己为无产阶级专政。

列宁主义自然在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领域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新的东西。然而，应该承认，在这个领域中，也就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领域中，列宁从马克思那里获得了比其他领域远为丰富的“现成的东西”；例如比民族问题或者是关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或者比关于农民的作用问题，或者比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在革命中的作用问题，特别是比关于无产阶级胜利后社会主义的实际建设问题，——比所有这些都远为丰富。

马克思本人早在 1852 年就曾这样确认自己在发现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上的作用。他在 1852 年 3 月 5 日致魏德迈的信中写道：

“……至于讲到我，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就已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对各个阶级做过经济上的分析。

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②

这样，还在 1852 年马克思就曾指出，他马克思的新发现实际上可归结为两点：(1)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2)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的过渡。

这两个基本原理已经成了每个马克思主义者，每个列宁主义

^① 尼·列宁：《全集》第 VI 卷第 279、281 页。《巴黎公社和民主专政的任务》。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332—333 页。——译者注

者，每个觉悟工人的日常思想，它们对我们来说已是某种不言而喻的东西了。但是这两个发现是马克思主义，因而也是列宁主义的无可争辩的基本点。列宁就是立足于这个基础之上的。

为了彻底说明这个问题，除了马克思以外，让我们再听一听列宁的说法。

“谁要是仅仅承认阶级斗争，那他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还可以不超出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政治的范围。把马克思主义局限于阶级斗争学说，就是阉割马克思主义，歪曲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变为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东西。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同平庸的小资产者（以及大资产者）之间的最深刻的区别就在这里。必须用这块试金石来检验是否真正理解和承认马克思主义。”^①——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这样写道。

“阶级斗争学说经马克思运用到国家和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必然导致承认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无产阶级的专政，即不与任何人分掌而直接依靠群众武装力量的政权。”^②

“‘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马克思的这个理论同他关于无产阶级在历史上的革命作用的全部学说，有不可分割的联系。这种作用的最高表现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实行政治统治。”^③

在另一个地方：

“马克思正是总结了历次革命的这个历史经验，这个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经济的和政治的——教训，提出了一个简短、尖锐、准确、鲜明的公式：无产阶级专政。”^④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31卷第32页。——译者注

② 同上，第24页。——译者注

③ 同上，第24—25页。——译者注

④ 《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176页。《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译者注

我们已经听完了马克思本人和列宁本人的说法。不可能有什么怀疑。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所有基本点马克思都提出来了。

列宁“发现的”不是一般的无产阶级专政，而是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形式**。

每当列宁谈到苏维埃政权是新的国家形式时，他总要把苏维埃政权同巴黎公社相提并论。

“工兵代表苏维埃再现了巴黎公社所创造的那种国家类型，马克思曾把这种国家类型叫作‘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①

“苏维埃政权是世界上第一个（严格说来是第二个，因为巴黎公社已开始这样做过）吸引群众即被剥削群众参加管理的政权。”^②

“顺便指出，苏维埃所以是民主制的最高形式和最高类型，正因为它把工农群众联合起来，吸引他们参与政治，它是最接近‘人民’（指马克思在1871年谈到真正的人民革命时所说的‘人民’）、最灵敏地反映群众在政治上阶级上的成熟发展到什么程度的晴雨表。”^③

“这个（苏维埃的——格·季·）政权和1871年的巴黎公社是同一类型的政权”。^④

“苏维埃政权是无产阶级专政发展过程中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第二步或第二阶段。第一步是巴黎公社。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一书中对公社的实质和意义所作的天才分析表明，公社创造了一个新型国家，即**无产阶级国家**。”^⑤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29卷第162页。《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任务》。——译者注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35卷第248页。《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译者注

③ 同上，第302页。——译者注

④ 《列宁全集》第2版第29卷第131—132页。《论两个政权》。——译者注

⑤ 《列宁全集》第2版第35卷第444—445页。《给欧美工人的信》。——译者注

“人民已经认识到目前爆发的这场斗争的伟大和意义。只是必须找出一种能使无产阶级实现自己的统治的实际形式。这种形式就是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制度。无产阶级专政！——在此以前，它还是一个群众看不懂的拉丁词。由于苏维埃制度在全世界的传播，这个拉丁词已经被译成现代各种语言。专政的实际形式已经被工人群众找到了。”①

我们说，列宁发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形式。这自然不完全准确。这个形式是最广大的劳动群众的“人民的创造”（列宁语）所发现的。但是这个形式是列宁阐明的（并且在相当大程度上先想到的）——就象巴黎公社是马克思所“阐明”的一样。

列宁写道：“俄国成立了苏维埃政权的这个事实表明，最富有革命经验的就是革命群众自身，千百万人都来援助数十个党员”。②

革命群众自身是最富有革命经验的。在其“财富”中也包括在历史的危机时代，在大危机的转变关头革命群众推荐、发动、激励象列宁这样的思想和事业的伟人。

马克思从一切基本方面提出无产阶级专政的完备理论已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了。马克思在巴黎公社身上“发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个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发展阶段，第一个无产阶级的国家形式。列宁在这个领域里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上完成了马克思的事业。列宁站在最广大的革命劳动群众前面并且领导他们，发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形式。在列宁的领导下，俄国的工人阶级迈出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第二步，或者说进入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二个发展阶段。在列宁的领导下“终于”发现了能够使劳动人民获得解放的最新的政治形式。列宁领导下的苏维埃向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35卷第483—484页。《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开幕词》。——译者注

② 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33卷第266页。《关于人民委员会工作的报告》。——译者注

全世界劳动人民指明了道路——消灭资产阶级统治，建立新型无产阶级国家的**具体**道路。

“马克思从社会主义和政治斗争的全部历史中得出结论：国家一定会消失；国家消失的过渡形式（从国家到非国家的过渡），将是‘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但是，马克思并没有去发现这个未来的政治**形式**。他只是对法国历史作了精确的观察，对它进行了分析，得出了1871年^①所导致的结论：事情已经到了**破坏**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的地步。

当无产阶级群众革命运动已经爆发的时候，马克思就来研究这个运动究竟发现了什么样的形式，虽然这个运动遭到了挫折，虽然这个运动为期很短而且有显著的弱点。”^②

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公社是由无产阶级革命“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形式。

列宁愉快地就苏维埃政权的胜利写道：

“思想掌握了群众。苏维埃思想在全世界的胜利进军。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发现了（通过无产阶级的群众运动）！！第三国际。”^③

巴黎公社是**第一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阶段。苏维埃是**第二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阶段。**马克思**的名字最好地体现了第一阶段；**列宁**的名字体现了第二阶段。

* * *

马克思和恩格斯还在巴黎公社的伟大经验之前就天才地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全部主要论点。马克思主义是从以下两点开始的：1. 证明由于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是不可避免的，2. 预言无产阶级专政不过是向消灭一切阶级的过渡。后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又十分清楚地说明了，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

① 原文如此。——译者注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31卷第52—53页。《国家与革命》。——译者注

③ 《列宁全集》第2版第37卷第261—262页。《论无产阶级专政》。——译者注

间有一个从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的革命的转变时期——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时期。最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十分清楚地描绘了（尤其参看《反杜林论》），在无产阶级革命专政时期**结束**，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来到时，无产阶级国家是怎样“消亡”，“自行停止”的。所有国家都“消亡了”，于是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就确立起来了（关于这一点详见第十三章《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

无产阶级专政的**开始**和它的**结束**，无产阶级专政的**出发重点**和它的**历史终点**，无产阶级国家的**诞生**和它的“自行停止”，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清楚地天才地预见到了。他们所不能提供的就是“中介”（象有时列宁爱说的那样），这就是从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阶段到它的最后阶段；从无产阶级国家的产生到它的“自行停止”的**具体道路**。这种“中介”，这种具体道路只有依据世界革命——那怕是世界革命的第一阶段——的历史经验，依据无产阶级的实际专政、无产阶级革命实际的和巩固的胜利——那怕开始时只在一个国家里——的经验才能描绘出来。只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生列宁才能完成这项工作，他活动于较晚时代的历史舞台，这时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次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胜利已经成为事实。

既然问题在于对处于**开始**和**终结**阶段的，即建立无产阶级专政阶段和一切国家“自行停止”阶段的无产阶级专政进行理论分析，列宁就把自己的论据完全建立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之上。列宁不是徒然地把象《国家与革命》这样的基本著作完全建立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引文之上的。由于说的是出发点（建立这个专政）和终点（一切专政的“自行停止”），所以列宁就可以仅限于解释、说明、阐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天才预见。由于说的是处于这两点之间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具体道路，由于说的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时代，关于实际存在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困难和问题，关于专政时代工人阶级的同盟者，关于变化中的专政形式，关于专政在对待各种各样的非无产阶级居民阶层的态度上的不同表现，等等，等等——总之，由于说的是“中介”，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是它

的动力，是它的机制，所以列宁就负有发展和补充马克思主义的使命。结果他也完成了这一伟大的任务。

正因为这个缘故，在农民问题上，先是俄国范围内，然后是国际范围内的农民问题上，提出那么多有价值的新论点的任务就落到了列宁的身上。我们在上面已经看到（详见本书第一章），在农民问题上马克思和恩格斯也给列宁提供了解决问题的钥匙。但是列宁比任何人都善于利用这些钥匙，善于用它们打开那些马克思和恩格斯由于生活在较早时代而没能达到的那些大门。

从这种观点看看俄国革命中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这个口号是很有意思的，这个口号的创造者就是列宁。值得注意的首先在于，除了列宁，在第一次革命的时代，再没有一个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用这一或那一阶级，或两个阶级的专政这一术语提出过关于俄国革命的问题。俄国的马克思主义在那个时代拥有从右到“左”的各种各样的色彩。民粹主义阵营也同样如此。关于俄国革命性质的争论充满了整个时代。不知弄折了多少支争论之剑。但事实是，用**一定阶级的专政**这个术语——“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提出问题的**只有列宁**。所有其他的人都只限于争论俄国革命会不会是“一般的”资产阶级革命，这个革命将是通常的欧洲型革命，还是特殊类型的革命，如此等等。非布尔什维克阵营中的杰出人物格·瓦·普列汉诺夫也只限于同列宁进行非常一般的争论：俄国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还是非资产阶级革命。再说一遍，只有列宁一人，清楚明确地提出了未来革命政权的阶级基础问题，只有列宁一人论述了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

现在回顾走过的道路，我们清楚地看到，列宁关于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问题的提法正好说明了，作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继承者，他的历史使命就是给人类指出通往创立无产阶级专政，然后使它向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具体的现实的道路、途径**和“阶梯”。在列宁直接进行活动的农民国家里，通向无产阶级专政的途径、“阶梯”就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企图把无产阶级和

农民的民主专政同无产阶级专政对立起来是不正确的和荒谬的，因为在特定的国家、特定的历史形势下，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实际上是通向无产阶级专政的唯一现实的道路。在我们这一代眼前实现的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十分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

列宁在1905年写道：“在1850年，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把民主主义专政和社会主义专政区分开来，或者更确切些说，根本就没有谈到民主主义专政，因为那时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已经衰老，社会主义已经临近。……

“1850年，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社会主义已经临近了，因此对民主胜利成果估计不足，那时他们觉得由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必然胜利，这些胜利成果是牢靠可靠的。……如果马克思和恩格斯了解到民主制度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占统治地位是不可避免的，那末……他们会赋予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以更大的意义的。”①

我们看到，列宁的这些话证实了我们的上述说法。正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期限问题上弄错了，他们当时过高地估计了革命发展的速度，所以他们未能着手解决具体的“中介”任务。特别是他们未能象以后列宁得以在丰富的具体的革命历史经验基础上所做的那样，“中介”由民主革命通向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理论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还是萌芽。但是只有列宁成功地描绘出这个转变的现实图景，以此为主题描绘出有力、鲜明和完美的图画，因为在他手中不仅有神奇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钥匙，而且还有新的丰富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具体的革命经验。

直接研究“从资产阶级民主向无产阶级民主的历史转变”的任务落到了列宁身上。列宁在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出色的草稿中用下列优美的语句言简意赅地说明了这一历史性转变：

① 《列宁全集》第8卷第438—439页。《论临时革命政府》。——译者注

“从资产阶级民主到无产阶级民主的历史性转变。

前一种民主是‘长入’、‘爬入’还是被摧毁，并创立后一种民主？= 经过革命还是不经过革命？”①

列宁直接经历过并亲眼看到了资产阶级民主的被摧毁和无产阶级民主的创立……。因此列宁才能够写出象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和专政的著名提纲这样的杰作，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朽文献之一。

列宁不是生活和活动在一般的资本主义时代，而是在它的最高阶段——帝国主义时代。因此列宁在考察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时候，还应给这一理论增加由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时期的特点所决定的新东西。在列宁的上述草稿中，例如就有整整一章叫做《无产阶级专政和帝国主义的特点》，这些特点在这里是用三言两语来表达的：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

殖民地和附属国。

无产阶级反对本国资产阶级的起义 + 殖民地和附属国人民的起义。

革命的无产阶级和民族战争……

‘联合的’压迫者。斗争的集中。

各个不同的阶段。

无产阶级中的资产阶级上层分子。”（顺便说一下，列宁在这里也没忘了补上一句：“马克思谈英国工联的领袖。两大‘支流’：卖身投靠的人和庸人。”）

“社会沙文主义。

两个国际。一个阶级的革命分子的专政。

一国和全世界。”②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37卷第259页。《论无产阶级专政》。——译者注

② 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37卷第259—261页。《论无产阶级专政》。——译者注

列宁十分详细地研究了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阶段，对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规律作了非常明确的表述。

“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甚至任何一个懂得现代科学的人，如果有人问他‘各个不同的资本主义国家平衡地或谐和均匀地过渡到无产阶级专政是否可能？’他的回答一定是否定的。在资本主义世界中从来没有而且不会有什么平衡，什么谐和，什么均匀。在每个国家的发展中，都是有时是资本主义和工人运动的这一方面、这一特征或这一类特点特别突出，有时是另一方面、另一特征或另一类特点特别突出。发展过程从来都是不平衡的。”①

正因为资本主义世界里任何时候都没有过平衡、谐和、均匀，所以列宁（在这篇草稿中）十分具体地分析了在不同国家里无产阶级专政可能出现的不同类型，一种是无产阶级占51%，中小资产阶级占40%，资本家占9%的国家，另一种是无产阶级占20%，小资产阶级占75%，资本家占5%（在75%的小资产阶级中，贫穷的占30%，中等的占30%，富裕的占15%）如此等等。列宁的使命是用极其具体的历史内容去充实被第二国际的祭司们歪曲了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般理论。

列宁愤怒地斥责这些假马克思主义者：“对新的、本质的和具体的东西撇开不谈，而翻来覆去老谈一般‘无产阶级’。”②

列宁如此出色地完成了这个工作，从而扩充、发展和丰富了马克思的全部学说——特别是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

* * *

“专政是一个大字眼，一个严峻的、血腥的字眼，它表示出两个阶级、两个世界、两个世界历史时代的你死我活的无情斗争。”③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36卷第292页。《第三国际及其在历史上的地位》。——译者注

② 《列宁文集》第Ⅲ卷第494页〔《列宁全集》第2版第37卷第429页〕。

③ 《列宁全集》第2版第38卷第144页。《政论家的短评》。——译者注

“无产阶级专政是新阶级对**更强大的敌人**，对资产阶级进行的最奋勇和最无情的战争。资产阶级的反抗，由于资产阶级被推翻（哪怕是在一个国家内）而**凶猛十倍**；资产阶级的强大不仅在于国际资本的力量，在于它的各种国际联系牢固有力，而且还在于**习惯的力量，小生产的力量**。这是因为世界上可惜还有很多很多小生产，而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①

“无产阶级专政是对旧社会的势力和传统进行的顽强斗争，流血的和不流血的，暴力的和和平的，军事的和经济的，教育的和行政的斗争。”^②

“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最坚决最革命的形式。”^③

“那个取得了政治统治的阶级，在取得统治时就意识到它是**独自**取得政治统治的。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概念的内容。只有当一个阶级知道它是独自取得政权而不用什么‘全民的、普选的、受到全体人民拥戴的’政权这类空话来自欺欺人的时候，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概念才有意义。”^④

“无产阶级专政不是结束阶级斗争，而是以新的形式、新的武器继续进行阶级斗争。只要阶级还存在，只要资产阶级在一个国家内被推翻后还在国际范围内用十倍的力量加紧向社会主义进攻，这种专政就是必要的。”^⑤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39卷第4页。《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译者注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39卷第24页。《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译者注

③ 《列宁全集》第2版第39卷第185页。《关于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基本任务的提纲》。——译者注

④ 《列宁全集》第2版第41卷第123页。《在全俄运输工人代表大会上的演说》。——译者注

⑤ 《列宁全集》第2版第42卷第8页。《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关于俄共的策略的报告提纲》。——译者注

“专政是一种激战状态。”^①

“专政就是铁的政权，是有革命勇气的和果敢的政权。”^②

“专政就是……不受限制的，凭借暴力而不是凭借法律的政权。在国内战争时期，任何获得了胜利的政权都只有实行专政。”^③

“专政是直接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④

所有这些严峻的钢铁般的定义充满着革命的激情，与革命息息相关，散发着革命的“气息”。与此同时，它们又充满着深刻的辩证法，是多种多样，绚丽多彩，包罗万象的。

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问题的提法可以有条件地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直接为夺取政权而斗争，直接推翻资产阶级并摧毁他们的反抗的时期，是手执武器进行直接的最激烈的国内战争的时期。第二个时期是为经济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首先是大工业）而斗争的时期，是加强无产阶级国家，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领会无产阶级革命的政治经验的时期，是长期地牢固地把广大非无产阶级劳动人民争取到无产阶级方面来的时期，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进行“和平的和流血的”斗争的时期，同样充满着最激烈、最紧张的阶级斗争（只是在另一种形式下进行）的时期。

在第二个时期里还能分出一个特殊阶段：在大工业发展的同时，开始了小生产的社会化、合作化、集体化，“文化革命”，使集体经济的思想深入到人民群众当中去这些紧张的工作。第二个时期不能机械地与第一个时期分开，尤其是不能把第二个时期的特殊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42卷第55页。《关于俄共策略的报告》。——译者注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176页。《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译者注

③ 《列宁全集》第10卷第186页。《立宪民主党人的胜利和工人政党的任务》。——译者注

④ 《列宁全集》第2版第35卷第237页。《无产阶级革命的叛徒考茨基》。——译者注

阶段同整个第二时期分开。应当辩证地对待这个划分。

上面引用的列宁的第一组定义，主要是概括第一个时期，无产阶级专政最危急的时期，直接夺取政权、摧毁资产阶级地主的旧国家机器的时期，最尖锐的直接国内战争时期。

这第一时期有多长时间？结束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个危急时期到底需要多少时间？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二个时期要多少时间，以国家“自行停止”告终的无产阶级专政时代还将有多少其他阶段和“中间环节”？这些问题是无法回答的。这在各个国家里是不同的，它取决于一个国家无产阶级的比重，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等等。在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站在正在经历无产阶级专政这一阶段的新国家“旁边”的已经取得胜利的无产阶级国家越多，这第一个时期就越短。

在俄国第一个危急时期持续了几乎五年时间——从1917年到1922年。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二个时期需要多长时间，还很难说。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展进程。不久前公布了列宁的一段话：只要在十年二十年内和农民保持正确的关系，即使世界革命延迟，也能保证完全的胜利。——这段话说明了列宁晚年所设想的期限的长短。“十年二十年内和农民保持正确的关系”一语应理解为无产阶级专政十年二十年的有机发展（我使用“有机”一词是有点冒险的——但愿某些“学者”不要从这个词作出“广泛的”和……庸俗的结论）。同时，这十年二十年当然不要理解为在此期间国家将彻底“自行停止”，而应看作在此期间已建立了完全的保障，使我们能以迅速的步伐不停地走向共产主义的最高阶段，达到任何国家的最终“自行停止”。

下面是列宁的第二组定义，它主要是涉及无产阶级专政第二个时期的“主题”。（当然，在这些定义里主题同期限是“相互交错”的）。

“无产阶级专政决不只是推翻资产阶级或推翻地主，——一切革命都这样做过，——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是要保证建立秩序、纪

律，提高劳动生产率，实行计算和监督，建立比过去更巩固更坚强的无产阶级苏维埃政权。”①

“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不仅在于暴力，而且主要不在于暴力。它的主要实质在于劳动者的先进部队、先锋队、唯一领导者即无产阶级的组织性和纪律性。”②

“要使无产阶级能引导农民和一切小资产阶级阶层前进，就必须有无产阶级专政，必须有一个阶级的政权，必须有这个阶级的组织性和纪律性的力量，必须有这个阶级的以资本主义文化、科学、技术的一切成果为基础的集中的实力，必须以无产阶级感情体会一切劳动者的心理，并在农村或小生产中的涣散的、不够开展的、政治上不够稳定的劳动者面前具有威信。”③

“无产阶级专政是劳动者的先锋队——无产阶级同人数众多的非无产阶级的劳动阶层（小资产阶级、小业主、农民、知识分子等等）或同他们的大多数结成的特种形式的阶级联盟，是反资本的联盟，是为彻底推翻资本、彻底镇压资产阶级反抗并完全粉碎其复辟企图而建立的联盟，是为最终建成并巩固社会主义而建立的联盟。这是在特殊环境中，即在激烈的内战环境中形成的特种联盟，这是社会主义的坚定的拥护者和其动摇的同盟者的联盟，有时则是社会主义坚定的拥护者和‘中立者’的联盟。”④

无产阶级专政初期，在激烈的国内战争中已经把中间阶层中相当一部分人争取到自己方面来。不做到这一点无产阶级专政的真正胜利是不可能的。随着专政从第一个时期向第二个时期的过渡，胜利的无产阶级在其道路上的每一个转折，在专政的每一个新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242页。《关于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的报告》。——译者注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36卷第375页。《向匈牙利工人致敬》。——译者注

③ 同上，第376页。——译者注

④ 《列宁全集》第2版第36卷第362—363页。《〈关于用自由平等口号欺骗人民〉出版序言》。——译者注

阶段都应该努力在居民的中间阶层，首先是在农民当中，按新的方式巩固和扩大自己的影响。在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关于农民问题的著名决议中，列宁详尽地指出，正是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在无产阶级专政巩固之后，无产阶级能够把农民争取到自己方面来，因为他们感到胜利了的无产阶级是**坚强的保卫者**，可靠的领袖。

“第二国际的‘社会党人’（应读作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之所以不理解无产阶级专政，其主要根源就在于他们不理解：**掌握在一个阶级即无产阶级手里的国家政权，可能并且应该成为把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吸引到无产阶级方面来的工具，成为把这些群众从资产阶级和各小资产阶级党派那里争取过来的工具。**”^①

无产阶级专政不仅为团结全体工人阶级，直至它的最落后的阶层提供了可能性，不仅为把全体工人阶级变成**自为的阶级**提供了可能性，而且也把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越来越牢固地争取到工人阶级方面来提供了可能性。在无产阶级先锋队同资产阶级争夺广大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的斗争中，国家政权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是一个决定因素。

自然，无论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个时期，还是在其第二个时期，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首先是农民）的动摇是不可避免的。列宁一分钟也没有忘记这一点。

“农民和任何小资产阶级一样，在无产阶级专政下也处于中间的地位：一方面，他们是由劳动者要求摆脱地主资本家压迫的共同利益联合起来的、人数相当多的（在落后的俄国是极多的）劳动群众；另一方面，他们又是单独的小业主、小私有者、小商人。这样的经济地位必然使他们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摇摆不定。到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尖锐化的时候，到了一切社会关系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38卷第11—12页。《立宪会议选举和无产阶级专政》。——译者注

遭到非常急剧的破坏的时候，由于农民和一般小资产者最习惯于因循守旧，那就很自然，我们必然会看到他们从一边转到另一边，摇摆不定，反复无常，犹豫不决，等等。”^①

从这里列宁得出结论：

“对于这个阶级，或者说，对于这些社会成分，无产阶级的任务就是领导他们，设法影响他们。**带领动摇分子和不坚定分子前进，这就是无产阶级应做的事情。**”^②（着重号是我加的。——格·季·）

无产阶级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在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中，无产阶级的力量都要比无产阶级在人口总数中所占的比重大多得多。”^③

而在苏维埃国家，在业已胜利结束专政的第一个危急时期的国家里，无产阶级的力量要比无产阶级在人口总数中所占的比重大多许多倍，特别是如果无产阶级政党在这个国家里坚定地站在列宁主义基础之上，也就是说，如果它对专政的第二个时期，“和平的”时期农民方面也必然动摇这一点没有作错误估计，如果它不用“超阶级的”玫瑰香水去代替列宁的冷静的阶级分析，如果它记住，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阶级斗争还在继续，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每日每时”地从小生产中产生出来，如果它善于巧妙地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说，要在完全保持专政的社会实质的条件下适时地改换实行专政的形式的话。

不久前发表了本世纪初列宁对普列汉诺夫起草的党纲第一个草案的评论和列宁就这一问题同当时《火星报》编辑部的通信。列宁当时有关无产阶级专政和小资产阶级动摇问题的一个意见是非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37卷第276页。《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译者注

② 同上。

③ 《列宁全集》第2版第38卷第24页。《立宪会议选举和无产阶级专政》。——译者注

常有意思的。列宁写道：

“在草案中（普列汉诺夫的草案。——格·季·），把初稿中原有的**无产阶级专政**字样漏掉了。即使这是由于疏忽而偶然发生的，但是，有一点毕竟还是不能怀疑的，这就是‘专政’这个概念同肯定地承认他人支持无产阶级是不相容的。如果我们的确肯定地知道小资产阶级在无产阶级完成自己的无产阶级革命时一定支持无产阶级，那就根本用不着谈论‘专政’了，因为那时完全能够保证我们获得如此压倒的多数，以至专政大可不要了（正象‘批评家’想要别人相信的一样）。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是同《共产党宣言》提出的**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这一原理最密切地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①

接下去是关于其他阶级的“有条件的革命性”的意见，只有无产阶级这唯一**彻底革命的阶级**能够通过自己的正确策略揭示出这种革命性来（这后一种意见我们将在本书的另一章里引用）。

我们刚刚摘录的列宁对普列汉诺夫草案的意见是极其有意思的，因为从这里，我们清楚地看到列宁1902年观点同他1922年观点的“结合”。在1902年列宁也比他在《火星报》编辑部的任何一个同事都更清楚地看到农民和一般小资产阶级的“**有条件的革命性**”。但是列宁同时又非常清楚地看到这些居民阶层不可避免的动摇性——动摇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必然性和规律性的基础就在于无产阶级不是“有条件的革命”阶级，而是**无条件的革命阶级和唯一彻底的革命阶级**。无产阶级应当率领居民的中间阶层。专政也就意味着率领可能动摇的人们跟自己走。当列宁说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和非无产阶级劳动阶层联盟的形式时，他指的是**领导作用永远属于无产阶级的那种联盟**。列宁的思想并不在于我们需要工人阶级和农民的“一般”联盟，而在于我们需要**工人阶级起领导作用的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这一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6卷第215—216页。《对普列汉诺夫的第二个纲领草案的意见》。——译者注

结论现在对于我们也具有最迫切的现实意义。

* * *

在无产阶级专政第一个危急时期告终的时候，在手执武器进行斗争结束的时候，在直接的国内战争的浪潮涌退的时候，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问题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专政是直接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列宁的这一经典定义从一般历史意义上说在专政的第二个时期，比较“和平的”时期**仍然是正确的**。但是不应该忘记，专政的这第二个时期在苏联已经是在“革命的法制”、“活跃苏维埃”等等口号下前进了——在处于同样阶段的任何其他无产阶级专政国家里大概也同样如此。无产阶级专政在这个时期是**除了自身的法律以外**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在专政的这个时期，建设是在正在巩固中的无产阶级国家的“整顿好”的革命法制的旗帜下进行的。

第二个时期的口号——革命法制，活跃苏维埃——**丝毫不改变而且也不应该改变政权的社会实质**。无产阶级专政仍然存在；这一时期任何“脱离”无产阶级专政轨道的行动都会使革命遭到完全的毁灭；但是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却在发生变化，并且在无产阶级国家胜利发展的情况下不能不发生变化。无产阶级专政还不是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制度。无产阶级专政是**争取社会主义制度胜利的斗争**，是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是消灭阶级的**准备时期**。正是为了做到消灭阶级，需要一个阶级的专政——无产阶级专政；需要无产阶级专政这整整一个时期，我们现在在苏联经历的就是这一时期。而此专政的**形式**却在变化并且不能不变化。在不久前发表的列宁在1921年秋写的论粮食税这一小册子的纲要中，我们看到这样一些话：“不是白卫恐怖，就是无产阶级的领导（愈来愈温和），即无产阶级专政。”^①（着重号是列宁加的）。

无产阶级的领导仍然存在，“无产阶级专政”仍然存在——没

^① 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41卷第379页。《论粮食税》一书纲要。——译者注

有这些革命就会毁灭；而领导的形式应该是“愈来愈温和”。目前，在由于国家的经济复兴向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二个时期的过渡已经充分显示出来的时候，这是具有特别迫切现实意义的新东西。

在我们眼前，形势在变化，因此，无产阶级对所有其他居民的领导形式也不能不变化。领导只有在善于适时地改变自己的形式以适应变化了的形势时才能称之为领导。象任何真理都是具体的一样，列宁主义是具体的。列宁主义的第一个要求就在于，每一个正确的策略的运用都取决于具体情况，取决于时间和地点的条件。如果我们不善于随着变化了的形势改变策略和领导方法，那末我们就仅仅是些墨守列宁主义成规的人，我们就有负于自己的导师。为了忠实于列宁的遗训，应当善于在新事物刚刚诞生的时候就发现它；应当善于看到从最尖锐的专政时期向它的第二个时期的“转变”。应当善于看到国家中新形势的“诞生”。与此同时，实现“苏维埃民主”需要做到一点也不动摇、不削弱无产阶级专政，不允许那怕“削去”一点点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内容。应当清楚地看到隐藏在这形势中的“蜕化”危险，并且要采取一切合适的手段同这一危险作斗争。

有充分的根据期望，现在苏联将年复一年地繁荣昌盛起来，贫穷、失业、流离失所、文盲、不文明将成为过去，工人群众对平等的要求、觉悟和纪律性将增长，对苏维埃政权象对“黑土”那样充满真情实意的热爱将日益增强。如果事情真是这样，如果不取决于我们的外部局势不阻碍这样做，那末，不言而喻，我国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就应当变化，并一年一年地变得温和起来。

现在特别需要重提列宁在十月革命初期，在无产阶级专政刚刚诞生的时候关于苏维埃民主制的论述。

“苏维埃民主制即目前具体实施的无产阶级民主制的社会主义性质就在于：第一，选举人是被剥削劳动群众，排除了资产阶级；第二，废除了选举上一切官僚主义的程序和限制，群众自己决定选举的程序和日期，并且有罢免当选人的完全自由；第三，建立了劳

动者先锋队的……最优良的群众组织，……从而第一次着手使真正全体人民都学习管理，并且开始管理。”^①

1919年通过的俄国共产党纲领作为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提出，“逐渐地把所有的劳动人民毫无例外地吸收来参加国家管理工作”。^② 纲领写道：“俄国共产党的任务就在于吸引日益众多的劳动群众来运用民主权利和自由，并扩大劳动群众运用民主权利和自由的物质条件。”^③ 纲领着重指出，“苏维埃政权同时消灭议会制的缺点，特别是立法权和行政权的分立、代表机关脱离群众等等。苏维埃国家使国家机关同群众接近……无产阶级的民主不是在形式上宣布权利和自由，而是真正地把它首先和最多地交给居民中曾受资本主义压迫的那些阶级，即无产阶级和农民”。^④ 纲领特别强调指出，“彻底而全面地实行这些措施，就是沿着巴黎公社所曾经走过的道路向前迈进一步，同时在劳动人民文化水平提高的情况下简化管理机关的职能，这将促使国家政权归于消灭”。^⑤ 纲领坚决要求，“在劳动群众在实践中日益严格、日益充分地实现民主制的基础上，特别是通过实行公职人员负责制和工作报告制的办法，使政权机关进一步接近劳动群众。”^⑥

这就象是特意为今天而写的。实行真正的公职人员负责制和工作报告制，由群众自身在实践中日益严格（这个词使人想起列宁的形象）、日益充分地实现民主制——这就是无产阶级政权目前工作的最基本的东西。

纲领的这一部分就象特意针对现在苏联正在经历的无产阶级专政阶段而写的，必须把它放在俄国共产党一切工作的中心地位。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183页。《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译者注

② 《苏共决议汇编》第1分册第535页。——译者注

③ 同上，第533页。——译者注

④ 《苏共决议汇编》第1分册第533页。——译者注

⑤ 同上，第535页。——译者注

⑥ 同上，第534页。——译者注

列宁和全党就苏维埃民主制所讲的话不应该变成“被遗忘的话”。这些任务成为无产阶级政党一切工作的轴心的时代已经到来。

俄共纲领(1919年)向全体资产阶级和一切改良主义的社会民主党发出了挑战，它着重指出：“同掩饰自己国家阶级性的资产阶级民主相反，苏维埃政权公开承认：当社会划分为阶级的现象以及因此而产生的任何国家政权尚未完全消失的时候，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避免地具有阶级性。”^①

纲领详细说明了，为什么无产阶级专政为了镇压剥削者的反抗，必须剥夺资产阶级的政治权利并规定一系列其他限制。但纲领随即保证说：“所以必须剥夺政治权利并对自由作各种限制，只是为了反对剥削者企图维护或恢复自己特权而采取的暂时办法。”^②

这些办法是暂时的，但不是短期的。针对资产阶级的这些办法是“认真的和长期的”。纲领非常慎重地确定可以着手取消对资产阶级的这些限制的期限：“将来，随着人剥削人的客观可能性的消失，这些暂时办法也将没有必要存在，同时党也将努力缩小其范围，并将其完全废除。”^③

大家知道，只有消灭了阶级，人剥削人的客观可能性才会消失。例如，在新经济政策时期，这种人剥削人的客观可能性无疑是依然存在的。党将努力缩小（“努力缩小”——这说得非常谨慎，列宁总是这么谨慎的）对资产阶级的限制并将其完全废除。

农民群众则是另一回事。党纲十分坦率地写道，在整个革命中领导作用属于，也应当属于城市工业无产阶级，因为他们“是劳动群众中最集中、最团结、最觉醒、在斗争中受到最大锻炼的一部分。”纲领继续写道：“我们的苏维埃宪法反映了这一点，保留了工业无产阶级比农村中比较散漫的小资产阶级群众的某种优越地位。”因而纲领作出结论说：“俄国共产党应当解释：由于以社会主

^① 《苏共决议汇编》第1分册第532页。——译者注

^② 同上。——译者注

^③ 《苏共决议汇编》第1分册第532页。——译者注

义原则组织农村比较困难而在历史上形成的这些优越地位，是暂时性的，同时党也应当坚定不移地、不断地利用工业无产阶级的这种地位，来消除资本主义在工人中间培养起来的那种狭隘行会利益和狭隘职业利益，使最落后、最散漫的农村无产者和半无产者群众以及中农同先进工人更紧密地联合起来。”①

请注意，在列宁这里（在纲领中）重心是在农村无产者和半无产者再加上中农身上。无论在什么情况下这里都决不允许给富农以政治平等和其他的平等权利。

纲领的这一部分对无产阶级专政的目前阶段也具有最迫切的现实意义。

纲领中现在仍然完全正确的那一部分都说了些什么呢？它说，1) 无产阶级专政本身应该并将延续到人剥削人的客观可能性消失的时候，也就是到阶级消灭和无阶级社会确立之时。其次它说，2) 在这相当长的时期之内，自然将有一些过渡时期。

现在每一年都将出现某些新东西。这一年同另一年不会完全一样。无产阶级政党应进行系统而顽强的斗争，把散漫的农村无产者和半无产者以及中农群众的文化提高到应有水平，党将致力于日益消灭他们与工业无产阶级之间的一切差别。这是无产阶级专政整个阶段的任务。

以上所引列宁关于苏维埃民主制的全部定义就下列意义来说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富有生命力，这就是正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目前阶段我们应该善于实现这些定义（党已经着手做了），善于用这些思想在亿万人民群众中开辟道路，在我们的全部建设中，在全部日常生活中提供这种民主制的生动的、真正的范例。

列宁在俄共纲领中对于限制资产阶级和使农民和工人逐渐“取齐”所做的论述是多么切实。千百万劳动群众珍视的不是表面的、有名无实的、抽象“民主”的东西。自然，以最彻底的方式实现

① 《苏共决议汇编》第1分册第534页。——译者注

的苏维埃政权本身只不过是政治生活的一种形式，它能够便于和加速生产资料的社会化，但还不是完全的社会主义。列宁说，苏维埃政权本身只能提供政治方面的保证（详见第十四章《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在一国胜利问题》）。群众珍视的首先是具有真正的物质条件，生活得好一些、文明一些、温饱一些、合理一些、健康一些；越来越多地实现真正的平等。我们现在正在进入这种可能性将获得发展的时期。如果我们善于象列宁所教导的那样实现苏维埃民主的话，那末在这个基础上苏维埃民主就会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

* * *

不久前我们看到了乌斯特里亚洛夫先生的《在革命的标志下》一书。乌斯特里亚洛夫是著名的“刹车下坡”和同样著名的关于布尔什维克的“策略还是演变”的名言的作者，列宁用关于阶级敌人粗暴的真话的著名评论回答了这一名言。列宁在1922年说：“乌斯特里亚洛夫所说的这种事情是可能的。……敌人说出了阶级的真话，指出了我们面临的危险。……这是一个主要的真正的危险。”^①乌斯特里亚洛夫是一个狡猾诡诈的敌人。他比米留可夫之流更为危险，尽管后者是较有经验的狡猾的议会政客。乌斯特里亚洛夫不反对“颂扬”列宁，“容纳”列宁主义——用路标转换派的民族“布尔什维克主义”精神去解释它。让列宁和列宁主义者用自己的双手给我们建设强大富饶的富农的“民主”俄国吧——这就是乌斯特里亚洛夫的心声，他善于把孟什维克和米留可夫主义的“思想”变得比孟什维克和米留可夫主义者本身“更绚丽”、“更动人”。

尼·乌斯特里亚洛夫或多或少正确地说明了苏联现状中的一些东西，他说：“同国家敌对的心情消失了，化为乌有了。在暴风雨中得到新生、但也被弄得精疲力竭的全体人民当中，唤起了对和平、对劳动、对顺从的愿望。国家在迎接正常的生活。”^②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92—93页。《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译者注

② 尼·乌斯特里亚洛夫：《在革命的标志下》（文集），哈尔滨1925年版第163页。

是的，国家在迎接正常的生活，但是，谨通知乌斯特里亚洛夫先生，在我们这里“正常的”生活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制度。“正常化”是必要的，我们已着手实现它。但是这将在无产阶级专政界限、范围内的正常化。无产阶级力求达到的“常规”，无产阶级实行专政以求达到的“常规”，根本不是乌斯特里亚洛夫所梦寐以求的那种“常规”。

乌斯特里亚洛夫先生已经在清楚地梦见资产阶级民主俄国的“黍稷”。

在以圣经中的“如今可放行了”^①开头的《发财吧！》这篇文章中(1925年6月)，乌斯特里亚洛夫丧尽天良地歪曲真理，厚颜无耻地歪曲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他写道：

“这是生存的口号，康复的口号，天才的(!)内心的呼喊(!!)：”

“当家人，发财吧！……”

“不久你们就会看到这样的人，听到来自农村的精神饱满、生气勃勃的声音：

“——是的，我是富农，我是苏维埃富农，我为此感到自豪！……”

“再过不多久，我们也许会在农村看到在当家人（富农！——格·季·）强壮的胸膛上闪耀着‘红旗’勋章：

“奖给劳动英雄”……^②

“如果在阴间彼·阿·斯托雷平的灵魂这天偶然碰上斯维尔德洛夫的灵魂，或者比如说，沃洛达尔斯基或者是李卜克内西的灵魂，那会怎么样呢……”

“听一听阴间的这一段对话会是很有意思的。”^③

① 圣经《路加福音》说，西面得圣灵启示，知死前必见主的基督。他进入圣殿，见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来，西面因而称颂神说：“主阿，如今可以照你的话，放仆人安然走了。”(2, 25—32)“如今可放行了”一语表示达到长期期待的某一目的。——译者注

② 尼·乌斯特里亚洛夫：《在革命的标志下》(文集)，哈尔滨 1925 年版第 194 页。

③ 尼·乌斯特里亚洛夫：《在革命的标志下》(文集)，哈尔滨 1925 年版第 194 页。

“如今可放行了。到底等到了！”

“发展和健全的个人主义口号，是象勤勉的农村一样清醒的口号，象生活一样不可避免的口号，象历史一样命令性的口号。”^①

乌斯特里亚洛夫想要“表示拥护”“面向农村”的口号。乌斯特里亚洛夫抓住了我们所有人的衣襟。他带着这样的热望高兴地津津有味地谈论着不容许有“贫农的幻想”^②的话，同时恶意歪曲这里的每一个字，以“证明”臆造的共产党人放弃保护贫农的谎言，故意歪曲我们党的路线。

读者看到，这是洋洋得意的……路标转换派的真正歌声。难怪就是这个路标转换派分子早在1921年11月就曾写道，新经济政策不是个策略，而是演变，难怪那时列宁就正确地指出，乌斯特里亚洛夫是其预言不妨一听的阶级敌人。

这个阶级敌人越加“狡猾”，越是力图“逐步拥抱”我们的党，我们就越有必要听一听刚才引用的他在1925年6月5日所写的话。

这位俄国新资产阶级理论家幸灾乐祸和冷嘲热讽得太早了。俄国共产党的政策同乌斯特里亚洛夫想要在这个政策中看到的東西没有任何共同之处。

是的，“国家在迎接正常的生活”。但是这个正常的生活将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正常发展**，直到任何专政都成为不必要，阶级被消灭，国家开始“自行停止”时为止。是的，“国家在迎接正常的生活”，但是它一分钟也没有忘记，它还处于资产阶级国家四面包围之中，苏联内部新资产阶级和老资产阶级的残余仅仅是**国际资产阶级**的一部分、一个环节和代理人，他们仍然很强大，在现在的俄国农村中还在发生分化，农村资产阶级还在发展，等等。

往俄共决议中 hineininterpretieren（加进自己的意思）乌斯特里亚洛夫主义的企图……对乌斯特里亚洛夫来说是非常值得引以为荣的，但是这些赌棍的狂妄行径统统是徒劳的。乌斯特里亚

① 尼·乌斯特里亚洛夫：《在革命的标志下》（文集），哈尔滨1925年版第192页。

② 同上。第194页。

洛夫们（和那些以乌斯特里亚洛夫为代表的潜在力量）想把党的路线“解释”为指靠富农，“解释”为国家“蜕化”^①为生气勃勃的、温暖的和发财致富的资产阶级富农的“民主制”。然而俄国无产阶级还存在，它的政党还存在，列宁主义还存在，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主要希望——正在发展着的（虽然比起应有的要缓慢些）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还存在。如果说我们党内个别人有时“忽视”中农，而另一些人没有清楚地看到富农，那末整个党（见第十四次党代表会议的决议）始终是忠实于列宁主义的。这些强有力的因素保证了苏联沿着列宁主义，而不是乌斯特里亚洛夫主义的方向发展。

* * *

无产阶级专政的实施不仅靠强制，而且靠说服，不仅靠命令，而且靠示范，靠实例，靠行动的宣传。强制与说服的正确结合等于一半胜利。

一般说来，作为国家政权形式的无产阶级专政可能有两种危险。一种危险是在时间上把专政“维持得过久”，拉得太长或者赋予专政以过于僵化、不够灵活的形式等倾向。另一种危险是提前削弱唯一彻底的革命阶级的专政，从而增加中间阶层的动摇，这种动摇归根到底不仅给无产阶级而且也给这些中间阶层自身带来巨大的危害。这种危险性就在于小资产阶级力量“用水冲淡”无产阶级专政，拧松主要的“螺母”，从而使**依靠着**（请勿忘记）**国际资本**的资产阶级（和富农），有可能直接打击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支柱。这种危险就在于不及时采取措施防止小资产阶级对国家机构，对经济，甚至对党施加反无产阶级影响的锈迹去腐蚀无产阶级专政。

现在在苏联这两种危险中哪一种更现实呢？不言而喻，是第二种。在一个小资产阶级居民占巨大优势的国家里；在一个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几乎断送了（1920—1921年）革命的国家里；在一个经历了多年新经济政策阶段，即部分复活和发展资本主义的阶段

^① 尼·乌斯特里亚洛夫：《七年》，第163页。

的国家里；在一个富农在农村还有相当大政治影响的国家里；在一个庞大的国家机器，按列宁的正确说法，严重沾染了官僚主义、旧习气的国家里；在人数众多的知识分子刚刚开始抛弃直接复辟资本主义的希望的国家里；在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新资产阶级同国际资产阶级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国家里；在一个大工业虽然在最近几年已迅速复兴，但是还仅仅接近沙皇时代水平（1913年）的国家里；最后（按次序，而不是按重要性的最后），在一个至今四面八方还被资产阶级国家所包围的国家里——在这样的国家里，对经济上刚刚开始巩固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最现实的威胁自然是第二种危险。但是，这种危险自然是完全可以克服的，并且毫无疑问必然会被克服的。

但是，全部问题在于，要克服这第二种危险，就必须一开始就看到第一种危险，也就是要善于把我们的全部任务置于争取无产阶级社会的斗争的前景之中，清楚地看到改变专政形式的必要性，表现出越来越富有弹性，越来越温和，也就是真正善于率领越来越多的亿万劳动人民，新的革命的一代，新的农民，新的知识分子等等。唤起越来越多的人民阶层，吸引亿万人们参加管理国家和经济的事业，象列宁在1918年已看到的那样，看到在劳动人民中间，在群众深处“沸腾地进行着有组织的创造性工作，革命使之焕然一新、变得无比崇高的生活在蓬勃发展”，帮助居民普遍地学习管理并开始进行管理，不仅口头上，而且用行动来争取实现越来越广泛的平等——这就是目前这一时期苏联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①

① 我们在这里没有分析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这一极端重要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将在“列宁主义和新经济政策”一章中的一节里单独讲到。按照本书纲要我们认为把这一问题列入“列宁主义和新经济政策”一章较为合适。

第十一章

列宁主义和新经济政策。 新经济政策和国家资本主义

布尔什维主义(或列宁主义)发展的总路线是**进攻**的路线：向专制制度、向地主阶级、向资产阶级、向反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向整个资产阶级世界进攻。但**进攻**的总路线并不排除在某一时间，在历史道路的某一阶段，作**战略退却**。

什么是**进攻**的布尔什维主义，这是众所周知的。1917年，在那“震撼世界的十天”里，在世界银幕上足够清楚地展现)这种布尔什维主义。但是如果不研究布尔什维主义的战略退却，那就不能完全理解列宁主义的真正实质。在**比较强大的敌人面前作暂时的退却**，同时**始终不渝，依然故我**，这是布尔什维主义的主要特点之一。学会这种艰难的艺术是目前正在进行的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化的主要任务之一。不是关于“原则上”是否允许“妥协”的徒然的争论，而应学会依然故我，即依然是布尔什维克，即在任何条件下，其中包括当形势迫使你作战略退却时，**依然是资产阶级制度的不可调和的敌人**。这是列宁主义的训条之一。

布尔什维主义历史上最重要的战略退却有五次：

1. 1906年列宁放弃抵制国家杜马(以及在革命低潮年代放弃抵制策略)，这时开始出现俄国革命较为缓慢地发展的前景。

2. 1917年的七月事变。七月发动所采取的形式超过一般示威，但不及真正的武装起义。在几小时内必须做出最重要的决定：

是继续进攻，把示威发展成决定性的战斗，还是把队伍撤出战斗，知道会遭受巨大损失而退却。考虑到力量对比，列宁主义采取了第二种方案。^①

3. 布列斯特和约。让出空间以赢得时间。取得“喘息时机”或者硬拼，准备“光荣地死去”；“随机应变和退却”或者在力量悬殊的条件下投入战斗。列宁主义采取了前一种办法。

4. 对波兰的战争。在猛烈的进攻之后，在用炮火突破西线的尝试之后，摧毁了帝国主义分子的波兰壁垒，却在华沙城下失败了。危险自然远不及签订布列斯特和约之前那些日子那么大；输赢并非在此一举；然而局势是严重的。必须作出抉择：再次集中突击兵团，在较短期间向波兰帝国主义发动猛烈攻击（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但是这样一来就要冒在苏维埃国家内部加剧农民不满的危险，也许会使工农联盟遭受直接考验；或者是退却，签订不利的和约；在小一点的规模上再一次让出空间，以赢得时间。列宁主义选取了后者。

5. 新经济政策（耐普）。这是列宁主义经过最广泛的深思熟虑的退却运动。这是无产阶级政党责任极其重大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最大战略机动。这是其历史意义迄今尚非所有人都清楚的退却。这是不仅对俄国革命的命运，而且对国际革命的命运都具有极端重要意义的退却。对新经济政策的含义和作用缺乏应有的理解就不能理解列宁主义，就不能成为真正的布尔什维克。

每当布尔什维主义不得不采取某种战略退却的时候，必然有一些人物、集团、流派、派别、思潮不懂得这一战略机动的历史意义，叫嚷布尔什维克“纠偏”^①、布尔什维主义“蜕化”、“共产主义的没落”等等。

“左派”的列宁主义提出这些充满真诚的痛苦和绝望情绪的指责。右派则“满意地”“确认”这一“演变”——“是啊，我们总是这么

① 也不免有这样的布尔什维克小集团，它们“深化”这种退却，从而看不见任何革命前途。

主张的！”孟什维克先生们宣称，退却“我们”总是同意的。这些人都不懂得什么是列宁主义。他们都不懂得，尽管有这样那样的战略退却，无产阶级革命的政党怎么能始终不渝。

列宁就新经济政策说明我们的战略时说：“我们现在后退，但是我们这样做是为了先后退几步，然后再起跑，更有力地向前跳。”

“只是在这一条件下（着重号是我加的。——格·季·）我们才在实行新经济政策时向后退。”^①

“我们后退，是为了先后退几步，然后再起跑，更有力地向前跳”，列宁的这些话非常适用于说明布尔什维主义的其他战略退却。

“布尔什维克的新经济政策到底是什么，是演变还是策略？”列宁在1922年春提出了这一问题。“路标转换派就是这样提问题的：苏维埃政权在建设什么样的国家呢？共产党人说是共产主义国家，并要人相信这是一种策略……布尔什维克可以爱怎么说就怎么说，但实际上这并不是策略，而是演变，是内部的蜕变。”^②

而列宁回答说：听听“敌人的阶级的真话”“是很有益的”。“究竟谁会得胜？”^③

是策略还是演变？是暂时退却还是内部蜕化？究竟谁会得胜？——这适用于我们在上面分析过的布尔什维主义的所有重要的战略退却。

* * *

列宁不止一次地把新经济政策问题同更为广泛的无产阶级革命可能的战略退却的一般路线问题联系起来。例如他恰恰把制订共产国际纲领的可能性问题这种一般性问题同这一问题紧密地联

① 尼·列宁：《全集》第XVⅢ卷第Ⅱ分册第103页。《1922年11月18日在莫斯科苏维埃全会上的讲话》[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296页]。

② 尼·列宁：《全集》第XVⅢ卷第Ⅱ分册第41页。《在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关于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91页]。

③ 《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92—93页。

系在一起了。列宁说，不能这么快地制订出共产国际纲领来，其原因之一就是“我们几乎根本没有考虑过可能的退却和保障这一退却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在世界上发生了象推翻资本主义和十分艰难地建设社会主义这样根本变化的时候，是我们必须注意的。”^①

“我认为无论从经济制度至今还很落后的俄国来看，或是从共产国际和西欧先进国家来看，我们都应当注意到这一点。”^②

在同一地方列宁提到了（印象几乎每当他以纲领形式谈论新经济政策时一样）他还在1918年初反对“左派”共产主义者时写的文章，文中提出了这样的思想：国家资本主义较之苏维埃共和国当时的经济状况是一个进步。

“我不想说我们事先已有一个准备好了的退却计划。这是没有的。这短短几行论战性的文字，在当时决不是什么退却计划……但这毕竟提出了一个大致的、还不明确的退却思想。”^③

“新经济政策是一种退却，我们走得比我们能够控制的远了一些……”^④“一个奇怪的名称。这个政策之所以叫新经济政策，是因为它在向后转。”^⑤

“从1918年产生了接收政权的任务和布尔什维克的全体人民揭示了这一任务的时候起，在我们的理论文献中就明确地强调指出，要从资本主义社会走上接近共产主义社会的任何一条通道，都需要有社会主义的计算和监督这样一个过渡，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渡。当我们不得不在国内战争激烈进行的情况下在建设方面采取必要措施的时候，好象把这一点遗忘了。而我们的新经济政策的实质正在于，我们在这一点上遭到了严重的失败，开始作战略退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277页。《俄国革命的五年和世界革命的前途》。——译者注

② 同上，第276页。新经济政策一般说来自然是同国际革命延缓密切相联的。关于这一点见第十四章《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在一国胜利的问题》。

③ 《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276页。——译者注

④ 同上，第8页。《论苏维埃共和国所处的国际和国内形势》。——译者注

⑤ 同上，第296页。《在莫斯科苏维埃全会上的讲话》。——译者注

却：‘趁我们还没有被彻底打垮，让我们实行退却，一切都重新安排，不过要安排得更稳妥。’共产党人既然自觉地提出了新经济政策问题，他们对于在经济战线上遭到了惨败这一点就不可能有丝毫怀疑。”^①

在我们这里有时有人也发挥这样的想法，似乎新经济政策根本就不是退却。问我们说：我们从哪儿向哪儿退却？答称：从战时共产主义的荒谬行为退向较为合理的社会主义经营方式！我们对每一根针实行统计，企图把小理发店实行国有化，这种状态是无法维持的，这难道还不清楚么？

这样提问题是不正确的，是不符合列宁关于新经济政策问题的提法的。新经济政策并非简单地消除“战时共产主义”的过火行为。我们实行新经济政策，不是简单地消除了战时共产主义的极端性，不，我们做的不是这件事——我们从根本上改变了整个经济政策。我们根本不是从战时共产主义退向社会主义，而是退向无产阶级国家中的特殊的“国家资本主义”。

至于这一退却是绝对合理的和必要的，唯有它能引导我们经过若干年达到社会主义的稳固胜利，新经济政策就是**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是列宁所说的向社会主义的必要的“长期而复杂的过渡”，这些都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必要的退却**，**合理的退却**也是退却。

因此，认为新经济政策这一无可置疑的退却似乎根本不是退却，而只是某种象有趣的闲逛或沿着平坦的柏油马路的旅行之类的东西，只是顺利地、毫无痛苦地长入社会主义的方法，是没有危险的过程——把事情描绘成这样是不正确的。

列宁不止一次地指出我们在战时共产主义时代所犯的巨大错误。但他没有说过战时共产主义全是错误，相反地，他声明，整个说来它是我们的“一个功绩”，是由国内战争的整个局势造成的。并

^① 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42卷第183页。《新经济政策和政治教育委员会的任务》。——译者注

且向新经济政策过渡也不只是纠正战时共产主义，而是重大的经济上的退却。自然，如果现在设想一下，俄国革命能够“从头开始”，那末在我们的经济政策领域我们在许多地方就会采取另一种做法。在这种情况下，在何种程度上我们可以“直接”从新经济政策开始，现在来猜想这一点是毫无益处的。研究了俄国革命所走过的道路，我们现在应当清楚明确地跟着列宁说，新经济政策是个退却。

列宁知道，当我们党——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党——开始谈论退却的时候，“一部分人不免会在这个问题上陷于灰溜溜的、近乎惊慌失措的状态”。^①但是甚至在我们最艰难的时期，他也不怕使用“退却”这个词。对我们退到什么时候为止这些没完没了的问题，列宁不无讽刺地回答说：

“我们什么时候学会了，什么时候为扎实地转入进攻作好了准备，我们就什么时候停止退却。对这个问题不可能作出更多的回答。退却是非常不愉快的事，但是人家揍你的时候，是不管你愉快不愉快的。”

列宁一方面勇敢地引导革命前进，一方面补充说：“应该细心地研究具体的条件和情况，应该确定可以利用什么地形站住脚，——利用一条河、一座山、一片沼泽或某个车站？因为我们只有在可以利用某种地形站住脚时，才能转入进攻。不应当陷在颓丧情绪里。”^②

我们不必害怕退却，我们已夺得足够广阔的进攻基地，“我们占领了广阔的阵地，如果在1917年到1921年这段时期，我们没有为自己占领这些阵地，那么无论在地理上或经济上、政治上，我们都没有退却的余地。”^③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42卷第183页。《新经济政策和政治教育委员会的任务》。——译者注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42卷第239页。《论新经济政策》。——译者注

③ 《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9页。《论苏维埃共和国所处的国际和国内形势》。——译者注

“我们明白，正因为我们许多年来这样胜利地实行了进攻，获得了这么多不平常的胜利（而且是在一个遭到了难以置信的破坏和缺乏物质前提的国家里！），为了巩固这种进攻，我们在取得这么多的战果之后完全有必要实行退却。”①

俄国无产阶级从战时共产主义走向新经济政策的道路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

列宁说：“世界各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正在成熟，如果它不能把奋不顾身的斗争和进攻的本领同实行有革命秩序的退却的本领结合起来，它就无法完成自己的任务。我们斗争的第二个阶段的经验，即退却的经验，将来至少对某些国家的工人大概也是适用的，正如我国革命第一阶段的经验，即奋不顾身英勇进攻的经验，无疑适用于所有国家的工人一样。”②

* * *

在农民的俄国，无产阶级专政将具有自己的特点，这一点列宁自然是从一开始就知道的。俄共纲领（1919年）等等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1919年，在战时共产主义的顶点列宁写道：

“由于我国十分落后而且具有小资产阶级的性质，俄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必然有一些不同于先进国家的特点……”

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俄国经济表现为如下双方的斗争，一方面是在一个大国的全国范围内按共产主义原则联合劳动的最初步骤，另一方面是小商品生产，是保留下来的以及在小商品生产基础上复活着的资本主义。”③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86页。《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译者注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133页。《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闭幕词》。——译者注

③ 尼·列宁：《全集》第XVI卷第348页。《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写于1919年10月30日〔《列宁全集》第2版第37卷第264—269页〕。

列宁是怎么解释从战时共产主义向新经济政策过渡的必要性的呢？

列宁就此向共产国际所作的解释特别珍贵。正因为列宁是向全体国际无产阶级作解释，所以这些解释特别准确和清楚。在这种场合列宁是特别仔细地斟酌每一个字的。

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是在1921年夏召开的，恰好是在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时候。追踪刚刚开始实行的新经济政策的新鲜足迹，列宁向共产国际的这次代表大会作了关于俄共策略的报告。

“社会主义的任务是消灭阶级。站在剥削阶级队伍最前列的是大地主和工业资本家。”^①

我们在俄国容易地完成了消灭这一剥削阶级的任务。

“我们在俄国已经剥夺了剥削者——大地主和资本家。”^②“但是，除了剥削者阶级以外，一切资本主义国家——也许英国除外——几乎都存在着小生产者和小农阶级……对于他们，不能剥夺或驱逐，必须采取其他斗争方法。如果我们把国际革命看作一个统一的过程，从国际观点看来，现在在俄国开始的这个时期的意义实质上就是我们必须从实践上解决俄国无产阶级同最后一个资本主义阶级的关系问题。在理论上，一切马克思主义者已经很好地很容易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但理论和实践是两个不同的东西，从实际上解决这个问题和在理论上解决这个问题决不是一回事。”^③

新经济政策是同我们俄国现存两个基本阶级——无产阶级和农民的相互关系问题最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一个只有无产阶级和农民这两个阶级的国家，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出现。农民占人口的大多数。自然，农民是很落后的。在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42卷第42页。《关于俄共策略的报告》。——译者注

② 同上。

③ 《列宁全集》第2版第42卷第44页。——译者注

革命的发展中，掌握政权的无产阶级同农民的关系实际上是怎样表现的呢？……

“我们和农民结成了联盟。”^①

孟什维克原则上也不反对同农民联盟，但是孟什维克说：“农民占大多数，而我们是纯粹民主主义者，因此多数应当决定一切。但是农民既然不能独立，那实际上只是意味着**资本主义复辟**。”——列宁继续写道。

“但我们（布尔什维克。——格·季·）这样提，意思是加强和巩固无产阶级。”^②

我们同农民的联盟到现在为止是军事联盟（红军，国内战争）。但**“没有经济联盟，军事联盟就无法维持……没有经济基础，我们和农民的联盟就绝对不能长期维持”**。^③没有这个基础，我们反对资产阶级的战争就支持不下来。

“联盟初步的形式（工人阶级和农民的军事联盟。——格·季·）是很粗陋的，我们犯过很多很多错误。但是那时我们必须雷厉风行，必须绝对保证军队的供应。”^④等等。

国内战争之后任务不同了。现在无论如何要安排好在一个农民占多数的国家里的工人阶级和农民的经济联盟。

“如果国家的经济没有遭到七年连续不断的战争所造成的那样的破坏，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联盟也许能够比较容易地转到新的形式上去。可是，歉收、饲料缺乏等使国内本来就很严重的情况更加困难了。这使农民困苦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我们必须立即向广大农民群众表明，我们准备用革命的办法改变政策……

这样，我们在经济政策上作了改变。”^⑤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42卷第45页。——译者注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42卷第45页。——译者注

③ 同上，第46页。——译者注

④ 同上，第47页。——译者注

⑤ 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42卷第47页。——译者注

起初“俄国农民从革命中获得的好处肯定要比工人阶级多。这是毫无疑问的。从理论上讲，这自然表明我们的革命在某种程度上是资产阶级革命。当考茨基提出这个论据反对我们时，我们付之一笑。自然，如果不废除大土地占有制，不赶走大地主，不分配土地，那只能是资产阶级革命，而不是社会主义革命。然而，我们是唯一能够把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并为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创造有利条件的政党……一般说来，农民的境况已经有所好转，而深重的苦难则落到了工人阶级身上，这正是因为工人阶级实行自己的专政。”^①

“俄国无产阶级专政给统治阶级即无产阶级带来的牺牲和困苦在历史上是空前的。”^② 领导阶级应当承担这种苦难，否则它就不能实现自己的历史使命。

“有高度政治觉悟的人——甚至在他们中间也只有最优秀的分子——懂得，为了工人阶级专政，我们应当作出最大的努力，不惜任何代价来帮助农民。”^③

无产阶级是革命的领导者。但是正因为如此，它必须懂得“没有农民群众，不和农民群众建立良好的关系，我们就不能存在”。

之所以采取新经济政策，是因为要不惜代价地在新的经济政策的基础上加强同农民的“良好的关系”。这要求向农民作让步，迅速而坚决的让步。

“这一点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理解的，但是，在这个先锋队里还有人不能理解，他们由于疲劳过度而不能理解这一点。他们认为这样做是错误的，还用上了机会主义这个字眼……农民是剥削我们的，他们要什么有什么，而工人却饿着肚子。

难道这就是机会主义吗？我们帮助农民，是因为不和他们结成联盟就不可能有无产阶级政权，就谈不上保持政权。在我们看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42卷第48—49页。——译者注

② 同上，第48页。——译者注

③ 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42卷第49页。——译者注

来，起决定作用的动机是考虑怎样才有利于达到目的”。①（着重号是我加的。——格·季·）

在结束的时候，列宁对整个共产国际说：

“不言而喻，实物税意味着贸易自由。……这种交换自由意味着资本主义的自由。我们公开说出这一点，并且着重指出这一点。我们决不掩饰。……”

贸易自由就是资本主义自由，然而这是资本主义的一种新的形式……这就是国家资本主义。但在政权属于资本的社会里的国家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国家里的国家资本主义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着重号是我加的。——格·季·）。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所谓国家资本主义，就是资本主义得到国家的认可并受国家的监督，从而有利于资产阶级而不利于无产阶级。在无产阶级国家里，做法相同，但是这有利于工人阶级。”②（1921年7月5日）。

这就是列宁根据事变的新痕迹确定的从战时共产主义向新经济政策过渡的原因。他就是这样确定新经济政策的社会经济实质的。

新经济政策，这是无产阶级国家里的国家资本主义。

“由于我国文化落后，我们不能用正面攻击来消灭资本主义。如果我们的文化是另一种水平，那就可以比较直截了当地解决这项任务了。也许其他国家到了建设它们的共产主义共和国的时候会这样来解决这项任务。但是我们不能用直截了当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③——在新经济政策开始之时列宁是这样说的。（1921年10月。）

“新经济政策就是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就是在很大程度上转而恢复资本主义……农民在全国人口和整个经济中占极大的

① 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42卷第49页。——译者注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42卷第50页。——译者注

③ 《列宁全集》第2版第42卷第193—194页。《新经济政策和政治教育委员会的任务》。——译者注

比重，因此在这种自由贸易的土壤上不可能不滋长资本主义。

这是经济学初级读本教给我们的最基本的经济常识。”^①

任务在于“把资本主义纳入国家轨道，建立起一种受国家领导并为国家服务的资本主义。”^②

1922年11月，列宁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世界代表大会上再次向国际无产阶级解释了新经济政策的原因和实质，这时新经济政策的轮廓已经更加清楚，已为评价新经济政策积累了某些实际经验。

这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向世界无产阶级代表所作的最后一个公开报告，也是他不祥地患病之前所作的最后的报告之一，在这个报告里，列宁再次回过头来谈起新经济政策产生的历史。他说，我们胜利地进行了国内战争，但是“当我们度过了，而且是胜利地度过了国内战争的最重要阶段以后，我们就遇到了苏维埃俄国内部很大的——我认为最大的——政治危机，这个内部危机不仅暴露了相当大的一部分农民的不满，而且也暴露了工人的不满。当时广大的农民群众不是自觉地而是本能地在情绪上反对我们，这在苏维埃俄国的历史上是第一次，我希望也是最后一次。”^③

总之，一次又一次地把产生新经济政策的原因归之于**农民问题**，归之于在应以经济基础上的联盟取代军事联盟的时期工人阶级同农民的相互关系问题。

要想懂得新经济政策产生的原因，那就细想一想工人阶级和农民的相互关系问题，这是我们整个革命的基本问题。理解新经济政策产生的关键要到工人阶级和农民的相互关系领域去找。

列宁继续说：“这种特殊的、对于我们自然也是极不愉快的情况是由什么引起的呢？”

他回答说：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42卷第184—185页。——译者注

② 同上，第186页。——译者注

③ 《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277页。《俄国革命的五年和世界革命的前途》。——译者注

“是因为我们在经济进攻中前进得太远了，我们没有给自己留下足够的基地；群众已经感到的，我们当时还不能自觉地表述出来，但是过了几个星期，我们很快就认识到了，这就是：**向纯社会主义形式和纯社会主义分配直接过渡，是我们力所不及的，如果我们不能实行退却，即把任务限制在较容易完成的范围内，那我们就有灭亡的危险。**”^①（着重号是我加的。——格·季·）

因此，当有人问我们，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时候我们是“从哪儿”退却，我们用列宁的话回答说：“我们是从向纯社会主义形式和纯社会主义的分配直接过渡上退却。”如果问我们，我们“往哪儿”退却，我们用列宁的话回答说：“往无产阶级国家的国家资本主义退却。”如果问我们，我们“为什么”退却，我们用列宁的话回答说：“因为我国的工业基础不够强大”，因为我国的绝大多数居民是农民，因为“没有农民群众，不和农民群众建立良好的关系，我们就不能存在”——特别是在世界革命延迟的情况下。

列宁在《论黄金在目前和在社会主义完全胜利后的作用》这篇出色的文章中是这样说明这一点的：“我们已经退到了国家资本主义。但我们退得适度。现在我们正退到由国家调节商业。但我们会退得适度的。”^②

如果问我们，新经济政策达到自己的目的没有，我们就用列宁的话回答说（还是1922年11月13日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是的，达到了。“在1921年以前，农民暴动可以说是俄国的普遍现象，而今天差不多完全没有了……我们认为，这些证据比任何统计数字的证据都重要。”^③

而现在（1925年）我们可以补充说：是的，新经济政策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因为1. 我们的工业在迅速接近战前水平，2. 运输业同样如此，3. 货币坚实了，4. 工资在增长，5. 农业在提高，6. 社会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277—278页。——译者注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42卷第252页。——译者注

③ 《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280页。——译者注

主义经济成份在增长。

新经济政策的起源，它的根源，它的基本原因首先是在我们本国无产阶级和农民的相互关系领域。

在国内战争结束之后的新阶段巩固工人阶级和农民这两个革命的基本阶级的联盟；在满足广大农民群众要求的牢固的经济基础上巩固这一联盟，这就是新经济政策的真正任务。

新经济政策的根本，这就是农民问题。

* * *

新经济政策是退向国家资本主义，这不是说我们重新退回到已走过的道路上去。在俄国事情并不是我们有了国家资本主义，从国家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制度，然后重新回到国家资本主义。情况是这样，十月前的俄国，同农奴制的和私人资本主义的基础并存的是微弱的国家资本主义成分，我们曾企图从十月前的俄国直接走向社会主义，后来不得不后退，以便通过由无产阶级国家控制的国家资本主义，开始稳固地向社会主义过渡。

我们是社会主义共和国（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在这种情况下是否可以说，在我们的社会结构中国家资本主义起着巨大的作用？可以，也应当这么说。

“看来，还没有一个专心研究俄国经济问题的人否认过这种经济的过渡性质。看来，也没有一个共产主义者否认过‘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这个名称是表明苏维埃政权有决心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而决不是表明现在的经济制度就是社会主义制度。”^①

在谈到国家资本主义的时候，列宁经常重提自己1918年春写的文章，还提及工人阶级夺取政权之前在克伦斯基政制下他关于国家资本主义问题的提法，这同他在1921年的提法是大体相同的。

早在《大难临头》（1917年9月）中列宁写道：“社会主义无非是从国家资本主义垄断再向前跨进一步。换句话说，社会主义无非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41卷第196页。《论粮食税》。——译者注

是变得有利于全体人民的国家资本主义垄断，就这一点来说，国家资本主义垄断也就不再是资本主义垄断了。”^①

提醒一下，列宁在其最后著作《论合作社》中写道：

“每当我写到新经济政策问题时，我总要引我1919年（1918年。——格·季·）那篇论国家资本主义的文章。这曾不止一次地使某些青年同志产生疑问。但他们的疑问主要是在抽象的政治方面。他们觉得，生产资料属于工人阶级，国家政权也属于这工人阶级，这样的制度就不能叫作国家资本主义。”^②

列宁解释说，“在帮助读者认识新经济政策时”，他力求“判明普通的国家资本主义同”我们苏维埃国家所实行的“那种特别的、甚至非常特别的国家资本主义之间的继承性的联系。”“那时我就已证明过，国家资本主义要高于我国当前的经济。”

这样，从《大难临头》（1917年）到最后的文章《论合作社》（1923年）在列宁的著作中贯穿着关于国家资本主义原理的红线。

列宁在关于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的报告中（1918年4月）问道：“什么是苏维埃政权下的国家资本主义？”接着回答说：

“在目前实现国家资本主义，就是实行资本家阶级曾经实行的计算和监督。德国的国家资本主义就是一个样板。我们知道德国比我们高明。只要稍微想一想，在俄国，在苏维埃俄国，确立这种国家资本主义的基础将意味着什么，那么任何一个没有丧失理智、没有被书本上的只言片语塞满头脑的人都一定会说，国家资本主义是我们的救星。……如果我们俄国有了国家资本主义，那么过渡到完全的社会主义就会容易，就会有把握，因为国家资本主义是集中的，有计算和监督的，社会化的，而我们正好缺少这些……我想提醒你们：我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言论是在革命前一些时候写的……我的这些话当时说的是革命民主国家，克伦斯基、切尔诺夫、策烈铁里、基什金及其同伙的国家。……当时我说，国家资本主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32卷第217页。——译者注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363页。——译者注

义是走向社会主义的一个步骤。我说这话是在1917年9月，而现在，在1918年4月，无产阶级已经在10月夺取了政权。”^①

当时反对列宁主义关于苏维埃制度下国家资本主义的意义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为理解这一点有必要看看“左派”共产主义者1918年所写的反对国家资本主义的文章。我们指的是发表在“左派”共产主义者的机关刊物《共产主义者》杂志上的文章。^②

1918年那个时期列宁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说法被“左派”共产主义者看作是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公然背叛。

“共产党的多数及其领导的苏维埃政权极有可能形成倒向新型小资产阶级政策轨道的倾向。”

据说列宁的政策使得我们的革命开始“冻结在国家资本主义和小资产阶级关系的制度上”。

这种政策“给自己提出的任务不是同西欧无产阶级结成联盟为推翻帝国主义制度而进行无产阶级的斗争，而是保卫农场主的(!!)祖国免于帝国主义的重担，而这是可以通过同它的妥协达到的。”

这一政策只能“是通向金融资本统治的过渡阶段”。

“这不仅意味着架设通往国家资本主义的桥梁，并且也是在知识分子中间保持他们同金融资本在物质上和心理上的联系。”

在继续执行这种政策的情况下，苏维埃政权“将不得不依靠其他阶级(例如农民)去反对工人，从而危害无产阶级专政自身。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劳动组织将由无产阶级自己去建成，或者它们根本就建不成，而将建成某种别的东西——国家资本主义。”

“签订布列斯特和约之后，在俄国无产阶级面前有两条道路。一条道路通向苏维埃政权的小资产阶级蜕化和国家资本主义，另

① 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236—237页。《关于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的报告》。——译者注

② 建议仔细研究一下该杂志上的下列文章：1.《关于时局的提纲》，2.《论社会主义建设》(奥新斯基同志的文章)，3.《直率的回答》(同上)，4.《经济札记》。

一条道路是通过建设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保持无产阶级专政并巩固其基础。”

“或者，或者……或者你们退回到在清除和摆脱了农奴制的新形式下的资产阶级建设。这也是一种出路……或者你们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所有这些出色的议论以建立另一个“无产阶级共产主义”政党的威胁和“看情况而定”（确实如此！）宽宏大量地同意支持苏维埃政权告终。

这就是“左派”共产主义者反对列宁关于苏维埃制度下的国家资本主义的提法的最初的“纯贞的”立场。

列宁猛烈抨击了“左派”共产主义者，指责他们“忘记了一件小事情：在俄国存在着一个人数众多的小资产阶级，它赞成消灭一切国家的大资产阶级，但不赞成实行计算、社会化和监督”。^①

列宁说，在苏维埃政权下国家资本主义是直接通向社会主义的阶梯，是 $\frac{3}{4}$ 的社会主义。

“国家资本主义在克伦斯基的民主制度下可以是走向社会主义的一个步骤，而在苏维埃政权下则会是 $\frac{3}{4}$ 的社会主义。”

他接着指出：“只有发展国家资本主义，只有精心做好计算和监督工作，只有建立起最严密的组织和劳动纪律，我们才能达到社会主义。否则，就不会有社会主义。”^②

从这个观点提出国家资本主义问题，列宁根本不是出于要影响我们这一批或那一批工作人员的临时考虑（即“教育的”考虑），而是出于对他不得不与之打交道的那个国家的经济所作的深刻分析。顺便说说，列宁的伟大就在于，象一个杰出的雕塑家使用他的粘土那样，他善于控制他直接从事活动的那个国家那个时期的各种经济成分。当我国工人阶级夺得了政权，当资产阶级政治上被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237页。《关于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的报告》。——译者注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237、239页。——译者注

推翻，经济上被剥夺，当草草地完成这一准备工作，为着手社会主义建设扫清了道路，这时候列宁特别深刻地考虑了一个无产阶级从此作为统治阶级从事活动的国家的经济结构。资产阶级被推翻了，被剥夺了，政治上被镇压下去了；无产阶级执掌了政权；政治上的胜利是巨大的，卢比孔河已越过，^①新的时代已开始。但是所有伟大的胜利都没有使得列宁看不到下列事实，由于各种情况的凑合，无产阶级首次夺得政权的国家其经济是非常落后的。列宁用显微镜非常仔细地观察了俄国的经济结构，这个俄国现在摆脱了资本家的统治，在这个意义上是大大地向前跃进了一步，但它的经济目前仍然是旧的，落后的。列宁通过马克思主义的显微镜观察了这种经济，得出结论说，在我们获得的摆脱了资本主义无上权力的俄国，拥有数种，而不是一种经济成分。

列宁写道：“俄国现有各种社会经济结构成分究竟是怎样的。问题的全部关键就在这里。”

“在这个制度内既有资本主义的也有社会主义的成分、部分和因素……现在我们把这些成分列举如下。”——列宁说。他列举说：

- “（1）宗法式的，即在很大程度上属于自然经济的农民经济；
- （2）小商品生产（这里包括大多数出卖粮食的农民）；
- （3）私人资本主义；
- （4）国家资本主义；
- （5）社会主义。

俄国幅员如此辽阔，情况如此复杂，社会经济结构中的所有这些不同的类型都互相错综地交织在一起。特点就在这里。

试问，占优势的是哪些成分呢？显然，在一个小农国家内，占优势而且不能不占优势的是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在这里不是国家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作斗争，而是小资产阶级和私人资本主

^① 古罗马凯撒不顾禁令，越过卢比孔河，引起内战，结果建立罗马帝国。这一典故被用来表示破釜沉舟，无可转圜。——译者注

义合在一起，既同国家资本主义又同社会主义作斗争。”①

对在苏维埃俄国交织在一起的这些不同的社会经济结构成分的分类，列宁曾不止一次地重复过，其中包括我们在上面提到过的在共产国际历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也重复过。

“看一下俄罗斯联邦的地图吧。在沃洛格达以北、顿河畔罗斯托夫及萨拉托夫东南、奥伦堡和鄂木斯克以南、托木斯克以北有一片片一望无际的空旷地带，可以容下几十个文明大国。然而主宰这一片片空旷地带的却是宗法制度、半野蛮状态和十足的野蛮状态。那么在俄国所有其余的穷乡僻壤又是怎样的呢？乡村同铁路，即同那些连结文明、连结资本主义、连结大工业、连结大城市的物质脉络往往相隔几十俄里，而只有羊肠小道可通，确切些说，是无路可通。到处都是这样。这些地方不也是到处都是宗法制度、奥勃洛摩夫精神和半野蛮状态占优势吗？……”

在最近这几年，必须善于考虑那些便于从宗法制度、从小生产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中间环节。‘我们’直到现在还常常爱这样议论：‘资本主义是祸害，社会主义是幸福。’但这种议论是不正确的，因为它忘记了现存的各种社会经济结构的总和，而只从中抽出了两种结构来看。

同社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是祸害。但同中世纪制度、同小生产、同小生产者涣散性引起的官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则是幸福。既然我们还不能实现从小生产到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所以作为小生产和交换的自发产物的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应该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要把它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②

新经济政策是小生产者的私人利益同在国内占统治地位的无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275—276页。《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译者注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41卷第216—217页。《论粮食税》。——译者注

产阶级的国家利益的正确(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观点看)结合。

列宁说,“现在我们发现了私人利益、私人买卖的利益与国家
对这种利益的检查监督相结合的合适程度,发现了使私人利益服
从共同利益的合适程度,而这是过去许许多多社会主义者碰到的
绊脚石。”①

我们现在发现了……我们发现了什么?我们从新经济政策那
儿发现了仍然处于资产阶级包围之中的**农民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
具体道路。**

对此我们“只”要增加一项需要很多很多时间的文化变革。

“为了通过新经济政策使全体居民人人参加合作社,这就需要
整整一个历史时代。在最好的情况下,我们度过这个时代也要一
二十年。”②(着重号是我加的。——格·季·)

“新经济政策是一种进步,因为它适合最普通的农民的水平,
它没有向他们提出什么更高的要求。”③

**新经济政策是作为小生产者群众的农民群众(“小农和极小
农”)的私人利益同组织社会主义生产的无产阶级的国家利益的正
确结合。**

* * *

必须把我们的国家资本主义,第一,同一般国家资本主义(同
资产阶级国家的国家资本主义)区别开来,其次,同私人经济的资
本主义区别开来。我们的国家资本主义同前者的区别在于,这是
在**无产阶级国家监督下的国家资本主义**。它同后者的区别也就是
国家资本主义同私人资本主义的一般区别。

一般资本主义(或者就是资本主义)在我国首先是从农民经济
中生长出来的。

还在实行新经济政策之前列宁就说过:“农民在自己的生产中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360页。《论合作社》。——译者注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362页。《论合作社》。——译者注

③ 同上,第362页。——译者注

仍然是私有者，他们还在产生新的资本主义关系。这就是我国经济状况的基本特征。”①（着重号是我加的。——格·季·）

“它（‘新的资产阶级’。——格·季·）不仅从我们苏维埃的职员中间产生出来（从这里也能产生极少的一部分），它还从……农民和手工业者中间产生出来（着重号是我加的。——格·季·）。这是事实。你们想用什么方法来回避这一事实呢？你们这样做只能沉溺在自己的幻想中，或是把不周密的书本知识套用于复杂得多的现实。现实向我们证明，甚至在俄国，也同任何资本主义社会一样，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还活着，起着作用，发展着，产生着资产阶级。”②（着重号是我加的。——格·季·）

这是1919年（即在战时共产主义极盛之时）列宁在俄共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关于党纲问题的总结发言中说的，恰恰是为反对“左派”共产主义思想残余而说的，“左派”共产主义“否定”列宁关于无产阶级国家中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观点。

在这一点上列宁在俄共第八次代表大会上论证党的纲领的整个报告是极端重要的。这是真正的纲领性报告。当时有些同志不认为有必要在俄共新纲领中保留1903年旧纲领中论及资本主义发展特点的那一部分，列宁在同这些同志争论时说：

“用制定漂亮完整的党纲的办法来跳出这个可悲的现实，就等于跳到九霄云外……1903年所描写的那个资本主义，正好由于帝国主义的瓦解和破产，还继续存在于1919年的苏维埃无产阶级共和国。例如在离莫斯科不很远的萨马拉省和维亚特卡省就可找到这样的资本主义……”

既然马克思说，工场手工业是普遍的小生产的上层建筑，那么帝国主义和金融资本主义便是旧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这个上层一破坏，旧资本主义就会暴露出来……

① 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38卷第332页。《在全俄工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译者注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36卷第161页。——译者注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当帝国主义遭到破坏的时候，就会看到顶部破坏，根基则暴露出来……存在着旧资本主义，它在许多部门中成长到了帝国主义……在现实中，还存在着旧资本主义这一极深厚的基础。帝国主义这个上层建筑是有的，它引起了战争，而这次战争的一个结果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开始。要想跳出这个阶段是办不到的。这个事实说明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将以何种速度发展，并且这个事实在许多年内仍将是事实。”①

语句不多，内容丰富。确实是在几行字里我们看到了关于一般帝国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同时也看到了无产阶级夺得政权后的俄国经济中的最本质的东西。在离莫斯科不很远的萨马拉省和维亚特卡省，在1919年，即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两年之后，你们找得到资本主义。这是在战时共产主义极盛之时说的。在1921年，从实行新经济政策之时起，列宁有更多的理由这么说了。

这样，就是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尽管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在不断发展，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却首先以个体的农民经济为基础，仍然活着、起着作用、发展着并产生着资产阶级。只要我们还不能从根本上来在集体制基础上改造农民经济，就不可能改变这种状况。而要改造农民经济，首先需要许许多多，需要实现电气化纲领，即需要大大提高大工业，需要使每一个农民都合作化，需要扫除文盲，等等，等等。现在我们已卓有成效地开始这样做了，我们要毫不动摇地做到底。但目前仅仅是开始。

国家资本主义是从私人资本主义通向社会主义的一个站，一个阶段。

“苏维埃政权怎样把资本主义的发展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苏维埃政权怎样‘培植’国家资本主义，可以说明这一点的最简单的事例，就是租让制……苏维埃政权‘培植’租让制这种国家资本主义，就是加强大生产来反对小生产，加强先进生产来反对落后生产，加强机器生产来反对手工生产，增加可由自己支配的大工业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36卷第139—141页。《关于党纲的报告》。——译者注

产品的数量(即提成),加强由国家调整的经济关系来对抗小资产阶级无政府状态的经济关系。”^①

从经济关系的观点看,到底什么是租让制呢?这就是国家资本主义。

列宁(在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关于粮食税的报告中)说,租让制具有同外国资本主义“联盟的形式”,这种联盟的形式归根到底是有利于我国无产阶级的,即有利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左派”共产主义者一开始就因列宁这种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罪恶”思想而向列宁宣战,他们把“联盟的形式”看作直接的政治联盟,看作对外国资本的投降。请回想一下,1918年初,在谈到美舍尔斯基租让企业时,“左派”共产主义首领就曾直接公开地指责列宁把无产阶级革命出卖给大资本家。

这样,从经济关系的观点看,租让制乃是国家资本主义。

“租让制这种国家资本主义,和苏维埃体系内其他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比较起来,大概是最简单、明显、清楚和一目了然的形式……”^②

列宁把合作制当作苏维埃国家里国家资本主义的第二种例子。

“合作社也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一种形式,但它却不那样简单,不那样明显和一目了然,而比较复杂。”^③

“在苏维埃政权下,‘合作制’资本主义和私人资本主义不同,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一个变种……从便于计算、监督、监察以及便于推行国家(这里指苏维埃国家)和资本家之间的全国关系说来,合作制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相类似。合作社这一商业形式比私营商业有利,有好处,不仅是由于上述一些原因,而且是由于合作社便于把千百万居民以至全体居民联合起来,组织起来,而这种情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41卷第211—212页。《论粮食税》。——译者注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41卷第213页。《论粮食税》。——译者注

③ 《列宁全集》第2版第41卷第213页。——译者注

况，从国家资本主义进一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观点来看，又是一大优点。”^①

下面我们将谈谈列宁逝世前所写的论合作社的最后一篇文章，并证明这最后的著作只不过是刚刚引述的列宁观点的发展，我们上面引用的《论粮食税》的小册子（1921年）和《日记摘录》中关于合作社的论述（1923年）基本上是属于同一条逻辑链条的。

列宁继续说：“再拿国家资本主义的第三种形式来说。国家把作为商人的资本家吸引过来，付给他们一定的佣金，由他们来销售国家的产品和收购小生产者的产品。

第四种形式就是：国家把国有的企业或油田、林区、土地等租给企业资本家，而且租赁合同与租让合同极为相似。”^②

“结果怎样呢？”1921年底，在新经济政策试行了半年之后列宁问道。“结果，……商品交换失败了。所谓失败，就是说它变成了商品买卖……我们应当认识到，我们还退得不够，必须再退，再后退，从国家资本主义转到国家调节买卖和货币流通。商品交换没有丝毫结果，私人市场比我们强大，通常的买卖、贸易代替了商品交换。你们要努力适应这种情况，否则买卖的自发势力、货币流通的自发势力会把你们卷走的！……现在我们处于必须再后退一些的境地，不仅要退到国家资本主义上去，而且要退到由国家来调节商业和货币流通。这条道路比我们预料的要长，但是只有经过这条道路我们才能恢复经济生活。”^③

谁要是到现在还没有完全领会列宁关于我国国家资本主义的论述，请他考虑一下上面所引的列宁的话吧。

例如毫无疑问，我们切尔文卢布的稳定以及所实行的整个币制改革的成果不仅对我国革命具有巨大的意义，并且也成为无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41卷第214页。——译者注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41卷第215页。《论粮食税》。——译者注

③ 《列宁全集》第2版第42卷第228—229页。《1921年10月29日在莫斯科省第七次党代表会议上的报告》。——译者注

产阶级专政巩固性的最好标志。我们大家都为苏联切尔文在外国交易所流通而骄傲。我们知道，没有坚硬的，真正坚硬的货币，就谈不上稳定地提高我们的经济。但是难道切尔文意味着社会主义？难道我们良好的、坚硬的苏联切尔文不正是无产阶级国家——在建设社会主义，但尚未建成社会主义的国家中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表现？

“我们俄国无产阶级在政治制度方面，在工人政权的力量方面，比不管什么英国或德国都要**先进**，但在组织象样的国家资本主义方面，在文明程度方面，在从物质和生产上‘实施’社会主义的准备程度方面，却比西欧最落后的国家还要**落后**。”^①

在同一篇文章里列宁说，“没有建筑在现代科学最新成就基础上的大资本主义技术……社会主义就无从设想”。他提醒说，历史“到1918年竟产生出分成了两半的社会主义，两者紧挨着，正如在国际帝国主义一个蛋壳中两只未来的鸡雏。德国和俄国在1918年最明显地分别体现了具体实现社会主义的两方面的条件：一方面是经济、生产、社会经济条件，另一方面是政治条件。”^②

列宁不懈地解释，树立关于无产阶级国家中的国家资本主义的正确观点对布尔什维主义具有何等巨大的意义。

在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的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这是列宁所作的最后一次政治报告）中，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

“在国家资本主义问题上，我们的报刊和我们的党都犯了一个错误，就是染上了知识分子习气，堕入了自由主义，自作聪明地来理解国家资本主义，并且去翻看旧本本……连马克思也没有想到要就这个问题写下片言只语，他没有留下任何明确的可供引用的文字和无可反驳的指示就去世了。……国家资本主义，就是我们能够加以限制、能够规定其范围的资本主义，这种国家资本主义是同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285页。《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译者注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279—280页。

国家联系着的，而国家就是工人，就是工人的先进部分，就是先锋队，就是我们。国家资本主义是我们应当将之纳入一定范围的资本主义，但是直到现在我们还缺少本领把它纳入这些范围。全部问题就在这里。”^①

列宁在该报告的结论中反驳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说：

“首先谈谈国家资本主义问题。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说：‘国家资本主义就是资本主义，只能这样理解并且应该这样理解。’我敢肯定，这是一种经院式的论断。直到现在还没有人能写出一本论述人类历史上的这种资本主义的书籍，因为我们现在才第一次经历这种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这是一种非常意外的、谁都绝对预见不到的资本主义，因为谁也无法预见到，无产阶级竟会在一个属于最不发达之列的国家中取得政权；它起初试图为农民组织大规模的生产和分配，后来由于文化条件所限，无力完成这个任务，不得不采用资本主义……关于国家资本主义，需要了解，什么应当成为宣传鼓动的口号，什么必须讲解清楚，使大家都能实际理解。这就是我们现在的国家资本主义并非德国人论述过的国家资本主义。这是经我们容许的资本主义。”^②

可惜，我们这儿至今有人在国家资本主义问题上喜欢把事情描绘成这样：似乎这些话列宁是顺嘴说出来的，并且是“不妥当的”，似乎在这一问题上我们必须比列宁“左一些”，等等。

看到吗，“国家资本主义”，这听起来不那么值得“骄傲”！但是他们忘记了列宁在莫斯科苏维埃会议上所作的最后一次报告——他的天鹅之歌——中的最后一语：我们将把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

“新经济政策的俄国”——要知道，这听起来大概也不那么值得“骄傲”！“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在哪一点上比“无产阶级国家中的国家资本主义”好听一些呢？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83—84页。——译者注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114—116页。——译者注

我们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成份在成长并且将更快地成长。但是我们国家还只是如列宁向我们嘱咐的那样：应当由新经济政策的国家变成社会主义的国家？为了使自己，也号召别人把全部生命投入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难道需要制造下列幻想来欺骗自己，似乎我国已没有国家资本主义（及一般资本主义），到处都是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

这种“政策”只会带来害处。如果我们现在在周围看见的就是社会主义，那末工人会说，你们这社会主义不是高质量的社会主义。而他是错的。

幻想的政策还从来没有给工人阶级和无产阶级政党带来过好处。正是在我们目前这建设阶段，正在达到实际成就，但只是花了极大的努力才达到这成就的时候，粉饰现实会带来特别大的危害。在我们现代国家托拉斯中，在它们的业务活动中，在它们的工作制度中，在它们的周围等等，甚至在我们的现代合作社中难道没有资本主义成分吗？难道工人、农民、人民没有看到，没有感觉到这一点？如果我们把这就是社会主义的甜蜜语句奉献给工人，难道他们感觉不出这全部谎言。

在农业中尤其是这样。在无产阶级夺得政权之后，我们曾预期对农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虽然会是缓慢的，但将可靠地向前发展。现在我们看到，在这方面事情的进展比任何一位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所设想的还要慢。从《大难临头》和《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开始，列宁主义已经准备好一系列措施，以便在无产阶级夺得政权之后尽可能坚决地制止农业的资本主义演进，把我国农业的发展纳入社会主义轨道。政权转归无产阶级后我们通过的土地社会化法令，俄共第八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我党纲领中的相应条文，说的都是这回事。而事态的进程实际上也是这样，从1921年起我们不得不实行新经济政策，如我们上面已看到的，这首先就是对作为小生产者农民所作的让步。而结果出现了这样的事，为了发展农村的生产力，1925年我们甚至不得不向上层农民

再作补充让步(租赁土地,在农业中采用雇佣劳动),——只是通过迂回的道路缓慢但可靠地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必须尽一切可能使农业从资本主义演进的道路转向非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这是绝对正确的。在有利的条件下无产阶级能做到这一点,这也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正当我们不得不向农业中的资本主义成份作补充让步的时候,当我们还刚刚开始通过农村的经济工作从后方“迂回”农业资本家的时候,当雇农在数量上急剧增长的时候,是不能庆祝农业中非资本主义演进的虚构的胜利的!不应忘记,在我们这种国家里,资本主义首先是从农民发展起来的(见上引列宁的言论)!不能闭眼不看列宁关于我们苏维埃国家中的国家资本主义的意义所说的那些话!通过合作社,通过已开始的工业的高涨,我们无疑能够改造农村,为社会主义夺得农村。但是不能把愿望,把未来的东西当作现实的东西。

列宁在最卓越的著作之一(《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革命中的土地纲领》)中同孟什维主义争论时写道:

“他(普列汉诺夫。——格·季·)把民粹主义,即认为可能有非资本主义演进道路的学说,同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农业演进可能有两种形式的观点混为一谈了。”^①

资本主义演进的两种形式是:1.自由派孟什维克的同地主勾结的纲领(赎买、市有化)和2.布尔什维克的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平民革命的纲领(不赎买的没收,土地国有化,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列宁把“可能非资本主义演进的学说”叫做民粹主义。

这就是用于1905年革命的估计。

实际结果怎样呢?在主要方面列宁是正确的。

1917年十月革命之后,估计当然变了。

① 《列宁全集》第13卷第307页。——译者注

在何种意义上？

从1905年到1917年农村的资本主义发展(资本主义演进)加强了。1917年的两次革命打倒了地主，“划分了”土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进行到底了。政权转入了无产阶级之手。这时候，也只有这时候才谈得上制止农村的资本主义演进，由胜利的无产阶级采取一系列措施认真地尝试把这种演进纳入另一种轨道。1917—1921年的历史表明，事情决不是轻而易举的。不得不改行新经济政策，它首先是对农民的让步。我们1925年的农民政策是进一步使社会主义政策的任务适应于“小农和极小农”的生产条件的一个尝试。我们坚决相信，在这条道路上，我们定能制止农村的资本主义演进，并将把它纳入另一种轨道，即社会主义的轨道。但是“定能制止”和“将纳入”还不是“已经制止”和“已经纳入”。我们记得，1917年以前农村的资本主义演进是开足马力前进的。我们没有忘记，1917年后过了5年（和更多的时间）列宁还在提醒我们，在我们这里资本主义还继续从个体农民经济中发展起来。不能在现代农村中只看见阶级斗争。但是也不能在那里只看见长入社会主义。为了从整体上看清整个过程，应当两者都看到：既看到社会主义的萌芽（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土地国有化，合作社），也看到农村在分化基础上的阶级斗争。取胜的将是社会主义。

新经济政策是“殊死的斗争”——列宁不止一次地这样说过。新经济政策是我国经济中资本主义成分同社会主义成分之间的激烈斗争。目前我们的现状是社会主义经济成分有重大增长，同时资本主义成分也有绝对（虽然不是相对）增长。不言而喻，这已经是非常非常不错的了。过不多久前者将开始以比迄今为止更快的速度超过后者。不久，后者将开始无可挽回地被抛在后面。最终结局将有利于社会主义。不久电气化工作将处于前列，不久将可以开始利用大工业这匹“高头大马”（沃尔霍夫河工程等等）。而在这以前不要幻想，不要自我欺骗！国家资本主义就叫做国家资本主义。在俄共第十一次代表大会（1922年）通过的由列宁起草的决

议《工会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的作用和任务》中我们看到有专门的一节（第二节），其标题是“无产阶级国家中的国家资本主义和工会”。这是党代表大会的决议。在国家资本主义问题上完全坚持列宁的观点，这就是说，号召无产阶级先锋队以不懈的工作使带有不断发展的社会主义成分的国家资本主义变为真正的社会主义，就是说唤起它的警惕性，就是说引导它从低级走向高级。在这一问题上“否定”列宁的观点，在这一问题上“左于”列宁，就等于犯错误，等于寻找意识形态的“枕头”，以求睡得似乎“松软”一些。当托洛茨基说新经济政策大概仅仅是一种计算方法，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采用资本主义会计方法，他实际上是在抹煞新经济政策中危险的一面，而这种危险是存在的，应当看到这种危险以便排除它。^①

① 托洛茨基在向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所作的报告中说：“对于这个名词（即“国家资本主义”这个名词。——格·季·）我既不认为是准确的，也不认为是可喜的。”

“……如果这就是‘国家资本主义’，那末它应放在大于这一名词本身的大括号之中。”（列·托洛茨基《共产国际的五年》第478—479页）

列宁不认为当时开始同托洛茨基展开论战是合适的，但是当时在第四次代表大会工作的领导小组所有成员无疑记得，列宁对托洛茨基的这些说法极为不满。

“社会主义，这就是统计。在新经济政策下仅仅是（L）统计的形式不同了，和我们在战时共产主义下试图采用的，而在全面开展的社会主义下得到最完备表现的形式不同了。”不久前托洛茨基还这么写道（《真理报》1925年9月1日）。这是犯了同样的错误。新经济政策决不“仅仅”是另一种统计形式。这不是列宁主义。

第十二章

列宁主义和新经济政策。 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

新经济政策是我国经济中资本主义成分和社会主义成分之间的斗争(表面上是比较和平的斗争)——无产阶级国家力求调节这种斗争,但在目前阶段它还不_想也不_{应当}取消这种斗争。在过渡时期经济不同成分这种“和平的和_不流血的”斗争“背后”进行着不停息的直接的阶级斗争。

1921年召开的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开始了新经济政策,列宁在代表大会上说:“而现在我国有没有阶级呢?有。在我国有没有阶级斗争呢?斗争得非常激烈!”^①

是的,应当坦率地说出这一点:在我们苏维埃国家目前还进行着不停息的阶级斗争。列宁把“文化工作”看作整个时代的任务。但是,列宁在实行新经济政策之前,特别是在实行之后曾解释说,无产阶级专政不仅不排除,而且是以继续阶级斗争为前提的,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阶级斗争只是以另一种形式继续进行。

在这方面列宁打算写的著作《论无产阶级专政问题的某些方面》初稿是极有意思的。

这一初稿到1925年夏才在《列宁文集》第三卷上发表。象经常在列宁那儿看到的那样,这手稿是极其完备的整体。该初稿具有巨大的理论价值。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41卷第48页。《关于工会问题的讲话》。——译者注

“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在新形式下的继续。”——列宁写道并接着说：“关键就在这里，这一点他们不了解”。①

可惜，恰恰是这一点至今还没有被了解。不了解这一点的人们中间有的时至公元 1925 年夏还在郑重其事地证明，在现代俄国农村再没有富农了，有的证明，农村的“积累”好象将通过无垢受胎的办法实现，等等。

“国家只=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工具。一根特殊的棍棒，rien de plus! (如此而已。——格·季·)。”②

这一点我们这里也往往有人“不了解”。有人证明，我们无产阶级国家可以实行同时使富农和贫农满意的政策，也就是狼能饱、羊能保的政策，这种人也不懂得这一点。而实际上我们无产阶级国家自然不能在耐普曼和工人之间，富农和贫农之间保持“中立”。资产阶级国家自然同样不会中立的，它干预阶级斗争的进程，支持街垒的一方。我们国家干预阶级斗争的进程，支持街垒的另一方。斯托雷平国家靠自己的土地政策取得了农村力的四边形的一个边；我们苏维埃国家靠自己的土地和农民政策现在正在取得农村力的四边形的另一边。

列宁教导说：“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形式不能同以前一样。”他列举了：

“五项(最主要的)新任务和… …五种相应的新形式：

1. 镇压剥削者的反抗……
2. 国内战争……
3. ‘中立’小资产阶级，特别是农民……
4. ‘利用’资产阶级……
5. 培养新纪律……”③

① 《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37 卷第 254 页。《论无产阶级专政》。——译者注

② 同上。——译者注

③ 《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37 卷第 254—256 页。——译者注

在目前局势下，看看无产阶级专政下阶级斗争的第三和第四种形式，对我们来说尤为必要。列宁对中立小资产阶级，特别是农民的理解是：

“‘中立’的实际运用

（用暴力强制（恩格斯 1895 年）

例子

说服教育，等等

吸引 + 强制，‘鉴于’。”^①

列宁还接着解释说：

“作为劳动者的农民和作为剥削者（投机者、私有者）的农民。

‘鉴于’。斗争过程中的动摇。斗争的经验。

任务：

‘带领’、‘领导’、‘吸引’，这些概念的阶级内容。”^②

所以，列宁从来没有把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后中立农民理解成无产阶级国家的某种中立，无产阶级国家在阶级斗争中的“不干涉政策”，等等。不是的，对列宁来说，中立农民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一个职能。无产阶级应当带领、领导、引导农民跟自己走。无产阶级胜利后中立农民是无产阶级专政下阶级斗争的形式之一。

被列宁叫做“利用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形式也很有意思。列宁用下面这些话来说明这一标题：

“‘专家’。不仅要镇压他们的反抗，不仅要使他们‘中立’，而且要他们担任工作，强迫他们为无产阶级服务。

比较俄共的纲领。‘军事专家’。”^③

被一些泄气的“共产党人”认为差不多是“阶级合作”的东西，列宁正确地称之为强迫为无产阶级服务，无产阶级专政下阶级斗

① 《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37 卷第 255—256 页。——译者注

② 同上，第 255—256 页。——译者注

③ 《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37 卷第 256 页。——译者注

争的一种形式。列宁把租让制叫做同外国资本主义“联盟的一种形式”，与此同时列宁清楚地知道，这种“联盟”是我国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阶级斗争的特殊表现。他不拒绝付给外国资本家承租人以巨额“贡款”，作为“学费”，以便从他们那儿获得迅速的经济援助，等等。与此同时他也知道，归根到底租让制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利用”资产阶级。

正是在目前，租让制问题具有空前的现实意义。正是在目前，我们从议论租让制转向租让制的实际政策。我们的经济越活跃，外国承租人就越乐意来我们这里承租企业。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当苏联的经济发展了，货币坚硬了，苏维埃政府为大批资产阶级国家所正式承认了，革命法制巩固了——正是这时候，在承租人那里会出现与迄今为止不同的态度。有一个时候列宁主要是从国际政策的角度看待租让制的。在莫斯科组织支部书记会议上（1920年11月27日）所作的关于租让制的发言中，列宁谈到当时正在准备的万德利普租让企业，他说：

“这个交易意味着把帝国主义力量从我们身边引开，——目前帝国主义者则坐在那里叹气，等待有朝一日出现合适的时机扼杀布尔什维克，而我们则在推迟这个时机……我曾向你们指出一个我们必须利用的帝国主义的矛盾，这就是日本和美国的矛盾；另一个矛盾是美国和整个其他资本主义世界的矛盾……因此，我们将从这个观点去看待关于租让的一切问题……第三种是协约国同德国之间的争吵……这三者交错在一起，使帝国主义者的把戏乱成一团而毫无出路……当然，就获取产品而言，租让制对我们来说是重要的。这毫无疑问是对的，但**主要的本质在于政治关系**（着重号是我加的。——格·季·）。”^①

列宁谈到用租让制的形式同外国资本结成表面上的联盟，同时补充说：

① 尼·列宁：《全集》第XVII卷第390、391、392、395页。《论租让制》。

“我们没有幻想过：我们打完了仗，和平就要来临了，社会主义小牛犊要同资本主义恶狼互相拥抱了。——决不！”^①

列宁在《论粮食税》里特别详尽地向我们解释，为什么租让制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一种形式。

“我们虽在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名义下向后转了，但我们向后转时决不放弃任何新东西，同时又给资本家一些好处，从而使任何一个国家，不管它曾经怎样敌视我们，也不得不同意和我们做交易，同我们来往……我们在战争中已经学会了巧妙周旋，而且应当明白我们现在面临的和正进行的周旋是最困难的一次，不过看来，这也是最后的一次了。”^②

* * *

这样，在无产阶级专政下阶级斗争没有静息下去，而是在继续——在新的、复杂的、“不习惯的”、古怪的形式下继续。它将继续到社会主义完全胜利，阶级消灭为止。

“无产阶级专政也是一个阶级斗争时期，只要阶级没有消灭，阶级斗争就不可避免，不过它的形式有所改变，在推翻资本后的初期变得更加残酷，更加独特。无产阶级夺得政权之后，并不停止阶级斗争，而是继续阶级斗争，直到消灭阶级——当然，是在另一种环境中，在另一种形式下，采取另一些手段。”^③

列宁详尽地向我们解释，到底什么叫消灭阶级。

“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大的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同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了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取得归自己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

① 尼·列宁，《全集》第 XVII 卷第 394 页。

② 《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43 卷第 300 页。《在莫斯科苏维埃全会上的演说》（1922 年 11 月 20 日）。——译者注

③ 《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37 卷第 12 页。《伟大的创举》。——译者注

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①

在另一个地方(在共青团第三次全俄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列宁对什么是阶级提出了一个更短的简明定义：

“阶级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这就是允许社会上的一部分人占有别人的劳动。”^②

“消灭阶级要经过长期的、艰难的、顽强的阶级斗争。在推翻资本权力以后，在破坏资产阶级国家以后，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以后，阶级斗争并不是消失(如旧社会主义和旧社会民主党中的庸人所想象的那样)，而只是改变它的形式，在许多方面变得更加残酷。……”

“要消灭阶级，就需要一个阶级的专政时期……”^③

“为了完全消灭阶级，不仅要推翻剥削者即地主和资本家，不仅要废除他们的所有制，而且要废除任何生产资料私有制，要消灭城乡之间、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之间的差别(着重号是我加的。——格·季·)。这是很长时期才能实现的事业。要完成这一事业，必须大大发展生产力，必须克服无数小生产残余的反抗(往往是特别顽强特别难于克服的消极反抗)，必须克服与这些残余相联系的巨大的习惯势力和保守势力。”^④

列宁的这些话是每一个想当列宁主义者的人都必须记住的。尤其是现在当农民问题成为我国列宁主义政策的中心问题的时候，特别需要记住这些话。

自然，同样必须牢牢记住，在一个政权和经济命脉牢固地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的国家里，阶级斗争的形式起了根本变化。“忘记”这一点就等于违背了列宁主义的主要之点——违背了研究每一个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37卷第13页。——译者注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39卷第304页。——译者注

③ 《列宁全集》第2版第36卷第376—377页。《向匈牙利工人致敬》。——译者注

④ 《列宁全集》第2版第37卷第13页。《伟大的创举》。——译者注

发展阶段的**具体**环境的列宁主义要求；等于忘记列宁主义的基本常识，使自己失去在**特定的具体条件下**，譬如说，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九年，领导工人阶级及其日常斗争的可能性。请注意，关于转向和平的“不流血的”经济斗争战线的活列宁是在五年前就已说过的。请注意，党第一次提出转向和平工作是在1918年，在布列斯特和约刚刚签订之后。“不流血的”（实际上可惜现在还经常是流血的）阶级斗争当然不是流血的国内战争（阶级斗争的最尖锐形式），但它**也是阶级斗争**。

在无产阶级专政下阶级斗争在继续——包括新经济政策时期在内都在继续。在农村，在现代俄国（在苏联），在刚刚迈向社会主义的新经济政策的俄国，阶级斗争**在继续**。

现代革命农村的中心人物应是中农——列宁在第一次提出对中农的态度问题的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在自己的完成的著作里，在转向新经济政策时期的各种草稿中都谈到这一点。

但什么是中农呢？

这里必须把列宁1919年春在俄共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所说的同1920年7月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上所说的作一比较。

上面（见第一章《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我们引用了共产国际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通过的列宁起草的关于农民问题决议的中心部分。这一决议既包括无产阶级尚面临夺取政权斗争的国家，也包括1920年政权已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的俄国。在上述决议中，列宁既谈到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的任务，也谈到取得胜利的无产阶级在**夺得政权以后的任务**。

什么是中农？应当区分列宁对一般“中农”和俄国中农所下的定义。

关于一般“中农”，列宁在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的决议中说：

“‘中农’从经济上来说是小农，他们也拥有一小块自己的或租来的土地，但是第一，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块土地上的收入通常

不仅能够维持一家的俭朴生活和经营的费用，并且可能有某些剩余，这些剩余至少在好年头可能变为资本；第二，往往另外雇用劳动力。”^①

这就是中农的一般定义。接着列宁举例说明德国和法国的中农是什么样的。

列宁在这一决议中继续说：“革命的无产阶级，至少在最近的将来和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初期（着重号是我加的。——格·季·），不能给自己提出把这个阶层争取过来的任务，而应当只限于中立中农，即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时不给予资产阶级以积极的支持。这个阶层必不可免地要动摇于这两种势力之间，而且在新时代的初期，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内，这个阶层的主要趋向将是拥护资产阶级的。……”^②（着重号是我加的。——格·季·）“如果不中立中农，如果没有全体小农、至少极大部分小农的支持，无产阶级政权是不能巩固的。”^③

在最初阶段，至少在最近的将来，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初期，可以只限于中立中农。接着在无产阶级面前就出现较为广泛的任务：吸引中农直接合作，建立巩固的联盟。列宁在俄共第八次代表大会上谈及运用于俄国时特别详尽地解释了这一点。为了理解列宁的意思，应当记住，第一，在我们国家里中农中有相当大量的“小农”阶层，第二，我们国家不属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由于这些情况我们就有较多的可能性吸引中农参加联盟，参加合作。

“当无产阶级推翻了资产阶级、巩固了自己的政权并从各方面着手建立新社会的时候，中农问题就提到第一位了……我们愈接近共产主义建设的任务，我们就愈应当在一定程度上把主要注意

①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第 610—611 页〔《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39 卷第 170—171 页〕。

②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第 611 页。〔参看《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39 卷第 171 页。——译者注〕

③ 同上，第 615 页。〔《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39 卷第 174 页。——译者注〕

力集中在中农身上。”^①

俄共第八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列宁起草的决议中也说到，无产阶级的政策“应当估计到和中农合作的长期性”，我们需要“胜利了的无产阶级和中农结成联盟和实行妥协”，我们必须“想出种种办法去实际帮助贫苦农民和中农”，共产党的全部政策应当贯彻“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两者同中农妥协的精神”。^②（着重号都是我加的。——格·季·）

列宁引用党纲第 47 条，其中写道：“俄共对中农的政策是逐步地有计划地吸引他们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工作。”

列宁最坚决地强调指出，“对于中农问题要给予加倍的注意。”^③

列宁主义的这一基本思想象一条红线贯穿于列宁的全部著作——直到如此重要的最后著作《论合作社》（1923年）。这一思想——“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同中农妥协”、联盟——是党的所有最重要的决议的核心。党的第十四次代表会议的决议就是完全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它完全正确地规定了党在整整一个时期的道路（合作社的作用，活跃苏维埃，加强苏维埃民主，极端注意大工业等等）。

——而俄国的中农是从哪里来的？

据我们看来，列宁就此所说的最深刻的论述是在他于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论证俄共党纲的讲话。

列宁说：

“我们说我们取得了专政，可是应当知道我们是怎样取得的。旧事物千头万绪地拖住我们，缠住我们，不让我们前进一步，或者迫使我们不能很好地前进，正象我们现在这样。所以我们说，为了

① 《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36 卷第 185 页。——译者注

② 《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36 卷第 196—199 页。《关于对中农的态度的决议》。——译者注

③ 同上，第 147—148 页。《关于党纲的报告》。——译者注

懂得我们现在处于什么境地，就必须说出我们是怎样走来的，是什么东西把我们引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引我们来的是原始商品经济形式的资本主义（着重号是我加的。——格·季·）。必须认清这一切，因为只有估计到现实，我们才能解决诸如对中农的态度这类问题。的确，在纯粹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时代怎么能有中农呢？要知道甚至在普通的资本主义国家里都是没有中农的。如果我们单单根据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存在来解决我们对这个几乎是中世纪现象（即对中农）的态度问题，那我们会碰很多钉子。（着重号是我加的。——格·季·）如果我们要改变对中农的态度，那就请在理论部分说清楚，中农是从哪里来的，什么是中农。中农是小商品生产者。这是关于资本主义的初步常识，是必须指出的，因为我们终究还没有越出这个初步常识。如果把这一点置之不理，还说‘我们已经研究了金融资本主义，为什么还要来研究这种初步常识！’——那是极不严肃的。”①

这一关于中农起源的内容极其丰富的定义同时给我们提供了理解列宁主义在下述问题上的立场的钥匙：1. 关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问题，2. 关于新经济政策产生的原因问题，3. 关于列宁主义在国家资本主义问题上的观点问题，4. 关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农村的阶级斗争问题。如果以列宁关于中农起源的这一定义作为出发点，那就不难找到确定富农的正确定义的道路，以及正确确定无产阶级在领导农民事业中应起什么样的作用的道路。

“农民作为劳动者，倾向于社会主义，更愿意要工人专政而不要资产阶级专政。农民作为粮食出售者，倾向于资产阶级，倾向于自由贸易，就是说，要退到‘惯常的’、旧有的、‘历来的’资本主义去。”②

① 尼·列宁《全集》第XVI卷第115—116页。[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36卷第141—142页。《关于党纲的报告》。]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36卷第376页。《向匈牙利工人致敬》。——译者注

对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目前所处的时期来说，没有比这个定义更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的了。

“现在，无产阶级掌握着政权，领导着政权。它领导着农民。领导农民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第一，要实行消灭阶级而不是依靠小生产者的路线。如果我们离开了这条根本的和主要的路线，那我们就会不成其为社会主义者，就会滚到小资产者阵营，滚到无产阶级当前最凶恶的敌人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阵营里去……”

无产阶级领导着农民，但是不能用过去赶走和消灭地主、资本家的办法来赶走这个阶级。必须费很大的力气，付出很大的代价，长期地改造农民。无产阶级和农民各分担多少苦难，这取决于我们这个起领导作用的党。在分摊时能根据的是什么呢？是平均分摊，一半对一半吗？让切尔诺夫和马尔托夫议论去吧，我们则说，应当以无产阶级的利益为准绳，也就是说要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和保证走共产主义道路。如果现在农民更疲惫了，更痛苦了，或者确切些说，他们自己认为是更疲惫了，那么我们就要对他们作更多的让步，以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保证走共产主义道路。”^①

所以，我们领导农民的任务是：1. 防止资本主义复辟，2. 保证走共产主义道路，3. 消灭阶级。为了这些目标，也仅仅是为了这些目标，从这种观点，也仅仅是从这种观点出发，我们可以也应当向农民作让步——这是同我们的这些基本目标并不矛盾的让步。列宁就是这样对工人阶级说的。但他又马上转向农民，对农民说：

“或者是农民和我们达成妥协，而我们在经济上向他们让步；或者是斗争……事实上，任何别的道路都是通向米留可夫的道路，都是使地主和资本家复辟的道路，我们则说，无产阶级将排除一切困难和障碍，坚决地消灭阶级，走向共产主义，而只要无产阶级政权能得到支持和巩固（着重号是我加的。——格·季·），我们可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41卷第312—313页。《关于粮食税的报告总结发言（1921年5月27日）》。——译者注

以作任何让步。”①

这是在象我们这样的国家里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工人阶级对农民的态度上唯一符合列宁主义的提法。谁把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束之高阁”，闭口不提无产阶级专政——哪怕这是出于最善良的考虑；谁深思熟虑地指出我们已经没有资本主义，或者几乎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富农，我们的政策对富农和对贫农都同样有利——他就是有意无意地在修正列宁主义。

我们不知道有比列宁的题为《工人同志们，大家都来进行最后一次决战！》的手稿更有力、更充满激情的文献了（写于1918年，1925年1月列宁研究院发表，加米涅夫同志作序）。

“任何怀疑的余地都不可能有了，富农是苏维埃政权的死敌。不是富农把无数的工人杀掉，就是工人把占人口少数的富农掠夺者反对劳动人民政权的暴动无情地镇压下去。这里不可能有中间道路。和睦相处绝对不可能，因为富农可以而且不难同地主、沙皇、神父和好，即使他们发生过争吵，但是要同工人阶级和好是永远办不到的……”

“富农是最残忍、最粗暴、最野蛮的剥削者，在其他国家的历史上，他们屡次恢复过地主、皇帝、神父、资本家的政权。富农的人数比地主和资本家多。但是富农毕竟是人民中的少数。……富农，财主，粮食投机者，恐怕不超过200万户（200万！请断言我国“几乎”没有富农的人注意。——格·季·）。这些吸血鬼在战争期间靠人民受穷发了财，他们通过抬高粮食和其他各种食物的价格积累了几万、几十万的货币。这些吸血蜘蛛靠战争中破了产的农民，靠挨饿的工人养肥了。这些水蛭吸吮劳动人民的血……这些吸血蝙蝠过去和现在总是把地主的土地集中到自己手里，……要无情地向这些富农开战！”②等等。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41卷第314页。《关于粮食税的报告的总结发言》。——译者注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35卷第36—37页。——译者注

自然，只有在1918年才会这样写。但是对富农——真正的富农，而不是对那些在我们这里常常被徒然“列入”这一可敬阶层的人来说，这种语言今后还会多次适用。当我们这里有人企图把事情说成似乎世上已无富农，当我们这里有人声称，似乎“富农对我们已无危险”，这必然使中农和贫农产生这样的想法，似乎在我们看来，富农——再说一遍，说的是真正的富农，而不是有时被错划为富农的中农——已不是苏维埃政权的疯狂敌人，不是凶狠野蛮的剥削者，不是吸血鬼，不是恶魔。然而实际情况却是对我们来说，农村的富农——真正的富农——要比城市的耐普曼危险得多，因为我们在农村的阵地是薄弱的，而富农成为农村舆论领导者的可能性却要大一些。富农在农村只占百分之二、三，这不足以自慰。资产阶级之所以是资产阶级，就因为它是微不足道的少数，而同时又骑在多数人民头上。农村百分之二、三的“富农”，这是个巨大的力量。

为了使目前党在农民问题上的政策真正能保障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保障“走向共产主义的道路”，为了使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作用不是停留在口头上，而能成为事实，为此在富农问题上就不应有一星半点模棱两可之处。

* * *

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我党的纲领是由两部分组成的。头一部分是1919年俄共第八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正式党纲，这是在战时共产主义的高潮中写就的。另一部分是列宁的著作《论粮食税》。头一部分（如果取其仍然绝对正确的部分，而不是一时的、暂时的、偶然的）主要包括：1.对资本主义及其帝国主义阶段的总的估计，2.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无产阶级政治纲领。这主要是对下列问题的阐述：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民主，无产阶级国家和资产阶级国家；这是对无产阶级和农民的相互关系的一般估计，等等。另一部分——《论粮食税》的小册子——主要包括一个农民国家在无产阶级专政过渡时期的无产阶级经济纲领。

有一天党将会根据这两部分（加上共产国际的某些纲领性文献：关于农民问题的提纲，关于民族问题的提纲，等等）最终重新写出自己的纲领。

但是毫无疑问，列宁在逝世前不久所写的著作《论合作社》和《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乃是一个巨大的贡献，特别是对后一部分纲领的巨大贡献。这两篇著作（我们要着重强调指出：正是这两篇著作，其总和，因为两篇相互补充，因为如果没有《宁肯少些，但要好些》就无法正确地理解《论合作社》中的主要之处）是党纲中的新的重要篇章。从《论粮食税》和列宁论述新经济政策的其他基本著作中完全可以“推导出”这两篇著作。决不能把这两篇著作同《论粮食税》对立起来；它们完全源于《论粮食税》，但是它们把许多东西具体化了，把许多极其重要的问题重新提出来了。

* * *

《宁肯少些，但要好些》详细研究了大工业（从而也包括电气化）的发展同领导“小农和极小农”的任务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再重复一遍，这一最后的天才的考察应当和关于合作社的同样天才的考察放在一起来看。只有这样，我们对于列宁在逝世前不久给予我们的政治上最重要的遗嘱是什么这个问题才会获得应有的概念。

“我们摧毁了资本主义工业，曾力求完全摧毁中世纪设施和地主的土地占有制，并在这个基础上培植出小农和极小农，他们由于相信无产阶级革命工作的成果而跟着它走。但是我们靠这种信任一直支持到社会主义革命在比较发达的国家里获得胜利，那是不容易的，因为小农和极小农，特别是在新经济政策的条件下，由于经济的必然性，还停留在极低的劳动生产率水平上……即使我们推翻不了俄国的革命制度，至少也要使它难于向社会主义发展。它们（帝国主义列强。——格·季·）大致上就是这样考虑的，而且从它们的角度也不能不这样考虑。结果，它们的任务只完成了一半。它们并没有推翻革命所创立的新制度，但是它们也不让新制

度能够立刻大步前进，以证实社会主义者的预言，使他们能够迅速地发展生产力和发挥所有能发展成为社会主义的潜力……”。

“因此，现在我们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在我国这种小农和极小农的生产条件下，在我国这种经济破坏的情况下，我们能不能支持到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到社会主义的那一天呢？……”

“为了保住我国的工人政权，为了保持工人政权在我国小农和极小农中间的威望和对他们的领导，我们必须极其谨慎小心……为了保证我们能存在到反革命的帝国主义的西方同革命的和民族主义的东方……发生下一次军事冲突的时候，这个大多数就必须能赶得上建立文明。我们的文明程度也还够不上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虽然我们已经具有这样做的政治前提。”^①

这就是列宁在逝世前不久为我们描绘的世界的总形势。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应采取什么样的策略，对这个问题列宁回答说：

“我们应当努力建成这样一个国家，在这个国家里工人能够保持他们对农民的领导，保持农民对他们的信任，并通过大力节约把自己社会关系中任何浪费现象的任何痕迹铲除干净……”。

“这岂不是会成为农民局限性的天下吗？”

不会的。只要我们能够保持工人阶级对农民的领导，我们就有可能在我国靠大力节约把任何一点积蓄都保存起来，以发展我们的大机器工业，发展电气化，发展泥炭水力开采业，完成沃尔霍夫水电站工程，如此等等。

我们的希望就在这里，而且仅仅在这里（着重号是我加的。——格·季·）。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打个比喻说——从一匹马上跨到另一匹马上，就是说，从农民的、庄稼汉的、穷苦的马上，从指靠破产的农民国家实行节约的马上，跨到无产阶级所寻求的而且不能不寻求的马上，跨到大机器工业、电气化、沃尔霍夫水电站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386—389页。《宁肯少些，但要好些》。——译者注

工程等等的马上。”^①

* * *

弗·伊·列宁在其最后著作《论合作社》中所追求的实际目的是什么呢？

他在《论合作社》一文中是这样解释这一点的：

“我们改行新经济政策时做得过火的地方，并不在于我们过分重视自由工商业的原则，而在于我们忘记了合作社，在于我们现在对合作社仍然估计不足，在于我们已经开始忘记合作社在上述两方面的巨大意义。”^②

列宁的《论合作社》一文正是以下列语句开始的：

“我觉得我们对合作社注意得不够。未必每个人都理解，现在，自从十月革命以来，不管新经济政策如何（相反，在这方面应该说，正是由于实行了新经济政策），合作社在我国有了非常重大的意义……但并不是所有的同志都明了，俄国的合作化现在对我们有多么巨大的、不可估量的意义。”^③

在这一论合作社的著作中我们认为有两个中心点。

其一是：

“目前我们应该特别加以支持的一种社会制度就是合作社制度，这一点我们现在必须认识到而且必须付诸行动。”^④

其二：

“从实质上讲，在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条件下，使俄国居民充分广泛而深入地合作化，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因为现在我们发现私人利益、私人买卖的利益与国家对这些利益的检查监督相结合的合适程度，发现了使私人利益服从共同利益的合适程度，而

① 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389—390页。《宁肯少些，但要好些》。——译者注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360—361页。《论合作社》。——译者注

③ 同上，第359—360页。——译者注

④ 同上，第361页。——译者注

这是过去许许多多社会主义者碰到的绊脚石。情况确实如此，国家支配着一切大的生产资料，无产阶级掌握着国家政权，这种无产阶级和千百万小农及极小农结成了联盟，这种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得到了保证，如此等等——难道这不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难道这不是我们通过合作社，而且仅仅通过合作社，通过曾被我们鄙视为做买卖的合作社的——现时在新经济政策下我们从某一方面也有理由加以鄙视的——那种合作社来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的一切吗？这还不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但这已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而且足够的一切。”①

列宁把“合作社制度”看作是最接近社会主义的制度。“在私人资本主义下，合作企业与资本主义企业不同，前者是集体企业，后者是私人企业。在国家资本主义下，合作企业与国家资本主义企业不同，合作企业首先是私人企业，其次是集体企业。在我国现存制度下，合作企业与私人资本主义企业不同，合作企业是集体企业，但与社会主义企业没有区别，如果它占用的土地和使用的生产资料是属于国家即属于工人阶级的。”② 列宁把居民的完全合作化同居民的整个文化水平，同“文化革命”联系在一起。这是适用于许多年的完整的纲领。

在这篇论合作社的文章里，列宁第一次为此明确地描述了合作社在把农民经济逐步纳入社会主义轨道上所起的巨大的决定性作用。问题并不在于要我们这里正在发展的合作社立即成为百分之百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合作社。毫无疑问，在我们的合作社里还会有资产阶级残余，还会复发资产阶级，在若干年内无产阶级政权将不得不根据形势采取经济和政治措施，按照需要不断地从正在发展的合作社中铲除资产阶级性的成份（элементы буржуазности），从麦子里拣掉毒麦。至于合作社是我们可以引导并且定能引导农民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这篇论合作社的文章作了确定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360页。——译者注

② 同上，第364页。——译者注

无疑的论证。

这同《论粮食税》中说合作社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一种形式的说法毫不矛盾。要知道，国家资本主义在我们这里也是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要知道，列宁把无产阶级国家中的国家资本主义也说成是“四分之三”的社会主义。

《论合作社》一文写道：“通过合作社，而且仅仅通过合作社”可以生长出社会主义。

《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一文写道：“我们的希望就在这里，而且仅仅在这里”（大机器工业）。

重复一遍，为了得到列宁逝世前所描绘的完整的纲领，需把《论合作社》的考察和《宁肯少些，但要好些》的考察“加在一起”。因为，从列宁所说所写看来，不言而喻，他所描绘的完全胜利正是大工业（其中包括电气化）的发展加合作社的结果。

我们苏联就是按照这条道路，这条列宁所嘱咐的道路发展的。最终取得胜利是毫无疑问的。由于缺粮、破坏、经济工作中缺乏计划等等而招致“国家毁灭”，即不仅阶级敌人，而且我们党内过去和现在都不善于真正理解列宁主义的一批党员都预言过的那种“毁灭”，——这种“国家毁灭”的说法现在只能引人发笑。现在不存在，将来也不会有这种危险。

但这并不是说在我们面前不存在另一种性质的危险。这种危险是存在的。城乡资产阶级的经济力量在增长——虽然不是相对的，而仅仅是绝对的增长。资产阶级不可避免地要对我们自己的国家机关（有时甚至对党）的最薄弱环节施加压力。国有工业生产力的发展是比较快的，但目前终究没有快到我们现在就能同欧美资本主义的技术进行胜利竞赛的地步。毫无疑问，农村的阶级斗争在一些时间内还将发展。外国资产阶级在组织起来反对苏联。“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从日程上取消，虽然这个问题将得到有利于我们的结局是显而易见的。

在1923年，最大的敌人是无穷无尽的埋怨、悲观主义和“国家

毁灭”的喊叫。在 1925 年，心满意足会成为某种危险，它正在变成掩盖农村的阶级斗争，抹煞来自富农的危险，抹煞列宁就我国制度中国家资本主义和一般资本主义所作的，现在仍然正确的论述。我们应当坚决而明确地告诉工人们，告诉全国：我们现在在新经济政策下所拥有的是无产阶级国家中的特殊的**国家资本主义**，加上正在成长的社会主义成分——正在成长，但远未长成。无需援引说，我们“不知道”什么是社会主义，说马克思也不知道这一点，说列宁在《论合作社》的小册子中讲过必须改变对什么是社会主义问题的看法。在农民国家中合作社怎么能成为社会化的形式，这一点过去是不清楚的。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合作社怎么能从根本上改变小生产者的心理，这一点过去也是不懂得。正是在这意义上列宁说，我们对社会主义的看法根本改变了。在这意义上，并且仅仅是在这意义上。我们确实不知道未来的，完全胜利了的社会主义的许多方面的**详细情况和细节**。我们确实认为，在这方面许多东西将由亿万人民群众的历史经验来确定。但是我们**确实无疑地**知道，马克思和列宁是怎样教导我们的，这就是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不论怎么说都意味着消灭阶级。

并且我们的状况整个说来是极其令人满意的，我们没有任何必要去自我欺骗，用幻想来自我安慰。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与日俱增。我国革命的国际影响在增长，在加强，并且首先正是在列宁逝世前如此雄辩地论证过的那个方向：**在东方**。我们的经济命脉越来越巩固。在世界历史上还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国家，在这个国家里政权属于无产阶级，而这个无产阶级又能牢牢地掌握象对外贸易垄断制、土地国有化、把全部运输业和整个大工业集中在自己手中这样一些杠杆，象信贷体系、国家托拉斯的利润以及诸如此类的杠杆。我国工人阶级在人数上、政治上都在增长。不需要多少年，我国的产业工人的人数将不少于 1000 万。目前我们仍然是**农业-工业国**。不需要多少年，我们将成为**工业-农业国**——它建立在我们城乡经济社会主义成分越来越发展的基础之上。尽管

有各种障碍，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在国际无产阶级的支持下我们一定能建成它。我国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快满十年了。1917年列宁问道：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现在已不存在这一问题。能够保持！毫无疑问，能够保持！并且能够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完成彻底的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者的义务。

我们具备取得完全胜利的一切条件。苏联面前展现的经济文化和政治前景越来越广阔。时代的任务在于防止我们苏联资产阶级关系的复辟，保证“共产主义的道路”。在党的正确政策下，即在我们善于把列宁主义学说正确运用于目前困难复杂的局势的情况下，这一伟大的任务无疑将得到解决。

第十三章

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

社会主义可能在一个国家取得最终胜利吗？列宁主义是怎样回答这一问题的？

为了对这一问题获得足够清楚的答案，首先必须约定，**这里说的是什么。**

我们有一定的权利说，例如争得 8 小时工作制是社会主义的胜利。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决不是想要说，8 小时工作制就是社会主义。不是的，我们只是想说，争得 8 小时工作制是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工人政党的胜利（胜利之一）。

要知道，我们甚至说，比如在总统选举中有 200 万选票投共产党人台尔曼是“共产主义的胜利”。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自然也决不是想说，投共产党议员的 200 万张选票就是共产主义。不是的，这只是共产主义先锋队的胜利（胜利之一）。

无产阶级在这一或那一国家夺得政权，这已是社会主义的**巨大胜利**。社会主义的胜利在这种情况下意味着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但我们决不想以此说明，甚至象无产阶级夺得政权这样的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已是最终胜利的社会主义。

不但如此。取得政权的无产阶级实施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社会化的法令，自然是社会主义的胜利。但这也不是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在这种场合我们想说的只是完成了走向社会主义的最坚决的步骤。宣布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归国家所有这一事实本身还

不是最终胜利的社会主义制度。

我们在苏联建立无产阶级专政8年之后提出社会主义能不能在一个国家最终胜利的问题，在这里我们提的已不是8小时工作制问题(如我们所举的例子)，决不仅仅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或甚至宣布生产工具和生产手段为无产阶级国家所有的问题：我们提出的是关于社会主义制度的胜利、关于社会主义社会最终胜利的问题。

列宁是怎样(继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后)规定“社会主义”的概念的？他是怎样区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

我们这里说的不是个别的简练的定义，它们自然也规定了社会主义的社会性质，并且对列宁主义起了很大的作用，但它们不可能具有科学的准确性。例如列宁曾不止一次地说过，社会主义是一个大合作社；或者，共产主义是苏维埃政权加电气化；或者，社会主义是计算和监督；或者，没有邮政、电报、机器，社会主义就是空话；或者，社会主义是公共耕作土地，等等。

此类公式对特定的目的来说是非常好的。但是要回答我们现在关心的问题，我们应当选取列宁主义所作的最准确的公式。

列宁说：“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科学区别，只在于第一个词是指从资本主义生长起来的新社会的第一阶段，第二个词是指它的下一个阶段，更高的阶段。”^①

列宁写道：“社会主义同共产主义在科学上的差别是很明显的。通常所说的社会主义，马克思把它称作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或低级阶段。既然生产资料已成为公有财产，那么‘共产主义’这个名词在这里也是可以用的，只要不忘记这还不是完全的共产主义。马克思的这些解释的伟大意义，就在于他在这里也彻底地运用了唯物主义辩证法，即发展学说，把共产主义看成是从资本主义中发展出来的。马克思没有经院式地臆造和‘虚构’种种定义，没有从事毫无意义的字面上的争论(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37卷第12页。《伟大的创举》。——译者注

共产主义),而是分析了可以称为共产主义在经济上成熟程度的两个阶段的东西。

“在第一阶段,共产主义在经济上还不可能完全成熟,完全摆脱资本主义的传统或痕迹。由此就产生一个有趣的现象,这就是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还保留着‘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

“计算和监督,——这就是把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调整好’,使它能正常地运转所必需的主要条件。在这里,全体公民都成了国家(武装工人)雇用的职员。全体公民都成了一个全民的、国家的‘辛迪加’的职员和工人。全部问题在于要他们在正确遵守劳动标准的条件下同等地劳动同等地领取报酬”……

“在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到来以前,社会主义者要求社会和国家对劳动量和消费量实行极严格的监督,不过这种监督应当从剥夺资本家和由工人监督资本家开始,并且不是由官吏的国家而是由武装工人的国家来实行”。①

列宁说:“马克思不仅极其准确地估计到了人们不可避免的不平等,而且还估计到:仅仅把生产资料转归全社会公有(通常所说的‘社会主义’)还不能消除分配方面的缺点和‘资产阶级权利’的不平等,只要产品‘按劳动’分配,‘资产阶级权利’就会继续通行。马克思继续说道:‘但是这些弊病,在经过长久阵痛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出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是不可避免的。权利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

‘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在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之后;在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着重号是我加的。——格·季·);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31卷第94,97,93页。——译者注

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①

这就是列宁继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后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所作的科学的定义。

* * *

列宁在另一个地方说,“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②“为了消灭阶级,首先就要推翻地主和资本家。这一部分任务我们已经完成了,但这只是任务的一部分,而且不是最困难的部分。为了消灭阶级,其次就要消灭工农之间的差别,使所有的人都成为工作者。这不是一下子能够办到的。这是一个无比困难的任务,而且必然是一个长期的任务。这个任务不能用推翻哪个阶级的办法来解决。要解决这个任务,只有把整个社会经济在组织上加以改造,只有从个体的、单独的小商品经济过渡到公共的大经济。这样的过渡必然是非常长久的。……

为了解决这个最困难的第二部分任务,战胜了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应当对农民始终贯彻以下基本政策路线:无产阶级应当把劳动者农民和私有者农民,即把种地的农民和经商的农民、劳动的农民和投机的农民分别开来,划分开来。”^③(着重号是我加的。——格·季·)

“没有建筑在现代科学最新成就基础上的大资本主义技术,没有一个使千百万人在产品的生产和分配中最严格遵守统一标准的有计划的国家组织,社会主义就无从设想。”^④

关于在俄国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时间问题,列宁的下述说法极为重要:

-
-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31卷第90,91页。《国家与革命》。——译者注
 - ② 见其著名的文章《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列宁全集》第2版第37卷第272页)。
 - ③ 《列宁全集》第2版第37卷第272—273页。《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译者注
 - ④ 《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279页。《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译者注

“组织道路是一条漫长的道路，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要求顽强持久地工作和具备我们所缺乏的相应的知识。即使是我们的下一代，他们更加成熟一些，也未必能完全过渡到社会主义。”^①（着重号是我加的。——格·季·）

这是在战时共产主义高潮中说的。

还有另一个类似的说法：

“共产主义是社会主义发展的高级阶段，那时人们从事劳动都是由于觉悟到必须为共同利益而工作。我们知道现在我们还不能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希望我们的儿辈或者孙辈能把这种制度建成就好了。”^②（着重号是我加的。——格·季·）

* * *

为全面起见，还必须引用列宁接着恩格斯所说的关于国家“消亡”的那些话。

列宁着重引用了恩格斯《反杜林论》中的下列著名说法：

“无产阶级将取得国家政权，并且首先把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但是，这样一来它就消灭了作为无产阶级的自身，消灭了一切阶级差别和阶级对立，也消灭了作为国家的国家。……当国家终于真正成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时，它就使自己成为多余的了。当不再有需要加以镇压的任何社会阶级的时候，当阶级统治和根源于至今的生产无政府状态的生存斗争已被消除，而由此产生的冲突和极端行动也随着被消除了的时候，就不再有什么需要镇压了，也就不再需要国家这种实行镇压的特殊力量了。国家真正作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所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即以社会的名义占有生产资料，同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243页。《关于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的报告》。——译者注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37卷第367页。《在农业公社和农业劳动组合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译者注

列宁的类似说法不止一处。但也有说得比较短的，例如在共青团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时也是作为国家所采取的最后一个独立行为。那时，国家政权对社会关系的干预将先后在各个领域中成为多余的事情而自行停止下来。那时，对人的统治将由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替。国家不是‘被废除’的，它是自行消亡的。”

列宁解释说，“实际上恩格斯在这里所讲的是以无产阶级革命来‘消灭’资产阶级的国家，而他讲的自行消亡是指社会主义革命以后无产阶级国家制度的残余。按恩格斯的看法，资产阶级国家不是‘自行消亡’的，而是由无产阶级在革命中来‘消灭’的。在这个革命以后，自行消亡的是无产阶级的国家或半国家……”

“恩格斯所说的‘自行消亡’，甚至更突出更鲜明地说的‘自行停止’，是十分明确而肯定地指‘国家以整个社会的名义占有生产资料’以后即社会主义革命以后的时期。

列宁写道，“我们的最终目的是消灭国家，也就是消灭任何有组织有系统的暴力，消灭任何加在人们头上的暴力。我们并不期待一个不遵守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的社会制度。但是，我们在向往社会主义的同时深信：社会主义将发展为共产主义，而对人们使用暴力，使一个人服从另一个人、使一部分居民服从另一部分居民的任何必要也将随之消失，因为人们将习惯于遵守公共生活的起码规则，而不需要暴力和服从。”^①

* * *

从上述言论无疑可以得出结论，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至少应理解为：

1. 消灭阶级，从而，
2. 废除一个阶级的专政，在这里就是废除无产阶级专政。

社会主义的完全和最终胜利是从共产主义的第一个阶段或低级阶段过渡到第二个阶段即高级阶段。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是消除分配上的缺陷和“资产阶级权利”的不平等——并且这种消除是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31卷第14—15、16—17、78—79页，《国家与革命》。——译者注

可靠的、稳固的、不可动摇的，是建立在基于最新科学的高度技术上的。

马克思写道：“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列宁接着马克思写道：“由整个发展论和全部科学十分正确地肯定了的的首要的一点，也是从前被空想主义者所忘记、现在又被害怕社会主义革命的机会主义者所忘记的那一点，就是在历史上必然会有一个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特殊时期或特殊阶段。”^①

需要弄清楚，在每一个具体场合说的是什么样的国家。北美合众国是一回事，中国又是一回事。俄国是一回事，德国是另一回事。日本是一回事，瑞士又是另一回事。

不仅就领土的幅员而论，并且就多种多样的经济区域来说，俄国实质上包含几个国家。至于苏联也可以这么说：尽管波兰、立陶宛等等分出去了，苏联仍占地球大陆面积的六分之一。这是一些国家的总和。工业和工业无产阶级的比重相对地说是高的。而问题正是涉及这样的国家，这样的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既然我们说是在一个国家的胜利，那也就是说，其余的国家暂时仍然是资产阶级国家，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处于资产阶级包围之中。讲的不是“一个”独立自在的抽象的国家，即不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个国家**——如果是那样提问题，那不用多说，事情当然是清楚的，抽象地说，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里”的最终胜利是**可能的**。我们这里讲的是一个**四面八方都被资产阶级国家包围**的国家。（列宁说，我们不仅生活在一个国家里，我们生活在许多国家的体系之中。）问题在于，在一个**被资产阶级国家包围**的国家里是否可能取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31卷第82页。《国家与革命》。——译者注

得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在这个国家里完全和“永远”确立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确立无阶级的社会，废除无产阶级专政，从而使任何国家都“自行停止”。

为了更准确地弄明白，1925年在我们苏联问题何在，应当区分两种东西：1. 建设社会主义的有保障的可能性——建设社会主义的这种可能性在一个国家的范围内自然是可以想象的，2. 最终建成和巩固社会主义，即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社会，完成向共产主义的第二阶段即高级阶段过渡——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的这种最终胜利是否可能？这一问题有待解决。

按照列宁的说法，社会主义的完全和最终胜利是向共产主义过渡，即向无阶级的社会过渡，即废除无产阶级专政。

因此，问题在于处于资本主义包围下的一个国家是否可能取得社会主义的这种完全的和最终的胜利。

下一章应回答这一问题。

第十四章

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 在一国胜利问题

“毫无疑问，在一个小农生产者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里，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必须通过一系列特殊的过渡办法，这些办法在工业雇佣工人占大多数的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是完全不需要采用的……”

我们在许许多多的著作中，在我们所有的讲话中，在所有的报刊上都一再强调说，俄国的情况不同，这里产业工人仅占少数，而小农则占大多数。在俄国这样的国家里，社会主义革命只有具备两个条件下才能获得最终的胜利。第一个条件是及时得到一个或几个先进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支援。……

另一个条件，就是实现自己专政的或者说掌握国家政权的无产阶级和大多数农民之间达成妥协。……

我们知道，在其他国家的革命还没有到来之前，只有同农民妥协，才能拯救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①

列宁在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就是这样说的。就实质而言，在这些话里我们已经有了论断社会主义在一国胜利问题上列宁主义的真实观点的全部主要之点。让我们历史地考察一下，这些观点是怎样形成的。

^① 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41卷第50—51页。《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报告》。——译者注

* * *

在第二国际里对国际革命思想的态度是极为冷淡的。认为谈论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理想”、“最终目的”必须怀着应有的“虔诚”，实际上是更象装腔作势。当伯恩斯坦举起“运动就是一切，最终目的是不足道的”著名旗帜时，人们对他置之不理。他破坏了第二国际的“善良风尚”。实际上那时候伯恩斯坦已表达了第二国际大多数领袖的情绪。王德威尔得、阿德勒、谢德曼脑子里想的，伯恩斯坦则表之于言词。“最终目的”、“为社会主义而斗争”、“解放人民的”社会民主主义——所有这一切对第二国际领袖来说只是装饰品，只是圣像。

回想一下，甚至第二国际的优秀领袖例如在战争等等情况之下是如何看待国际革命斗争的，是很有意思的。甚至对他们来说默认的前提也是：只有一系列国家同时“行动”才行，“不能要求”一个国家的工人和工人党采取革命发动反对“自己的”资产阶级，如果与此同时其他国家或其他交战国的工人和工人政党不知什么缘故而没有采取行动的话。这一高招是“国际主义”献出的最后一言。在更好地准备国际性行动的架式下实际上是鼓吹国际性的无所作为。

第二国际的一些决非坏人集会于齐美尔瓦尔德和昆塔尔。但又怎么样呢？可以说，齐美尔瓦尔德的多数完全陷入了“国际主义”。当事情还没涉及直接的革命发动，而甚至仅仅涉及简单地投票反对军事拨款时，齐美尔瓦尔德多数派的代表就已经总是这样提问题：只有在法国社会党人同时投票反对军事拨款时，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才能采取同样行动，等等。结果得到的是循环论法。而所有这一切都披上了虚伪的国际主义外衣。要知道我们是国际组织，不是闹着玩的！因此……只有在能保证一系列国家同时进行革命发动的情况下，我们才能允许革命发动。但“暂时”还无法保证这一点，所以应当等待普遍的革命发动。实际得到的结果是占卜者反对国际革命行动的国际密谋。

正是从1914年战争爆发时起列宁主义反对第二国际的斗争变得更加猛烈了。不用说，列宁是上述“观点”拥护者的激烈揭发者。

1、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和

2、在帝国主义战争中每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应当首先希望“自己的”本国政府失败——从帝国主义世界大战一开始列宁主义就提出的这两个主要口号自然是具有国际意义的。但是列宁和他的拥护者并没有等待一切国家都接受这些口号，就立即首先在自己国家宣传这些口号，而其他国家社会民主党领袖却对此不理解，表示敌视。

尤其重要的是粉碎当时以考茨基为首的社会民主党“中派”，它企图“科学地”奠定这样一种思想：在战争期间根本就不可能实行革命发动，社会主义革命只可能——如果可能的话——在几个国家同时举行，社会主义革命只能在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发生——如果能发生的话。

列宁投入了反对考茨基分子的这些思想的战斗。列宁从两个方面向社会沙文主义者和中派宣战：1、纯科学方面——关于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主要见列宁的《帝国主义》），2、策略方面——什么是真正的国际主义。他首先是从解释一般资本主义，尤其是帝国主义时期资本主义的基本规律这一方面发动进攻的。

列宁说：“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因此就应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这个国家内获得胜利的无产阶级既然剥夺了资本家并在本国组织了社会主义生产，就会起来反对其余的资本主义的世界，把其他国家的被压迫阶级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在这些国家掀起反对资本家的起义，必要时甚至用武力去反对剥削阶级及其国家。”

1915年8月23日列宁在论欧洲联邦口号的文章中就是这样写的，这篇文章是反对考茨基主义者的（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反对托

洛茨基的)。①

“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列宁从“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正确地引伸出两个结论：1、“社会主义首先在少数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的可能性，即在一个国家突破资本主义战线的可能性，在一个国家进行第一个无产阶级革命的可能性，2、这少数甚至一个国家不一定是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可能性。

但列宁决没有从这里得出第三个结论：似乎社会主义可能在一个国家取得最终胜利。

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是社会主义在国际范围内胜利的理论，是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马克思的理论也是这样的。

但是，列宁的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并不排除，而是预计到可以在几个甚至一个国家打破缺口，无产阶级革命能够先在一国进行并支持许多年，直到在一系列国家或全世界范围内取得社会主义的比较广泛的，最后是完全的胜利。

俄国革命的经验也证明，在一个国家内的这种第一个胜利不仅是可能的，并且在一系列有利形势下，这第一个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国家能够（在国际无产阶级的一定支援下）长期支持并巩固下来——甚至在国际无产阶级的支持没有表现为直接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形式的情况下也是如此。

列宁在当时的一系列著作中全面地阐述了这一“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的“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他不仅就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前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问题，而且就这一战争结束之后帝国主义的命运问题同考茨基展开争论。由于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理论”，列宁再次表述了自己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规律”。②

① 《列宁选集》第2卷第709页。《论欧洲联邦口号》。——译者注

② 考茨基理解的“超帝国主义”是战后不同国家的资产阶级所签订的国际协定，这种协定将“永远”消除新的军事冲突的危险。列宁无情地揭露了这一“理论”伪善的机会主义的真面目（见《帝国主义》、《反潮流》）。

* * *

资本主义,特别是帝国主义的发展是不平衡的,跳跃式的。这就是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正是这种状况把(能够把)这一国或那一国首先“推上”历史舞台,暂时把它变成革命事变的中心。在这种情况下,这并不是非要资本主义关系最发达的国家不可的。可能出现一种情势的结合,使得最积极的革命过程恰恰不是从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开始的。

1920年列宁回顾了俄国革命的命运,试图尽可能完整地说明,是什么样的特殊情势的结合使得首先在俄国,在一个比较落后的国家取得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

列宁在《“左派”幼稚病》中写道:“俄国在1917年那种历史上非常独特的具体形势下,开始社会主义革命是容易的,而要把革命继续下去,把革命进行到底,却要比欧洲各国困难。我还在1918年年初就指出了这个情况,此后两年来的经验也完全证实了这种看法是正确的。俄国当时的特殊条件是:(1)有可能把苏维埃革命同结束(通过苏维埃革命)给工农带来重重灾难的帝国主义战争联结起来;(2)有可能在一定时期内利用称霸世界的两个帝国主义强盗集团之间的殊死斗争,当时这两个集团不能联合起来反对苏维埃这个敌人;(3)有可能坚持比较长期的国内战争,其部分原因是俄国幅员广大和交通不便;(4)当时农民中掀起了非常深刻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无产阶级政党就接过了农民政党(即社会革命党,他们多数党员是激烈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的革命要求,并且由于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而立即实现了这些要求。这些特殊条件,目前在西欧是没有的,而且重新出现这样的或类似的条件也不是很容易的。除其他一些原因外,这也是西欧开始社会主义革命比我国困难的一个原因。”^①

列宁在逝世前不久,在“日记摘录”,特别是在极其深刻的札记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39卷第43—44页。——译者注

《论我国革命。评尼·苏汉诺夫札记》中，再一次极其全面地回到这一题目上来。列宁在后一篇文章中写道：

“他们（欧洲的假马克思主义者。——格·季·）根本不相信任何这样的看法：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他们甚至没有想到，例如，俄国是个介于文明国家和初次被这场战争最终卷入文明之列的整个东方各国即欧洲以外各国之间的国家，所以俄国能够表现出而且势必表现出某些特殊性，这些特殊性当然符合世界发展的总的路线，但却使俄国革命有别于以前西欧各国的革命，而且这些特殊性到了东方国家又会产生某些局部的东西。”^①

似乎又回到齐美尔瓦尔德和昆塔尔同第二国际的甚至优秀分子进行的争论中去了，这些人论证“先”应在一系列国家准备工人阶级的同时发动，然后才是国际革命，列宁就此写道：

“记得拿破仑这样写过：《On s'engage et puis...on voit》，意译出来就是：‘首先要投入真正的战斗，然后便见分晓。’我们也是首先在1917年10月投入了真正的战斗，然后就看到了象布列斯特和约或新经济政策等等这样的发展中的细节（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来看，这无疑是细节）。”^②

总之，列宁主义教导说：

1. 资本主义（特别是其帝国主义时期）发展的不平衡和跳跃式创造了首先在少数，甚至单独一国内无产阶级胜利发动的客观可能性。

2. 这一个国家不一定属于资本主义关系最发达的国家之列。可能出现这样一种特殊的情势结合：在资本主义关系相对落后的国家里发生第一个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俄国革命的历史就证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368页。——译者注

② 同上，第370页。——译者注

实了这一点。

3. 任何“超帝国主义”都不能改变上述两条规律；相反地，它只是加强这两条规律。

4. 由此可见，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准备国际革命的同时，不应把一国无产阶级的革命发动（只要形成有利于这种发动的形势）推迟到一系列国家工人阶级能同时发动之时。

5. 无产阶级在一国取得胜利之后，该国无产阶级应尽最大的可能去支持和发展国际范围的革命运动，牢记社会主义不可能在一国取得最终胜利，社会主义制度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最终胜利有待于国际范围内解决。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和建立无产阶级政府，这是一回事。作为开端这在一国也能做到。保证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全和最终胜利则是另一回事。这只有无产阶级在一系列国家取得胜利才有可能。

* * *

这后一点，即社会主义革命不可能在一国取得最终胜利，列宁一分钟也没忘记。二月革命后列宁带着几乎在所有细节上都制订好的我国未来无产阶级革命纲领动身回俄，准备投入战斗，他在致瑞士工人的告别信中写道：

“俄国无产阶级单靠自己的力量是不能胜利地**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但它能使俄国革命具有浩大的声势，从而为社会主义革命创造极好的条件，这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意味着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这样，俄国无产阶级就会使自己**主要的、最忠实的、最可靠的**战友——**欧洲和美洲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易于进入决战。”^①

这一原理现在仍然是无可争议的。这是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之一。一个国家也可以胜利地开始社会主义革命。国际社会主义革命能够在个国家取得巨大胜利。但是社会主义制度在一国不能取得**最终胜利**。世界历史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胜利要在国际舞台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29卷第91页。

上解决。至少在几个有决定性意义的国家取得胜利，社会主义的胜利才是巩固的和最终的胜利。

在驳斥和嘲笑孟什维克（以及整个第二国际，甚至“齐美尔瓦尔德派”）企图以“呼吁”“世界斗争”来逃避现在1917年反对俄国资产阶级的斗争时，列宁声明：

“有人向我们描绘我们事业的困难；有人对我们说，社会主义只有在世界范围内才能取得胜利。我们认为，这些议论只是说明资产阶级及其有意无意的拥护者毫无希望地企图曲解一个无可辩驳的真理。当然，在一个国家内取得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是不可能的（着重号是我加的。——格·季·）。支持苏维埃政权的我国工农队伍，是世界大军的一个支队，这支世界大军现在被世界大战分散了。”①一定要由局势有利于这样做的国家开始。

“毫无疑问，欧洲的社会主义革命应该到来，而且一定会到来。我们对社会主义取得最终胜利的一切希望，都是以这种信心和科学预见为基础的。”②

“在这里，俄国革命最大的困难，最大的历史课题就是：必须解决国际任务，必须唤起国际革命，必须从我们仅仅一国的革命转变成世界革命。”③

“我们已经把全部事业掌握在布尔什维克一党的手里，当我们肩负起这个事业时，确信各国的革命正在成熟起来，不管我们会遇到怎样的困难，不管我们会遭到多大的失败，国际社会主义革命最终（不是马上）一定会到来，因为它正在到来；它一定会成熟，因为它正在成熟起来。我再说一遍，能把我们从所有这些困难中拯救出来的，是全欧洲的革命。”④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33卷第277—278页。《关于人民委员会工作的报告》。——译者注

② 同上，第33卷第248页。《谈谈不幸的和约问题的历史》。——译者注

③ 同上，第34卷第6页。《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译者注

④ 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8—9页。《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译者注

“无论在十月革命前或十月革命中，我们一直说，我们把自己看作是而且只能看作是国际无产阶级大军中的一支部队，我们这支部队所以走在前面，决不是由于我们的程度高，素养好，而是由于俄国的特殊条件，因此，社会主义革命至少要无产阶级在若干先进国家中取得胜利后，才能说取得了最终的胜利。”^①

“没有国际上世界革命的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②

“我们不仅生活在一个国家里，而且生活在许多国家组成的体系里，苏维埃共和国和帝国主义国家长期并存是不可思议的。最后不是这个胜利就是那个胜利。”^③

“布尔什维克在开始革命时说过：我们可以而且应当开始革命。可是我们同时并没有忘记：不能只限于在俄国一国革命，只有联合其他许多国家战胜国际资本，才能顺利地把革命进行到底，取得绝对的胜利……

我们看到，事实证明了俄国革命只是国际革命链条中的一环，我们的革命事业正在发展。”^④

“那时我们知道，只有我们的事业在全世界取得胜利，我们的胜利才算是胜利，因为我们开始我们的事业时，就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世界革命上……

我们的希望是寄托在世界革命上的，而这是绝对正确的……

如果我们现在来看一看国际关系，——我们一向强调我们是从国际的观点来看问题的——那末要在一个国家完成象社会主义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37卷第371—372页。《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的报告》。——译者注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42卷第40页。《关于俄共策略的报告》。——译者注

③ 《列宁全集》第2版第36卷第126页。《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译者注

④ 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39卷第348页。《在莫斯科省的县、乡、村执行委员会主席会议上的讲话》。——译者注

革命这样的事业是不可能的，——并且也看一看战争史”等等……

“不应当忘记，我们至多才获得一半的胜利。……我们一向懂得并且不会忘记，我们的事业是国际的事业，因此在一切国家（包括最富有和最文明的国家）的革命还没有完成以前，我们的胜利只是一半，也许一半还不到。……但是我们的胜利还远不是完全的胜利，我们所获得的胜利还不到完全胜利的一半。”①

“只要存在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我们就不能和平相处：最后不是这个胜利，就是那个胜利；不是为苏维埃共和国唱挽歌，就是为世界资本主义唱挽歌。”②

“从全世界历史范围来看，如果我国革命始终孤立无援，如果其他国家不发生革命运动，那么毫无疑问，我国革命的最后胜利是没有希望的。”③

“我们只有最后彻底地粉碎凭借技术和纪律的巨大力量支持的国际帝国主义，才能取得最终胜利。”④

“我们总是明确地说：没有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的支持，这个胜利就不可能巩固；只有从国际的观点出发才能正确估价我们的革命。为了取得巩固的胜利，我们必须使无产阶级革命在一切国家或者至少在几个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取得胜利。”⑤

“我们一贯说，我们只是世界革命链条上的一环，从来没有给自己提出只靠自己的力量去夺取胜利的任务。”⑥

① 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40卷第358—361页。《庆祝十月革命三周年的讲话》。——译者注

② 尼·列宁《全集》第XVII卷第398页。《1920年11月27日在莫斯科组织支部书记会议上关于租让问题的演说》。

③ 《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6页。《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译者注

④ 同上，第219页。《在莫斯科工人、农民和红军代表苏维埃的讲话》。——译者注

⑤ 《列宁全集》第2版第40卷第22页。《我国的国内外形势和党的任务》。——译者注

⑥ 同上，第40卷第42页。《在俄共（布）莫斯科组织支部书记会议上的讲话》。——译者注

“只要我们苏维埃共和国还是紧挨着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一个孤立地区，那种认为我国经济完全可以独立和各种各样的危险已经消失的想法，就是十分可笑的幻想和空想（着重号是我加的。——格·季·）。当然，只要这种根本对立还存在，危险也就存在，并且不能避免。”①

“你们大家自然都知道，资本是一种多么强大的国际力量，全世界最大的资本主义工厂、企业和商店之间有着多么紧密的联系，从这一点当然就可以明显地看出，按事情本质来说，要想在一个国家内彻底战胜资本是不可能的。资本是一种国际力量，要想彻底战胜它，工人在国际范围内也必须共同行动起来。自从1917年我们同俄国资产阶级共和政府作斗争时起，自从1917年末我们建立了苏维埃政权时起，我们就经常地、不止一次地向工人指出，我们根本的、主要的任务就是要把革命最低限度扩展到几个最先进的国家中去，这是我们胜利的基本条件。”②

“因此，现在我们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在我国这种小农和极小农的生产条件下，在我国这种经济破坏的情况下，我们能不能支持到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到社会主义的那一天呢？……我们的文明程度也还够不上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虽然我们已经具有这样做的前提。”③

这就是列宁的为数众多的声明。

这里是不是片面地选取了列宁的引文？这里是否有由发展的困难引起的某种“悲观主义”呢？

统统不是！

我们想，谁也不会指责象《共产主义ABC》这样的书有悲观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40卷第135页。《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关于对外对内政策的报告》。——译者注

② 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40卷第318—319页。《在全俄服装工业工人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译者注

③ 《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387—389页。《宁肯少些，但要好些》。——译者注

主义。这本书是在我们的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凯歌行进时写的。

其中我们读到：

“共产主义革命只有作为世界革命才能取得胜利……在工人只在一个国家取得胜利的情况下，经济建设（所有着重号全是原有的）、组织经济是极其困难的……如果要取得共产主义的胜利必须有世界革命的胜利和工人们的相互支持，这就意味着工人阶级的国际团结是胜利的必不可少的条件。”^①

这不是“悲观主义”，这不过是**共产主义 ABC**（不带书名号的）。

如果由于事变的结果，《共产主义 ABC》（带书名号的）在某些地方过时了（正象我们的纲领那样），那么无论如何过时的不是这一点。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思想。

我们摘录的列宁引文大部分也是在俄国革命和国际工人运动取得最大成就的年代写的。众所周知，列宁根本就不是个“悲观主义者”。

提及列宁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这不存在任何悲观主义。我们正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并且还将进行建设。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将成为社会主义的俄国。不过反正“共产主义革命只有作为世界革命才能取得胜利”——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是这样教导的。我们反正应当是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者，并且记住，社会主义制度的最终胜利要同一系列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同时取得。世界革命的时代开始了。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世界革命的最终胜利是有百分之百的保证的——尽管会推迟和会有反革命的“垂死挣扎”。我们在苏联越是坚毅、有信心，有成就地建设社会主义，在同样的条件下，就能越快地取得世界范围内的最终胜利。

列宁主义的这些根本原理现在也是完全正确的。起初认为，这将在一两年期间，或者甚至在不多的几个月内“最终”解决。然

^① 布哈林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共产主义 ABC》，彼得格勒 1920 年版第 106—107 页。

而，事变进程表明，我们这仅仅是“最初”的推论。在1921年，列宁已经写道：“只要在10—20年内和农民保持正常的关系，就能保证全世界范围内的胜利（甚至在日益发展的各国无产阶级革命推迟爆发的情况下），否则就会遭到20—40年白卫恐怖的苦难。”^①

列宁的上述纲领性声明是一分钟也不应忘记的。

从1917年起所经历的年代和1917年至1925年间世界革命的波折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看作是个“开端”。现在在世界范围内形成的局势可用列宁的话来概括：“长期拖延，双方谁都没有取得决定性胜利”，现在可以再加上一句：苏联社会主义的明显增长和明显地趋向于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 * *

在速度和时限问题上，我们取得了某些实际经验，现在谨慎一点了。

由于缺乏足够具体的历史经验，我党在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展时限问题上，尤其是在我国革命初期，不能不出现某些失算。

有一个时候（1918年），我们全都期待在几个月，甚至几个星期内在德国和其他几个国家里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

德国革命来得相当晚，并且还不是无产阶级革命，仅仅是打倒威廉二世，而不是消灭资产阶级政权的革命。然而就是德国这样的革命，加上一系列国家的革命震动，已足以使俄国无产阶级革命赢得时间，得到巩固。

结果发现：1. 世界革命发展进程缓慢得多，2. 然而还同时发现，第一个取得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苏联）一国（在其他国家工人的一定支持下）能支持的时间比革命初期所设想的要长得多。

我们现在已经清楚地看到，在我们认为需要几个月的地方，经常需要几年，而认为需几年的地方则需要几十年。这一方面涉及国际无产阶级革命成熟问题——它在成熟，但比我们想象的要缓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41卷第378页。《〈论粮食税〉的几个提纲》。——译者注

慢得多。但这也涉及第一个无产阶级国家处于许多国家组成的体系中还能孤立地存在多久的问题。

从1917年起我们所经历的八年,看来只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发展的开端。如果就1917年(无产阶级革命的一年)和1925年(这一年国际无产阶级组织——共产国际正式承认了资本主义的局部稳定)而言,可以相对地说,这头八年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第一轮,是其多少已完结的第一个时期。这个时期正在结束,哪一方都没有取得决定性胜利。欧洲几国资本主义的局部“稳定”因第一个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国家苏联国民经济的真正和稳固的稳定而取得平衡。无论如何,出现的不是—种稳定,而是两种稳定。出现了列宁早在1920年就已说过的某种平衡。^①

有一个时候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和苏维埃政权的命运完全同德国革命能否迅速取得胜利的问题联系在一起。例如列宁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在1918年3月7日的报告中)说:

“这是一个教训。因为,如果没有德国的革命,我们就会灭亡,——灭亡的地方也许不在彼得格勒,不在莫斯科,而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或更远的地方,我们也许不得不迁到那里去,到那里的距离可能比从彼得格勒到莫斯科的距离要远,但不管怎样,无论发生什么可能设想的情况,如果德国革命不爆发,我们就会灭亡,这是绝对真理。”^②

我们现在看到,事情不是这样。过了八年德国无产阶级革命还没有取得胜利,但是,有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加上一系列其他有利的情况,就足以使俄国的苏维埃政权赢得很长一段时间,以

① “结果,无论这一方还是那一方,无论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还是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都没有获得胜利,也没有遭到失败;其次,虽然我们的预言没有轻易地、迅速地、直接地实现;但是主要的一点我们办到了,就这方面说预言实现了,因为主要之点就在于,即使全世界的社会主义革命推迟爆发,无产阶级政权和苏维埃共和国也能够存在下去。”〔《列宁全集》第2版第40卷第22页。《我国的国、内外形势和党的任务》。〕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12页。——译者注

支持到德国和其他有决定性意义的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真正胜利成熟之时。

然而，只有在国际范围内才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最终胜利，列宁坚持这一思想无疑是正确的。

“唯有走我们已经走上的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才能得救。”^①——列宁在论证自己的喘息的理论时在《当前的主要任务》一文中这样写道。

“既然我们孤立无援，我们的任务就是在其他国家的革命到来之前，在其他部队到达之前把革命坚持下来，哪怕为革命保持一座不够坚固的规模不大的社会主义堡垒也好。相反，期待历史严格地按部就班和按照计划推动各国的社会主义部队，那就是不懂得革命，或者是由于自己的愚蠢而拒绝支持社会主义革命。”^②

列宁由此得出结论说，我们的策略是“随机应变，等待和退却的策略”。列宁自己把这种观点叫做“喘息的理论”。

在其他国家缺乏无产阶级革命的情况下，一个国家内的无产阶级政权能支持多少年，对这一点起初我们只有不很清楚的概念。直到现在 we 才开始正确地估计“时间”的因素。在著名的《给美国工人的信》（1918年8月20日）中列宁写道：

“我们知道，欧洲的无产阶级革命，不管它近来成熟得多么快，在最近几个星期内（着重号是我加的。——格·季·）还不可能爆发。我们指望国际革命必然发生，但这决不是说，我们象傻瓜一样指望它在某个短时期内必然发生……在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其他队伍来援助我们之前，我们就好象守在一个被包围的要塞里。”^③

与此同时，列宁还在十月革命的最初几个星期里就能向我们解释，为什么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将由法国人开始，而由德国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75页。——译者注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232页。《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关于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的报告》。——译者注

③ 《列宁全集》第2版第35卷第62—63页。《给美国工人的信》。——译者注

人完成”的预言没有得到证实，为什么“现在的形势与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预料的不同了，它把国际社会主义革命先锋队的光荣使命交给了我们——俄国的被剥削的劳动阶级；我们现在清楚地看到革命的发展会多么远大；俄国人开始了，德国人、法国人、英国人将去完成，社会主义定将胜利……。”^①

我们以月来计算时限，有一段时期甚至以周来计算，而在签订布列斯特和约之前几乎是以日计算的。然而以后事变的进程表明，在解决西方无产阶级革命发展速度问题上应作某些修正。

十月革命后不久列宁是这样估计“时间”的因素的：

“革命的到来，并不象我们所希望的那样快。历史已经证实了这一点，应当承认这是事实，要估计到，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在各先进国家，不可能象俄国革命开始时那么容易……在这样一个国家里，开始革命是很容易的，是轻而易举的事情……现在我们还只是接近各国社会主义革命开始的痛苦时期。”^②列宁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就是这样说的。

再过一年，我们又继续寄希望于事变的迅速进展了。

“根据最近的数字，华沙工人代表苏维埃中有波兰社会主义叛徒 353 人^③，共产党员 297 人。这就表明，照我们的革命日历来看，那里已离十月不远了。这已经是 1917 年的 8 月或 9 月……”

“我们知道，波兰和匈牙利的革命都在发展，并且发展得很快。这些革命会给我们以无产阶级后备力量，会减轻我们的困难而大大巩固我国的无产阶级基地。”

列宁在俄共第八次代表大会上（1919 年 3 月）这样说。但他立即补充说：

“这可能在最近几个月内发生，但我们不知道究竟会在哪一天

① 《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33 卷第 279 页。《关于人民委员会工作的报告》。——译者注

② 参见《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34 卷第 12—13 页。——译者注

③ 《列宁全集》上为 333 人。——译者注

发生……还没有颁布一个法令要一切国家都用布尔什维克的革命日历。”^①

* * *

我们还没有最终取得胜利。而无产阶级革命在一个国家是不能取得最终胜利的。资产阶级帝国主义阵营被矛盾弄得四分五裂。我们应当利用这一对我们有利的时机。而其他国家的工人将来帮助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正在一系列国家成熟。否则就不能理解列宁的整个“喘息理论”。这就是它的基础。我们在一个国家的决定性战役中赢得了胜利。在我们的其他大军到来之前，我们竭力等待，为自己取得“喘息时机”。喘息理论在列宁主义中起不小的作用。列宁的整个新经济政策是同“喘息”理论相联系的。按照列宁的说法，新经济政策首先是国内的大规模战略机动，其目的是甚至用重大的让步来更牢固地加强工人阶级同农民的联盟，特别是在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及时来到之前。这里应当牢记，工人阶级同农民的联盟今后（即在其他国家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之后）将比现在更加需要，而新经济政策（即目前工人阶级同农民联盟的形式）则是暂时的东西。工人阶级同农民的联盟，这是认真的，长期的，直到消灭阶级之前永远需要的。新经济政策则是认真的和长期的，但不是永远需要的。

作为**国际无产阶级革命家**（因为不这样也就没有列宁主义），我们很清楚，只有社会主义再在几个有决定性意义的国家内取得胜利之后，我们（即在苏联）才可能有牢固的**最终胜利**。正因为我们是**从国际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任务着眼**提出无产阶级专政目前时期我党的策略问题的，正因为如此，我们现在提出“面向农村”的口号，把它当作“认真的和长期的”口号。

从喘息理论可以毫无疑问地得出结论，列宁很懂得赢得时间的价值，同时也坚决认为，归根到底事情毕竟要在国际舞台上解

^① 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36卷第146、148、147页，《关于党纲的报告》。——译者注

决。换句话说，列宁是国际革命家而不可能是另一种革命家——否则他就不会是列宁，我们也就不会有列宁主义。

请回想一下列宁在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所说的：

“问题就是这样摆着：迄今为止，一切革命、一切最伟大的革命的成败都是由一系列的战争来决定的。我们的革命也是这种最伟大的革命。我们结束了一个战争阶段，应当准备迎接第二个阶段；但是，我们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到来，所以必须做到战争一旦到来，我们就能够应付自如。”

“如果说我们在战争的第一阶段已经取得了胜利，那么在战争的第二阶段，我们就不会那么容易地取得胜利，因此，必须特别注意这一方面。必须使每一个非党农民都明白这一不容置疑的真理，而我们也相信他们一定会明白。”^①

甚至资产阶级大革命也不只经过一轮战争，因而很清楚，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将经受不是较少的，而是更为大量的考验。第二轮战争的结局大概多多少少将最终解决问题。我们自然应竭力避免新的战争。但是否能做到这一点，这不取决于我们一方。列宁是这么说的，因为他是立足于国际革命的。在这里他不仅赋予西方，而且赋予东方以特殊的意义。

“而印度和中国在沸腾。这有7亿多人。再加上周围和它们完全相似的亚洲各国，那就占全世界人口的一大半。那里的1905年即将到来，而且正以不可阻挡之势愈来愈快地到来，但有一个根本的很大的不同之处：俄国的1905年革命尚能孤立地进行（至少在开始时），也就是说，没有一下子把其他国家卷入革命，而印度和中国的日益发展的革命现在正在卷入或已经卷入革命斗争，卷入革命运动，卷入国际革命。”^②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40卷第142、144页。《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关于对外对内政策的报告》。——译者注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176页。《庆祝〈真理报〉创刊十周年》。——译者注

在“日记摘录”里，列宁给予东方以更大的注意。在这里我们再一次看到列宁对我国革命同世界革命的命运的联系的看法——这是列宁最后一次表达的观点。

“因此，现在我们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在我国这种小农和极小农的生产条件下，在我国这种经济破坏的情况下，我们能不能支持到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到社会主义的那一天呢？不过，这些国家完成这一发展过程，不会象我们从前所期待的那样。它们完成这一发展过程，不会是经过社会主义在这些国家里平衡‘成熟’，而将是经过一些国家对另一些国家进行剥削，经过对帝国主义战争中第一个战败国进行剥削，再加上对整个东方进行剥削的道路来完成的。另一方面，正是由于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东方已经最终加入了革命运动，最终卷入了全世界革命运动的总漩涡。

在这样的形势下，我国应该采取怎样的策略呢？显然应该采取这样的策略：为了保住我国的工人政权，为了保持工人政权在我国小农和极小农中间的威望和对他们的领导，我们必须极其谨慎小心。现在全世界正进入一种必然引起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运动，这对我们是有利的。但是也有对我们不利的地方，这就是帝国主义者已把整个世界分裂为两个阵营，而且因德国这个真正先进的、文明的、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现在很难抬起头来而使这种分裂更加复杂化……

斗争的结局归根到底取决于如下这一点：俄国、印度、中国等等构成世界人口的绝大多数。正是这个人口的大多数，最近几年来非常迅速地卷入了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世界斗争的最终解决将会如何，是不可能有一丝怀疑的。在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是完全和绝对有保证的。”^①

由于西方两个资产阶级国家集团之间的尖锐斗争，我们获得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387—389页。《宁肯少些，但要好些》。——译者注

了几年时间的第一个喘息时机。由于它们的内讧，我们胜利了。现在的问题在于，我们能不能因西方帝国主义者同东方帝国主义者的内讧而赢得喘息时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问题正是在于，在东西方帝国主义者之间进行内讧的时候聪明地赢得时间，这将给我们以第二个喘息时机。

每当列宁提到我国革命的命运时，他总是把它同国际局势——同西方，也同东方联系在一起，他把它同国际革命的命运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以便不仅看到局部，而且看到整体。

列宁是彻底的国际革命家。他的学说不仅适用于俄国，并且适用于全世界。有一种想法认为，削弱列宁主义中的哪怕一丝一毫的国际因素而仍然能是列宁主义者，我们这些列宁的学生们应当把这种想法当作莫名其妙的东西从头脑中驱逐出去。

* * *

看看我们的农民政策。有人有时把它理解成这样：在目前局势下，除了向俄国庄稼汉及其经济要求鞠躬，向他们作让步而外，我们当然没有别的办法，然而这当然已经不是国际革命政策了。他们说，这不是马克思所写的，这不是叫做世界革命策略的那个东西。

这样提问题是对列宁主义的全然无知。俄国工人和农民的联盟正是胜利的世界革命的首要前提。我们现在在农民问题上贯彻的正是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为世界各国共产党规定的决议中的列宁主义原则。

如果说在 1848 年革命时代俄国农民起了反动因素的作用（俄国农民军队去扼杀了匈牙利革命等等），那末在 1917—19……社会主义革命时代，同我国工人阶级结成联盟的俄国农民客观上起着伟大的革命作用。

在我国农民政策目前这一篇章同国际形势、国际革命、世界无产阶级斗争状况之间是否存在某种联系（如果存在的话，那末是什么样的联系）？

不言而喻，是存在的。我们是国际革命的一部分。我们在共产国际和我们党的一些最重要的原则性决议之间不仅看到时间上相近，而且也看到逻辑上近似，其原因就在于此。

在实行新经济政策和世界范围内无产阶级革命速度延缓之间是否存在联系？无疑是存在的。

早在1918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已看清当时拟定的让步不仅同整个国际革命的延缓，而且同一国——德国革命延缓之间的联系。他写道：

“如果德国革命迟迟不‘诞生’，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学习德国人的国家资本主义，全力仿效国家资本主义，不惜采用独裁的方式加紧仿效。”^①

在1921年实行新经济政策之初这种联系在逻辑上和政治上就更加清楚了。当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说：

“毫无疑问，在一个小农生产者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里，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必须通过一系列特殊的过渡办法，这些办法在工农业雇佣工人占大多数的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是完全不需要采用的……

我们在许许多多的著作中，在我们所有的讲话中，在所有的报刊上都一再强调说，俄国的情况不同，这里产业工人仅占少数，而小农则占大多数。在俄国这样的国家里，社会主义革命只有具备两个条件才能获得最终的胜利。第一个条件是及时得到一个或几个先进国家社会革命的支援……

另一个条件，就是实现自己专政的或者说掌握国家政权的无产阶级和大多数农民之间达成妥协（所有着重号都是我加的。——格·季·）……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280页。《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译者注

我们知道，在其他国家的革命还没有到来之前，只有同农民妥协，才能拯救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①

所以，在我们这样小农占多数的国家里，只有在两种条件下我们才能取得最终胜利，摆在我们面前的不单单是工人党的“一般”任务，而是工人党在农民国家里的任务。在这种国家里共产党最终胜利的可能性是同实现两个条件联系着的：第一个是国际条件，第二个是国内性质的条件。第一个条件是，在这种国家里社会主义革命只有在得到一个或几个先进国家社会革命的及时支援下才能取得最终胜利。第二个条件是同农民达成妥协。

在这里两个条件中的任何一个条件都不能代替另一个条件；为了取得完全胜利必须两个条件都具备。列宁从来没有这样提问题：对我们来说农民只是同盟者的代用品，我们是它的所谓“不得已的盟友”。列宁主义历来清楚地知道，为了取得完全的和最终的胜利，我们需要使两个条件都得到兑现。存在其中的一个条件不能取代另一个条件，而只能改变它的形态。无产阶级革命在一系列国家的迅速胜利不会使我们可以不需要（和不希望）工人阶级同农民的联盟，而只会改变该联盟的环境。而另一方面，我国工人阶级同农民的最紧密的联盟也不会使我们可以不需要为取得最终胜利而实现第一个条件；为了使我们的革命防止资本主义关系复辟的危险，必须有其他几个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我们苏联工人阶级同农民的巩固联盟只是在下列含义下改变关于第一个条件（其他国家的革命）的问题提法，即给我们更多的时间和可能去等待其他国家正在发展的无产阶级运动并取得胜利。

其他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迅速胜利在何种意义上能改变苏联工人阶级同农民妥协、联盟的环境呢？

最好用列宁的话来回答这一问题（我们指的是他在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和他的文章《论黄金在目前和在社会主义

^① 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41卷第50—51页。《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报告》。——译者注

完全胜利后的作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这样说的：为了使我国工人阶级同农民的联盟得到完全巩固；为了使联盟立足于不可动摇的基础上，同时为了使之迅速向社会主义发展——为了这些我们必须转而实行大工业产品同农产品的直接交换。我们不能现在就在我国做到这一点。为什么？经济不允许这样做，因为首先我们的大工业还极为薄弱。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十月革命的路线是不正确的呢？这是否意味着，孟什维克关于在经济不发达国家无产阶级不应当夺取政权，社会主义的条件根本就没有成熟的说法是正确的呢？不，不是这个意思。

列宁说：

“说到能够立刻用一切必需品满足农民需要的发达的大工业，那么这种条件是存在的。就世界范围来说，这种能够给全世界提供一切产品的发达的大工业是有的（着重号是我加的。——格·季·），可是人们却只会用它制造枪炮弹药和其他武器，而且在1914—1918年使用得非常成功……”

但是，我们还是有理说，就世界范围而论，这种工业是有的，世界上有些国家是拥有能够立刻向亿万落后的农民提供产品的先进大工业的。我们就是在这个基础上作出自己的估计的（着重号是我加的。——格·季·）。

我们是在落后这种情况下投入革命的。因此现在没有我们所必需的发达的工业，那我们该怎么办，撒手不干吗？灰心丧气吗？不。我们要作艰巨的工作，因为我们走的道路是正确的。毫无疑问，只有走人民群众结成联盟的道路，农民和工人的劳动才会是自己的劳动而不是为剥削者的劳动。”^①

在《论黄金的作用》一文中列宁是这样结束这一思路的：

“就世界范围（着重号是我加的。——格·季·）来说，这种‘假定’没有的东西已经有了，这个条件已经具备了，但是，某一个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42卷第334、336—337页。《关于共和国的对内和对外政策》。——译者注

国家,而且是最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之一,在试图马上直接实现即实际建立工业和农业之间的这种新的联系时未能用‘强攻’方法完成这项任务,现在就不得不采取一系列缓慢的、渐进的、审慎的‘围攻’行动来完成这项任务。”①(着重号是我加的。——格·季·)

列宁在另一个地方说:“你们应当记住,现在包围着我们这个经过多年磨难而贫穷不堪的苏维埃国家的,不是会用自己高度发达的技术和工业来帮助我们的社会主义法国和社会主义英国。不是的!我们必须记住,现在它们的高度发达的技术和工业,全部都归反对我们的资本家所有。”②(着重号是我加的。——格·季·)

无产阶级革命只在一国或数国的胜利怎样改变我们在苏联取得最终胜利所必须的第二个条件,即这一胜利如何促进苏联工人阶级与农民的最紧密的联盟,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就是这样。如果我们在列宁讲过的那些有决定性意义的国家里取得了胜利,那末我们就会即使不是在世界范围内,至少也在几国范围内立即利用大工业,使之成为决定我们在较好的形式下,在好得多的形势下同农民妥协的因素。

在这种意义上,无产阶级革命在一国或几国的胜利虽然没有改变我们同农民联盟的必要性本身,但是它却能改变这个联盟的条件,使这一联盟具有大得多的稳固性,能为它创造好得多的物质基础。

但是问题就在于,到现在为止这种胜利还没有来到,因而必须更为谨慎地对待同农民的妥协。列宁说,我们知道,在其他国家革命还未到来的时候,只有同农民妥协,才能拯救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

在不久前发表的《论粮食税》一书纲要中,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问道:“农民的‘个人主义’对社会主义是否可怕?他们的‘自由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42卷第249页。——译者注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42卷第193页。《新经济政策和政治教育委员会的任务》。——译者注

贸易’是否可怕？”他回答说：

“不可怕。”……

“如果经过10—20年的电气化，小农的个人主义和他们在地方流转中的自由贸易就一点也不可怕了。如果没有电气化，回到资本主义去反正是不可避免的。”①

我们有时认为，电气化无非就是建设电站。不，不是这样。电气化，这就是工农业的普遍高涨，技术的普遍进步，技术的新阶段，生产力发展的新阶段。

列宁在评苏汉诺夫的札记中出色地说明，在局势的某种结合下工业不是最发达的国家可以“开始”。但是没有电气化，这个国家要“继续”和“完成”是困难的，不可能的——甚至在能保障它的国际后方的情况下也是如此。没有“电气化”（即没有生产力的高涨），退回到资本主义“反正”是不可避免的。非常幸运，我们苏联现在可以有可靠的希望，在我们的政策正确的情况下，这种危险的威胁已经不很大了！

* * *

“不断革命论”的根本错误正是在于对农民这一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斗争中，尤其是在无产阶级夺得政权之后的同盟者的作用估计不足。

把下面两段引文作一对照，你们就会清楚地看到列宁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在这一问题上的根本分歧。

列宁 1920 年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关于土地问题的提纲中写道：

“上述三类空前愚昧、十分分散、备受压抑的、在一切最先进的国家中必然过着半野蛮生

托洛茨基同志 1922 年在《1905年》一书的序言中写道：

“恰恰相反，无产阶级先锋队正是为了保证自己的胜利，还在它统治的初期，就不仅要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41卷第377—378页。——译者注

活的农村居民,虽然在经济上、社会上和文化上会从社会主义的胜利中得到好处,但是只有在革命的无产阶级夺得政权以后,只有在革命的无产阶级坚决镇压大土地占有者和资本家以后,只有在这些备受压迫的人在**实践中**看到他们有了这种组织起来的十分强大坚定的领导力量和保护力量来帮助和领导他们,给他们指出正确道路以后,才能坚决地支持革命的无产阶级。”^①

最深刻地侵犯封建所有制,而且要最深刻地侵犯资产阶级所有制。在这种情形下,它不仅会和那些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初期支持过它的一切资产阶级集团发生**敌对的冲突**,而且会和那些协助过它取得政权的广大**农民群众**发生敌对的冲突。在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落后国家,工人政府所处地位的矛盾,只有在国际范围内,在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舞台上,才能求得解决。”^② (着重号是我加的。

——格·季·)

夺取了政权,我们巩固了自己对农村的经济领导,现在进入了一个完整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农民对我们的支持是有长期和巩固的保障的。按照列宁的看法,正是在无产阶级夺得政权之后,基本农民群众对无产阶级的支持是坚决而牢固、认真而长期的。

在托洛茨基同志那里,所有这一切恰好“相反”。

这两段引文就象“一滴水见太阳”那样反映了托洛茨基主义同列宁主义的根本分歧。由于完全不懂得农民的作用,尤其是农民在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的作用,这就使得托洛茨基同志把苏联社会主义经济的真正高涨“推到”国际革命胜利之时。^③而在俄国革命胜利和它在国际范围内的胜利之间,他看到的不是无产阶级同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39卷第170页。《土地问题提纲初稿》。——译者注

② 列·托洛茨基《1905年》第4页。

③ “俄国社会主义经济的真正高涨只有无产阶级在欧洲几个最重要的国家内获得胜利以后(着重号是我加的。——格·季·),才会是可能的。”1922年托洛茨基在《和平纲领》中就是这样写的(《托洛茨基全集》第3卷第1册第93页)。

农民在革命胜利国家里的合作，而是工人阶级同农民的“矛盾”和冲突。

* * *

不应把事情想象得过于简单。如果要问我们是否应当，我们是否能够，我们是否善于在一国建设社会主义，我们就回答说：当然应当、能够、善于、一定。我们现在就要为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什么也不等待，要不住手地工作。我们肯定能够“保持住我们的革命”和“为它保存哪怕几个社会主义的堡垒”，并且甚至是强有力的。力量在不断增长的堡垒。我们现在有可能并且应当利用这种可能在一个国家尽最大的力量去支持世界各国的革命，首先是用在暂时还是“一个”国家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工作去支持世界各国的革命。

到1925年，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基地大大扩大了。我们已不仅有建设社会主义的“政治条件”（即工人掌握政权），并且具有较为象样的生产基地，物质基地。有些人现在才在造林，而把着手建造大厦的任务推到遥远的将来，我们这里不应有这种人的情绪。不，我们现在已经应当建造大厦本身，而不是去造林。我们这里不应有“露宿”的气氛。我们在建造牢固的无产阶级大厦。我们应当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同时记住我们的胜利是国际胜利的一部分，我们自己是国际革命天秤上的一个不小的砝码，我们自己是国际革命的最重要的队伍。我们占地球面积的六分之一，我们是国际革命的最大的“分数”。国际范围内的革命成就取决于我们的努力、我们的劲头、我们在经济和其他方面的成就。

最终结局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将取决于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善于利用历史给予我们的“喘息时机”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目前历史发展时期的结局“归根结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一点。

在一个农民国家里，我们现在必须更多地考虑农村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列宁在逝世前不久指出了这条道路。

我们要一次又一次地提出列宁的最后一篇文章《论合作社》

(1923年)中的说法，它在目前条件下具有特殊的意义，其中写道：

“情况确实如此，国家支配着一切大的生产资料，无产阶级掌握着国家政权，这种无产阶级和千百万小农及极小农结成了联盟，这种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得到了保证，如此等等——难道这不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难道这不是我们通过合作社，而且仅仅通过合作社，通过曾被我们鄙视为做买卖的合作社的——现时在新经济政策下我们从某一方面也有理由加以鄙视的——那种合作社来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的一切吗？这还不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但这已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而且足够的一切……如果不是因为国际关系，不是因为必须为我们在国际范围内的阵地进行斗争，我真想说，我们的重心转移到文化主义上去了。”①（着重号是我加的。——格·季·）

我们在思考列宁的最后著作《论合作社》时，一分钟也不应忘记下面这一点：从大的原则观点来看合作化问题，描绘应当最终排挤资本主义制度成分的苏联未来的“合作社制度”，列宁也就为我们革命提出一个绝对正确，唯一可能的伟大纲领和广阔前景。他向我们指出了“小农和极小农”走向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

列宁在这篇文章中还涉及同苏联合作社最近发展阶段有关的问题（指出国家必须给予合作社以一定的优待；指出必须加强党在合作领域的工作，等等）。然而，列宁这最后一篇文章的重心却在头一部分；这就是至少为期十年的广阔的根本前景。党应当依据实践经验“中介出”这条道路。在把合作社完全纳入社会主义体系之前，在合作社在某种含义上“在社会主义锅炉中熔炼”之前，苏联合作社发展最近一个阶段（或最近几个阶段）的实际问题首先只能在最近几年依据实践经验予以解决。毫无疑问，哪怕是合作社形式去组织小生产者、小私有者都是一件经济上、政治上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360、365页。——译者注

极端困难的事业，要解决这些困难，就应当看到这些困难。列宁当时所说的合作社具有“化学分解出”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特性，在合作社建设的最近几年无疑是仍然有效的。

对我们来说，这里没有任何无法克服的困难。在正确的政策下，我们一定能克服这些困难。但是必须清楚地看到面临的争取建立合作社的斗争和合作社内部的斗争。农村越是恢复元气，在开头那段时期在农村争取建立合作社的斗争和在合作社内部的斗争就会越严重，应当看到这一点。

在把全部热情和所有精力投入发展合作社的事业的时候，我们只有从一开始就以清醒的阶级观点去看待新经济政策环境下最近阶段的合作社问题，只有在这一领域中既不为最初的失败而灰心失望，也不因取得初步成就而产生幻想和患“合作社的”近视症，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忠实于列宁关于合作社所说过的一切。

应当看清农村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但也必须看到这条道路上的沟壑和绊脚石。做到这一点我们就一定能取得胜利。

* * *

苏联无产阶级专政十周年快到了。新经济政策的头五年很快就要满期了。这头五年的经济总结对于判断我们能在苏联以多快速度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具有巨大的意义，而苏联目前还是唯一的社会主义联盟，暂且还是在“资本主义包围”下发展的。

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列宁曾怀着巨大的胜利的心情告诉国际无产阶级的代表，苏维埃共和国在国际贸易中积累了10亿金卢布等等，同时向共产国际描绘了我们用积累起来的这10亿卢布去恢复我们的重工业的前景。目前我们已能提供全然不同的数字。

摆在我们面前的是《1925—1926年度苏联国民经济控制数字》（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团给劳动国防委员会的报告）。只要选这一报告中几个最主要的数字就够了。

1924—1925年度国内生产的全部商品为730700万卢布（按

战前价格),而1913年为1 150 900万卢布(63%),1925—1926年度提高到914 900万卢布,为战前商品总量的79%。

注册工业的总产量1913年为562 060万卢布,1924—1925年为397 730万卢布,等于战前的70%。

在注册工业中的工人数1913年为2 598 600人,而1924—1925年为1 841 000人,等于战前的70.8%。

按战前价格,每一工人的总产值1913年为2 162.9卢布,1924—1925年为2 160.4卢布,等于战前的99.9%。

我国的运输货运量,1913年为767 100万普特,1924—1925年度为457600万普特,1925—1926年为610 000万普特。因此,1925—1926年的铁路货运量等于战前的80%。

我国工业投资1925—1926年约达97 000万卢布,其中用于新建工程32 400万卢布,用于恢复64 600卢布。

下年度进出口将超过20亿。其中出超15 000万卢布。

注册工业工人人数增长预计为21%。每名工人的产量预计增长15%。正常的实际工资这一年大约将增长20%。

住宅建设已开始。预算在增加并得到改善。

1920年我国注册工业的总产量下降到[战前的]17%;到1925年我们从17%提高到70%!很快就要提高到100%。1925—1926年农产品大约应提高到战前的87%。

这就是基本数字。已出现经济的迅速高涨,它具有经济继续以更高的速度高涨的全部征兆。我们以极其满意的心情写下了这一总结。

然而,列宁主义者不能仅仅从单纯生产力发展的观点去看待苏联的今后命运。不发展生产力就没有社会主义,这是对的。但是在存在着象新经济政策这样的过渡制度下,这种以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同资本主义经济成分斗争为基本特点的过渡制度下,从单纯生产力发展的观点看问题是不正确的,有一股“苏维埃”司徒卢威主义的气味。现在谁也不敢否认我们的经济高涨。全部问题在于

生产力“向哪儿发展”。全部问题在于**社会主义成分**在我国经济普遍发展中起什么样的作用。

在上引报告和斯·斯特卢米林的极有意思的著作《我们的经济社会化没有?》中所公布的数字说明,我国国民经济的社会化进程总的说来开始得到顺利发展。

“除具消费意义的住宅基金,在国内现存的物质生产资金中,到1924—1925年度初按最低的和极不完全的统计,国家拥有的基金不少于117亿切尔文卢布,合作社拥有5亿,私有经济主要是农民经济拥有75亿。因此,在生产资料社会化方面62%以上已社会化,38%有待于通过合作化和国有化实现社会化。其中,在农村我们的基金实现社会化的目前不足4%,而在城市,包括大工业和铁路运输业在内则达97%。

在工业部门,生产资料社会化已达89%,其中大工业部门达99%。至于大工业和小工业的生产总额,控制数字所反映的变动情况如下:

总产量和百分比(单位百万切尔文卢布)

年 份	国家和合作社产量		私有产量		总 计	
	绝对数字	百分比	绝对数字	百分比	绝对数字	百分比
1923—1924	5 562	76.3%	1 728	23.7%	7 290	100%
1924—1925	7 550	79.3%	1 970	20.7%	9 520	100%
1925—1926	9 186	79.7%	2 334	20.3%	11 520	100%

我们看到,社会化企业的产量不仅在绝对数字上有巨大的增长——两年期间增长65%,并且它在总产量中的比重一年比一年有明显的提高。”^①

这些数字(它们当然是大概的数字)是建立在最乐观的基础之上的。然而我们再说一遍,列宁主义者不应忘记,在叫做新经济政策的过渡制度中,在另一种“社会化”卢布中还仍然存在着资本

① 《经济生活》1925年第2009期。

主义竞争者或竞赛者，存在着资本主义细菌，这都有待于消灭，应逐渐使之“安眠”。在我们这里，可以说几乎在我国经济的每一个原子之中都或多或少地进行着社会主义成分同资本主义成分之间的竞赛。无论如何都不应忘记这种一般眼睛所看不见的竞赛的分子运动，这种竞赛最后还会变成直接的阶级斗争。

也不应闭眼不看，甚至在我们的大工业中工作的工人也常常感到自己是雇佣工人，还不是随时都意识到自己是社会主义的生产者，是在自己的社会化的社会主义工厂工作的。在这一点上，存在着失业者、工资不够高、存在流离失所现象等诸如此类的事实起着巨大的作用。

在我们这里，农村的社会主义经济成份主要是合作社。合作社有远大的前途。它在农村无疑起着列宁在最后的文章《论合作社》中为它规定的那种作用。据中央统计局统计，在苏联13 500万居民中有3 150万人(包括家庭成员)已合作化。因此，到1925年在苏联将近有23—25%的居民已合作化。这当然是个重大的开端，特别是如果注意到我们这里合作社较为正常的发展大致上是从1923年才开始的，尤其是如果考虑到我们在最近几年所看到的合作社的迅速发展。然而，在这里也不能陷入自满，不能把事情想象成，似乎目前的每一个合作社现在已经可以同社会主义画等号了。在我们这里，在有的“合作社”卢布中继续有资本主义的细菌生活着。在我们的合作社里资本主义的残余还很强大，并且在相当长的期间内仍将很强大。在合作社内部现在进行着，在相当长时间内还将进行着独特的阶级斗争。在农村，社会化的基金目前还不足4%(见上引斯·斯特卢米林的统计数字)。虽然农村的“基金”在绝对数字上少于属于国家的“基金”(大约是7:11)，但不应忘记下列基本事实：农民在我国占居民的绝大多数，单单农民占多数这一事实就给我国经济的全部发展、给全部社会生活打上强烈的印记。存在着小资产阶级商品经济。它散布得还很广。它的作用还很大。阶级差别尚未消灭。农村的实际影响大大超过7:11

这个对比数字。列宁在不久前写道：“农民构成(俄国)全体居民和全部经济的巨大部分(着重号是我加的。——格·季·)。这是最基本的经济常识。”不应忘记，虽然最近两年私人资本在大小工业中的相对作用下降了(从1923—1924年度的23.7%下降为1924—1925年度的20.7%)，但在此期间私人资本的绝对数字却从1923—1924年度的172 800万增加为1925—1926年度的233 400万。

我们应当记住列宁的话：

“显然，全部工业不按照大机器生产的要求来改造，社会主义建设就只能是一大堆法令，只能是工人阶级同农民在政治上的一种联系，只能使农民挣脱高尔察克和邓尼金的统治，只能给世界各国提供一个榜样，然而却没有自己的基础(着重号是我加的。——格·季·)。共产主义是以苏维埃政权这一能使被压迫群众完成各项事业的政治机构为前提的，否则共产主义便是不可想象的……

这是政治方面的保证，但是经济方面，只有当建立在现代技术基础上的大工业机器的一切脉络真正布满无产阶级的俄国时，才算有了保证。”^①(着重号是我加的。——格·季·)

“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剥削者阶级，即地主和资本家阶级，还没有消失，也不可能一下子消失。剥削者已被击溃，可是还没有被消灭。他们还有国际的基础，即国际资本，他们是国际资本的一个分支(着重号是我加的。——格·季·)。他们还部分地保留着某些生产资料，还有金钱，还有广泛的社会联系……他们的作用比他们在人口中所占的比重大得多。”^②

我们有一切根据满怀信心地展望未来。国家在发展。我们不仅看到生产力的普遍增长，我们还看到我们经济中社会主义成分的逐步增长。与此同时，如果我们想做一个彻底的列宁主义者，我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40卷第31页。《我国的国内外形势和党的任务》。——译者注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37卷第275页。《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译者注

们就应当清楚地看到，**在城市和农村都在进行着阶级斗争**。我们一分钟也不应当忽视，从个体农民经济中正在生长出资本主义，列宁在新经济政策年代曾不断提醒这一点。

我们把一个上升的阶级即无产阶级所能发挥出来的全部热情、全部能量、全部胆略投入在苏联提高国民经济、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与此同时我们应当最坚定地坚持列宁主义关于一个国家不可能取得社会主义最终胜利的极其重要的论点。每一个新建成的工厂，我们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对资本主义成分的每一个胜利，每挥动一次“社会化”的铁锤去敲击我们苏维埃祖国的工业的铁砧，都应当使我们的工人，使我们的党员成为受更多锻炼的**国际无产阶级革命家**。只有到那时候我们才能避免陷入农民狭隘性王国的危险，这是列宁在其政治遗嘱中提请我们注意防止的危险。

* * *

列宁的最出色的文章之一（我们指的是写于1922年春的《论攀登高山》一文）对我们在本章中所涉及的问题提供了很好的答案。此文似乎是专为今天而写的：

“我们‘干净利落地’‘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在世界上是从未有过的……”

但是，我们连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也没有建设完成。**仇视我们的垂死的资本主义势力还有可能把这夺回去**（着重号是我加的。——格·季·）。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公开地承认这一点，因为再也没有什么比产生错觉（和冲昏头脑，特别是在极高的地方）更危险的了。承认这一痛苦的真理根本没有什么‘可怕’，也决不会使人有正当的理由可以有一丝一毫的灰心失望，因为我们向来笃信并一再重申马克思主义的一个起码的真理，即要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必须有几个先进国家的工人的共同努力……有些共产党员既不陷入错觉，也不灰心失望……这样的共产党员就没有完蛋，而且很可能不会完蛋……我们尤其不容许有丝毫灰心失望，也没有理由灰心失望，因为我们虽然处于经济破坏、贫困、落后

和饥荒的情况下,但是,我们毕竟在为社会主义创造条件的经济领域内开始前进了。”①

列宁在这篇文章中反对了,并且是正确地反对了灰心失望情绪。但与此同时他也向幻想宣战。“在极高的地方冲昏头脑特别危险”——列宁提醒说。这一提醒对目前来说非常及时,因为现在经济的重大高涨已经开始,我们正开始攀登越来越多的“高峰”。这里不允许有幻想,在这里丧失头脑,开始用玫瑰色去看待一切,把我们在社会主义发展的情况下暂且还只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东西看作是社会主义,看不到实际上阶级斗争还极为紧张,等等,等等,这是最危险的。

有一种情绪也极为危险,这种情绪可以归结为没有国际无产阶级的支持,我们也“对付得了”。列宁写道:“我们向来笃信并一再重申马克思主义的一个起码的真理,即要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必须有几个先进国家的工人的共同努力。”②“笃信并一再重申”,还能比这说得更清楚吗?列宁主义的这一真理现在也应当“笃信并一再重申”。

这样提问题自然同下述“观念”,毫无共同之处,这种“观念”认为,没有国外的贷款,我们就不能更新我国工业的固定资本,不给予外国资本家大型租让企业,我们就不能振兴经济,等等,因此应当“指靠西方”,向外国资本家作更大的让步,等等。当然我们不反对按照有利于我们的条件的贷款和租让企业。但是,我们的主要指靠不是这些,而是内部的发展力量。我们作了相当大的让步,以便从麦克唐纳“同志”(他当时任内阁大臣)那里取得2亿至3亿卢布的贷款。事情没有成功。而1925年我们从“丰收同志”那里取得了更大数目的“贷款”,并且是按更为有利的条件取得的。今年我们已经能把几乎整整10亿资本投入工业。当然,穿上10亿的靴子

① 尼·列宁《论攀登高山,论灰心的害处》,写于1922年2—3月,发表在《真理报》1924年第87号[《列宁全集》第2版第42卷第449—450页]。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42卷第450页。——译者注

的苏联工业开始迈出巨大步伐，朝“美国”速度前进。

然而这仍然不是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

“在目前最困难的关头，自欺对革命者是最有害的。”^①

不应当灰心，也不应当幻想。认为为了使正在成长的青年一代保持蓬勃的朝气，为了给他们以能取得最终胜利的信心，需要粉饰现实和美化未来，这是完全错误的。列宁从来没有这样做过。“我们尤其不容许有丝毫灰心失望，也没有理由灰心失望，因为我们虽然处于经济破坏、贫困、落后和饥荒的情况下，但是，我们毕竟在为社会主义创造条件的经济领域内开始前进了。”^②列宁在1922年春天是这样写的，写得简短、谨慎。然而在这不轻许的谨慎语句中却确实可以感觉到真正的乐观主义和对最终胜利的真正信心。

1925年更不允许陷入灰心失望。在俄共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1923年）我们是乐观主义者。1925年我们有更多的根据这样乐观了。

苏联开始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进行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和一般政治建设。共产主义的犁将越来越深地插入大地，我们将以自己的建设工作把越来越多的“下层”人民群众发动起来。相信人民群众，相信“下层”人民群众的创造力，这是列宁的最出色的特点。全党完全继承了这种信念。党能够在数年内把数千万工人和农民群众发动起来。党能够领导全体工人阶级建设社会主义。党能够领导人民达到无阶级社会。党能够为社会主义建设而利用每一个细小的现实的机会。党能够把正在成长的整个年青一代吸引到真正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文化的道路上来。正是为了能胜利地完成这一切，党将同对列宁主义的任何修正，特别是同任何民族局限性的倾向作斗争。正是为了完成这一具有世界历史重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178页。《庆祝〈真理报〉创刊十周年》。——译者注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42卷第450页。《论攀登高山，论灰心的害处》。——译者注

要性的伟大任务，党应当首先成为**彻底的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党**。

列宁教导说，如果西方不发生社会主义变革，那末俄国甚至真正民主革命的胜利也缺乏牢靠的保障。列宁把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甚至看作是俄国民主革命免除复辟的保障。

列宁在斯德哥尔摩“统一”代表大会(1906年)的发言中说：“俄国革命可能单靠自己的力量来取得胜利，但是它绝对不可能单靠自己的一双手来保持和巩固自己的胜利果实。只要西方不发生社会主义革命，俄国革命就不可能做到这一步……我们的民主共和国除了西方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以外，没有任何后备军。在这方面不应该忽视，欧洲典型的资产阶级革命即十八世纪的法国大革命决不是在俄国革命所处的国际环境下发生的。十八世纪末叶包围法国的是一些封建国家和半封建国家。然而包围着正在进行资产阶级革命的二十世纪的俄国的一些国家，是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已经全副武装起来就要同资产阶级作最后的搏斗的国家。”^①

列宁这里所说的一切尤其适用于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除了国际社会主义革命(和在一定限度内——东方被压迫民族)，它早已没有任何其他后备力量。除了一系列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它早已没有任何其他防止资本主义制度复辟的绝对保障。谁忘了列宁1907年所说的这些话，谁不善于把它用于目前局势，谁就是向“民族局限性”作让步。

毫无疑问，整个目前局势(欧洲革命速度放慢，苏联经济开始重大的增长，新经济政策造成的全部社会政治麻烦)造成了阉割列宁主义，特别是他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国际性质论点的“需要”。在目前的革命时期，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影响，首先表现在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企图把我国工人阶级和我们党推向民族狭隘性^②、小市民的闭关自守、小资产阶级的自我满足的立场上去。这

^① 《列宁全集》第10卷第249页。——译者注

种社会情绪是存在的。

不管多么离奇,但这是事实:这种情绪本身也是苏维埃政权普遍发展和巩固的征候。力量随筋脉外传——不论在城市,还是在农村,经济都在发展和加强,在恢复和巩固。人民群众中间出现一种完全可以理解的正当愿望,要求休息一下,在自己的土地上当一阵子家,积聚新的力量,摆脱危机、军事纠纷、紧张斗争、国际冲突等等而休养一段时期。在共产党人中间也有这种情绪。无产阶级的敌人——国际资产阶级的思想家、路标转换派(见乌斯特里亚洛夫的书)等等就企图利用这种情绪,把布尔什维主义推上民族狭隘性的道路。

应当注意、考虑和顾及人民群众的这种情绪。领导国家的我们党必须尽一切可能去保障尽可能长期的和平及和平劳动的可能性。指出这方面问题的人的功绩是巨大的。对这种情绪应当敏感。然而对群众要敏感不等于对他们的弱点要迎合讨好。对群众要敏感并不等于要对他们的偏见简单地随声附和。在这方面“尾巴主义”是特别危险的,我们大家必须明白这一点。正是千百万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要求在目前时代比任何其他时候更要把俄国革命的全部问题同国际革命的问题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如果把耳朵贴在地面上,在劳动居民的深处倾听目前群众的情绪,那就可以感觉到两种情绪。

头一种,头一类情绪是:经济终于开始复兴了;我们终于开始

- ② 俄共第十四次代表会议的决议揭示了这种民族局限性的根源。“由于国际舞台上的既定形势,在目前时期能够威胁到我们党的有两种危险:(1)消极倾向(这是由于过分夸大某些地方呈现出的资本主义的稳定状态和国际革命的缓慢速度而产生的),缺乏一种在国际革命的速度缓慢的情况下仍要坚决地有步骤地从事苏联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充沛的热忱;(2)民族狭隘性的倾向,忘记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者的责任,不自觉地忽略苏联的命运和发展着的(虽然是缓慢发展着的)国际无产阶级革命有着极密切的关系,不懂得不仅国际运动需要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国家的存在、稳固和强盛,而且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也需要国际无产阶级方面的援助。”[《苏共决议汇编》第3分册第51页]。

医治战争带来的创伤了；我们想休息，我们想耕种自己的土地，我们想和平地劳动，我们想提高自己的福利；使我们避免新的危机和动荡；少把我们的命运同国际命运联结在一起，危机受够了，风暴受够了；我们“不反对”国际革命，但我们不认为这是自己的切身事业；我们无论如何都要安静。

另一种，另一类情绪是：我们也全心全意地要安静，我们也主张和平，我们不想要新的战争和新的磨练，我们也想献身于和平劳动；但我们知道，我们从1914—1925年的经验中看到，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全部社会生活业已国际化；1914年的战争教给我们，各民族人民的命运纠缠在一个国际线团之中；我们知道，我们无法在罗汉松下为自己修建单人修道室；我们知道，只有把几个最大的国家的帝国主义野兽的牙齿拔掉，只有几个国家的工人获得胜利，只有不仅在我国，而且在其他一系列大国中资本主义被推翻，只有在这之后我们才能为自己创造“永远”从事和平劳动、提高文化、完全巩固社会主义的可靠的可能性。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应当把自己的命运同国际革命运动的命运联结在一起的缘故；这就是为什么例如各国工人代表来到我国访问，对我们来说，不仅具有愉快的示威性质，而且也是必不可少的食粮，是切身的事情。

怀第一种情绪的既有农民，也有许多工人，有时还有共产党人。这种情绪不可避免地也在国家“机关”中有所反映；而从机关又部分地甚至传到党内。不应为自己制造任何幻想。第一种情绪大约多于第二种。这在目前是较为广泛的情绪。而第二种情绪是先进的、先锋队的、较为坚定的情绪，虽然不那么广泛。在目前局势下实行专政的无产阶级政党，在自己的政策中必须顾及头一种情绪。但是必须支持、爱护、珍视、发展第二种情绪。应当把头一种情绪“拉向”第二种，而不是相反；当然要巧妙地，小心谨慎地拉。但恰恰是应当拉向第二种。因为正是这第二种情绪符合革命发展的路线，因为只有它才反映我国人民中最先进成分的集体智慧，因为只有它能加强作为国际无产阶级革命党的我们党。

我们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正确理解的“民族”利益正是要求用国际主义的态度去对待基本问题。苏联自身的基本的和根本的利益，要求苏联把自身的命运同国际革命的命运联结在一起。“大俄罗斯人的民族自豪感”（请回想一下列宁的出色文章）要求首先解放被压迫民族和实现各被压迫民族的完全平权。这并非“牺牲”。顺从地允许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可能自由的。现在也必须这样说：从国际革命的观点去解决苏联的所有问题，这并非苏联所作的“牺牲”，只有按照历史进步的路线制订自己的全部政策（和自己的整个经济）的国家，其前途才是可靠的。国际革命，这就是人类的明天。无产阶级是上升的阶级，它不仅看到自己的今天，也看到自己的明天。这也就是对劳动人民来说最“合理”、最“有利”的政策。

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不是发展得很慢吗？是的！但是同指靠缓慢地（然而肯定地）走下坡路的国际资产阶级比起来，指靠缓慢地（目前还是缓慢地）走上坡路的国际无产阶级对苏联来说毕竟合理一些，对劳动群众来说毕竟“有利一些”。

列宁主义教导说，而最近的全部事变也完全证实了：没有全世界或至少一系列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就不会有最终的和巩固的保障去防止资产阶级关系的恢复，即防止新的奴役，新的数十年的白色恐怖，新的帝国主义流血战争，等等。正是为了苏联人民群众的利益，列宁的党应当不仅反对战时共产主义的思想意识残余，并且还要反对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政治积淀，这种积淀是同新经济政策时代和由于新经济政策而终于（！）到来的国内生活福利的提高联系在一起。

* * *

列宁在为第三国际的建立而作的《争取到的和记载下来的东西》一文中写道：

“被革命工人极其丰富的新鲜经验光辉地加以证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曾经帮助我们懂得了当前事变的发展完全合乎规律。

今后它还将帮助为推翻资本主义雇佣奴隶制而斗争的全世界无产者更加明确自己的斗争目的，更加坚定地沿着既定的方向前进，更加扎实地夺取胜利和巩固胜利。”①（着重号全是我加的。——格·季·）

这说得很朴实，是用列宁的方式说的：夺取胜利和巩固胜利。夺取胜利——党在列宁的直接领导下已完成了这一任务。胜利已经取得，现在问题在于巩固这个胜利。这也不是件容易的事，简单的事。

“完成”对我们来说在许多方面要比“开始”困难得多。现在的工农联盟已不仅仅是反对地主和资本家的共同斗争。这首先是一起进行经济和文化建设。在《论粮食税》一书纲要中列宁写道：“这个反对邓尼金之流的联盟不是（这个）经济建设中的联盟。前者＝资产阶级革命。后者＝社会主义革命。”②（着重号是我加的。——格·季·）

建立在经济建设基础上的工农联盟，今后将比迄今为止更为必要。在革命的新的（经济的）时代如何在这一联盟中保持无产阶级领导，这一点列宁把所有基本的东西都及时作了阐述，特别是在他论新经济政策的主要著作中，在《论合作社》、《宁肯少些，但要好些》等文章中，以及在反对“发号施令”的讲话中，等等。

如何在工农联盟内部保持无产阶级的领导和如何在农民国家继续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这是托洛茨基主义最没有弄清楚的问题。而这毫不奇怪。托洛茨基主义摔跤最多的地方恰恰是农民问题，把运动的局部同整体联结起来的问题，研究农民国家的具体革命道路问题。这一根本性的有机缺陷妨碍托洛茨基主义在目前的革命阶段理解复杂的力量配合。

我们现在常常重复工农联盟一词，却不懂得，问题不在于简单的联盟，而在于无产阶级应起领导作用的那种联盟。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35卷第506页。——译者注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41卷第376页。——译者注

我们应当迁就“小农和极小农”的理智（而不是偏见），同时仍然是国际无产阶级革命家。

我们在上面已经足够详尽地指出，如果根据列宁所写所说的去说明一国社会主义最终胜利的可能性问题，那末问题是百分之一百清楚的。所引的列宁的无数声明是不允许作任何曲解的。

本章所分析的问题是列宁的言论百分之一百解决了的问题。这些问题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联系在一起的。正是在这些问题上，政治和经济的最新事实完全证实了列宁主义的正确性。

1915年，列宁第一次特别准确地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起初在一国首先取得胜利的可能性。而当在一国（在俄国）取得了这种胜利，列宁在许多年里几乎每天都在重申，这还不是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这只是部分胜利，只有在国际范围内才可能取得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

* * *

列宁向我们指明了全部道路。局势是非常有利的。现在我们面临的任务是简单的，然而却是伟大的——在我们现在所处的局势下，巩固在农民国家的胜利。而巩固在我国的胜利，这同时也就意味着打开其他国家工人胜利的道路，使易于取得这一胜利，给以援助，从而为共产主义在全世界的最终胜利做好准备。

第十五章

列宁关于党的作用的学说

论无产阶级专政和党专政问题

毫无疑问，布尔什维主义关于党在革命中的作用的观点是列宁主义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同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所说过的东西比起来，正是在这一领域列宁主义提出了许多新东西。这是可以理解的。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早在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真正开始以前就逝世了。在他们生前还没有经过锻炼的、具有丰富经验的共产党，在这一领域补充和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观点的任务正好落在了列宁的肩上。当然，在这里，象在其他一切领域里一样，列宁主义可以说是整个地站在马克思主义的肩膀之上的。但是，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列宁主义不得不十分艰难地为自己开辟独立的道路。

回顾俄国布尔什维主义同孟什维主义的 20 年斗争，我们现在清楚地看到，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的第一次分裂的起点，就实质而言就是**关于党在革命中的作用问题**。实际上，在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1903 年）上激化并导致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第一次分裂的关于党章第一条的著名争论，放在历史的远景中来看能是别的什么问题吗？

在这次分歧开始的时候，由于完全可以理解的原因，甚至列宁也没有看出争论的全部含义。那时他把对孟什维克的指责说成是指责“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但是很快就清楚了，问题决不只是

组织问题，而是要大得多的问题，争论的恰恰是工人在革命中的历史作用问题。

列宁及追随他的一些布尔什维克还在本世纪初就曾不止一次地指出，巴黎公社覆灭的原因之一就是法国工人中间缺乏一个统一集中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巴黎公社运动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部分地相互敌对和相互矛盾的派别。

现在我们越是密切研究巴黎公社的历史，有关它的新材料出现得越多，就越清楚地看到列宁是多么正确。特别是在许多关于巴黎公社的口头报告中（可惜，远非所有的报告都记录下来和刊印出来），他十分坚定地强调了这一思想，即巴黎公社覆灭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缺乏一个团结、集中的无产阶级政党。

自然，不应该把问题简单化。巴黎公社也很可能会在有这样的政党的情况下覆灭。缺乏这样的政党一事当然也不是偶然的，而是同法国工人阶级不够成熟，同整个阶级关系有关。巴黎公社社员的起义首先是由战争局势（普法战争）引起的。法国无产阶级的人数还太少。但是毫无疑问，巴黎公社覆灭的一个最重要原因毕竟还是缺少一个集中的无产阶级政党。

从反对“经济派”的斗争起，到反对孟什维克和取消派，直至反对布尔什维主义内部的各种倾向（直到“工人反对派”倾向）的斗争止，列宁极其重视把阶级和政党的概念混淆起来的错误。

还在关于出版《火星报》的声明里（1900年11月）列宁就已写道：

“谁把社会民主党理解为一个只搞无产阶级自发斗争的组织，谁就会满足于只搞地方性的鼓动工作和‘纯工人的’书报。”

我们不是这样理解社会民主党的。我们认为它是一个反对专制制度、同工人运动紧密联系的革命政党。只有组织成这样一个政党的无产阶级，即现代俄国最革命的阶级，才能够完成它所肩负的历史任务：把全国一切民主分子团结在自己的旗帜下，进行顽强的斗争，彻底战胜万恶的制度，完成历代先人的未竟之

业。”^①

在第一号《火星报》上，列宁在《我们运动的迫切任务》一文中同“经济派”争论说：

“‘组织起来！’《工人思想报》用各种调子一再向工人这样宣传，‘经济派’的一切拥护者也一再向工人这样宣传。我们当然完全同意这个呼吁，但是一定要补充一句：不但要组织互助会、罢工储金会和工人小组，而且要组织政党，组织起来同专制政府和整个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坚决的斗争。不这样组织起来，无产阶级就不能去进行自觉的阶级斗争，不这样组织起来，工人运动就会软弱无力，只靠一些储金会、工人小组和互助会，工人阶级永远不能完成自己所肩负的伟大历史任务。”^②

众所周知，在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1903年）上同孟什维克分裂以后，列宁指责孟什维主义首先恰恰在党的作用问题上重犯了“经济派”的错误。列宁在《进一步，退两步》中同巴·波·阿克雪里罗得辩论说：

“如果说，党应当是**组织的总和**（并且不是什么简单的算术式的总和，而是一个整体），那么，这是不是说我把党和组织这两个概念‘混淆了’呢？当然不是。我只是以此来十分明确地表示自己的愿望，自己的要求，使作为阶级的先进部队的党成为**尽量有组织的**，使党只吸收**至少能接受最低限度组织性的**分子。反之，我的论敌却把有组织的分子和无组织的分子，接受领导的分子和不接受领导的分子，先进的分子和不可救药的落后分子——因为还可救药的落后分子是能够加入组织的——**混淆在党内**。这样的混淆才真正是危险的。……”

把作为工人阶级先进部队的党同整个阶级混淆起来，显然是绝对不行的（着重号是我加的。——格·季·）。阿克雪里罗得同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317—318页。《〈火星报〉编辑部声明》。——译者注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336页。——译者注

志……正是犯了混淆起来的错误（这种错误是我们的整个机会主义经济派的特点。”^①

在列宁主义反对取消派的斗争年代（1908—1914年）里，又用另一种说法重复了这一争论。《维·查苏利奇在怎样伤害取消派》一文最为完整地汇集了这一时期列宁提出的论据。

“结论是：在一切国家里，无论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地方，除开‘党’以外，还有靠近党的‘广大阶层’和组成党、挑选党、抚养党的那个阶级的广大群众。取消派不懂得这个简单明了的事情，因而重犯了1895—1901年‘经济派’的错误；而经济派无论如何是不能了解‘党’和‘阶级’之间的差别的。

“党是阶级的觉悟的、先进的阶层，是阶级的先锋队。这个先锋队的力量比它的人数大十倍，一百倍或者更多。

这是不是可能的呢？一百个人的力量是不是能够超过一千个人的呢？

当一百个人组织起来的时候，不但可以超过而且一定会超过。

组织能使力量增加十倍。这个道理的确不是新的。如果对维·查苏利奇和取消派不得不从头讲起，那不是我们的罪过。

先进队伍的自觉性还表现为它善于把自己组织起来。它一旦组织起来，就会产生统一的意志，而这先进的一千人、一万人、一百万人的统一意志就会变成阶级的意志。党和阶级之间的媒介就是“广大阶层”（比党大，比阶级小），就是投票赞成社会民主党的阶层，援助和同情社会民主党的阶层，如此等等。……

马克思主义者是以根本不同的态度来看待没有组织起来的（和在长期内，有时是几十年不受组织领导的）群众对党、对组织的关系的。正是为了使一定阶级的群众能够学会认清自己的利益、自己的地位，学会推行自己的政策，正是为了这一点，才必须立即建立而且无论如何也要建立本阶级先进分子的组织，即使起初这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8卷第252、254—255页。——译者注

些分子只占本阶级极少的一部分也没有关系。为了为群众服务和代表他们正确地意识到的利益，先进队伍即组织必须在群众中大力进行活动，从而吸收他们当中一切最优秀的力量，并且随时随地都要仔细地和客观地检查：是不是同群众保持着联系，联系是否密切。这样，也只有这样，先进队伍才能教育和启发群众，代表他们的利益，教他们组织起来，指导群众的全部活动沿着自觉的阶级政策的道路前进。”①

列宁主义关于党的作用的这一系列观点直到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直到最近俄共党内斗争事件，直到列宁生前的最后时日都始终没有变。

在列宁所写的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关于我们党内工团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倾向的决议中我们看到：

“不正确地理解共产党对非党无产阶级的作用以及共产党和非党无产阶级对全体劳动群众的作用，就是在理论上根本违背共产主义，就是工团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倾向，而这种倾向贯穿在‘工人反对派’的全部观点之中”。②……

* * *

首先把《进一步，退两步》和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关于共产党作用的讲话中的两段引文对照一下，就可以具体地看到列宁主义关于党的作用观点的完整的继承性。

这两个声明时隔15年以上。两个声明中间间隔有三次革命。工人阶级已从被压迫、被迫害的阶级变成统治阶级。党从小小的地下小组发展为管理着世界上的一个伟大国家的强大力量。而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作用的学说基本上依然如故——因为这一学说还在二十世纪初就牢牢地形成并为二十世纪头二十年的伟大事件所完全证实了。

“我们是阶级的党，因此，几乎整个阶级（而在战争时期，在国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19卷第407—408、410页。——译者注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41卷第85页。——译者注

内战争年代，甚至是整个阶级)①都应当在我们党的领导下行动，都应当尽量紧密地靠近我们党，但是，如果以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论在什么时候，几乎整个阶级或者整个阶级都能把自己的觉悟程度和积极程度提高到自己的先进部队即自己的社会民主党的水平，那就是马尼洛夫精神和‘尾巴主义’。还没有一个明白事理的社会民主党人怀疑过，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连职业的组织(比较原始的、比较容易为落后阶层的觉悟程度接受的组织)也不能包括几乎整个工人阶级或者整个工人阶级”。②

请把列宁 15 年后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所说的话同这些话对比一下：

“政党所能吸收的只是本阶级的少数，正如在任何资本主义社会里，真正觉悟的工人也只占全体工人的少数一样。所以我们必须承认，只有这觉悟的少数才能领导广大工人群众，引导他们前进……

我们需要的是能够经常同群众保持真正的联系的党，善于领导这些群众的党……”③

列宁说过在战争时期，在国内战争时期整个阶级都应该而且将在我党的领导下活动，这一预言完全被证实了。

不仅是在无产阶级夺得政权以前，在夺取政权和夺得政权以后俄国共产党的发展，而且共产国际的所有其他最重要的支部的发展，每天都在证实列宁主义关于党的作用学说的正确性。

* * *

从同经济派斗争起到同我们的工人反对派斗争止，列宁在 20 年期间始终同混淆“阶级”和“政党”这两个概念的错误进行斗争。列宁同这一错误作斗争，把它看做是最大的危险的根源：混淆这两

① 着重号是我加的。——格·季·。

② 《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8 卷第 255 页。《进一步，退两步》。——译者注

③ 《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39 卷第 224—225 页。《关于共产党的作用的发言》。——译者注

个概念能导致并且已经不只一次地导致贬低、削弱党——即先锋队的作用，从而推迟整个阶级的解放。

现在，在苏联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九个年头，在我们这里无产阶级已停止瓦解之后，在整个工人阶级越来越牢靠地站在共产主义基础上之后，混淆“工人阶级”和“政党”的危险并没有完全消除，但变得小一些了。党在最近几年里将越来越同阶级融合在一起。党工工人和非党工人之间的差别将越来越缩小。全体或者几乎全体产业工人都将参加党（而产业工人的数量当然将增长）的时代将会到来，并且已经不远了。

我们的党是**工人的党**。这就是说，党在任何时候也不能把工人阶级看成施加影响的“对象”，而把它自己看成施行影响的“主体”。不，党本身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党生活在工人阶级的毛孔之中。党是从工人阶级中间生长出来的。在这里摆在我们面前的并非先锋队单方面影响其整个阶级的过程，而是双方互相影响的过程。越往前发展，就越是这样。

那末，同农民的关系怎样呢？

工人阶级和农民在目前时期是我国的两个基本阶级。作为工人党，我党还给自己提出领导农民的任务。不仅如此，党还给自己提出了消灭工农差别的历史远景，使两者都成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工作者。党不允许组织特殊的农民党，因为这样的党必然要引导农民走上反工人阶级的小资产阶级政策的道路上去，从而给工人阶级和农民带来无可挽回的危害。党在革命现阶段，直到社会主义完全巩固，也就是到完全消灭阶级为止，负责全面领导农民。但这并不是说我们的党成了工人农民党。在后一种情况下，其结果大致同容许成立特殊的农民党相同；党完成不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反而会给工人阶级和农民带来无可挽回的危害。

现在社会上有一种新的危险：把党同两个阶级混淆起来；把“党”这一概念与“工人阶级加农民”的概念混为一谈。现在党不仅应该领导工人阶级，而且应该领导农民，从这种情况出发往往得出

错误的结论，似乎党本身应该成为双重的或者二元的工人农民党。

如果说，把党和工人阶级混为一谈，这种把“党”和“阶级”的概念混为一谈曾经是（并且仍然是）极其危险的话，那么把党不是同工人阶级，而是同工人阶级加农民混为一谈，就百倍危险了。

这里问题在于两个阶级，其中一个阶级（无产阶级）在顺利的条件下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将借助于示范和帮助者“改造”另一个阶级。为了使无产阶级能够完成这一任务，首要的条件就是它的党仍然是工人的党，无产阶级的党。

为了在目前局势下按新的方式领导苏联境内的农村，我们至少需要几十万个农民积极分子，我们将逐步造就这样的积极分子。但是他们当中只有那些真正够共产党员的人才能参加党。

自然，党也要吸收农民加入自己的队伍，这些农民是最健全、最靠近工人阶级的成员，是劳动群众中真正的先进分子。

自然，不应当把党的社会成分问题简单化。问题不仅在于党内有多少工人，多少农民和“其他分子”。事情要复杂一些。但是，不言而喻，社会成分具有巨大的意义。

马克思（和列宁）的理论把无产阶级的世界历史作用看作是唯一切彻底革命的阶级，最先进的阶级，全体劳动人民的领导者的作用。我们的党是工人阶级的党，这不仅仅是因为它的工人成分，而且也因为它捍卫着工人阶级先锋队所达到的那种思想体系。工人群众接近并且理解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思想体系，这是因为工人的劳动条件使他们容易接受这种思想体系。农民由于他们的经济条件要做到这点就比较难。随着农民“转变”为“文明的合作社工作者”情况将会好转。而暂时党还只能吸收那些在思想上接近无产阶级的农民加入自己的行列。

与此同时，党能够找到通向最广泛的农民阶层的道路，能够用符合事业的需要的形式把他们组织起来，通过苏维埃（活跃苏维埃），通过合作社等等。组织农民的问题现在是，在近期内也将是党的最迫切的问题。组织阶段（在组织农村的意义上）才刚刚开

始。在这一领域我们才迈出了第一步。困难将是不小的，但一定会找到办法的。

以组织农妇为例。不言而喻，不使农妇摆脱目前的消极和狭隘状态，就不能巩固地建成社会主义社会。需要唤起、组织、启导她们，把她们引入社会生活。现在我们找到了这种组织形式：妇女代表大会。这种灵活的组织形式具有很大的优越性，一方面它使我们能够逐渐吸收全体农妇，同时又不把缺乏修养的、不够无产阶级水平的分子直接吸收入党。

我们认为，农村的青年团大体上也可采用这种组织形式（各种各样的辅助性组织也许可采用“代表”制等等）。自然，对青年团在许多方面应采取跟对党不同的另一种态度。党在青年团中的影响，党对青年团的领导——这是主要的。但是社会成分也具有巨大的意义。使领导中“工人占多数”的任务，改善团的社会成分的任务不应同党的领导任务对立起来，反之亦然。领导权首先应当掌握在青年工人加青年农民中的优秀分子手里。

作相应的变更之后，这也同样适用于全体成年农民，我们应该通过合作社，通过农村苏维埃，通过互助委员会等等，把他们组织起来，然而决不是把全体群众（或者甚至全体积极分子）直接吸收入党。

但是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纵容下列倾向，这种倾向现在还在许多地方占统治地位，其方针是向农民积极分子中的优秀分子完全关上入党的大门：据说这样将会安静一些，会少一些麻烦，我们将“自己”执掌政权等等。对这种反动腐败的情绪应当给以最坚决的反击。

* * *

布尔什维主义一提出党在革命中的作用问题，孟什维克马上宣布这是用“对无产阶级的专政”来偷换无产阶级专政。

过了15年，当俄国工人阶级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实现了无产阶级专政，这时出现了国际孟什维主义，它重复在布尔什维主

义迈出最初几步时投向布尔什维主义的这种贫乏无味的非难。

1917年十月革命以后，考茨基之流说不出别的什么话了。他们同样宣称，俄国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对无产阶级的专政”。因此他们从列宁的《叛徒考茨基》以及其他著作中受到了应得的惩罚。

“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党专政”，——第二国际的英雄们这样评价苏联的苏维埃政权。

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列宁主义的观点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呢？

无产阶级专政没有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专政，即没有无产阶级政党的专政是不可能的；没有无产阶级政党的专政，至少胜利的巩固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不可能的。巴黎公社的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党专政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函数。

一个布尔什维克如果说“我们是党专政，而不是无产阶级专政”，那他不仅是胡说八道，而且是直接往反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磨盘加水。因为，换句话说，他也就是在重复孟什维克在1903—1904年或考茨基之流在1918年所写的那些东西。“党专政，而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公式等于“对无产阶级的专政”的孟什维克公式。

但是如果有一个布尔什维克反过来说：“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而不是党专政”，那末他恰恰是忘记了列宁主义学说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即列宁关于党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作用的观点。“无产阶级专政，而不是党专政”，这种对立本身从列宁主义观点看来就是不正确的。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和“党专政”这两个概念的相互关系问题是布尔什维主义的最基本的问题之一。正确评价这种相互关系是通向正确评价整个列宁主义立场的道路。布尔什维主义的一系列活跃的线路都在这里，在这一点上交叉。这是列宁主义的脊梁骨。这是布尔什维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活的神经。因此阐明这一问题具有首要的理论意义和政治实践意义。

还在1917年6月14日发表的在全俄第一次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说过：

“他(策烈铁里。——格·季·)说，俄国没有一个政党会表示决心要掌握全部政权。我回答说：‘有的！任何一个政党都不会放弃这样做，我们的党也不放弃这样做，它每一分钟都准备掌握全部政权。’”^①(着重号是我加的。——格·季·)

看来，这清楚不？列宁完全坚持他关于苏维埃体制和无产阶级专政的1917年4月4日的著名提纲，他在自己的敌人面前，在我们党还处于少数的第一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公开宣布，这个“党准备夺取全部政权”。

十月革命以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这一点不只一次地发表了更为明确的意见。例如，在全俄教育和社会主义文化工作者代表大会上列宁说：

“当有人责备我们是一党专政，提出——象你们所听到的那样——建立社会主义统一战线时，我们就说：‘是的，是一党专政！我们就是坚持一党专政，而且我们决不能离开这个基地(着重号是我加的。——格·季·)，因为这是一个在几十年内争得了整个工厂无产阶级即工业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地位的党。这个党还在1905年革命以前就取得了这种地位。这个党在1905年领导了工人群众，从那时起，在1905年以后的反动时期内，即当工人运动在斯托雷平杜马的条件下历尽艰辛恢复起来的时候，它一直和工人阶级打成一片。因而只有这个党才能领导工人阶级去深刻地根本地改变旧社会。’”^②

还能说得更清楚吗？“是的，是一党专政！我们所依靠的就是一党专政，而且我们决不能离开这个基地。”我们应当记住列宁的这一声明。

在《左派幼稚病》这本小册子里列宁写道：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30卷第240页。——译者注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37卷第125—126页。——译者注

“……要使无产阶级能够正确地、有效地、胜利地发挥自己的组织作用（而这正是它的主要作用），无产阶级政党的内部就必须实行极严格的集中和极严格的纪律。无产阶级专政是对旧社会的势力和传统进行的顽强斗争，流血的和不流血的，暴力的和和平的，军事的和经济的，教育的和行政的斗争。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势力。没有铁一般的在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党，没有为本阶级一切正直的人们所信赖的党，没有善于考察群众情绪和影响群众情绪的党，要顺利地进行这种斗争是不可能的。”①

在同一本小册子里列宁还宣布：

“‘是党专政还是（着重号是列宁加的。——格·季·）阶级专政？’……单是问题的这种提法就已经证明思想混乱到了不可思议的无可救药的地步（着重号是我加的。——格·季·）。这些人竭力要标新立异，结果却弄巧成拙。谁都知道，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只有把不按照生产的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区分的大多数人同在生产的社会结构中占有特殊地位的集团对立时，才可以把群众和阶级对立起来；在通常情况下，在多数场合，至少在现代的文明国家内，阶级是由政党来领导的。”②

“是党专政还是（着重号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加的。）阶级专政”这种提法本身就证明了“思想混乱到了不可思议的无可救药的地步”。

这也就是说，一个布尔什维克如果宣称“我们是党专政，而不是阶级专政”那是多么荒谬，而如果一个布尔什维克反过来说：“我们是阶级专政，而不是党专政”，那又是多么愚蠢，多么错误。不能把这两个概念互相对立起来。一个概念是另一个概念的补充和表现——这就是关键之所在。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39卷第24页。《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译者注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39卷第21页。《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译者注

在另一个地方列宁详细地解释了为什么无产阶级专政恰恰要以党专政为前提。在《论工会》这一小册子中列宁写道：

“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候，无产阶级专政是不可避免的，而这种专政却不是由包括全体产业工人的组织来实现的。（着重号是我加的。——格·季·）为什么呢？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看看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关于政党的作用的提纲。①我在这就不详细说了。我们得到的结论是这样：可以说党吸收了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由这个先锋队来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着重号是我加的。——格·季·）。可是，没有工会这样的基础，就不能实现专政，就不能执行国家职能。而这些职能必须通过一系列特别的、并且同样是某种新型的机关，即通过苏维埃机关来实现。……然而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由包括全体无产阶级的组织来实现（着重号是我加的。——格·季·），因为不仅在我们这样一个极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就是在所有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都还那样分散，那样被人鄙弃，在某些地方还受人收买（具体来说，在某些国家里被帝国主义收买），以致无产阶级专政不能直接由包括全体无产阶级的组织来实现。只有吸收了阶级的革命力量的先锋队，才能实现这种专政。”②

什么是吸收阶级的革命力量的先锋队呢？这就是共产党。换句话说，列宁教导我们，无产阶级专政不能由包括全体产业工人的（更不用说农民了）组织来直接实现，而只能由共产党来实现这一专政，共产党把无产阶级先锋队吸收到自己的行列中来，它拥有苏维埃、工会等等一系列联系群众的纽带。

列宁继续说：“这里是一个由若干齿轮组成的复杂体系，而不可能是一个简单的体系，因为无产阶级专政不能由包括全体无产

① 这个提纲是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密切参与下由我起草的，他曾不只一次地在报刊上表示完全赞同这一提纲。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40卷第200页。《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同志的错误》。——译者注

阶级的组织来实现(着重号是我加的。——格·季·)。没有一些把先锋队和先进阶级群众、把它和劳动群众连结起来的‘传动装置’,就不能实现专政。”

“照我看来,托洛茨基……,是犯了一系列牵涉到无产阶级专政问题的本质的错误。”(着重号是我加的。——格·季·)①

在上面的引文里列宁引用了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关于党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作用的决议。所有还没有完全搞清楚“无产阶级专政”和“党专政”这两个概念的相互关系的共产党人都有必要把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上述决议同上面所引用的列宁的观点比较一下。任何人都会相信,决议的内容同这些观点是完全一致的。

没有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领导,全体产业工人的组织是不能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农业工人不用说了,组织在苏维埃中的半无产者和农民更不用说了。为什么?由于非常简单的原因。因为在资本主义下广大工人阶层受压制,受屈辱,没有文化,极其分散;还因为在无产阶级革命以前共产党照例无法把大多数工人组织到自己的队伍中来(关于这一点见上述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因为,我们需要有无产阶级革命本身作为胜利地改造和重新教育广大无产阶级群众的先决条件。

在不久前发表的恩格斯致伯恩施坦的一封信中我们读到:

“德国人的重大错误就在于把革命想象成一夜之间就能完成的事情。事实上,它是群众在加速情况下的多年发展过程。”②(着重号是我加的。——格·季·)

马克思本人在报刊上也表示过同样的思想,他谈到即将到来的几十年的国内战争,在这期间将要改造和重新教育数以百万计的无产阶级群众: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40卷第200—201、202页。《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同志的错误》。——译者注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40页。——译者注

马克思对工人们说：你们必须经历15年、20年、50年的国内战争和国际战争，以便不仅改变相互关系，而且也改变自身，使自己能够进行政治统治。

由此产生吸收阶级的革命能量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即党的伟大作用。自然，说的是这样的先锋队，它同整个阶级确实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它同整个阶级打成一片，它是作为阶级的无产阶级的首脑和铁腕。列宁说的正是这样的党——工人阶级的真正的先锋队，只有它能够实行阶级的专政。

在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的前夕，列宁在著名的小册子《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中说：如果说13万地主能管理沙皇俄国，那末得到数百万劳动者同情的24万布尔什维克党党员就更能管理了。

在夺取政权半年之后列宁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这本小册子中说：

“我们布尔什维克党已经说服了俄国。我们已经夺回了俄国——为了穷人，为了劳动者，从富人手里，从剥削者手里夺回了俄国。现在我们应当管理俄国。”^①

“现在我们应当管理俄国。”我们是谁？布尔什维克党——吸收了阶级的革命能量的先锋队。

1920年列宁提出下列意见：

“我们要重视承认党的领导作用问题……我们必须知道并且记住，从法律上和事实上来说，苏维埃共和国宪法的基础都是：党在纠正缺点、制定措施和进行建设的时候，都是遵循这样一个原则，就是要使那些同无产阶级息息相关的共产主义分子能够引导无产阶级贯彻他们的精神，服从他们的领导，摆脱……资产阶级的欺骗。……从原则上说，对于应该有共产党的领导这一点，我们不能有任何怀疑。……每一个宣传员（我们中间的每一个人。——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155页。《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译者注

格·季·)都属于管理和领导整个国家、领导苏维埃俄国同全世界资产阶级制度进行斗争的党。他们代表正在斗争的阶级,代表领导着并且应当领导巨大的国家机构的党。”①

“要管理,就需要有一支经过锻炼的共产主义革命者的大军,这样的大军是有的,这就是党。一切工团主义的荒谬言论,生产者提出的必须接受的人选,——所有这些都应当扔到废纸篓里去。如果走这条道路,实际上就是不要党,实际上俄国也就不可能有无产阶级专政。”②

* * *

但是,也许列宁在1920年所讲的话现在已经不正确了。是这样吗?没有的事!要知道我们全都“接受”了列宁在他临终前的最后几篇文章中所阐述的政治遗嘱。那末让我们仔细想想著名的《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一文中的下列段落:

“怎么可以把党的机关和苏维埃机关结合起来呢?这里难道没有什么不可容许的东西吗?

这个问题倒不是我要提出的。我在上面说过官僚主义者不仅在我们苏维埃机关里有,而且在我们党的机关里也有,这个问题是代表我这句话所暗指的那些人提出的。

真的,为了工作的利益,为什么不把两种机关结合起来呢?在外交人民委员部这样的人民委员部里,这种结合带来了极大的好处,并且从一开始就是这么做的,这难道还有谁没有看到吗?……难道苏维埃机关和党的机关这种灵活的结合,不是我们政策的巨大力量的源泉吗?我想,在我们对外政策方面证明正确和确立起来的东西,已经成为惯例而在这个部门已毫无疑问的东西,对于我们的一切国家机关至少是同样适用的(而我认为是更为适用的)。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39卷第403—404页。《在全俄省、县国民教育局政治教育委员会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译者注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40卷第254页。《在全俄矿工第二次代表大会共产党党团会议上关于工会的作用和任务的报告》。——译者注

工农检察院本来就是为我们的一切国家机关而设的，它的活动应毫无例外地涉及所有一切国家机构：地方的、中央的、商业的、纯公务的、教育的、档案的、戏剧的等等——总之，各机关无一例外。

对于活动范围这样广，又需要活动方式非常灵活的机关，为什么不能容许它用特殊的形式把党的监察机关同苏维埃的监察机关合并起来呢？

我看不出这里有什么障碍。而且我认为，这种结合是顺利工作的唯一保证。我认为，只有在我们国家机关的那些落满灰尘的角落里才会有人怀疑这一点，而对这种怀疑只有付之一笑。”^①（所有的着重号都是我加的。——格·季·）

这些话是一个完整的纲领。

什么是外交人民委员部？它是最重要的国家机关之一——是这样一个机关，苏联通过它与外国资产阶级接触，而它由于同党的联系而受到整个资产阶级世界的最多的攻击。现在回想一下列宁关于党的机关同外交人民委员部合并的公开谈话是特别有益的。

让我们回想一下，列宁对喀琅施塔得叛乱之后米留可夫之流直接提出的“没有布尔什维克的苏维埃”这个口号抱什么态度。他写道：

“同切尔诺夫之流和马尔托夫之流比较起来，米留可夫说得对，因为他泄露了真正白卫势力，即资本家和地主势力的真正策略：好吧，只要能打倒布尔什维克，只要能使政权变动，我们可以拥护随便什么人，甚至是无政府主义者，我们可以拥护随便什么样的苏维埃政权！”^②

象这样的和类似的列宁引文我们还可以举出很多。没有无产阶级先锋队即党的专政，也就没有工人阶级本身的专政。这就是所有这些引文所说明的东西。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384—385页。《宁肯少些，但要好些》。——译者注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41卷第227页。《论粮食税》。——译者注

自卫老爷们(包括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现在经常装出他们“已经成功地”揭开管理苏维埃国家的发条的“秘密”。他们喜欢装出一付样子,似乎他们现在已经猜出,比如,政治局在我们的管理体系中所起的领导作用。其实不是别人,正是列宁早在1920年就在《左派幼稚病》这本专门供译成世界上各种最重要语言而写的小册子里解释了苏维埃政权的结构,他公开写道:

“我们党每年召开一次代表大会(最近一次代表大会,每1000个党员选代表1人参加),由大会选出19人组成中央委员会领导全党,而且在莫斯科主持日常工作的则是更小的集体,即由中央全会选出的所谓‘组织局’和‘政治局’,各由5名中央委员组成。这样一来,就成为最地道的‘寡头政治’了。我们共和国的任何一个国家机关没有党中央的指示,都不得决定任何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或组织问题。”(着重号是我加的。——格·季·)①

为什么列宁丝毫不怕向全世界公开讲这个问题呢?为什么他不怕宣布“是的,是一党专政!我们所依靠的就是一党专政,而且我们决不能离开这个基地”?因为关于先锋队和整个阶级的相互关系问题是具有深刻的重要意义的理论问题和现实政治问题;因为这里没有什么可隐瞒的,也用不着隐瞒。我们国家的缺点,官僚主义的歪风,苏维埃、经济管理部门的阴暗面等等在人民群众看来都要由党负责。应当使人民把成绩——经济的提高,福利和文化的增长等等,也都记在我们党的身上。

自然,可以使每一种思想都变成谬论。自然,在象我们党这样的大党里,可能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可怜的布尔什维克,他们在宣传中,主要是在实践中在这一点上去“加深”列宁主义学说,以至于给党,从而也给工人阶级带来危害。自然,党最坚决地反对这种简单化的人。但并不因此而改变下列情况:按照列宁的学说无产阶级专政要通过先锋队的专政,通过无产阶级政党的专政来实行。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39卷第27页。《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译者注

从**阶级内容**来看苏联的现存制度是什么呢？

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

苏联政权的直接发条是什么呢？是谁去实现工人阶级政权呢？

是共产党！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是**党专政**。

在苏联政权的法律形式是什么样的呢？十月革命所创建的新**型国家制度**是怎样的呢？

这就是**苏维埃制度**。

两者一点也不矛盾。

* * *

因此，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观点的总和和可以用下述说法来表示：如果我们从**社会阶级**的观点看问题，那末这就是**阶级专政**。如果我们从**法律形式**，也就是从特殊的国家观点来看问题，那末这就是**苏维埃国家，苏维埃专政**。如果我们从**领导**的观点，从过渡社会整个巨大机器的内部机制的观点来看问题，那末，这就是**党专政**。

所以，在这里是从各种不同的角度观察无产阶级专政的。这并不是三种不同的“专政”，而是一种专政，它可以（也应该）从不同的观察点，从不同的出发点去观察。由此可见，把阶级的专政同苏维埃国家或者执行专政的党对立起来，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和不能允许的。

阶级的专政表现于苏维埃国家这种形式，同时也表现于实行专政的执政的共产党所处的领导地位这种形式。但是不应由此得出结论，苏维埃国家就是党，或者党就是工人阶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而工人阶级只有**通过和依靠**这个先锋队才能进行统治。但是先锋队只有同整个阶级保持联系才能成为先锋队，工人阶级的党只有同本阶级的**其余群众**保持联系才能成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如果失去这种联系，如果这种联系中断了，那末党就不能完成它的使命，而整个工人阶级就会毫无力量。

所以，阶级不是党。但是这决不妨碍以党的专政来体现阶级

的专政。从另一方面看，党（和阶级）也不是苏维埃国家，即所有的组织、人、机构及其“物质附件”（监狱、武器、整个国家组织的物质成分）的总和。苏维埃包括广大的人民群众，在这里建立起苏维埃与本阶级的大多数之间的联系；另一方面，这里不仅联合了工人，而且也联合了农民；最后，在这个国家组织的毛孔中还藏着无产阶级的异己分子（职员、资产阶级专家等等）。尽管如此，苏维埃国家毕竟还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形式。因为城市在文化上统治着农村，因为无产阶级的觉悟比小资产阶级高，因为无产阶级的党领导着无产阶级——而这一点极其重要并且具有决定性意义。如果党退出了实际管理机构，那么苏维埃国家就必然会垮台。如果共产党不再是执政党，不再是执掌政权的党，不再是实行专政的党，那末苏维埃政权就会不复存在，无产阶级专政就会不复存在。

我们还远未研究工人阶级各个部分和各种组织之间联系的形式。例如，我们还没谈到工会这一全体工人阶级的组织。工会的意义确实是巨大的。我们也没有谈及合作社，合作社的意义也是巨大的。我们请读者去看列宁关于这些所说的和所写的东西。

从所有这些得出什么结论呢？由此得出的结论是**阶级专政的机制决不象初看起来的那么简单**。工人阶级不能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作为整个阶级的组织来执掌政权，因为工人阶级在文化上和思想上不是单一的，这当然是由于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活的物质条件造成的。

如果是这样——而这无疑是这样的，——那末无产阶级专政的内部机制的复杂性就会得到充分的解释。

由此也就必然得出一系列实际政治结论。所有这些结论的共同基础可以表述如下：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复杂机制里，在此机制的各个部分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分工。因此破坏合理的联系和正确的关系必然起消极的作用。

在这里总的方面的最大问题之一是党的机关和苏维埃政权机关之间的相互关系。

客气地排挤党对苏维埃的领导意图必然导致苏维埃政权的变质，最后导致苏维埃政权的垮台（米留可夫先生、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的“没有布尔什维克的苏维埃”）。但是需要特别强调，在苏维埃政权机关和党的机关之间的相互关系上也可能有另一种错误。这种错误常常出现在党的机关不是领导苏维埃，而是倾向于取代苏维埃和“正规的”苏维埃机关。从一般政治的观点看，从组织技术观点看，这都是不正确的。因为不应当用“共产党员”去把一系列社会阶层吓跑，而需要吸引非党人士，应当善于象列宁所说的，“借他人之手来建设共产主义”，应当使广大群众习惯于遵守严格的革命法制，也就是习惯于国家政权制订的社会关系的规范，应当通过一切渠道，而不只是直接通过党，使越来越广大的群众参加国家的工作，等等等等。

真正“醉心于党性”，对待苏维埃机关抱错误的态度，用党专政去瞎“捅”，都会给党，给整个阶级造成损失。正因为如此，在同所有一切排斥党的领导和管理的企图作斗争的同时，党也必须同用党的机关取代苏维埃政权（或工会）机关的企图进行斗争——这点我们从俄共第八次代表大会起就不断指出过了。

“活跃苏维埃”的口号是认真的和长期的口号。在许多年内列宁主义都将致力于尽量使苏维埃更牢固、更深入地在千百万劳动人民的生活中扎根。那些现在只有几百人参加新生活建设的地方，将来（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应当有几千人参加建设。而那些现在有成千上万人参加建设的地方，将来就应该有几十万、几百万人参加。共产主义不能光靠共产党员的手去建成——这一思想渐渐成为最广大的工人群众的财富。近期的共产主义工作应是重新教育最广大的人民阶层，进行“文化革命”，使千百万劳动者参加到社会主义建设中来——这一真理是列宁主义的指路明星。

但是，不能靠削弱共产党的领导作用来实现这一伟大的纲领，相反地，只有在完全保持这种领导作用的情况下才能实现。领导的形式是而且应该是随形势而变更的，但它的实质是始终不变的。

列宁主义关于党的领导作用的学说对于当前的建设时期仍然是完全绝对正确的。削弱党的领导作用实际上也就是削弱无产阶级专政。世界无产阶级斗争的进程已经十分清楚地表明、无产阶级专政时期，向无阶级社会过渡的时期比在十月革命之初所能设想的时间要长得多。在整个这一时期内，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和作为无产阶级专政函数的党专政的学说，是始终不可动摇的。

* * *

关于工人党的结构的学说，也就是可以叫做组织问题上的列宁主义的学说，按其本质说，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从在企业里建立基层支部这一无产阶级政党的“原子”起，直到建立统一的世界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国际止，现在全世界的共产党人都在久经革命锻炼的列宁主义的经验的牢固基础上建设着自己的队伍。

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它是工人阶级最先进、最有觉悟，因而也是最革命的一部分。共产党是挑选最有觉悟、最奋不顾身、最有远见的优秀工人建立起来的。共产党没有与工人阶级不同的利益。共产党区别于全体工人群众的地方就在于，它从整体上观察工人阶级的整个历史道路，而且在这条道路的所有转折点上竭力维护整个工人阶级的利益，而不是个别集团个别行业的利益。共产党是一种政治组织杠杆，工人阶级的最先进的部分借助于这一杠杆把全体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群众引向正确的道路。

在无产阶级尚未取得国家政权，无产阶级尚未一劳永逸地巩固自己的统治并且尚未使其统治获得防止资产阶级复辟的保障的时候，共产党在自己的组织里通常将只包括少数工人。

阶级斗争要求把各种形式的无产阶级运动（苏维埃、工会、合作社、工厂委员会、文化教育工作、选举等等）统一于一个中心，实行总的领导。只有党才能成为这种总的统一的领导中心。只有它能保证对在不同的斗争舞台上活动的无产阶级的各个战斗队伍实行统一的领导。只有它才是争取工人阶级彻底解放斗争的中心枢

纽。

党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前和夺取政权中都起着极其伟大的作用。但是俄国革命的历史表明，在取得政权之后无产阶级政党的作用不仅没有减少，而且在增长。只是随着阶级的彻底消灭无产阶级政党才无存在的必要。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但是只有在这个先锋队在工人阶级争取自身解放的整个斗争期间始终能同全体无产者群众，同全体劳动群众保持紧密的、不可分割的联系条件下，它才能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

为了胜利地领导工人阶级争取解放的斗争，党应当铸成一个整体。对在自己队伍中实行自愿的铁的纪律必要性的认识应是同党血肉相关的。在直接的国内战争时期，共产党在自己的队伍内建立了直截了当的铁的军事体制。

列宁主义的党只能而且也只应该建立在民主集中制的基础之上，其主要原则是：上级组织由下级支部选举，绝对服从上级组织对所属支部的一切指示（在采取行动的时候），两次代表大会之间存在对党的生活的所有领导者都是不容争辩的具有权威的党中央。与此同时，列宁的党的结构应当是，在任何条件下都能最大限度地保证党内的无产阶级民主制，能够保证每个普通党员的主动性，提高他们的觉悟和积极性，使每个普通党员——工人能够真正地成长，使他的呼声能被听到，让他们的意见到处都能永远决定党的路线。有集中制，也有带引号的“集中制”。最近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德国共产党党内危机的信（1925年8月）可以作为最好例证。党内的无产阶级民主制是列宁主义的最重要原则之一。

自然，无产阶级政党的结构在各个国家，在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的各个阶段会有所改变。但是在列宁主义的组织原则中已经有许多对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政党来说是不变的和共同的成分。

第十六章

列宁主义和辩证法

1912年出版了四卷本的马克思与恩格斯通信集，它收入了将近整整40年的通信。共产主义创始人的这些通信使列宁能够就近观察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实验室。我们清楚地记得，当时列宁多么“如饥似渴”地仔细研究这四卷涉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上的各种各样问题的通信。列宁不仅自己研究了这四卷书中的每一句话，而且还号召那时和他住在一起（就是在克拉科夫）的所有同志都这么做。

列宁在1913年或1914年初所写的没有写完的文章里（见全集补卷），总结了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的这浩繁而又内容深刻的通信：

“如果我们想用一词来表明全部通信集的焦点，即其中所发表所讨论的一切思想集结的中心点，那末这个词就是辩证法。用唯物辩证法从根本上来改造全部政治经济学，把唯物辩证法应用于历史、自然科学、哲学以及工人阶级的政策和策略——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最为注意的事情，这就是他们做了最重要最新颖的贡献的地方，这就是他们在革命思想史上英明地迈进的一步。”^①

这在很大程度上也适用于列宁本人的著作。

“马克思没有丝毫的空想主义，就是说，他没有虚构和幻想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19卷第558页。《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译者注

‘新’社会。相反，他把从旧社会诞生新社会的过程、从前者进到后者的过渡形式（着重号是我加的。——格·季·），作为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来研究。他以无产阶级群众运动的实际经验为依据，竭力从这个经验中取得实际教训。他向公社‘学习’，就象一切伟大的革命思想家不怕向被压迫阶级的伟大运动的经验学习……一样。”①

列宁对马克思的这个评语我们难道不能完全运用于列宁本人和列宁主义吗？

列宁善于做事变的最积极、热情、“疯狂”（列宁喜欢的字眼）的参加者，同时他也善于象站在旁边一样以哲学家的冷静，以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为准绳，以自然科学家的客观态度完全客观地观察、评价和总结这些事件。列宁善于以最大的热情为某一似乎是细枝末节的东西而战斗；同时，他比任何人更能从整体上观察整个道路，按照某种难以捉摸的，只有他一个人看到的征兆把握住未来事件的脉搏，在事变尚未“冷却”，尚未结束的时候，清晰地看到社会发展中某一阶段的结束和新阶段的来临。象一个有经验的化学家在作他很熟悉的分析时善于观察曲颈瓶里的一切变化，事先知道最后的结果一样，列宁善于观察社会生活和革命斗争中所发生的“转变”（列宁最喜欢用的一个词），同时几乎总是准确无误地预料到在一定的时间地点条件下一定的发展阶段的最后结局。

列宁写道：“马克思的全部理论，就是运用最彻底、最完整、最周密、内容最丰富的发展论去考察现代资本主义。自然，他也就运用这个理论去考察资本主义的即将到来的崩溃和未来共产主义的未来的发展。

究竟根据什么材料可以提出未来共产主义的未来发展问题呢？

这里所根据的是，共产主义是从资本主义中产生出来的，它是历史地从资本主义中发展出来的，它是资本主义所产生的那种社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31卷第45页。《国家与革命》。——译者注

会力量发生作用的结果。

马克思丝毫不想制造乌托邦，不想凭空猜测无法知道的事情。马克思提出共产主义的问题，正象一个自然科学家已经知道某一种新的生物变种是怎样产生以及朝哪个方向演变的才提出该生物变种的发展问题一样。”^①

或者在另一个地方：

“马克思是严格根据他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一切前提确定无产阶级策略的基本任务的……在每个发展阶段，在每个时机，无产阶级的策略都应估计到人类历史的这个客观必然的辩证法。”^②

考察了列宁对马克思的这些评价，我们这些列宁的学生，完全有权说：de te fabula narratur——这个故事说的是你。这个评价完全适用于你，适用于你的学说（也就是适用于列宁主义）。

在自己的所有重要的著作中，在许多没有发表的当时完全是“为自己”写的札记中，列宁几十次谈到辩证法问题。现在我们越深入地聚精会神地观察列宁主义的思想实验室——其中包括还没有发表的列宁的著作和札记，就越看得清楚：列宁一向对辩证法怀有巨大的兴趣。

* * *

早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中我们就看到下列定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称之为辩证方法（它与形而上学方法相反）的，不是别的，正是社会学中的科学方法，这个方法把社会看做处在不断发展中的活的机体（而不是机械地结合起来因而可以把各种社会要素随便搭配起来的一种什么东西），要研究这个机体，就必须客观地分析组成该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研究该社会形态的活动规律和发展规律……所以马克思竭力去做的只是一件事：通过精确的科学研究来证明一定的社会关系制度的必然性，同时尽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31卷第80—81页。《国家与革命》。——译者注

② 《列宁选集》第2卷第602页。《卡尔·马克思》。——译者注

可能完全地指出那些作为他的出发点和根据的事实。为了这个目的，他只要证明现有制度的必然性，同时证明另一制度不可避免地要从前一制度中生长出来的必然性就完全够了，而不管人们相信或不相信这一点，不管人们意识到或意识不到这一点。马克思把社会运动看作受一定规律支配的自然历史过程，这些规律不仅不以人的意志、意识和意图为转移，反而决定人的意志、意识和意图。”①

列宁对辩证法所下的纯哲学定义异常深刻，也异常质朴——它们是“新鲜的”，散发着土地、生命和革命的“气息”。我们的任务自然不是在这里引用列宁关于辩证法所说过的一切。但是我们还是要引用一些话。

“辩证法是一种学说，它研究对立面怎样才能够同一，是怎样（怎样成为）同一的——在什么条件下它们是同一的、是相互转化的，——为什么人的头脑不应该把这些对立面当做僵死的、凝固的东西，而应该当做活生生的、有条件的、活动的、互相转化的东西。”②

“《Sie(事物)sind, aber die Wahrheit dieses Seyns ist ihr Ende》③

机智而且聪明！对通常看起来似乎是僵死的概念，黑格尔作了分析并指出：它们之中有着运动。有限的？——就是说，向终极运动着的！某物？——就是说，不是他物。一般存在？就是说，是这样的非规定性，以致存在=非存在。概念的全面的、普遍的灵活性，达到了对立面同一的灵活性，——这就是问题的实质所在。这种灵活性，如果加以主观的应用=折衷主义与诡辩。客观地应用的灵活性，即反映物质过程的全面性及其统一的灵活性，就是辩证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1卷第135—136页。《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译者注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38卷第111页。《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译者注

③ “它们存在着，可是这个存在的真理就是它们的终结。”

法，就是世界的永恒发展的正确反映。”①

“马克思的辩证法是最科学的进化论，它正是不容许对事物作孤立的即片面的、歪曲的考察。”②

“马克思辩证法要求对每一特殊的历史情况进行具体的分析。”③

“恩格斯在谈到他自己和他那位赫赫有名的朋友时说过：我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这个经典式的定义异常鲜明有力地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的往往被人忽视的那一方面。而忽视那一方面，就会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一种片面的、畸形的、僵死的东西，就会阉割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破坏它的根本的理论基础——辩证法，即关于包罗万象和充满矛盾的历史发展的学说；就会破坏马克思主义同时代的一定的实际任务，即随着每一次新的历史转变而改变着的任务之间的联系。”④

“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的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是辩证法的实质（是辩证法的‘本质’之一，是它的主要的特点或特征之一，甚至是它的最主要的特点或特征）。

任何一般都是个别的（一部分，或一方面，或本质）。任何一般只是大致地包括一切个别事物。任何个别都不能完全地包括在一般之中，如此等等。任何个别经过千万次的转化而与另一类的个别（事物、现象、过程）相联系，如此等等。”⑤

在这篇文章里我们还看到对马克思《资本论》所作的出色评价：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首先分析资产阶级社会（商品社会）里最简单、最普通、最基本、最常见、最平凡、碰到过亿万次的关系——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38卷第112页。《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译者注

② 《列宁选集》第2卷第642页。《第二国际的破产》。——译者注

③ 《列宁全集》第2版第22卷第310页。《论尤尼乌斯的小册子》。——译者注

④ 《列宁选集》第2卷第398页。《论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中的几个特点》。——译者注

⑤ 《列宁选集》第2卷第713页。《谈谈辩证法》。——译者注

商品交换。这一分析从这个最简单的现象中(从资产阶级社会的这个‘细胞’中)揭示出现代社会的一切矛盾(或一切矛盾的胚芽)。往后的叙述向我们表明这些矛盾和这个社会的发展,在这个社会的各个部分总和中的、从这个社会的开始到终结的发展(既是生长又是运动)。”①

说得多么质朴而又天才的深刻!

* * *

在纯哲学问题上,普列汉诺夫对辩证法的理解并不比列宁差。作为马克思哲学观点的启蒙者、著作家、宣传家和通俗解说者,普列汉诺夫是个强手。普列汉诺夫对我们所作的辩证法的纯理论论述是很出色的。但是把所有这些问题从学院式的天上搬到罪恶的大地,把辩证法运用于革命斗争,运用于群众运动,运用于社会发展,运用于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在这些领域普列汉诺夫则是完全软弱无力的。而正是在这些领域里列宁是一位真正的巨人。

列宁在一篇讲话中说,我们已经把社会主义“拖进”日常生活。关于辩证法列宁也能够这么说——列宁主义已经把辩证法“拖进”日常生活,“拖进”群众的日常斗争。

在列宁手里,辩证法被天才地运用于制定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 and 策略领域。

一种现象或一组现象“向何处发展”——这样提问题是列宁主义的一大特点。重要的不仅在于在某一时刻这一事实或这组事实是什么;重要的是首先弄清楚这些现象向何处发展。

“转变”一词是列宁主义语汇中最常用、最深刻的词汇之一。

基于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转变;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转变;帝国主义战争向国内战争转变;总罢工向武装起义转变;机会主义向社会沙文主义转变。

或者从另一个方面说,“农奴制地主经济慢慢地转变为容克-

① 《列宁选集》第2卷第712—713页。——译者注

资产阶级经济”^①——1905年后列宁认为这是农民的俄国朝“普鲁士”型式发展的可能性之一。

或者——“资产阶级民主到无产阶级民主的历史转折。

“前一种民主是‘长入’、‘爬入’还是被摧毁，并创立后一种民主？=经过革命还是不经过革命？”^②

如此等等。这些公式中的每一个公式都充满了最深刻的的内容，每一个公式都是运用革命辩证法的榜样。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是列宁主义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列宁在这方面的论述如同强大的探照灯照亮了无产阶级伟大的解放斗争的历史道路。正是在这个领域列宁的学说给最困难的，至今还没有阐明的世界解放运动问题投下了特别明亮的光芒。不弄懂列宁主义与辩证法的关系，就完全不可能懂得列宁主义学说中象关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这样极端重要的篇章。

列宁写道：“革命永远不会现成地诞生，永远不会从丘必特的头脑中产生。永远不会突然爆发。革命前总是要有一个酝酿、危机、运动、骚动的过程，革命开始的过程，而且这个开始并不总是能够发展到底的（例如，假使革命阶级软弱的话）。”^③

但是，如果谁根据列宁的上述“转变”观点把列宁的全部辩证法归结为进化论，那他就大错特错了。辩证法指的是这样一种“发展”，在这种发展中通过飞跃量能够转化为质；是这样一种发展，在这种发展的时候慢慢积累起来的分子的“量的”变化造成了“突发的”纯属“质的”变化。

当然，列宁从来不把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想象成“进

① 《列宁全集》第13卷第400页。《社会民主党在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译者注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37卷第259页。《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小册子的提纲》。——译者注

③ 《列宁全集》第2版第21卷第432页。《机会主义和第二国际的破产》。——译者注

化”，就象修正主义分子，马克思的“批评者”所习惯的那样。相反地，“飞跃”，以武装起义、革命的形式出现的“飞跃”，不仅是不言而喻的，并且是预见到的，是给予最大的注意和进行准备的目标。列宁的辩证法是革命的。

* * *

在关于俄国革命性质的第一次争论中，还在1905年总演习以前，列宁和普列汉诺夫都坚持俄国第一次革命将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在反对民粹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的争论中，列宁和普列汉诺夫当时都站在街垒的同一方。当问题仅仅涉及这一点时，普列汉诺夫是强有力的。他出色地反击了民粹主义的偏见，他以最辉煌的写作才华捍卫了关于俄国第一次革命必然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马克思主义的论点。

但是当俄国工人阶级由预备班转入一年级时，当应该使俄国无产阶级在行将到来的资产阶级革命中的策略具体化的时候，普列汉诺夫起初简直象个孩子一样束手无策，随后就滑到自由资产阶级立场上去了。当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出现了这样一些问题：俄国面临的究竟是什么样的资产阶级革命，农民在革命中将起什么样的作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之间有什么关系，农民俄国的工人阶级与资本主义欧洲的工业无产阶级之间会出现一些什么样的环节；当具体地出现了无产阶级在农民国家中的领导作用问题时，——这时候正是列宁挺身而出，只有他一个人能够向俄国和世界无产阶级指明道路。

“不言而喻，在这种经济基础上的俄国革命，必然是资产阶级革命。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原理是颠扑不破的。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忘记这一原理。无论什么时候都必须把它应用到俄国革命的一切经济和政治问题上去。

但必须善于运用它。只有具体分析各种阶级的地位和利益，才能确定这个真理应用于某一问题上的确切意义。在以普列汉诺夫为首的右翼社会民主党人中间，却时常出现一种相反的推论方

法，即他们力图在关于我国革命的基本性质的一般真理的单纯逻辑发展中去寻找具体问题的答案，这是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并且完全是对辩证唯物主义的嘲弄。”①

在第一次世界帝国主义战争时期，列宁主义的革命辩证法在内容上更鲜明、更丰富了，这时候国际问题按照特殊的绝对命令被提上了历史日程。列宁用无与伦比的技巧阐述了崭新的、空前复杂的困难问题。就象粘土“听命于”有经验的雕塑家一样，革命发展的最复杂的问题也“听命于”列宁的革命辩证法的巧手。

下面是1915年按照帝国主义战争的第一次大动荡的鲜明印记写下的不长的片断，还有什么能比这更清楚、更深刻、更丰富，更富于辩证法的呢？

“欧洲的社会主义革命，不能不是一切被压迫者和不满者的群众斗争的爆发。一部分小资产阶级和落后的工人，必然会参加这种斗争，——没有他们的参加就不能有群众性的斗争，就不能有任何的革命——因而他们必然会把自已的成见、反动的幻想、弱点和错误带到运动中来。可是客观上他们是向资本进攻的，而觉悟的革命先锋队，先进的无产阶级，则会表现出这种各式各样的、五光十色的、复杂的、表面上分散的群众斗争的客观真理，它能够统一和指导这个斗争，夺取政权，夺取银行，剥夺大家所憎恨的（虽然憎恨的原因各不相同！）托拉斯并实现其他的专政措施，以求最后推翻资产阶级和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而社会主义的胜利远不是一下子就能‘清除掉’小资产阶级的渣滓的。”②

列宁关于世界革命胜利是由1)无产阶级运动，2)农民运动，3)被压迫民族运动形成的学说——特别是他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在解放运动中的作用的学说——现在已成为人民群众的财富。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3卷第12页。《〈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第二版序言》。
——译者注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22卷第351页。《关于自决问题的争论总结》。——译者注

中国1925年夏季事件后列宁主义理论的这一部分特别清楚地具体化了。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1925年的中国事件是列宁主义的胜利。但是,还在1915年——中国事件前十年——要象刚才引用的片断那么清楚,那么朴实而冷静,那么天才地具体描绘出欧洲和亚洲行将到来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进程,这需要有多么天才的洞察力才做得到啊!

列宁写道:“然而政治与其说象算术,不如说象代数,与其说象初等数学,不如说更象高等数学。实际上,社会主义运动的一切旧形式中都已注入了新内容,因此在数字前面出现了一个新符号即‘负号’,可是我们那些圣哲仍然(现在还在)固执地要自己和别人相信,‘负三’大于‘负二’。”①

在这个“高等数学”领域里,列宁感到自己就象在家里一样自由自在。还在就1905年革命同孟什维克争论时列宁就写道:

“如果要真正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来估计革命,就应当把革命当作在某种客观条件下、进行某种活动以及多少顺利地运用某些斗争方式的生气勃勃的社会力量的斗争。在这种分析的基础上,当然也只有在这种基础上,估计斗争的技术方面和它的技术问题才是完全合适的,而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是完全必要的。”②

对生气勃勃的社会力量的斗争所作的正确估计使列宁主义得以完成其所完成的伟大事业。

正确地运用“高等数学”(也就是革命的辩证法)去计算生气勃勃的社会力量的发展,也帮助列宁主义对农民这一“现实的辩证矛盾”作出正确的评价(见《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如此出色地发展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思想。

“民主实行到一般所能想象的最完全最彻底程度,就由资产阶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39卷第81页。《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译者注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15卷第37页。《谈谈对俄国革命的估计》。——译者注

级民主转化成无产阶级民主，即由国家(=对一定阶级实行镇压的特殊力量)转化成一种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的东西。”①

我们已经知道，不仅对于孟什维克，而且可惜对于某些共产党人来说，列宁主义关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相互关系的观点至今仍然是百思不得其解的东西。

在前一章里我们看到，有些人不久前还发表布尔什维主义思想上“重新武装”的狂妄言论，这种人的不幸的根源正是在于不理解列宁主义的这一最重要的方面。

“前一革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格·季·)可以转变为后一革命(社会主义革命。——格·季·)。后一革命可以顺便解决前一革命的问题。后一革命可以巩固前一革命的事业。斗争，只有斗争，才能决定后一革命能比前一革命超出多远。苏维埃制度就是由一种革命发展为另一种革命的明证或表现之一。”②

如果这些爱好修正的人们能想一想列宁的这些话，那末就会少干一些企图“修正”列宁主义的徒劳的勾当。

* * *

为了掌握住整个链条，必须抓住“环节”，这种说法现在已经成为善于思考的工人们的巨大财富了。这种说法也是运用革命辩证法的范例。

“大飞跃时代真正应当注意的是：旧事物的碎片极多，并且有时比新事物的幼芽(不是常常可以一眼看到的)的数量积累得更快，这就要求我们善于从发展路线或链条中找出最重要的环节。有这样的历史时刻，当时为了取得革命的胜利，最重要的是多积累一些碎片，就是多破坏些旧机构；也有另一种时刻，即在破坏已经够了的时候，那就需要做些‘平凡的’工作(在小资产阶级革命家看来是‘枯燥无味的’工作)，清除地面上的碎片；还有一种时刻，这时最重要的是精心照料在瓦砾还没有清除干净的地面上，从碎片底下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31卷第40页。《国家与革命》。——译者注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42卷第172页。《十月革命四周年》。——译者注

生长出来的新事物的幼芽。

仅仅一般地做一个革命者和社会主义拥护者或者共产主义者是不够的。必须善于在每个特定时机找出链条上的特殊环节，必须全力抓住这个环节，以便抓住整个链条并切实地准备过渡到下一个环节；而在这里，在历史事变的链条里，各个环节的次序，它们的形式，它们的联接，它们之间的区别，都不象铁匠所制成的普通链条那样简单和粗陋。”①

《伟大的创举》中的下列语句说得多么深刻：

“当新事物刚刚诞生时，旧事物在某些时候总是比新事物强些，这在自然界或社会生活中都是常见的现象。讥笑新事物的幼芽嫩弱，抱着知识分子的轻浮的怀疑态度等等，——这一切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手段，是保护资本主义而反对社会主义。我们应当仔细研究新事物的幼芽，对它们极其关切，千方百计地帮助它们成长和‘护理’这些嫩弱的幼芽。其中有一些不免会死亡。不能担保说，‘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列宁当时论述过它。——格·季·）一定会起特别重要的作用。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应支持各种各样新事物的幼芽，生活本身会从中选出最富有生命力的幼芽。一位日本科学家为了帮助人们战胜梅毒，耐心地试验了605种药品，直到制出满足一定要求的第606种药品，要想解决战胜资本主义这一更困难的任务的人们，也应该具有坚韧不拔的精神来试验几百以至几千种新的斗争方法、方式和手段，直到从中得出最适当的办法。”②

善于从现象的一切方面去观察现象；善于从大量的事实中找出基本倾向；善于在头绪纷繁的事务中找出主要之物；善于把最大的力量集中于主要的东西上，同时又能避免任何片面性；善于把极复杂的现象“分解”为各个组成部分；善于用肉眼看到所有相互斗争的力量的细微的活动；善于in statu nascendi（在萌芽状态）预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185页。《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译者注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37卷第17页。《伟大的创举》。——译者注

料到正在萌发中的新形势——这就是列宁主义辩证法的实质。

“而实际生活和实际历史本身却包含有这些各不相同的趋向，正好象自然界的生命和发展过程既包含有缓慢的进化，也包含有迅速的飞跃，即渐进过程的中断一样。”^①

在尖锐的当前政治争论中，在最激烈的迫切政治论争中，列宁会“突然”转向最一般的辩证法问题。

在组织问题上同孟什维克展开激烈争论的时候，在充满了当前迫切政治问题的小册子《进一步，退两步》中，列宁“突然”走进了辩证法的领域。

“不研究每次战斗的具体情况，就丝毫不能了解我们的斗争。研究了这一点，我们就会明显地看出，发展确实是按着辩证的道路，矛盾的道路行进的：少数变成多数，多数变成少数；各方时而转守为攻，时而转攻为守；思想斗争的出发点‘被否定’……但以后就开始‘否定的否定’……在党章第一条问题上的孤立的偶然的错误已经发展成为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观点的所谓体系，这时这个现象同我们党的分成革命派和机会主义派这种根本划分的联系已经愈来愈清晰地呈现在大家面前。总而言之，不仅燕麦是按照黑格尔的规律生长的，而且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也是按照黑格尔的规律互相斗争的。”^②

普列汉诺夫总是以善于运用辩证法而自夸，但是一旦涉及俄国革命的最重大的问题时，他就陷入了机会主义的罗网——为了击中普列汉诺夫^③的要害，列宁在同一本书中写道：

“无论什么时候都不应当把马克思主义使之用脚立地后接受过来的伟大的黑格尔辩证法，同那种为某些从我党革命派滚向机会主义派的政治活动家的曲折路线进行辩护的庸俗手法混为一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16卷第348页。《欧洲工人运动中的分歧》。——译者注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8卷第411—412页。《进一步，退两步》。——译者注

③ 请比较列宁为《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第2版所写的序言。在这里，列宁详细分析了普列汉诺夫方法的错误。

谈，不应当把它同那种将各种特定的声明，将同一过程中不同阶段发展的各种特定因素搅成一团的庸俗态度混为一谈。真正的辩证法并不为个人错误辩护，而是研究不可避免的转变，根据对发展过程的全部具体情况的详尽研究来证明这种转变的不可避免性。辩证法的基本原理是：没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总是具体的……同时也不应当把这个伟大的黑格尔辩证法同那种可以用“脑袋钻不进去，就把尾巴塞进去”(mettere la coda dove non va il capo)这句意大利谚语来形容的庸俗的处世妙诀混为一谈。”^①

或者举1918年初列宁写关于解散立宪会议的提纲为例。题目似乎离哲学很远。政治空气紧张到了极点。街上在开枪射击。在引证迫切的政治理由的紧张时刻，列宁“突然”转向了辩证法，你们可以读到关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辩证转变等等在明确性和深刻性上都令人惊叹不已的全面评论。

或者在“关于工会的作用和任务”的热烈争论中，列宁“突然”从迫切的战斗题目转向辩证法，于是我们得到一些关于辩证法问题的经典篇章，它象列宁本人那样卓越、明确和不朽。请回想一下那深刻明确的关于“玻璃杯”的杰出的篇章。列宁主义的政策是建筑在科学的基础上的。列宁在辩证法领域，在自然科学领域以及其他领域的每一次涉猎，总是丰富了列宁主义的政治路线，使之在内容上更为深刻，更为广泛，更为全面。

回想一下列宁（和列宁领导下的布尔什维克中央）从1905年到1917年所写的许多关于《目前局势》的决议。就实质上而论，这是多么了不起的革命辩证法的典范和杰作！在对**目前局势**进行全面分析的同时，列宁主义也把握住**未来局势**的总轮廓。^②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8卷第412页。《进一步，退两步》。——译者注

② 除1905—1914年的范例以外，我们还可以举1917年的范例。只要提一提1917年4月4日的提纲和1917年4月10日的《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任务》（无产阶级政党的行动纲领草案）就够了。而“左派”幼稚病难道不是把辩证法运用于策略问题，并且是运用于不同国家的极其多种多样的局势的一个范例？

孟什维克喜欢嘲笑布尔什维克对“目前局势”的这种“强烈爱好”。机会主义之所以是机会主义，就是因为它“日复一日地”活下去，避开“幻想”，畏避伟大的革命前途。而列宁主义之所以是列宁主义，就因为它善于从今天的错综复杂的现象中抽出主要的东西，善于向自己和他人说明，向何处发展，目前形势“向何方发展”，目前局势会被未来什么样的局势所取代。

刻板、简单化和庸俗化是列宁不断地与之战斗的敌人。当它们在布尔什维克中间出现时，当简单化披上列宁主义外衣时，列宁对它们尤其不留情面。

列宁在纯哲学领域也严厉抨击了“直线性和片面性，死板和僵化”。^①当问题涉及现实的政策，涉及与群众斗争相联系的问题时，列宁对上述现象就更加无情了。

“个别向一般的转变，偶然向必然的转变，对立面的转化、转换（着重号是我加的。——格·季·）、相互联系。”^②——这就是列宁教导要认清的东西。没有比缺乏灵活性、“死板”更同列宁主义格格不入的东西了，它是“死板的、贫乏的、枯竭的”。^③

“全部历史，特别是历次革命的历史，总是比最优秀的政党、最先进阶级的最觉悟的先锋队所想象的更富有内容，更形式多样，更范围广阔，更生动活泼，‘更难以捉摸’。”^④

借用列宁的这些话，我们也可以说，列宁主义比自命为列宁主义信徒，可惜根本不懂得列宁称之为“转化、转换”的东西的那些人所想象的更富有内容，更形式多样，更范围广阔，更生动活泼，“更难以捉摸”。

正因为列宁主义内容如此丰富，如此全面，如此辩证，如此伟

① 《列宁选集》第2卷第715页。《谈谈辩证法》。——译者注

② 同上，第714页。——译者注

③ 同上，第712页。——译者注

④ 《列宁全集》第2版第39卷第74页。《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译者注

大，所以它迟早会为全世界所掌握。我们所有列宁的学生的终身任务，我们全党、整个共产国际的任务就是竭尽所能促使尽快尽早地实现。